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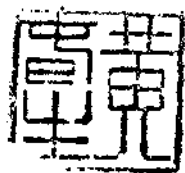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沙俄侵华史

第四卷（上）

THE HISTORY OF TSARIST RUSSIA'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VOLUME FOUR, PART I)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说 明

《沙俄侵华史》为四卷本。因最后一卷篇幅较多，分成上、下两册出版。参加本卷编写工作的有（按姓氏笔画为序）：吕一燃、刘存宽、杨诗浩、李嘉谷、余绳武、张之毅、徐曰彪、薛衔天。康佑铭参加了下册的工作。

本书一至四卷均由余绳武主编，刘存宽、徐曰彪参加定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7年7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19 世纪末沙俄对华侵略扩张的加紧	(1)
第一节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沙俄的外交活动与策划	
“三国干涉还辽”	(1)
一 19 世纪末远东国际形势与俄日矛盾	(1)
二 沙俄觊觎中国东北三省和邻邦朝鲜	(3)
三 甲午战争爆发前沙俄的“调停”及其后果	(7)
四 甲午战争爆发后沙俄的“不干涉”政策	(12)
五 策划“三国干涉还辽”	(17)
第二节 中俄“四厘借款”与华俄道胜银行	(22)
一 中俄“四厘借款”	(22)
二 华俄道胜银行的成立及其性质	(28)
第三节 “中俄密约”与东省铁路	(33)
一 沙俄攫取东省铁路利权的方针及最初交涉	(33)
二 “中俄密约”的签订	(36)
三 东省铁路“合同”与东省铁路“公司章程”	(46)
四 东省铁路的动工修筑	(52)
第四节 沙俄强租旅顺大连	(56)
一 俄德勾结与旅大的占领	(56)
二 强租旅大交涉和《旅大租地条约》的签订	(66)
三 《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与《东省铁路续订合同》	(76)
四 沙俄在旅大的殖民统治	(83)
第五节 俄英争夺中国铁路利权和两国在华铁路范围协定的订立	(93)

一	俄英对中国铁路利权的争夺	(93)
二	俄英瓜分在华势力范围和两国在华铁路范围协定的订立	(102)
第二章	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对中国的侵略	(111)
第一节	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残酷镇压京、津地区	
义和团运动	(111)	
一	阴险狡猾的侵略方针	(111)
二	组织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和天津	(114)
三	参加联军攻占北京	(119)
四	沙俄侵略军在京、津地区的暴行	(124)
第二节	沙俄在直隶地区的侵略活动	(128)
一	抢占关内铁路	(128)
二	策动建立天津地区的军事殖民统治机构——天津都统衙门	(132)
三	强建天津俄租界	(135)
第三节	东北三省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其对沙俄侵略者的	
沉重打击	(138)	
一	东北三省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138)
二	东北三省义和团运动对沙俄侵略者的沉重打击	(141)
第四节	沙俄武装进攻中国东北的序幕——海兰泡和江东	
六十四屯大血案	(148)	
一	沙俄的军事动员与中国黑龙江当局的和平努力	(148)
二	海兰泡大血案	(151)
三	江东六十四屯大血案	(154)
第五节	沙俄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与东北军民的英勇抵抗	(160)
一	俄军的作战部署	(160)
二	俄军的血腥暴行与东北军民的英勇抵抗	(161)
第六节	沙俄图谋霸占中国东北和中俄彼得堡谈判的破裂	(184)
一	逼签《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184)
二	中俄彼得堡谈判的开始及其破裂	(190)
第七节	东三省人民反抗沙俄占领的斗争	(201)
第八节	沙俄与《辛丑条约》	(209)

第三章 争夺中国东三省的日俄帝国主义战争	(219)
第一节 日俄矛盾的加深和中俄北京谈判的开始	(219)
一 日俄在远东的对立和英德美法的态度	(219)
二 中俄北京谈判的开始和沙皇政府的策略	(226)
第二节 第一次英日同盟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的签订	(236)
一 日俄协商的挫折与英日同盟谈判的进展	(236)
二 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的签订	(242)
第三节 “黄俄罗斯”计划的初步实施	(252)
一 攫取产业租让权,控制东三省的经济资源	(252)
二 扩展以东省铁路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势力	(258)
三 建立赤裸裸的军事殖民统治	(266)
第四节 沙俄毁约拒绝撤军,俄美关于东三省的秘密交涉	(272)
一 进退维谷的俄国远东政策	(272)
二 冒险主义“新方针”的提出与沙俄毁约拒绝撤军	(275)
三 俄美关于东三省的秘密交涉,俄军重占奉天	(285)
第五节 日俄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俄斗争	(292)
一 日俄谈判和日俄开战	(292)
二 清政府的屈辱中立与日俄战争的灾祸	(304)
三 中国人民的抗俄斗争	(314)
第六节 分割东三省的日俄《朴次茅斯和约》	(318)
一 日俄和谈的酝酿	(318)
二 《朴次茅斯和约》的订立及其对中国的严重后果	(327)

地图目录

1900年俄军入侵京津地区路线示意图	(120)
1900年沙俄入侵中国东北进军路线示意图	(158)
日俄战争示意图(1904—1905年)	(305)

插图目录

“中俄密约”法文本	(43)
“中俄密约”中文本	(44)
俄国总工程师勘测东省铁路线	(53)

东省铁路“护路军”司令部(1898年)	(55)
俄军占领下的旅顺口	(65)
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1899年)	(96)
在大沽登陆的沙俄侵略军(1900年)	(115)
由天津进犯北京的俄国步兵(1900年)	(122)
俄军侵占北京东便门(1900年)	(124)
沙俄侵略军在北京俄占区张贴的告示(1900年)	(126)
辽南义和团拆毁的东省铁路桥梁	(143)
沙俄侵略军在哈尔滨登岸(1900年)	(169)
驻哈尔滨俄军铸造的大炮(1900年)	(169)
中国阿城信差知照俄军撤出所占要塞(1900年)	(172)
沙俄掩埋被吉、江军民击毙的“护路军”军士(1900年)	(176)
沙俄强占中国牛庄海关	(269)
日俄战争前盘踞中国辽南的俄军	(292)
日俄战争蹂躏下暂避奉天的中国难民群	(309)

前 言

本卷是《沙俄侵华史》的最后一卷，论述帝国主义时期沙皇俄国的对华政策和侵略活动，兼及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华侵略和十月革命后沙俄残余势力对中国的侵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这时，世界全部领土已被分割完，帝国主义各国按照实力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空前尖锐；亚洲的一些半独立国家成为列强竞相吞噬的对象，幅员辽阔、资源富饶，经济落后、灾难深重的中国，便是其中的一个。俄国帝国主义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是：占领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中国领土，并向关内扩张势力，削弱和压倒竞争对手，夺取东亚的霸权。由于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各种力量此消彼长，俄国不断变换其对华策略，但直到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它从未改变上述战略目标。

凭借军事和政治手段来掠夺邻国领土，是沙俄殖民政策的固有传统。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①；贷款、筑路、开矿、设厂、开办银行等资本帝国主义的最新侵略方式也日益为沙俄所采用。但是，由于地主阶级仍然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垄断资产阶级完全依附于沙皇专制制度，加以农奴制残余的束缚，俄国经济远比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落后，仅靠资本和商品无力同其他列强竞争，因此，沙俄在对外扩张时特别需要借助哥萨克的刺刀，并且仍然热衷于领土兼并。正如列宁所说：“在俄国，资本帝国主义较薄弱，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比较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 2 卷，中文第 2 版，第 841 页。

强大的”^①；“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②俄国帝国主义的上述特征使其对外扩张兼有时代的和俄式传统的鲜明特色。它利用中俄边界相连的便利条件，以获得领土为主要目标，对中国实行了武力、政治（外交）和资本的全面进攻。

帝国主义时期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呈波浪式推进的形势，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1895—1905年。时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沙俄乘机发动大规模侵略攻势，中心目标是鲸吞中国东三省，兼及华北、新疆、蒙古、西藏和邻邦朝鲜。1900年俄国武装占领中国东三省，使这一攻势达于顶峰；以此为界限，本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1895—1900年。沙俄以“干涉还辽”为契机，以中国的“救星”自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并以金融资本为先导，开辟“和平”征服东三省的道路。以伪装结盟、重金贿赂等卑劣手段，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在法国金融资本的参与和支持下，成立对华四厘（息）贷款，开设华俄道胜银行，攫取东省铁路（中东铁路）建筑权，都是为此迈出的重要步骤。俄国由此以新型的资本帝国主义面貌出现在中国。东省铁路的修筑，标志着东三省已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在实行“铁路和银行”的征服政策的同时，俄国继续按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原则为所欲为。1898年，沙俄与德国互相呼应，在武装侵占的基础上强租旅大，将前不久日本被迫吐出的辽东半岛据为己有。各国群起效尤，夺占租借地、争划势力范围，攘夺各种利权，形成了瓜分中国的第一次狂潮。沙俄是制造这场瓜分危局的罪魁。

英、俄争夺霸权，是贯穿于本期东亚国际关系史的主线。法俄联盟是沙俄赖以在东亚推行侵略政策的国际条件。继1895年英、俄私分中国帕米尔地区之后，1899年缔约双方达成关于在华铁路范围的协议，相互承认“长城以北”和长江流域为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这是俄国以双边协议形式同另一个主要侵华国家瓜分中国的重大尝试。它加强了俄国在中国东三省、华北和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中文第2版，第635页注。

^②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中文第2版，第893页。

蒙古的侵略地位，是双方在华势力暂趋平衡的重要标志。两国在中国西藏的明争暗斗，这时仍在激烈进行。

仇视革命，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1900年，沙俄与英、日、德、法、美等国在中国华北地区建立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武装联合阵线，率军抢先侵入北京，充当亚洲宪兵；它旋即高唱对华“友好”，宣布无意吞并中国“尺寸土地”，并单独从北京撤军，以示与其他列强“有别”，结果在中国的巨额赔款中分得了最大的一份。与此同时，沙俄在其势力范围内继续推行排他性政策，并利用清政府的困境，单独出兵，烧杀淫掠，强占了东三省全境，使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势力进入极盛期；俄国帝国主义凶残狡诈的面目，暴露无遗。

(二) 1901—1905年。本期侵略的重点在中国东三省，主要目标是使它的军事占领合法化和永久化。为此，沙俄一面制定《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在东三省强行建立军事殖民统治机构，积极实施“黄俄罗斯”计划，攫取各种经济特权；一面图谋通过中俄秘密谈判，订立双边条约，使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

沙俄独占中国东三省，激化了它同日、美等国的矛盾，促成了英日同盟，终于导致了日俄争夺中国东三省的帝国主义战争。东三省沦为日俄战场，中国主权横遭蹂躏，人民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日本在英、美的支持下获胜，结束了沙俄独霸中国东三省的局面。

二、1906—1917年。与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强盗同盟，联合宰割中国，是这一时期俄国对华侵略最突出的特点。沙俄虽然失去“南满”，却采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方针，在中国北部、西部展开疯狂的扩张活动，把近1/3的中国领土统统纳入了俄国势力范围。本阶段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 1906—1910年。日俄战争削弱了俄国的力量，改变了远东国际力量的对比；日本成为亚洲头号军事强国，并确立其在中国东三省南部的霸主地位，与沙俄分庭抗礼；美国也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企图插足中国东三省，构成对俄、日两国的新威胁。在欧洲，俄、德矛盾加深，英、德关系恶化，德国成为俄、英两国的共同敌人。为适应上述形势，沙皇政府调整远东政策，采取与日本携手、同英国协作的侵华方针，以便稳定它在亚洲的阵脚，集中力量于西线。

1907年，俄国与日本签订密约，划分在华势力范围，这是缔约双方由武

装对抗变为合伙打劫的转折点。同年,《法日协定》、《英俄协定》先后成立,英日同盟与法俄联盟的对立随之消失,俄国在远东的形势于是改观。1910年,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缔结,意味着沙俄最终确立了联日拒美方针,它加强了俄国在远东的实力地位,为沙俄再一次向中国发动侵略攻势准备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本期沙俄的侵略重点,一是确保其在“北满”的垄断地位,全面强化在这一地区的殖民活动。另一重点是加紧向外蒙古地区扩张,“用朝鲜‘交换’蒙古”^①,使日本确认外蒙古为俄国的势力范围;积极推行民族分裂政策,扶植亲俄势力,策划变外蒙古为俄国羽翼下的“独立国”。同时,沙俄承认英国在中国西藏的优越地位,以换取英国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中亚其他地区的特殊利益。

(二) 1911—1914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沙俄始而追随日本,准备对辛亥革命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继则利用袁世凯政府渴望获得列强承认和支持的时机,打着捍卫俄国“特殊利益”的旗号,进行猖狂的侵逼和勒索活动,带头掀起了又一次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沙俄煽动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独立”,英国煽动西藏“独立”,是这一新的瓜分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

1914年,俄国悄悄地窃占原属中国的唐努乌梁海,面积达17万多平方公里。在此期间,沙俄还通过逼签《满洲里界约》,割占了大兴安岭以西呼伦贝尔沿边地区约14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公然武装侵犯伊犁、喀什噶尔和阿尔泰,妄图使新疆“成为俄国的属地”^②;强化对“北满”的政治控制,力图把东省铁路区域纳入俄国的行政系统,以实现其“黄俄罗斯”的传统野心;与日本签订第三次密约,从而将它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内蒙古西部。

此外,沙俄参与订立“善后借款”,规定以盐税等项收入作为担保,剥夺中国盐政主权,并迫使有关各国承认:国际银行团的活动不得损及俄国在“北满”、蒙古和新疆的特殊利益。显然,在当时各个侵华国家中,沙俄是利用辛亥革命之机积极推行肢解中国的政策、抢到赃物最多的帝国主义强盗。

(三) 1915—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英、法、德集中力量于欧洲战场,日、美成为在东亚争霸的主角。在这一新的国际条件下,沙

①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中文第1版,第776页。

② 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1913年彼得堡出版,第173页。

俄以“俄日亲善”为其远东政策的基石，积极奉行牺牲中国、讨好日本的方针，一面支持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以便援例向中国进行新的勒索，并从日本获得为欧战所急需的大批军火援助；一面仰赖日本的支持，维护其在华的既得利益。这样，欧战期间沙俄侵略中国的势头虽然有所减弱，但其野心有增无减。

1915年，沙俄先是通过《中俄蒙协约》，将中国在外蒙古的领土主权进一步破坏殆尽；接着，又以高压手段迫使民国政府把呼伦贝尔地区划为“特别区域”，实行“自治”，从而使这一地区实际上变成了它的又一块殖民地。

1916年，日、俄通过签订第四次密约，正式结成掠夺性军事同盟，其利益范围从满蒙扩大到全中国甚至整个远东。

1917年3月初，沙皇政府在牺牲中国领土的基础上又与日本达成秘密谅解，支持日本“继承”以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等地享有的一切特权。这是沙俄与日本之间的最后一笔肮脏交易。

“多行不义必自毙。”俄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使其侵华计划难以一一实现；而且促进了俄国人民革命，加速了它自身的灭亡。1917年3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俄国胜利，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王冠滚落在地；不久又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虽然在中国继续兴妖作怪了一个时期，然而，大势已去，它的称霸中国的狂妄计划终于以完全的失败而告终。

第一章

19 世纪末沙俄对华侵略 扩张的加紧

第一节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沙俄的外交活动 与策划“三国干涉还辽”

一 19 世纪末远东国际形势与俄日矛盾

19 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强国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已接近完成。随着垄断资本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资本输出替代商品输出居于日益重要的地位，列强争夺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斗争更趋尖锐。在远东，朝鲜已成为国际冲突的焦点；中国正面临着被肢解的危险。

沙皇俄国依然是中国北方的强邻。自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迅速发展，并于 19 世纪末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是，俄国帝国主义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①。沙皇专制制度依然存在，俄国社会依旧处于封建主义层层密网的缠绕中，国内市场狭小，阶级矛盾尖锐，新的社会革命在酝酿之中，沙皇政府力图从扩大对外侵略中寻找出路。由于在欧洲及西亚的扩张受到其他欧洲强国的牵制，遭到挫折，沙俄于是将侵略扩张的重点移向远东，移向富饶的中国东北地区和邻邦朝鲜。在这里，地理上的接近和同远东各国长期打交道的经验，使它的侵略扩张得到某种方便。在侵略方式上，它一面采用传统的军事手段以拓展疆土、扩大地主资产阶级的活动范围和剥削对象；一面为适应本国垄断资本和在俄国的西方金融资本的需要，开始推行“铁路和银行的侵略”政策，力图扩大对华资本输出。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结合，给俄国的远东政策增添了

①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 2 卷，中文第 2 版，第 674 页。

新的动力。

这时，日本已在远东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它原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对象，1868年“明治维新”后才稳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亚洲惟一的资本主义军事强国。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封建残余大量存在，国内市场狭小，加以资源短缺，日本资产阶级把希望寄托于开拓国外市场。与此同时，在国内改革中受到限制、趋于没落的“士族”（上层武士），力图在对外的侵略战争中进行冒险，建立武功。以上两个因素的结合，使得具有浓厚封建色彩和军国主义性质的日本，在争取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谋求与欧洲各国平等的同时，就以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开始了野蛮的对外扩张，把矛头指向近邻的中国和“伸手可及”的朝鲜。

英、俄两国是当时争霸远东的劲敌，也是在中亚互争雄长的对手。中亚与远东的形势息息相关。1885年，两国在阿富汗的激烈争夺，波及远东，朝鲜近海成为争斗的中心。日本的崛起，对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利益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英国在朝鲜海峡的活动，客观上限制了日本的野心，加以英国对日不平等条约直到1890年尚未废除，因此，英、日双方互相怀有戒心。但是，面对俄国的竞争，英国政府指望拉拢日本以对抗俄国的侵略势力；同时，为了避免俄国和日本接近，它更需要讨好日本。日本也乐得利用英、俄在远东的矛盾来实现其侵略目标。因此，英、日之间又存在着互相利用的可能。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日本深受沙俄侵略压迫之害。但是，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情况为之一变：昔日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已被双方在远东的争夺所代替。这种政治格局的形成，深刻地改变了远东国际力量的对比，对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影响至深。这时，日俄矛盾的交汇点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沙俄欲由朝鲜而南下，称霸东亚；日本欲取朝鲜而北上，征服大陆。两国在地理上的接近及其所觊觎的对象的重叠性，预示着双方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迎面相撞的一天终将来临。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始终把沙俄的南下视为对本国的主要威胁，处处防范，时时警惕；彼得堡当局则由于对日本的实力估计不足，在远东忌英远胜于忌日，而且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即在俄、英对立中希望得到日本的好感），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曾做出接近日本的姿态，结果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沙俄在远东的扩张，得到了法国的大力支持。法国资本指望利用沙皇专制制度的力量及其对清政府的影响，为其在远东的发展开辟道路；法国资本

的大量流入俄国，不仅使俄国得以从财政危机中恢复，而且促进了俄国工业和交通的彻底改革以及资本的高度集中。法、俄金融资本的结合，大大增强了俄国向远东输出资本的能力（由于俄国本身的财力有限，从一定意义上说，俄国资本在远东只是充当了西欧资本的捐客）。

1892 年结成的法俄联盟，更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两国在侵略远东问题上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后起的、野心勃勃的德国帝国主义为了争霸欧洲的需要，也不遗余力地诱使沙俄将对外扩张的视线由巴尔干、近东移向远东，以削弱法俄联盟在欧洲对德国施加的压力；在远东，德国企图使自己在俄英对立中处于左右逢源的地位，以便谋取更大的好处。这样，欧洲国际政治与远东国际政治的交互影响显著增加了。

美国的经济力量这时已经迅猛发展，向西太平洋扩张的势头越来越大，但是，它在中、朝两国附近还没有自己的海上据点。在 1898 年美西战争以前，美国用很大的气力来占领太平洋上的重要岛屿，建立通往东亚的海军基地，暂时还腾不出手来在远东大举扩张；因此，它企图假日本人之手在远东行事，并希望俄、英在冲突中两败俱伤。上述立场使美国在远东充当了日本的同伙和竞争者，一身两任。

二 沙俄觊觎中国东北三省和邻邦朝鲜

19 世纪中叶，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中国领土，开始与朝鲜为邻。此后，俄国的殖民浪潮沿着它熟悉的道路，转向更近的目标——中亚和近东；对远东的经营，则限于财力、物力、人力，不得不暂时降到次要地位。

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和物资补给困难，是俄国远东地区的根本弱点。19 世纪 80 年代起，为了加强其远东的战略地位，沙俄决定增加对远东的移民，加速“边区俄罗斯化”的进程。在沙皇政府的大力资助和鼓励下，移民人数由 1859—1882 年的平均每年 601 人，猛增到 1883—1899 年的平均每年 4076 人。^①

为加强管理，1883 年，沙皇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把东西伯利亚总督管辖下的外贝加尔湖以东各省，划为阿穆尔总督辖区，并将其行政中心设在中国隔江相望的伯力。同时，沙俄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俄方一侧“设屯置

^① 详见本书第二卷第三章第六节。

戍”，加强战备。“沿岸十里八里之间，村堡相望，洋枪队兵，梭巡不绝，兼有电线，以通文报”。据1885年吉林将军派员查勘，上述地区已设有大小电站共240多处，“以后尚有续设者”^①。

随着远东国际竞争的加剧，特别是由于日本海上力量的迅速增长和1885年4月英国侵占了巨文岛，沙皇政府担心俄国海军与远东之间的交通被切断，于是，决定加强远东地区的陆上“防卫”力量^②，增加建造军舰的预算^③，并修筑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以加强滨海地区和欧俄的交通联系。

1886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发布“要按最短的路程”修筑这一铁路的敕令^④，次年6月，授权交通大臣组织铁路勘察工作。1891年2月，沙皇政府拟就了筑路方案，预计在12年内完成；同年5月31日，正式在铁路的东端海参崴动工修筑。皇储尼古拉（即后来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主持了开工典礼。

1892年11月间财政大臣维特在一份奏稿中阐述了这条铁路在促进欧俄与东亚的贸易方面的巨大价值后强调，该路在军事上将成为支持俄国陆军和加强俄国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工具。他说：“随着铁路的通车，这支舰队可能大大加强，一旦在欧洲或东亚发生政治纠葛，它将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从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⑤

当时，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认为，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无异于在远东大举增兵；日本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也说，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之日，俄国很可能要侵吞蒙古，进而延及中国内地，“东洋祸患，不出今后十年”^⑥。因此，正如苏联学者所说，“这项计划意味着俄国即将（在远东）转入大规模的扩张”^⑦。

与此同时，俄国的一批被称为“东方人”学派的御用文人，大肆鼓吹

①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光绪十七年刊本，第6卷。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1958年美国出版，第33—34页。

③ 1884年为3060万卢布；1886年约4000万卢布，1891年为4520万卢布，1894年达5120万卢布。参见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1956年莫斯科出版，第527页。

④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1958年美国出版，第27—28页。

⑤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1928年列宁格勒出版，第60页。

⑥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1853—1972）》，1974年东京出版，第152、163页。

⑦ 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1871—1914）》，第2卷，1963年莫斯科出版，第225—226页。

“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说什么俄国人负有向东方传播西方文化的“责任”；把东方归并于俄罗斯帝国，使两者融合到一起，便是俄国的“历史使命”。俄国外交部顾问马尔坚斯教授公开宣扬“同半野蛮的民族打交道不能考虑国际公理”的论调，力图证明俄国征服中亚是正当的，从而“为实行侵华政策准备类似的论据”^①。这个“学派”的侵略思想，后来成为尼古拉二世东方政策的中心内容。

沙皇政府在积极准备大举东进的同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已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种种侵略活动。重要的有：

（一）掠夺矿产资源。黑龙江矿藏丰富，俄人越界盗采金矿，已有多多年；到1884年，仅漠河一处，即集中了俄矿工4000余人，造屋700余间，立窑500余。中方提出交涉，“俄官佯为不知，暗予主持”。黑龙江将军文绪下令将越界盗采金矿者“擒送”俄方，但被俄官“任意释放”。沙俄侵略者还要求“在黑龙江之粗（祖）鲁海图卡内约租地段，设立公司，开采金石各矿”，“举凡内兴安岭之一带山河，包括无遗”。对此，清政府驻俄公使刘瑞芬曾指出：俄国“官绅有思集股采取粗（祖）鲁海图卡金矿之议，中国若不争先筹办，始而租赁，继而图占，皆在意计之中”^②。真是一语破的。

（二）经济渗透。随着俄国移民的增加，中俄东段边境贸易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4年，由南乌苏里边区输入中国东北的商品额为36万卢布，1895年增至180万卢布；同年，海兰泡市的双边贸易额为100万卢布^③。沙俄对中国东北出口的是各类工业制品，进口的主要是粮食和牲畜。

由于英、美等国商品的输入，外国争夺中国东北市场的斗争于是开始。为促进商品输出和农副产品的收购，进而控制当地市场，俄国的纸币（俗称羌帖）开始渗入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并逐渐操纵了当地的金融。

光绪初年，璦琿副都统依克唐阿在任内“亲见璦琿商贾行用皆系俄帖，且华商购办货物，必须以银易帖，始可易货，以致边界数百里，俄帖充溢，不下数百万”。1881年，他调任琿春副都统后，见当地“华俄互市仍以俄帖

①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1958年美国出版，第42—44页。

②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光绪十七年刊本第4卷。

③ 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1956年莫斯科出版，第547—548页。

为重”^①。俄国官方著作也承认,当时卢布不仅在瑗珲等沿边地区流通,而且在墨尔根、齐齐哈尔及三姓等内地城镇也可自由通行,以至出现了俄国纸币在“黑龙江城境悉通用之”而“中帖则不行也”的严重局面^②。

为适应经济渗透的需要,1893—1894年间,伯力城防司令鲍格丹诺夫奉东西伯利亚总督杜霍夫斯科伊之命,建造了一艘轮船,专供航行松花江使用。沙皇政府规定,此船在伯力和吉林城之间每往返一次,由国库补助1700卢布^③。这是沙俄有计划地闯入中国内河松花江之始。接着,沙俄于1895年集资200万卢布,设立了“阿穆尔商船公司”。这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上航行(有时也闯入松花江)的俄国轮船已达46艘,驳船64艘。这些商船从伯力运往中国东北的是布匹等消费品,从伯都讷(今扶余)、呼兰等地收购粮食,从阿什河(今阿城)收购牲畜等物运回俄境^④。

此外,由帝俄地理学会、总参谋部组织的“考察队”,常深入中国东北各地,广泛收集情报。例如,1888年,总参谋部上校普佳塔的“考察”,踪迹到达营口、奉天、吉林、阿勒楚喀、三姓、宁古塔、瑗珲等地,回国后在军事学术机关刊物发表了《满洲旅行记》、《旅顺口介绍》、《禁止汉人向满洲移民问题》等报告,不仅详细报道了沿途见闻,而且对东三省驻军、移民、旅顺口的价值等问题做了战略分析,为沙俄制定远东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又如1884年,从海兰泡越境到达齐齐哈尔的叶夫秋金,在结束“考察”后公然撰文鼓吹加强战备,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并声称俄国人要“保卫”阿穆尔边区,惟一的办法是“进攻满洲”!^⑤

这时,沙俄对邻邦朝鲜的野心,也有增无减。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沙俄在割占滨海地区后,即企图染指朝鲜。1864年,俄国商船到朝鲜要求通商,遭到拒绝^⑥。次年,俄国人越过边境,在朝鲜领土上擅设营帐,建造房

① 《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折》。参见张寿镛等编《皇朝掌故汇编》,内编,1902年求实书社藏版,第20卷,钱法二,第32页。

② 俄国财政部编,中野二郎等译:《满洲通志》,1907年东京出版,第595页。

③ 斯坦菲尔德:《俄国在满洲的事业》,1910年哈尔滨出版,第16页。

④ 张伯英等撰:《黑龙江志稿》,第39卷,交涉三,航权,第7页;斯坦菲尔德:《俄国在满洲的事业》,第16页。

⑤ 叶夫秋金:《1884年夏由布拉戈维申斯克到齐齐哈尔纪行》,载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委员会编《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资料汇编》,第14册,1885年彼得堡出版,第213—219页。

⑥ 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第152页。

屋^①。1866年1月,俄国兵船闯进元山津,要求通商,并准许俄国人居住。1869年5月,俄国炮艇驶近朝鲜海岸进行测量,被逐出^②。

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由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日益加紧,美、英、德、意等国的势力陆续侵入朝鲜,沙俄唯恐朝鲜落入它的对手英国或日本之手,也力谋在朝鲜确立自己的势力,并切盼在朝鲜获得一个不冻港。1884年7月,俄国强迫朝鲜签订《通商条约》,获得了开埠设领、治外法权、驻泊军舰、置地建房设厂(或仓库、货栈)等特权,并获得片面的最惠国待遇^③。

1885年1月,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汉城条约》后,沙俄驻日公使馆参赞士贝邪奉命到汉城活动,秘密表示愿以租借朝鲜北部要地永兴湾(拉札列夫港)为条件,向朝鲜国王提供“保护”,并派遣军事教官赴朝。由于英国海军采取了威胁性行动,这一阴谋未能得逞^④。与此同时,俄国驻华公使威胁清政府说,如中国承认英国占领巨文岛,“则俄国认为有占领其他岛屿或朝鲜王国一部之必要”。清政府担心各国效尤,要求俄国保证不侵占朝鲜土地,以便向英国交涉撤兵。为此,1886年9~10月间,李鸿章与俄国驻华代办拉德仁在天津会商,结果俄方做出了“决不侵占朝鲜领土”的保证^⑤。但是,沙俄并未放弃控制朝鲜的企图,就在这一年,阿穆尔总督科尔弗上奏沙皇说:朝鲜“为东方一弱国,若无强盛之保护,决不能保护其社稷”,“我俄国宜毅然担任保护之责,实地势上不得不然者也”。^⑥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建成,太平洋舰队力量薄弱,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尚未根本改观,沙俄暂时不得不采取利用矛盾、窥伺时机的策略,以谋求自己的利益。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正是这样的时机。

三 甲午战争爆发前沙俄的“调停”及其后果

1894年4月,朝鲜南部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烽火遍及全罗、忠清、庆尚三道。5月31日,起义军攻陷全罗道首府全州城,宫廷为之震惊。依据传统,朝鲜国王请求中国派兵“助剿”。清政府遂于6月4日命令

① 伦森:《在朝鲜和满洲的国际抗衡(1884—1899)》,1982年美国出版,第7—8页。

②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1931年波上顿、纽约出版,第385页。

③ 朴:《俄国与朝鲜》,1979年莫斯科出版,第58—60页。

④ 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383—384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52页。

⑤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第294、297—303页。

⑥ 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1937年清华大学出版,第91页。

北洋海陆军开赴朝鲜，并于6月6日电令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①，将中国出兵朝鲜事照会日本外务省，声明“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②。

这时，野心勃勃的日本，也决定乘机出兵朝鲜；为了取得借口，日本政府先是通过其驻朝代理公使杉村瀚怂恿中国出兵，并声言日本“必无他意”^③。接着，日本内阁于6月2日正式做出了出兵的决定；6月4日，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确知中国出兵朝鲜后，又电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立即派日本军队前来”^④。第二天，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离日回任。他不顾朝鲜方面的劝阻，于10日率海军陆战队400余名带着大炮，强行进入朝鲜京城。因出动的兵丁有限，陆奥宗光要求大鸟公使充分注意，不要引起与中国军队的冲突，若遇驻汉城外交官员质问，“可向其保证，谓帝国政府系根据《济物浦条约》第五款及《天津条约》第三款而出兵，决无他意。”^⑤其实，日本早在6月5日已设置大本营，不断调兵遣将，做对华战争的准备。6月7日，日本接得清政府关于出兵朝鲜的来照后，立即宣布出兵朝鲜，扩大事态。

朝鲜局势恢复平静后，日本政府违反中日共同从朝鲜撤兵的协议，并以改革朝鲜内政为名，继续向该国增派军队，蓄意挑起对华战争。陆奥宗光承认，日本提出朝鲜内政改革问题，不过借题发挥，“或则由此调和一度破裂之日清两国关系；如终不得调和，则毋宁乘机促其决裂，一变此密云昏暗之阴霾天气为骤降暴雨，或可期其快晴耳。”^⑥到6月28日，日本集中在仁川与汉城的军队已达七八千人^⑦，而中国仅在距汉城200余里的牙山驻军2500人，相形之下，完全处于劣势。

中国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促使日本从朝鲜撤兵，并避免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决定请有关列强出面干涉。6月上旬，他首先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

① 1885年4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亦称《天津条约》），内第三款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参见《光绪条约》，第19卷，第6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167—168页。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7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158页。

⑤ 同上书，第161页。按：1882年8月，日本与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济物浦条约》，内第五款规定，日本得驻兵若干“警备”日本使馆；“若朝鲜国兵民守律一年之后，日本公使视作不要警备，不妨撤兵。”参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4卷，第9页。

⑥ 陆奥宗光：《蹇蹇录》，1943年东京出版（岩波文库），第48页。

⑦ 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1卷，第112—115页。

请求英国出面调停，促使日本从朝鲜撤兵。

6月19日，欧格讷托英国驻天津领事持函见李鸿章说：已电告英国外交部嘱驻英日使将此意转告日本政府，“未知听劝否”。^①由于英国的态度并不积极，李鸿章于是转而求助俄国。

6月20日，准备回国养病的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希）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乘机向他提议，请俄国“切劝日与我约期同时撤兵”，喀西尼满口答应^②。李鸿章于是把出面调停的希望寄托在沙俄身上。次日，他对喀西尼说：“日以重兵协议，实欲干预韩内政，为侵夺之谋，华决不允。”喀西尼趁势答道：“俄韩近邻，亦断不容日妄行干预，”并说：“使华以来，惟此件交涉于俄关系甚重，务望彼此同心力持。”^③对此，李鸿章不仅未表示异议，反而说：“中国政府认为俄国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俄国有出面调停的特殊权利。”^④这种曲意迎合的态度使喀西尼觉得有利可图，决定暂留天津。

他在6月22日给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的电报中说：“我认为我国决不应错过目前中国要求我们担任调停者的机会，况且此事对于我方既无任何牺牲，又能大大增加我国在朝鲜以及整个远东的势力。”^⑤格尔斯于接电当日上奏沙皇，表示同意喀西尼的意见，并提出应“防止英国干预此事”。23日，俄国外交部电令喀西尼留在天津与李鸿章商办日韩交涉事件^⑥。同时，致电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嘱其竭力劝告日本政府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军^⑦。后一则电报并未表示俄国对日本要采取强硬态度，而喀西尼却故意让参赞对李鸿章说：“俄皇已电谕驻日俄使转致日廷，勒令与中国商同撤兵，俟撤后再会议善后办法，如日不遵办，电报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⑧这就使李鸿章更加坚信：只有依靠俄国的干涉，才能避免与日本的冲突^⑨。从此，他对喀西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19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47页。

③ 同上书，第49页。

④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894年6月10（22）日，载苏联《红色档案》（以下简称《红档》）杂志1932年第1—2（总第50—51）卷，第16—17页。

⑤ 《红档》杂志1932年第1—2（总第50—51）卷，第16页。

⑥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22页。

⑦ 《外交大臣上沙皇奏》，1894年6月10（22）日，载《红档》杂志1932年第1—2（总第50—51）卷，第15—16页。

⑧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50—52页。

⑨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894年6月12（24）日，载《红档》杂志1932年第1—2（总第50—51）卷，第17页。

尼言听计从,任其摆布;在日本一再增兵朝鲜的情况下,他却一心期待着俄国的调停和干涉;并接受了喀西尼关于无条件避免任何武装冲突、不再向朝鲜增兵的劝告^①,一再退让,不做战争准备。他在6月25日给中国驻韩大臣袁世凯的电报中说:俄国已“勒令(日本)照华议同时撤兵,再妥议善后”,“似日不能不遵,速电叶(志超),请仍静待勿妄动为要。”^②同日,又电复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说,“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现俄国出为调处,或渐就范。”^③其实,所谓俄国从中调停,完全是李鸿章的幻想。希特罗渥对日本政府连“竭力劝告”都没有做。这位俄国公使在6月25日同陆奥宗光会晤后电告俄国外交大臣说:“我与日本外务大臣作过长谈,我认为最好不立即明白地表示意见。”因为“英国正在等待时机,一旦我国以任何方式表示援助中国,英国很可能站在日本一边”;“由很多迹象看来,若干其他强国很乐于见到我们牵连到远东问题中去。”^④

格尔斯收到上述电报,便对中国的请求做了新的考虑。6月28日,他启奏沙皇说,俄国应“仅限于表示支持汉城政府关于中日军队撤出朝鲜国境的申请,至于李鸿章所要求的正式调停,我国只能在冲突双方同意时才能进行。”^⑤根据这一方针,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格毕尼斯向日本公使宣称:“我们同样希望朝鲜获得独立和安宁,可是我们不信这些目的能由中日两国联合占领朝鲜而实现。”他警告说:“如果某些国家由于他们的行动而酿成朝鲜问题,甚或挑起冲突,则他们应负严重的责任。”^⑥

6月30日,希特罗渥也照会日本外务大臣说:“与中国政府同时撤退其遭朝军队一事,日本政府若加以阻难,则应负重大责任。”^⑦与此同时,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利用李鸿章渴望俄国出面调停的心理,要求他同意俄国参与朝鲜的内政改革。李鸿章立即表示同意^⑧,从而再一次上了俄国的圈套。喀

①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894年6月12(24)日,载《红档》杂志1932年第1—2(总第50—51)卷,第17、25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52页。

③ 同上。

④ 《驻东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894年6月13(25)日,载《红档》杂志1932年第1—2(总第50—51)卷,第18页。

⑤ 《外交大臣上沙皇奏》,1894年6月16(28)日,同上书,第29页。

⑥ 同上书,1894年6月17(29)日,载《红档》杂志1932年第1—2(总第50—51)卷,第21页。

⑦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284—285页。

⑧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27—28页。

西尼高兴地电告格尔斯说,“为了报答我们的效劳,中国正式承认俄国具有与中日两国共同解决朝鲜内部组织问题的权利”;“应竭力劝告日本接受此项建议,这一建议对于我国及日本均极有利,它将保证朝鲜秩序今后得以维持,将摒除中国在朝鲜的优越势力,并成为防止任何列强企图重新侵犯王国完整的惟一有力保证。”^①沙俄佯示同情李鸿章的愿望,实则企图插手朝鲜事务,斩断中朝两国之间的传统联系。这一阴谋,在喀西尼的上述电报中暴露无遗。

但是,沙俄的这一意图遭到蓄意独吞朝鲜的日本的强烈反对。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总理衙门声明:韩事愿两国相商,不愿他国干预^②,不同意俄国插手朝鲜内政改革。英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反对俄国插手朝鲜。欧格讷并向总理衙门暗示,英国不愿俄国调停中日纠纷^③。7月2日,日本复照俄国说:“一俟帝国政府认为朝鲜国内形势完全回复平稳,将来不复发生若何忧虑时,自当撤回目下在朝鲜境内之日本军队。”^④婉言谢绝了俄国的“忠告”。

当时,俄国虽然对朝鲜垂涎三尺,但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西伯利亚大铁路尚在修建中,远东交通不便;沙皇政府虽大力扶植远东移民,但阿穆尔和滨海地区仍然人烟稀少,经济很不发达。在此情况下,俄国不愿因朝鲜问题而冒与英、日发生冲突的风险,只得稍事收敛。

7月7日,俄国外交大臣致电驻北京公使说:“我们努力的目的在于消除中日两国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我们要求日本由朝鲜撤兵是友谊的劝告,我们完全珍视李鸿章对我们的信任,然而我们认为不便直接干涉朝鲜的改革。”^⑤

7月13日,俄国外交部照复日本外务省,对7月2日来照所述,表示“颇为满意”,同时又说俄国政府“以邻国之故”,“对朝鲜国内所起事变,不能旁观”^⑥。即俄国目前对朝鲜事务不拟积极干预,但保留必要时进行干涉的

①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894年6月21日（7月3日），载《红档》杂志1932年第1—2（总第50—51）卷，第26—27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4卷，第1页。

③ 同上书，第14卷，第28—30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289页。

⑤ 《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电》，1894年6月25日（7月7日），载《红档》杂志1932年第1—2（总第50—51）卷，第29页。

⑥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659页。

权利。

喀西尼得知本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后，立即改变原有态度，派参赞巴甫洛夫告诉李鸿章：“韩事明系倭无理，俄只能以友谊力劝倭撤兵，再与华会商善后，但未使用兵力强勒倭人。至朝鲜内政应革与否，俄亦不愿与闻。”李鸿章指出这些话与俄国以前所说“语意不符”，巴甫洛夫搪塞说：“我等亦觉不符，恐俄廷另听旁人间阻。”^①

其实，对于朝鲜局势，喀西尼一开始就主张积极干涉，俄国外交部也曾同意喀西尼的意见；问题并不在于什么“俄廷另听旁人间阻”，而是“由于一些特别的动机（帝国政府无疑已估量其重要性），促使俄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中拒绝担任重要角色”^②。这里所谓特别的动机，就是指在条件不成熟时避免同英、日等列强发生冲突，同时静观事态的发展，保持将来的行动自由^③。

至此，李鸿章依靠俄国调停的希望，化为泡影。在这一过程中，沙俄先是同意进行干涉，以迫使日本撤军的甜言蜜语麻痹了清政府，导致它疏于战备；及至日本大量增兵朝鲜，战火迫在眉睫之际，沙俄又自食前言，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这就使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 甲午战争爆发后沙俄的“不干涉”政策

1894年7月25日，日本挑起了对华战争。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战争爆发后，沙俄虽未公开宣布“中立”，但明确表示了“不干涉”的方针。8月7日，俄国外交大臣电令俄国驻东京公使将此意通知日本，并希望对方“注意我们（俄国）必须受到应有的尊重”^④。次日，他又致函俄国驻北京公使说：“我们同任何一方均无直接关系。然而朝鲜同我国的滨海省毗邻，问题可以说是发生在我国门口，与我国关系密切。”“帝国政府一贯遵循的宗旨是：不为远东敌对双方中任何一方的一面之词所乘，也不被他们牵累而对此局势有偏袒的看法。类似的行动方式不仅有失我们的尊严，甚至可能限制我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4卷，第14—15页。

② 《红档》杂志1932年第1—2（总第50—51）卷，第36—37页。

③ 《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函》，1894年7月27日（8月8日），载《红档》杂志1932年第1—2（总第50—51）卷，第58—59页。

④ 《红档》杂志1932年第1—2（总第50—51）卷，第57页。

们将来的行动自由。所以，当李鸿章通过你建议我们直接干预朝鲜内政改革^①，并为维持现状担任有力的调解时，我们毫无遗憾地加以拒绝了。因为正如李鸿章所知，维持现状是有利中国的。外交部很明白，所谓改革不过是中日冲突的借口，而且由于我方非正式的调解，我们可能违反我们的本意，很容易地站在中国和狡狴的直隶总督的一边，从而与日本公开为敌。”“必须认清，我们在朝鲜可能扮演的角色，有赖于事件未来的发展，而不在于中国或日本对俄国的友善程度。”^② 这个文件表明，喀西尼原先娓娓动听的对华“友谊”全是假的。沙俄对中俄关系的现状不满，但又担心日本占领朝鲜，因此，它的态度是“不偏袒任何一方”，保持行动自由，然后选择有利时机，为自己谋取最大限度的侵略利益。

应该指出，俄国当时对日本在朝鲜势力的膨胀更为担心。俄国陆军大臣认为：“日本人在今日与中国的斗争中，显然占着上风”；“日本拥有按欧洲方式训练的军队和相当数目的军舰”，一旦成为俄国邻国，并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强国联盟，将对俄国十分不利。俄国外交大臣也认为：“如果日本占领朝鲜半岛的南部，则今日分隔日本与朝鲜领上、几乎是我国西伯利亚东部海港通往大洋的唯一出路的朝鲜海峡将落在日本手中，这样我们将很难保持航行日本海面的自由。”^③ 出于这种担心，8月中旬，他训令驻华公使向李鸿章秘密表示：“朝鲜之事，俄国已有激而起，毫无自利之心，唯有确照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即光绪十二年拉德仁在津面订之约办理。”这时，李鸿章对俄国出面干涉又产生幻想。他报告总理衙门说：“看来，俄似有动兵逐倭之意。”^④ 但是，清政府的许多官员对此颇不以为然。8月16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说：“俄国动兵逐倭之意，此非我所能阻，然亦不可联彼为援，致他日藉词要索。总须由我兵攻剿得胜，则俄虽派兵续出，亦落我后，著李鸿章飭催水陆诸将奋迅图功，慎勿虚盼强援，转疏本计。”^⑤ 对李鸿章的这一批评，是正确的。

为讨论中日战争爆发后俄国应采取的方针，8月21日，沙皇政府召集特

① 按：此言不实。俄国参与朝鲜内政改革的建议，本是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首先提出的，李鸿章仅是同意了他的要求。参见上文。

② 《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函》，1894年7月27日（8月8日），载《红档》杂志1932年第1—2（总第50—51）卷，第58—59页。

③ 《红档》杂志1932年第3（总第52）卷，第64—65页。

④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第121页。

⑤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6卷，第39页。

别会议，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俄国积极干涉中日战争不符合俄国利益，应该争取以外交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二）不必另作中立声明，应继续促使中日两国政府注意尊重俄国的利益，尤应使他们注意必须在俄国与朝鲜接壤处小心行事，避免一切足以引起误会的行动；

（三）中日战争的结果，应是保持朝鲜的“现状”；

（四）如因情况需要增兵俄朝边境并拨付必要的款项，陆军大臣可与财政大臣商议。^①

在这里，沙皇政府所考虑的，首先是俄国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保持朝鲜“现状”云云，在日军不断取胜的情况下，显然是为了不让日本独霸朝鲜，为俄国今后插手朝鲜创造条件。

随着战局的展开和日本的胜利，沙皇政府的担心更形加剧了。1894年9月24日，俄驻天津领事往晤李鸿章，言“喀使三四日内来津，奉国命在津过冬，会商一切。俄廷初意不改，不愿倭得韩地”^②。李鸿章的心又为之所动，再次盼望喀西尼从中调停。当时掌握清政府实权的慈禧太后也有此意。9月30日，翁同龢奉命到天津面见李鸿章，传达慈禧旨意。李鸿章十分感动，当即向翁表示联俄无害，他“能保俄不占东三省”^③。

10月6日，英国政府向俄、德、法、美等国建议在共同保证朝鲜“独立”与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两项条件下联合调停中日战争。由于各国相互猜忌，这项建议没有实现。这时沙俄虽然一再向清政府暗中保证“俄廷初意不改”，但在行动上却开始迎合日本，格尔斯甚至说：“在目前中国尚未直接向日本乞和、日本政府亦尚未表明媾和条件之时进行干涉，为时尚早。”^④不仅如此，在英国提议的联合调停流产后，俄国政府为防止英日接近，还曾通过其驻日公使希特罗涅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俄日两国应彼此交换意见，以防其他强国的干涉”^⑤，明显地表露了俄国外交界企图牺牲中国以拉拢日本的意向。

① 《红档》杂志 1932 年第 3（总第 52）卷，第 66—67 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20 卷，第 40 页。

③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二日，第 33 册，第 91 页。

④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 173 页。

⑤ 同上书，第 175 页。

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一书中回忆当时沙俄的态度时说：“在这个时期，俄国一方面往往以花言巧语对待我国，竭力不伤我国的自尊心，同时也决不使中国丧失其依赖心。……总之，当时俄国的举动，从外表看来，实难捉摸：有时像与中国友好，有时又像与日本友好。”“如用比喻来说，当时俄国对中日两国的真正企图，如果不能兼获鹬蚌之利，也必须尝到熊掌或鲜鱼的一项美味，只是等待时机而已。”^① 同书还写道：1894 年 12 月 23 日，希特罗渥向陆奥宗光转达俄国政府的意见：“为了日本的利益，不论何时，俄国均将尽力周旋”；“关于媾和条件，俄国对日本之愿望毫无猜疑之意。”希特罗渥又说他本人估计，“对于日本占领台湾一事，俄国当不致有任何阻碍”。据此，陆奥宗光猜测：“俄国怀有不经由其他欧洲各国单独与日本密商以达成某种协议的用意。”^② 可见，把日本的侵略矛头引向中国的南方以利沙俄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扩张，已成为俄国政府对待中日战争的重要出发点。

不久，沙俄于 1895 年 2 月 1 日召开了关于中日战争的第二次特别会议，首先讨论在日军接连取胜、中日即将议和的情况下，如何“保卫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会上，有的提议占领朝鲜半岛南端的巨济岛，在那里建立类似英属香港的俄国“居留地”，以控制朝鲜海峡，保障俄国的通航自由。有的提议占领朝鲜的其他地方。有的主张不必占领巨济岛，以保持与英、日等国的“友好关系”。会议着重讨论了渤海湾的形势和俄国应采取的对策。

为了防止日本占领旅顺、威海卫，代理海军大臣认为：“最好自然是占领满洲的一部分”。陆军大臣认为“在西伯利亚铁道建成前占领满洲的一部分是有困难的”。总参谋长则认为：“目下尚不必作任何占领，以免英国有所借口进行更多的占领。但必须努力保持朝鲜的独立。”代理海军大臣附和上述主张，“理由”是“我们可能需要朝鲜港口作为我国军舰的碇泊所”。亚洲司司长向会议所作的报告认为：“假如日本的（对华）要求相当温和，我们应仍采取以前的不干涉政策；假如其要求触犯我们的重要利益，则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必须见机行事。但是考虑到我们现在并没有充足的装备来有力地压迫日本，为审慎起见，最好与其他国家首先是要与英国取得协议，因为英国与我国在远东的关系最为密切。”为了“尽可能维护远东目前的均势”，还应争取其他列强共同“保证朝鲜的独立”。“只有依照上述方向行动，才有可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 175—176 页。

② 同上书，第 274—275 页。

能防止中日冲突的恶果，并为西伯利亚铁道的竣工赢得必要的时间；那时，我们才能以自己的充分的物质手段装备起来，并在太平洋事务中占有相应的位置。”维特赞同亚洲司的报告，并说，“目前除与英国采取一致行动外，别无其他办法。”但是，“为了维护俄国的势力及尊严，必需增强我国在远东的舰队”，以应付任何事变。维特的上述意见，成了会议最后结论的基础。会议决定：

（一）增强俄国在太平洋的舰队，使尽可能较日本为强。

（二）谋求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主要是法国达成协议，如果日本政府的媾和条件侵犯俄国的重要利益，则应对日本施以共同压力。同时应注意，俄国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朝鲜的“独立”。

（三）如未能与英国及其他列强就保障朝鲜独立达成协议，应再开会讨论俄国进一步行动的问题。^①

2月8日，沙皇政府正式决定与英、法、德等国接触，商议“联合调停”。沙俄的态度是：如果日本的“议和条款是温和的”，即议和条件不涉及渤海湾及中国东北地区，并保证朝鲜的“独立”，则建议列强“对中国施以压力，强迫中国接受”^②。恰在此时，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奉旨会晤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基斯敬，乞求沙俄以武力胁迫日本停止对华战争。但是，俄国的方针已定，所以，基斯敬回答说：“俄主面告：威胁停战，致各国嫌衅，碍难办，然中俄交谊笃，东海局面，俄英法皆关注，俄力可助，必肯为，请中国速与商讲，如倭要索太过，必立即出约英法劝其退让。”清政府见依赖俄国无望，只得令当时正在彼得堡的专使王之春“不必再言此事”^③。

2月14日，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再次向日本外务大臣提议俄日两国交换意见。希特罗渥说：“现在日本向中国要求割地乃属当然，而俄国欲在太平洋岸获得自由通路亦非一日。因此，如贵国政府确能做到如过去所宣布的不妨碍朝鲜国之独立，俄国亦不会加以梗阻。”他又以“私人谈话”方式说：“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当然亦无异议。但日本若欲放弃岛国之地位而向大陆扩张版图，为日本计，则决非上策”，“总之，关于割取大陆土地，在欧

① 《红档》杂志 1932 年第 3（总第 52）卷，第 67—74 页。

② 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1894—1900）》，1928 年伦敦出版，第 80 页。

③ 《许文肃公遗稿》，第 10 卷，电报，第 12—13 页，并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33 卷，第 46 页。

洲各国中会有提出异议的。”^① 希特罗渥将交涉情况报告本国政府说：“陆奥向我重申关于朝鲜问题的保证；他说……日本将留意照顾别国的利益。”^②

过了两天，日本政府密电俄国，它已通知中国政府：“除了承认赔款及朝鲜独立外”，必须派遣赋予谈判割地及缔结通商条约全权的议和大臣。日本在这通电文中对割地问题说得含糊其辞，因为俄国对此预先已有明白的表示。

2月24日，俄国政府宣布：“日本政府若声明在名义上及事实上承认朝鲜独立，则我政府当能劝告中国政府派遣具有上述资格之全权使节，亦能劝诱其他强国与我政府采取同一方针。”由于俄国政府这一回只提及朝鲜问题，日本政府大为兴奋，即于2月27日备文感谢俄国政府的“赞助”，并声明：“日本国决不改变其对朝鲜国之政策方针，帝国政府在名义上和实际上皆承认朝鲜国之独立。”^③

以上事实表明，俄国对中日战争的“不干涉”政策，是以战局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为转移的。它一方面暗中进行武力干涉的准备；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公开的干涉，甚至企图在牺牲中国的基础上同日本达成某种秘密交易，以避免在准备尚未充分时同日本及英国发生正面冲突。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乞求沙俄“以兵协和”的指望全部落空^④。

五 策划“三国干涉还辽”

1895年3月初，日军进一步发动进攻，几天工夫就占领了整个辽东半岛，严重威胁京津地区。3月20日，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与日本开始谈判。

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对沙俄的远东扩张计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地区，沙俄赶忙收拾起“不干涉”政策，积极行动起来，从3月下旬起，在中国北部边境集结兵力，并将海参崴的派遣军移驻吉林。^⑤

4月1日，日本向中国提出议和条件11款，其中包括割让辽东半岛。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获悉后，立即禀奏沙皇尼古拉二世称：除非我们准备面对一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275—276页。

② 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83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1册，第705—706页。

④ 《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电报，第38页。

⑤ 《日本外交文书》，明治年间追补第1册，第700页。

场战争，或放弃远东的广大市场，我们绝不能容许日本“在大陆上获得巩固的立足点”，“攫取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①但是，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反对上述意见，主张不要开罪日本，而应乘机“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和“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他说，俄国固然应当“设法不使日本由于目前的战争而特别强大起来”，另一方面，也需要“审慎地放弃对日本的任何敌对行动，以便将来不损害我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②。他承认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对俄国是“最不惬意的事”，但是鉴于英国已明确表示对日本“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而德、法两国的态度尚不明朗，因此他认为，目前“只能非常友好地向日本政府指出，对旅顺口的占领将永远妨碍日本恢复对中国的良好关系，并成为破坏东方和平的借口”，而不宜采取强硬态度^③。

4月11日，沙皇政府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在中日和议新形势下俄国的远东政策问题。会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海军元帅阿列克谢大公支持洛巴诺夫先前的观点，认为日本是俄国对付英国的“天然敌人”，因此，“必须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秘密地站在日本方面”，“与它成立尊重我国利益的协议”。采取这种途径，“一方面于我们无损，同时在将来可能与英国发生的纠葛中我们可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④尼古拉二世同意他的意见，不反对中日和约，但希望从朝鲜获得不冻港作为“补偿”。但是，洛巴诺夫由于得到德、法准备参加俄国对日行动的保证，已改变了原有的看法，认为俄国不可能指望得到日本的友谊。维特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日本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假如日本占领南满，对我们将是威胁，以后大概会引起朝鲜被日本全部归并。”“假如我们现在让日本人进入满洲，为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及西伯利亚铁道，就需要数十万军队并大大增强我们的海军”，与日本的冲突终将难免。因此，他主张俄国暂不进一步占领中国领土，不使自己同时与中国及日本为敌，并要与欧洲保持正常关系；同时应坚决声明，不能容许日本占领南满，“假如（日本）不尊重我们的要求，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果有战争的必要，我们就坚决行动”，“令我国舰队……开始对日本海军作敌对行动，并轰击日本港口。这样，我们就会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就会尊重我们的效劳，从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

① 狄龙：《俄国的衰落》，1918年纽约出版，第246页。

② 《红档》杂志1932年第3（总第52）卷，第75—76页。

③ 同上书，第74页。

④ 同上书，第79页。

国界。”^①显然，维特坚持以武力作后盾迫使日本退出南满，其目的绝不是帮助中国，而是为了长远的侵华打算。

维特的上述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同意。会议最后决定：

一、在中国北部保持“临战状态”，先以友好方式劝告日本放弃占领南满，如遭日本拒绝，即宣布俄国将“依照我们的利益来行动”；

二、正式通知欧洲列强及中国：俄国无意侵占中国领土，但坚决主张日本应放弃对南满的占领。^②

在 4 月 16 日再次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沙皇同意了 4 月 11 日会议的结论，随后谕令外交大臣立即执行上述决定。

4 月 17 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③，该约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使日、俄两国的矛盾迅速表面化。条约签字当天，洛巴诺夫正式向德、法两国提议，如果日本拒不接受俄国上述忠告，俄、德、法三国即刻在海上对日本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切断远征中国大陆的日军同其本国的全部交通，使之陷于孤立^④。德国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不久，法国也表示同意。

沙皇政府得到德、法的上述保证后，立即在烟台（中日互换《马关条约》的预定地点）集结舰队^⑤，在阿穆尔军区开始军事动员，扬言要“助中伐倭”^⑥。4 月 23 日，三国驻日公使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内容相同的声明，强调日本占有辽东半岛，不但有危及中国首都之虞，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并对将来远东永久之和平有所障碍。因此，敦促日本国政府放弃领有辽东半岛^⑦。俄国驻日公使还补充说：日本政府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性占领，将使俄日友好关系得以维持，否则“对三国抵抗是没有希望的”^⑧。

日本接到三国干涉的声明后，即于次日在广岛行宫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首相伊藤博文在会上提出三个供选择的方案：

① 《红档》杂志 1932 年第 3（总第 52）卷，第 79 页。

② 同上。

③ 全文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14—619 页。

④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 1 卷，1960 年商务印书馆版，第 29 页。

⑤ 纳罗奇尼茨基等著：《远东国际关系史》，第 1 卷，1973 年莫斯科出版，第 176 页。

⑥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44 卷，第 14 页。

⑦ 《日本外交文书》，第 28 卷，第 2 册，第 17 页。

⑧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 1 卷，第 34—35 页。

- 一、断然拒绝俄、德、法的劝告，即使再增加敌国也在所不惜；
- 二、将辽东半岛问题提交国际会议处理；
- 三、接受三国劝告，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

会议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①会后，伊藤前往舞子与正在那里养病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商议。陆奥认为，第二个方案是自己招来新干涉的“愚计”，决心在不得已时对三国“完全让步”，而对中国则“一步不让”。这一意见得到天皇的批准^②。

为了探明俄国的意向并最后与沙皇政府讨价还价，日本驻俄公使奉命向俄国表示：中日媾和条约已经天皇批准，放弃辽东半岛实难办到，希俄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对日本的劝告，以敦和好；日占辽东，“绝不致危及俄国远东之利益，而实与日本国之利益相一致；关于朝鲜独立问题，日本国政府定不难使俄国得到满足”^③。由于沙皇政府断定自己已经稳操胜券，对日本的上述要求坚不让步。俄国外交大臣向日本驻俄公使声称：沙皇认为，日本的请求并无足以使我国撤销劝告的充分理由，故不能予以接受^④。

这时的日本经过侵略战争的消耗，已是国库空虚，军备缺乏，无力与以俄国为首的三国相抗衡。为保全最大限度的侵略利益，它试图取得英、美的援助，以对付三国的干涉，但没有成功。5月1日，日本政府分别向俄、德、法三国递交内容相同的备忘录，表示“同意以另外的附加条约方式”对《马关条约》做如下修改：

第一，除金州厅外，“全部放弃对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权”，但中国“当以相当款项”作为对日本放弃上述权利之“报酬”；

第二，在中国确实履行和约规定的义务以前，“日本有占领上述土地以作担保之权利。”^⑤

俄、德、法三国坚持日本必须完全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拒绝了日本的上述修改条款。沙皇政府宣称，辽东半岛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在于它拥有旅顺；因此，俄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俄国政府的意见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253—254页。

② 同上书，第256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2册，第32—33页。

④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259页。

⑤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2册，第65—66页。

是：必须坚持原来的要求，即必须放弃半岛全部^①。随后，德、法两国政府也表示同意沙皇政府的上述意见。

在三国的联合压力下，5月5日，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劝告”，指示驻俄、德、法三国公使向驻在国表示，日本同意“放弃对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②。5月8日，中日在烟台交换了包括上述修改内容的《马关条约》批准书。

日本退还辽东半岛，虽然在提交三国的备忘录中并未附加条件，但实际上正在与德国协商，以增加赔款作为交换。沙皇政府担心日本借此赖在辽东不走，便积极催促德、法两国讨论日本自辽东撤退的日期及中国追加赔款的数额等问题^③。三国经过协商后，于5月30日通过其驻日公使正式询问日本外务大臣：日本为放弃辽东半岛的占领要求中国增加多少“偿金”？何时从辽东半岛全部撤军？^④此时，德国因在对华贷款问题上遭到俄国排挤而对俄不满（详见下节），在增加赔款及自辽东撤军的问题上正暗中助日，这就使日本得到了继续讨价还价的机会。

7月19日，日本政府向俄、德、法三国递交备忘录，宣称：

一、日本政府为交还辽东半岛将向中国索偿5000万两；

二、日本政府准备于中国偿清上项赔款及第一期战争赔款后，即将军队撤至金州；待中国交付第二期战争赔款及交换“通商航行条约”后，即全部退出辽东半岛。

对于日本的上述要求，德国竟认为是“合理与适中的”。但是，俄国担心中国付不起5000万两的额外“偿金”，届时日本可能以此为借口，拖延占领辽东半岛的时间，于己不利，所以主张运用压力使日本将“偿金”减至一半。^⑤

对日本以缔结中日“通商航行条约”作为它从辽东全部撤军的先决条件的主张，俄国也表示反对。后几经磋商，俄、德、法三国达成了协议。

9月11日，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大臣建议，将退还辽东半岛的“偿金”减为3000万两，并将撤退的实行与赔款的支付直接联系起来。^⑥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264页。

② 同上。

③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45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2册，第128页。

⑤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65页。按：这项中日《通商航行船条约》于次年7月21日签订。

⑥ 同上书，第82页。

10月7日,日本接受三国条件:同意将交还辽东半岛的“偿金”减至3000万两;不以签订中日“通商航行条约”为撤兵条件,并愿于“偿金”交清后三个月内实行撤兵。^①

10月18-19日,三国和日本分别在东京换文,对上述条件予以确认。

11月8日,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辽南条约》及《议定专条》,规定1895年11月16日中国将库平银3000万两交与日本后,日军即于3个月内从辽东半岛撤回。^②

至此,持续半年多的“三国干涉还辽”活动终于结束。

“三国干涉还辽”的胜利,首先是策划者沙俄的胜利。俄国在这次行动中,仅仅通过军事威胁及外交手段,就兵不血刃地把日本从辽东半岛赶了出去,并迫使它承认朝鲜保持“独立”。通过干涉还辽,俄国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好打抱不平的中国“大救星”的假象,这就大大增加了以李鸿章为首的亲俄派的势力,便于俄国进一步加紧对清政府的控制,并以“还辽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

俄国策划干涉还辽,丝毫不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是为了便于今后由它自己来加以占领。中国空有保全辽东之虚名,而不得不承受追加赔款3000万两之重担。干涉还辽表明,当时中国领土的命运已不能由自己决定,而必须由列强来决定。清政府只能顺从以俄国为首的三国的旨意,交款赎地,这就大大加强了它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性,首先是使自己陷入沙俄掠夺性外交的罗网而不能自拔。

“三国干涉还辽”刺激了沙俄和其他列强采取积极的远东政策,使日俄关系空前紧张起来,这就大大加剧了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矛盾。自此,在东方地平线上,展现出一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血与火的图画。

第二节 中俄“四厘借款”与华俄道胜银行

一 中俄“四厘借款”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对日巨额赔款的重负;其中第一期赔款

^①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83—84页。按:这项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于次年7月21日签订。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36—638页。

5000万两应于1895年10月17日支付,时间紧迫。清政府试图通过提高关税在国内自筹赔款,但遭到把持中国海关、在对华贸易中居于首位的英国的反对^①。为救燃眉之急,清政府只得举借外债。对华贷款权于是成了俄、法、英、德等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的对象。

沙皇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起了主导作用,正准备以“恩人”和“朋友”的身份扩大对华影响,捞取“报酬”,确立在中国的霸主地位。在对华贷款方面,它自以为有“优先权”,可以捷足先登。但是,出乎它的预料,清政府在谋求列强贷款时,最先是向英、德、法而不是向俄国提出的。原来,《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清政府就通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提出了向英国借款的要求^②,同时也向法、德提出借款问题。接着,在柏林、伦敦和巴黎开始酝酿成立一个“德、英、法三国银行组成的银行团”对华联合贷款^③。德国人对英国把持的中国海关很不放心,提出贷款不能仅以中国海关收入作担保,应该成立一个“管理中国债务的行政机构”^④。法国人对这一建议表示同意。同时,由于企图削弱英国对中国财政金融的影响,避免在未来的国际银行团中陷入孤立,法国金融界决定拉俄国人入伙,以便利用俄国在中国的势力给自己的对华资本输出以保障,并最终“把俄国这一份攫为己有”^⑤。英、法、德在对华贷款权上的这种矛盾,给俄国以插手贷款的机会。

4月下旬,沙皇政府从柏林方面获悉此事后,因受清政府的“冷遇”,十分恼火。5月3日,沙俄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对清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表示:“闻中国拟将偿费借付日本,此时俄国户部^⑥已筹良策,有益中国,预备商。乃闻现欲向不肯合劝^⑦之英国商借,颇觉诧异。”^⑧它还逼迫许景澄转告清政府,借款事“应先商俄国,方见交谊”^⑨。这时,日本政府对俄、德、法

①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69页。按:1894年,英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65%,遥遥领先。参见马格《帝国主义的外交》,第1卷,1951年纽约出版,第167页。

②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410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87页。

④ 同上。

⑤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87页。

⑥ 即俄国财政部。

⑦ 指英国不肯与俄、法、德一起干涉日本还辽。

⑧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11卷,第11页。

⑨ 同上。

“三国干涉还辽”尚未作最后答复，清政府担心俄国态度有变，只得同它交涉借款问题。5月17日，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获悉法国人提出了吸收俄国人参加拟议中的国际银行团的建议，法国金融界考虑到“俄国可能从政治角度对此事感兴趣”，希望维特“组织一个俄国银行团，以便与法国银行团同时行动”，从而“使管理中国债务的行政机构中俄国代表的席位合法化”^①。但是，维特对法国人的这一建议并不怎么感兴趣，他担心，俄国一旦参加国际银行团，就只能成为“觊觎中国主权的普通一员”^②，而俄国的目标比这要大得多。因此，维特直截了当地拒绝说，他“对事情不太熟悉，不能对这一提议给予任何答复”^③。

1895年5月9日，即《马关条约》批准的第二天，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电告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叫他“通知中国政府，法国的一些第一流企业准备在借款中起重要作用”^④。施阿兰将此事通知庆亲王。庆亲王说，清政府拟在干涉日本还辽的“三强中分摊借款”^⑤，也就是说，在俄国的压力下，清政府已经不考虑向英国借款了^⑥。但是，俄国不仅不同意英国参加贷款，也不同意其他国家参加贷款，意欲独揽。

5月11日，维特向许景澄宣称，他“已饬本部^⑦筹备巨款，约合一万万两数作借”^⑧。许景澄将此事报告总理衙门。

5月15日，总理衙门电示许景澄告诉俄方，拟向俄国“先订借五千万（两）”，担保是“本利均由税关出票，户部盖印，按期拨还”，并重申“现德法亦愿借款，拟俟俄款商定，再与酌订”。^⑨也就是说，清政府答应了借款“应先商俄国”的要求，但只同意借款的半数。

5月20日，俄方为了掩饰贷款的政府性质，改变策略，提出一种所谓新办法，叫做“改荐银行承办，海关作押，关款不敷，由俄国国家担保”^⑩。关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8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88页。

④ 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1918年巴黎出版，第68页。

⑤ 同上书，第68—69页。

⑥ 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764页注④。

⑦ 即俄国财政部。

⑧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12卷，第5页。

⑨ 同上书，第9页。

⑩ 同上书，第16—17页。

于借款额，俄国仍坚持 1 万万两。许景澄再次告以“德、法须分办，故拟减借”。对此，俄方以减借“不合俄主筹退日兵本意”^①，“分办不如勿借”^②相威胁。

在上述交涉中，值得注意的是“改荐银行承办”和“由俄国国家担保”两端。所谓“改荐银行承办”，即名义上不再由俄国财政部出面贷款，而由“私人”银行出面，这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改荐”的目的是引出一个“由俄国国家担保”。所谓“由俄国国家担保”，就是以“担保”为名，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清政府实行控制。

同年 5 月 23 日洛巴诺夫给俄国驻法国大使莫伦海姆男爵的一封信，暴露了沙俄的真正意图，信中在谈到对华贷款时写道：“使中国处于依赖我们的状态，不让英国在那里扩大影响，这对我们未来的计划是十分重要的。”^③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他国注意，俄国政府极力装作对此事毫无兴趣。维特再三向德国驻俄国大使拉多林表示，“他根本无意参加这一贷款”^④。

其实，俄国当时的财力根本无法独揽这一大笔贷款，这是因为：俄国自有资本不足；正在修筑中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耗资巨大；1891—1893 年的连年灾荒也使它元气大伤。形势迫使它不得不同它的盟国法国勾结起来做合伙买卖：俄国给法国以政治支持，法国给俄国以财政支持。这一外交格局，在往后一段时期远东的国际政治中，曾起了巨大的作用。

沙俄和法国勾结排斥英、德参加贷款的活动，早在 5 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了^⑤。6 月 10 日，沙皇政府又派罗启泰率领一个代表团抵达巴黎，商讨在法国银行团“帮助下的”法俄对华贷款问题^⑥。罗启泰从巴黎向维特报告说，法国的霍丁格尔银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托银行、国家贴现银行、振兴工商业合股公司和工商信托银行准备承担贷款，并委托俄国向许景澄提出此事，“由俄国政府亲自签字担保”^⑦；此外，还委托俄国催促清政府授权许景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12 卷，第 17 页。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 10 卷，电报，第 14 页。

③ 格拉特费尔特：《俄国在中国：俄国对义和团叛乱的反应》，1975 年安阿伯—伦敦出版，第 21 页。

④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88 页。

⑤ 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 765 页注④。

⑥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89 页。

⑦ 施阿兰：《使华记》，第 69—70 页。

澄“同俄国政府及将从事贷款的法俄银行团签字”^①。勾结既妥，6月11日，维特和洛巴诺夫同时出面强迫许景澄接受4万万法郎（约合白银1万万两）的法俄贷款，条件是中国“海关作押，由俄主颁谕加保”^②。

英国和德国得知俄法勾结包办借款并由俄国对借款进行担保一事，十分不满，一齐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不要接受俄、法方案。德国驻华公使绅珂对庆亲王说，德国同俄、法一起干涉还辽，但是没有享受同等权利；上述方案“将德国排除在外，由俄国和法国独享利益”，庆亲王这样处理问题是“错误的、罕见的”，他为此表示遗憾^③。同时，他要求清政府接受英德贷款^④。英国公使欧格讷也提请清政府“警惕俄国对贷款担保的意图及其不可告人的目的”^⑤。赫德也大肆活动起来，力求破坏法俄方案，“保住英国的一份”^⑥。他居然忘记了他身为海关总税务司的中国官员身份，“抱怨法俄在目前条件下以如此低的利息向中国贷款。”^⑦

清政府对借款由俄国担保一事，也并非毫无警惕。6月12日，即俄国正式提出借款“由俄主颁谕加保”的次日，总理衙门援引英、德驻华公使之意电许景澄称，“俄国保借法款，有失体面”，“西国借用商款，事所恒有，从无他国国家代保者，既保借款，即为保护国事之渐”^⑧；并命令他拒绝接受“俄国担保”这一条，请俄国“务须另想办法”^⑨。许景澄遵旨向俄方提出取消俄国担保一条，俄方反以“请中国勿信妒忌造谣”为词，不予考虑^⑩。这时，亲俄媚俄的李鸿章出来替俄国帮忙，电告总理衙门说，向俄法借款事“应请速成，于公法国体，均无所碍”^⑪。在北京外交界公认为“形影不离”、“狼狽为奸”的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和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也展开了积极活动，“说服”清政府接受法俄贷款^⑫。

① 施阿兰：《使华记》，第71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13卷，第17页。

③ 施阿兰：《使华记》，第70—71页。

④ 占奇、坦纳利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1卷，1927年伦敦出版，第322页。

⑤ 施阿兰：《使华记》，第71页。

⑥ 同上书，第70页。

⑦ 同上书，第71页。

⑧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13卷，第18页。

⑨ 同上。

⑩ 同上书，第19页。

⑪ 同上书，第18页。

⑫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274页，第4章注⑬。

6月21日,应俄国政府邀请,法国大银行家霍丁格尔、诺茨兰和雷内·勃里斯访问彼得堡,就对华贷款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参加对华贷款的银行除了上述6家法国银行外,还有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彼得堡贴现贷款银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伏尔加—卡马银行等4家俄国银行^①。

7月1日,在俄、法的联合压力下,总理衙门电示许景澄可以画押^②。

1895年7月6日(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许景澄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当着维特和洛巴诺夫的面,同6家法国银行和4家俄国银行的代表正式签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和中俄“四厘借款”《声明文件》。《四厘借款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4万万法郎,由上述法国和俄国的银行分摊贷给:俄国银行占1/5,法国银行占4/5;以九十四又八分之一(即94.125%)折扣付款;年息4厘;36年还清,“以中国海关所入税项及存票作为押保”(第九条)。《四厘借款合同》还规定,中国偿还借款时“如遇有付款阻隔滞缓之处,不拘何故,俄国国家与中国国家商明,允许立合同之号各商董一面如期蝉联周备发给到期应销票本及票息之款”(第九条)。这样,沙皇政府对这次借款的担保权事实上由合同肯定下来了。《四厘借款合同》还规定:“在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正月十五日以前,除与银号商董商定外,中国暂不另行借用金钱各债,亦不准他人售卖各种借款股票”(第十六条)^③。也就是说,非经俄、法允许,中国在半年内不得向其他国家借债。

此外,同一天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四厘借款”《声明文件》规定:

一、如到期中国不能偿还借款本息,可由参与贷款的银行垫付,“唯中国国家应另许俄国以别项进款加保”(第三条);

二、“中国声明无论何国何故,决不许其办理照看税入等项权利,如中国经允他国此种权利,亦准俄国均沾”(第四条)^④。

这样,任何别的国家就不可能对中国财政享有支配权了。

通过“四厘借款”所附加给中国的苛刻条件,沙俄对清政府的影响大大加强了。俄国对借款的担保“使中国处于对圣彼得堡的依赖地位”^⑤,《四厘借款合同》规定的其他特权又使俄国得以借口插手中国海关和税收,干预中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90页注①。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2卷,奏疏二,第7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15卷,第7—13页。

④ 同上书,第14页。

⑤ 克莱德:《满洲的国际竞争(1689—1922)》,修订第二版,1928年美国出版,第49页。

国财政,迫使清政府进一步投靠沙皇政府。这是英、德的失败,俄、法的胜利。它加强了法俄联盟。俄国财政界对此普遍表示欢迎,认为这笔贷款将为俄国在远东开创一个“新时代”^①。

二 华俄道胜银行的成立及其性质

中俄“四厘借款”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沙皇政府对中国扩大侵略的贪欲。1895年7月6日,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刚刚签完字,维特就迫不及待地邀请法国大银行家霍丁格尔等人到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的办公室,向他们建议成立一家有法国资本参加的俄国银行。这家银行将“以最广泛的方式在东亚诸国开展活动”^②,并将得到俄国政府的庇护。维特和洛巴诺夫都亲自出面保证,一旦远东发生国际冲突,沙皇政府将出面支持该银行的事业^③。

根据维特的设想,该行的活动范围极其广泛,除一般的银行业务外,还从事贸易、货运、开展为中国国库“服务”的各项业务(其中包括征收赋税和发行货币)、获取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筑铁路和架设电线的租让权等等,其目的在于“巩固俄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以便与主要由于实际攫取了海关管理权而在中国占有极重要地位的英国人相抗衡”^④。总之,维特为了推行他的侵略远东的“新方针”,需要一个以“私营企业”为掩护的金融组织充当他的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拟议中的银行就是这样一种手段。

由于俄国资本的力量不足以实现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因此,维特沿袭中俄“四厘借款”时使用的手法,建议法国金融资本参加他打算成立的银行,使之成为俄国“从法国取得钱款的媒介”^⑤,也就是说,再次借用法国国内剩余资本的力量,替俄国争霸远东服务。这时法国和英、德两国的关系均不友好,它希望继续利用沙皇专制制度高度集中的政治军事力量及其对清政府的影响,为它在中国南部的扩张服务,并在中国的东北和华北给自己开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俄、法两股侵略势力的再度结合,导致了华俄道胜银行的成立。

①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71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90—91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90页。

⑤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73页。

俄、法的勾结，并不等于说它们之间就没有矛盾了。在谈判过程中，法国银行团答应承担创建股金的5/8，俄国只承担3/8，但是，维特为了保证俄国对银行的控制权，使之成为沙皇政府远东政策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①，坚持在董事会的8名董事中俄国要占5名，法国只能占3名。这一主张遭到法国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自己承担了大部分股金，应当“在银行中起到首要作用”^②。双方相持不下。“有好几个月，法国金融家一直在反对银行的管理计划”^③。最后，由于两国在侵华问题上总的利益一致，罗启泰在巴黎“说服”了法国人，谈判于10月12日结束。

1895年12月5日，法方的创办人在巴黎签署了由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拟就的《华俄道胜银行章程》。12月22日，《章程》经沙皇批准。华俄道胜银行随即在彼得堡成立总行。1897年，在巴黎设分行，充当法国金融资本与远东联络的媒介。自1896年2月起，该行相继在远东各国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而以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为最多。

华俄道胜银行创建时的股本为600万卢布，参加创建的有由4家法国银行（霍丁格尔银行、里昂信托银行、巴黎荷兰银行、国家贴现银行）组成的银行团和一家俄国银行——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后者是德国犹太资本家开设的德国贴现公司的子公司。德国贴现公司自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1855年）以来，数十年间，一直帮助沙皇政府在俄国建立和发展银行网^④。在上述600万卢布股本中，四家法国银行认购5/8，即375万卢布；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认购3/8，即225万卢布^⑤，其中自然包括了德国的资本。

为了混淆国际视听，沙皇政府从一开始就将银行命名为“华俄道胜银行”，并于1896年5月间向正在俄国的李鸿章递交了“伙开银行”的合同草案^⑥，李鸿章当即将此密寄总理衙门^⑦。后经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与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谈判，双方于同年9月2日签订了《中俄银行合同》五款，规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91页。

② 同上书，第91页注②。

③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71页。

④ 奎斯特德：《华俄道胜银行——沙皇在中国的跨国金融基地》，1977年伯明翰出版，第3页。

⑤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91页注②。

⑥ 《密约交涉未刊电稿》：《寄总署电》，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光绪中俄密约全卷》（影印本），1965年台湾出版，第85页。

⑦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第35册，第49页。

定清政府“入股伙开”华俄道胜银行，“所有赔赚均照股摊认”^①。

为了与俄国“合办”银行，建造东省铁路，清政府兴致勃勃地拿出了库平银500万两（折合756.2万卢布），这个数字超过了法、俄、德资本家开初认股的总和。罗曼诺夫正确地指出，正是由于清政府大量入股，“才使银行的这种地位得到了巩固”^②。其实，清政府是中了俄国政府的奸计。所谓“伙开生意”，纯属有名无实。它投资最多，但是在银行管理上毫无地位。它从来没能向银行董事会派过一名董事，甚至1910年华俄道胜银行与北方银行合并^③，沙皇政府都不屑于将此事知照清政府。沙皇政府拿了中国的钱^④来剥削中国人民，这一招可谓做绝了。

华俄道胜银行的董事席位并未按各方出资多寡分配。银行开设伊始，在沙俄政府一手操纵下，占银行股本5/8的法国银行团在总行董事会8名董事中只占3席，占银行股本3/8的俄国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占2席，当时未认一股股票的沙皇政府部门却委派了3名董事和1名董事长^⑤。

① 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编：《中外约章汇编》，第七部，中俄部分，1927年出版，第370—371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25页。按：库平银500万两当时折合卢布几许，所说不一。

③ 华俄道胜银行由于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而遭受沉重的打击，加上长期资金短缺，1910年，它不得不同法国人在俄国开设的北方银行合并，改名“俄亚银行”（中文名未改）。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将该行设在彼得格勒的总行收归国有，于是它的巴黎分行成了总行。后来，巴黎总行因外汇投机失败，宣告清理，在华各分行亦相继关闭。

④ 清政府用以与沙俄“伙开”道胜银行的库平银500万两，是由俄方在中俄“四厘借款”中扣拨充抵的（汪康年：《记道胜银行之存款》，《汪穉卿笔记》上册第1卷，1925年出版，第19页；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第29页）。道胜银行向清政府支付股息（《清德宗实录》，第508卷，第2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25页）。股息“多时不过四五厘，少且无有”，而“四厘借款”的利息却须按时照付，中方“所受亏损”“不可胜言”（《汪穉卿笔记》上册第1卷，第19—20页）。为此，清政府曾企图“将五百万两作为存款，不作股本，征收利息，不问银行之盈亏”（清外务部档案，第340宗，俄字第60号。转引自金世铸：《揭开华俄道胜银行的内幕》，《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但遭到俄方拒绝。1910年，道胜银行改组，俄方擅自把中国股本由500万两折为股本350万两、公积金175万两（公积金不计股息）。清政府闻讯后曾派员前往该行北京分行责问，对方竟称“公事忙碌”，没有通知（金世铸：《揭开华俄道胜银行的内幕》）。足见这家银行名为中俄合办，实则大权全掌诸俄人之手。有的作者认为清政府承担的500万两，纯系虚数，并未拨付（参看雷发著，蒋学楷译《外人在华投资》，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418页注），此说似欠根基。

⑤ 1896年华俄道胜银行董事名单：霍丁格尔（巴黎霍丁格尔银行）、夏勃里厄尔（巴黎荷兰银行）、诺茨兰（巴黎荷兰银行）、乌赫托姆斯基（董事长、俄国公爵）、罗启泰、诺特哈弗特（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斯塔尔采夫、弗拉基米罗夫（在远东的俄国当地商人）、罗曼诺夫（沙俄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后任财政副大臣）。

上述董事席位的分配情况很难使占股份比俄国多的法国人满意。果然，银行成立才一年多，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就亲自出来干预。法国人对俄国在上海分行的活动也表示不满^①。为了确保控制权，从 1897 年起，俄国财政部开始直接出面认购华俄道胜银行的股票，从法国股东手中购得 6000 股^②，合 75 万卢布。1898 年 7 月，维特又批准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第二次股票 1.2 万股，并命令用国库资金全部包买下来，从而使沙皇政府在银行总数 6 万股中占了 1.62 万股（即 25% 强）^③。1902 年该行发行的第三次股票 2 万股，也全数被俄国政府买去。至此，沙皇政府持有的股票已占该行股金的 53%，一跃而为最大的股东了^④。早在 1898 年的银行股东大会上，俄国凭借它拥有的多数票，对“银行章程”做了补充，规定该行所有董事，包括法国董事在内，一律须经过沙俄财政大臣批准^⑤。法方拒不承认此项修改，但也无可奈何。后来，董事席位虽屡经调整，但沙俄在董事会中的优势始终未变。

负责银行具体业务的经理（由一名董事兼任）一职也一向由沙俄政府委派。第一任经理（1896—1904）罗启泰原籍德国，他既是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的代表，又是财政大臣维特的亲信。他大权在握，与法方代表不和。1903 年维特被黜后，罗启泰失掉靠山。1905 年，沙俄财政部官员维什涅格拉德基继任经理。日俄战争期间，沙俄政府对华俄道胜银行更加重视，从俄国国库拨给银行 750 万卢布，实际上把这家银行当做俄国国家银行使用。战后，沙俄政府对华俄道胜银行的重视有所减弱，法国董事名额有所增加，但大权仍掌握在新经理、沙俄财政部官员索利斯基之手。

华俄道胜银行的分支机构分布甚广。1901 年，它已有分行 31 处，代理处 10 处，其中有 16 所分行，3 所代理处设于中国，计有上海（设于 1896 年 2 月）、北京（设于 1897 年）、天津、哈尔滨（设于 1898 年）、大连、旅顺、汉口、牛庄（营口）、烟台、宽城子（长春）、齐齐哈尔、吉林、铁岭、奉天、海拉尔、喀什等分行以及张家口、库伦、乌里雅苏台代理处。

此外，华俄道胜银行还在东西伯利亚、滨海省以及中亚细亚浩罕、撒马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485—486 页及第 91 页注②。

② 奎斯特德：《华俄道胜银行——沙皇在中国的跨国金融基地》，第 6 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235—236 页。

④ 同上书，第 376 页；参见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 1 卷，1934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 31 页注④。

⑤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236 页；奎斯特德：《华俄道胜银行——沙皇在中国的跨国金融基地》，第 6 页。

尔罕等地设立分行^①。该行极盛时期的分支机构达 50 个之多,遍及日本、北美、印度、英国及香港等地^②。

自 1909 年起,华俄道胜银行实行“中心分行”制,以加强对中国各边疆地区分行的控制。一个“中心分行”管辖若干分行。例如,中国东北中心分行设在哈尔滨,管辖长春、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分行。撒马尔罕中心分行管辖喀什、伊犁等分行。西伯利亚中心分行设在巴尔瑙尔,管辖塔城分行。伊尔库茨克中心分行管辖恰克图分行等^③。

以上关于华俄道胜银行创立经过、资金构成及组织管理情况的叙述,证明这家银行是一家结合了法、俄、德三国金融资本,以法国资本为主的跨国银行^④。银行的管理控制权与一般跨国银行不同,股权和管理权背离,始终操纵在沙皇政府手里。银行打着私人企业和外国资本占优势的双重旗号,实际上是一个“略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⑤及其驻中国的办事处^⑥。在成立后的二十余年间,它不仅充当沙俄对中国实行“经济兼并”的工具,而且执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即使它的经济活动,也绝不仅仅是考虑直接的商业利益,而主要是从独霸中国东北地区,向蒙古、新疆渗透,进窥华北并南下和英国争夺长江流域的政治战略出发的。苏联学者罗曼诺夫指出,这家俄国财政部的在华分店,“由于其章程所订活动范围极其广大,俄国政府在该行董事会中又占有优势,就成了俄国政府在世界帝国主义舞台上进行政治大赌博的一个富有弹性的、无孔不入的强大工具。”^⑦因此,华俄道胜银行是一个政治、金融二位一体的沙俄侵华殖民机构。它长期在中国活动所起的极其恶劣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本书以后各章将顺次予以必要的叙述和说明。

① 《华俄道胜银行 1901 年年报》,1902 年巴黎印行。转引自奎斯特德《华俄道胜银行——沙皇在中国的跨国金融基地》,第 33 页。

② 阿纳尼奇:《俄国的专制制度与资本输出》,1975 年列宁格勒出版,第 6 页。

③ 《华俄道胜银行须知》,1909 年彼得堡印行。转引自金世铸《揭开华俄道胜银行的内幕》,《历史研究》1977 年第 6 期。

④ 整个来说是以法国资本为主,沙俄只是在从俄国出兵东北到日俄战争这一段(1900—1904 年)是主要股东。

⑤ 罗森:《外交活动四十年》,第 1 卷,1922 年伦敦出版,第 198 页。

⑥ 该银行总行的历届董事会中,一般有 3 名董事是俄国财政部官员。1896—1900 年三任总经理中,一人与维特过从甚密,两人是俄国财政部官员。北京、上海、天津的分行经理也是俄国财政部官员,其中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是维特的心腹,后任沙俄驻华公使(1905—1908 年)。

⑦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955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 290 页。

第三节 “中俄密约”与东省铁路

一 沙俄攫取东省铁路利权的方针及最初交涉

19世纪末,沙俄推行侵华新方针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借地筑路”。维特倡议成立华俄道胜银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攫取中国铁路利权。他在1895年7月26日谈到拟议中的华俄道胜银行在“巩固俄国在华经济势力”方面的作用时,曾指出,该银行“在俄国政府建造同西伯利亚铁路工程的竣工具有最直接关系的最后一批设施时”,“可能成为俄国政府手中极其有益的工具。”^①同年11月11日,他正式提出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地区直达海参崴的建议,并为此起草了建筑该铁路的租让方案和政策性备忘录,于12月9日上奏沙皇并得到批准^②。为取得预期的效果,维特在上述建议中要求道胜银行为俄国驻华使馆提供一笔特别基金,用于贿赂中国的大臣。

如前所述,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将海参崴同俄国欧洲部分连接起来以称霸远东的计划,早在19世纪80年代已在俄国开始酝酿,并于1891年3月经沙皇批准。末代沙皇,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尼古拉二世做了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主席,而这条铁路的灵魂则是靠铁路起家、代表俄国钢铁资本利益、号称“俄帝国主义鼻祖”的财政大臣维特。当时,沙皇政府内部对该铁路在远东一段的走向问题发生过分歧。以阿穆尔总督杜霍夫斯科伊为首的一些人主张选择“阿穆尔线”,即由外贝加尔地区沿黑龙江左岸以达伯力,与自海参崴通往该城的乌苏里铁路(1891年动工修建)衔接^③。但是,经过1894年的勘察,发现这条线路所经过的地区山高泽多,地形复杂,居民稀少,施工较难;而且选择这条线路必须“绕行”黑龙江左岸,耗时糜资,多所“不便”。这一切,都被维特紧紧抓住,当做西伯利亚铁路必须穿过中国东北地区的“理由”。

其实,这些都不是维特反对“阿穆尔线”、提出铁路穿过中国东北方案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从1896年4月12日维特同杜霍夫斯科伊论战时所写的一份《节略》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节略》说:“所拟联接外贝加尔省与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92页。

② 同上书,第92—93页。

③ 《红档》杂志1932年第3(总第52)卷,第88—89页。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铁路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的及战略的意义。”由于列强在中国的激烈争夺,俄国“必须用种种方法将中国北部的铁路网转入自己手中,首先要将由外贝加尔穿过满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干线握在手中”。

“从政治及战略上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沿岸和临近中国首都之处。相当数量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出现,就可能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从此以后,没有俄国的同意,任何铁路线或支线都不得在中国北部修建”。

从经济上看,这条铁路将使海参崴“成为满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港口”,“会提供非常有利于俄国商业的条件”,从而使它“能在满洲及毗连满洲的中国省份牢牢地站稳脚跟”。而且,“在修筑上述干线以后,短期内自然会由该线建筑支线到中国内地”。但是,维特认为,目前通过满洲的铁路问题是“主要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毫无疑问会自然解决”^①。

维特的这个《节略》,赤裸裸地暴露了沙俄提出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的真正动机。它绝不仅限于经济上的图谋,更重要的是怀着明显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打算,堪称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征服中国“新”方针的纲领性文件。

还在维特着手策划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的大阴谋的同时,对清政府的试探就已经开始了。1895年夏,维特佯装防备日本以投合新近被日本战败的清政府的口味,多次对驻俄公使许景澄说:“俄国防日甚亟,现已赶造西伯利亚铁路”,如中国自己“造路与彼接连”,则中俄“两收通商调兵之利”。^②其实,维特是坚决主张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地区的,他根本不想让中国在东北“自造铁路”,他不过是借此摸清政府的底。

1895年10月,沙俄未经清政府同意,擅自派员越境到中国东北各地勘测铁路线路。勘测队分为四批:一批由斯维亚金率领从乌苏里方面到宁古塔一带活动^③,其他三批则越过黑龙江径往齐齐哈尔、大兴安岭乃至辽东湾等地^④。其查地之广,勘测项目之多,远远超出修筑一条铁路的需要。清政府

① 以上参见《红档》杂志1932年第3(总第52)卷,第92—95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18卷,第1—2页。

③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1923年哈尔滨出版,第41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18卷,第2—4页。

对沙俄的阴谋有所警觉。总理衙门奏章指出,沙俄的活动是“以将来或与中国在满洲地方兴造铁路相接为词”,企图“借地修路”,因此力主铁路“自俄境入华境之后……均由中国接造”。^①

果然不出所料。1895 年 11 月,维特早将他不久前劝说清政府“自造铁路”的话置之脑后,悍然向许景澄提出在中国东北“借地修路”的无理要求。他伪善地说道,“本部为中国代计,目前未必有款,又无熟悉工程之人”,中国自造铁路“办理恐难迅速”,建议“莫如准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与中国订立合同”。^②对此,许景澄以“公司办法与前奉本国训条自造之说不同”为理由,加以拒绝。他向总理衙门报告说,维特的计划“明系托名商办,实则俄廷自为,盖即借地修路之谋,变通其策,以免诸国之忌而释我之疑”。^③

同许景澄的谈判既无结果,沙皇政府转而在北京同清政府进行直接交涉。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896 年 4 月 18 日,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奉沙皇政府之命,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了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的问题^④。很有可能,喀西尼在上述交涉中把一份协定草案交给了总理衙门。这就是西方盛传的“喀西尼协定”^⑤。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18 卷,第 2 页。

② 《许竹算先生出使函稿》,第 12 卷,第 9 页。

③ 同上。

④ 施阿兰:《使华记》,第 136 页。

⑤ 这个“协定”于 1896 年 10 月 30 日首次以《中俄专门条约》文本的形式披露于《北华捷报》。此后,人们就把它称作“喀西尼协定”。直到 1910 年刊出“中俄密约”法文本的英译本以前,国际上一直认为“喀西尼协定”是中俄关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秘密协定的惟一近似的文本。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认为,这个“协定”完全是虚构的(《使华记》,第 147 页);罗曼诺夫则认为,“协定”虽非已经签署的正式文件,但往后的历史进程证明它基本符合事实,因此,“协定”纯属虚构之说是没有根据的(《俄国在满洲》,第 135—136 页)。尽管如此,他认为还是不能把“协定”当做一份外交文件的最后定稿,理由是:(1)“协定”结尾没有签字及日期;(2)引言中举出了俄方代表喀西尼的名字,但未道出中国代表的名字;(3)《北华捷报》抄件的原件本来未分成条款,分条编款出自英国出版者之手;(4)“协定”措词比较粗糙,不同于一般外交文件(同上书,第 138 页)。另据《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丁未(1896 年 10 月 21 日)所载“中俄新约”全文,内容与《北华捷报》所载“喀西尼协定”几乎完全相同,引言只署了俄方全权代表“一等伯爵贾”(即喀西尼)的名字,中方全权代表的名字则付阙如,仅作“特派大清国钦命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为全权大臣”。结尾处也未见签名。(《光绪朝东华录》,总第 3875—3876 页)从以上各点似可推断,喀西尼开始与总理衙门谈判时,似已准备了一份“协定”的草案,并将该“草案”交给了总理衙门。苏联学者罗曼诺夫称,这份“协定”草案“是 1896 年秋天从俄国使馆的文件中被窃取出来”的,不知何据(见《俄国在满洲》,第 138 页)。根据当时情况,清政府为了利用列强的矛盾,极有可能有意将喀西尼提出的掠夺性要求泄露出去。

如果说维特的《节略》是沙俄侵华新方针的纲领,那么,“中俄新约”即所谓“喀西尼协定”就是沙俄侵华新方针的底盘了。这底盘是:

(一) 要求中国同意俄国政府在中国东北修筑两条铁路,一条是海参崴—珲春—吉林线,一条是西伯利亚铁路某站—琿琿—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线,这两条铁路由俄国自行筹集资本,其行车章程均应仿照俄国成规办理,中国不得与闻,其管理权,亦暂归俄国,以30年为期;

(二) 山海关—奉天—吉林线,如中国不拟修筑,准由俄国备资由吉林代造,以10年为期赎回;

(三) 中国所拟续造之铁路,自奉天至山海关,至牛庄、盖平、金州、旅顺口等地,均应仿俄式宽轨铁路修筑;

(四) 上述俄国自造之铁路,俄国得派马步营兵驻扎各要站;

(五) 关于海港问题,要求中国将山东胶州地方暂行租与俄国,以15年为限。

对旅顺口和大连湾,俄国愿予以“保护”,不准他国侵犯,中国应同意“将来永不让与他国占据,惟日后俄国急有军务,中国准将旅顺口及大连湾等地方暂行让与俄国水陆军营泊屯于此,以期俄军攻守之便”。

此外,沙俄还勒索在吉、黑两省的采矿权和中国东北军队的训练权等。^①

4月30日,喀西尼再次去总理衙门,威胁说:如果中国拒绝“借地修路”,必将对沙皇政府产生“最不愉快的印象”。^②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清政府担心如答应上述要求,列强将群起效尤。因此拒绝了喀西尼的要求,并且声明说:中国已经决定“不把这类租让权给予任何外国和外国公司”^③。谈判遂陷入僵局。

二 “中俄密约”的签订

为了实现“借地修路”、使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沙皇政府在指示喀西尼与清政府交涉的同时,又利用清政府遣使赴俄参加沙皇加冕典礼的机会,施展新的阴谋。在这一阴谋中,沙俄看中的谈判对手是李鸿章,并采用伪装结盟、威胁讹诈、重金贿赂等手段,干尽了伤天害理

①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3875—3876页；马克谟编：《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1894—1919）》，1921年纽约出版，第1卷，第79—80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04页。

③ 同上。

的事。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预定在1896年5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早在1895年12月28日,光绪帝以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次奉使俄邦,办理得体”,派其为致贺专使。^①沙皇政府借口王之春“位望未隆,与各国遣使相形,难于接待”,^②强要清政府简派大学士或清室王公前往,实际上是要亲俄派头子李鸿章出马。清政府屈从于沙俄压力,不得不于1896年2月10日授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致贺加冕,并前往英、法、德、美等国联络邦交。^③行前,慈禧太后亲自召见李鸿章,密商“联俄”问题。^④翁同龢也和他谈了“密结外援”问题。^⑤与俄国结盟的方针,因以大定。因此,李鸿章出发前说,“连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⑥

这时,沙俄为防止欧洲其他列强抢先把李鸿章接走,曾做了周密的布置。先是由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同他商定了此行的路线:由上海乘法国邮船到埃及亚历山大港,再改乘俄船经黑海在敖德萨登岸^⑦。

3月28日,李鸿章自上海出发。沙俄又害怕李鸿章途中被西欧列强截去,改道先去西欧,受其影响,决定派沙皇亲信乌赫托姆斯基秘密前往苏伊士运河口“恭迎”^⑧,乘机“开始同特使(即李鸿章)谈判”,与他“秘密亲近”和做出“慷慨许诺”^⑨,即进行贿赂。

4月22日,李鸿章抵塞得港时,乌赫托姆斯基已在该地。他立即将李鸿章送上一艘俄国轮船,向黑海进发。在他的陪同下,李鸿章一行于4月27日到达敖德萨。在那里,沙皇政府对他待以国家元首之礼,给他配备专门的卫队,“俄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⑩。

在这种貌似热情隆重的接待下,李鸿章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没有意

① 《清德宗实录》，第379卷，第35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3726—3727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20卷，第1页。

④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60页。

⑤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第35册，第2页。

⑥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11，《李毅肃侯挽诗》自注。

⑦ 《寄彼得堡钦差、巴黎庆钦差等电》，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三日。《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76页。

⑧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1922年柏林俄文版，第43页。

⑨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09页。

⑩ 《寄总署、天津交李经迈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参见《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80页。

识到自己已入俄国人的彀中,“联俄制日”之志益坚。

为了更快地实现攫取“借地接路”(即修筑东省铁路)的目标,沙皇政府于李鸿章到达敖德萨的次日,派专列将李鸿章接往彼得堡,并于4月30日到达,这时距沙皇加冕典礼还有二十多天。尼古拉二世特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与李鸿章进行秘密谈判。

5月3日,谈判正式开始。根据不久前维特与许景澄、喀西尼与总理衙门交涉的经验,沙皇政府深知要李鸿章在东省铁路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做出让步,绝非易事,于是采取了两种策略:

(一)伪装结盟,即利用清政府新近战败急于同俄国结盟的心理,以结盟为诱饵,逼使李鸿章同意“借地接路”;

(二)对李鸿章及其随员进行重金贿赂。这两个狡猾卑劣的手段,贯穿于密约交涉的始终。

谈判一开始,维特即师俄国前辈外交官的故伎,伪装成中国的“朋友”。他说:俄国非常“关心”中国的“完整”。在干涉还辽中,“正是由于有了俄国,中国的完整才得以保持”。甲午战争中,俄国虽曾派兵从海参崴进入吉林,但因为没有铁路,行动迟缓,兵未开到,而战局已定,可惜没有来得及“帮助”中国,为了在必要时能够从海参崴和欧洲两个方向运兵助华,“我们首先需要一条铁路,而且是一条最便捷的通往海参崴的铁路;为此,这条铁路必须穿过蒙古和满洲北部。”^①换句话说,你要俄国和你结盟,非先得同意“借地接路”不可。

维特如此提出问题,使李鸿章难以应付。而且临行前他与西太后和翁同龢的密议,似乎仅谈到密约和结盟,未允给予俄国以“接路”的特权。因此,李鸿章推说事关重大,不敢贸然答应维特的要求。

维特一计不成,于是拿出另一个“法宝”。他暗中派遣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秘密勾结李鸿章的俄籍随员兼翻译柯乐德^②,“用百万法郎来诱惑对方”,使他愿意为成立穿过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公司方案出力^③。此外,还决定把沙皇抬出来以加重分量。

5月4日,在李鸿章递交国书后,维特安排了一次尼古拉二世的秘密接

① 以上参见《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46—47页。

② 时任中国海关五品衔副税务司。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10页。

见。5月7日，尼古拉二世又以“回宫验收礼物为名”，破例再次接见李鸿章。这次接见十分诡秘，只让李鸿章带其子李经方参加，而且俄国各报刊对这次接见未加报道。会见时，尼古拉二世向李鸿章宣称：“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铁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华俄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日）、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①这段话的意思与维特上次与李鸿章所说的基本相同，只是明确提出了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接路和“妥议章程”的问题。

在维特的《回忆录》中，关于沙皇第二次接见李鸿章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叙述：由于李鸿章对“借地接路”“制造了种种障碍”，他才安排了沙皇对他的单独接见。5月7日接见后，维特立即进宫朝见。尼古拉二世“容光焕发，他几乎用耳语对我说：‘李鸿章曾到我处，我对他说了’”。^②据罗曼诺夫分析，这次接见时尼古拉二世已对李鸿章做出了允诺^③。这项允诺，从所谓“抵偿与东省铁路租让权有关费用的特别基金”，即俗称的“李鸿章基金”而得到证实^④。

在沙皇第二次接见李鸿章的次日，即5月8日，维特和洛巴诺夫根据沙皇的意图，要求李鸿章答应“借地接路”，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并建议就此事议定章程。李鸿章答以中国东北部地势不利，人迹不通，修路匪易，而且此事须请旨定夺，予以婉拒；同时，他询问头一天沙皇对他说的“出力援助”的问题，表示对这件事情十分关心。洛巴诺夫于是直接提出密约问题，明确宣称订约要以清政府接受“接路”为先决条件。他说道：“若请派兵……华有事俄助，俄有事华助，总要东路接成乃便。俟成准后另订密约。”^⑤

李鸿章见沙俄无意退让，决定同对方讨论“借地接路”问题，只是认为这个问题应在订立密约以后讨论。他于5月8日当天电商总理衙门，提出可

① 《寄总署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80-81页；《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21卷，第5-6页。按：以上两个出处个别用词略有不同。

②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47-48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8-50页。

④ 详见下文。

⑤ 《寄总署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参见《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81页。

否“先修订援助，后议公司”^①。这和总理衙门4月30日在北京对喀西尼表示的不将东三省的铁路租让权给予任何外国或任何外国公司的立场^②，已有根本不同。原因也许是李鸿章过分沉溺于“联俄制日”的狂想，也许是俄国卢布已经发生效力，更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

5月13日，俄方不问清政府和李鸿章态度如何，竟然将单方面拟定的“中俄密约”约稿交与李鸿章转奏。约稿的正式名称叫做《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约稿除了虚晃一枪，声称日本或日本的同盟国如侵夺俄国、中国或朝鲜土地，中、俄两国应出兵互相援助外，提出“将来为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捷速起见，议于黑龙江、吉林边地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第四款）；“无论和时、战时，俄国均可用上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第五款）；开战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舰驶入”（第三款）等侵略要求。为了确保掠夺到东省铁路的租让权，约稿还规定“此约应由第四款所让之事举行之日算起照办”（第六款）。^③

对上面这个约稿，李鸿章除了在第四款末尾加上“其事可由中俄公司经理，其条款由两国妥善商订”两句话并征得俄方同意外^④，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意见。他似乎认为，只要加上诸如此类的话，清政府的“面子”就可保全，他的屈膝退让就可以找到为之辩护的理由。因此，收到俄方约稿的当天，李鸿章就将它转奏光绪帝请旨；第二天，他又迫不及待地电催清政府准其画押^⑤。

但是，清政府仍然只同意与俄国密结军事同盟，“接路”事仍欲中国自办，并将此意电示李鸿章^⑥。5月18日，谈判移至莫斯科进行。李鸿章遵旨向洛巴诺夫转达清政府的上述立场。对此，洛巴诺夫粗暴地威胁说：“铁路无成，另约即无庸议。”^⑦也就是说，如不答应“接路”要求，俄国就要中断谈判。

5月19日，俄方又主动提出修改它在5月13日提出的约稿，主要是：删去第一款中“或与日本同盟之国”的字样，这是为了避免对中国承担过多

① 《寄总署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参见《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81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04页。

③ 《寄总署电》，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参见《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82页。

④ 同上。

⑤ 《寄总署电》，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同上。

⑥ 《北京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到。参见《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83页。

⑦ 《寄总署电》，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同上书，第83页。

的义务，并防止引起英国的猜疑；第四款末句，将此路“可由中俄公司经理”，改为“此路由中国国家准交俄华银行承造经理”；第六款将原约稿“此约应由第四款所让之事举行之日算起照办”，改为“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等等^①，其他基本未变。

俄方的这次修改，不仅完全坚持原有立场，而且明确提出“接路”非要华俄道胜银行“承造经理”不可。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不过是维持“中俄合办”的假象。由于该行由俄国操纵，实际上等于这条铁路由俄国独办。不仅如此，修改后的第六款意味着“铁路合同”一口不批准执行，“密约”即一日不能生效。这种蛮横态度，暴露出先前对李鸿章的温文谦恭，全是演戏。

关于上面提到的“铁路合同”，俄方也早已拟就草案，并于递交“密约”原稿的次日即5月14日由维特面交李鸿章^②。5月19日，双方就修“密约”原稿及“合同”草案进行了谈判。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实际上已就“密约”及“合同”对俄方做了原则性让步，同意中国东省铁路公司“令华俄银行承办”，仅换来一个该公司“由中国政府派委员总办”的虚名^③。至此，俄方的侵略要求，基本上已经达到。

在既成事实面前，清政府不得不从原来“自造铁路”的立场后退，同意“借地接路”。但是对俄方约稿第五款所言平时、战时俄国均可用该铁路运兵一层，心存疑虑；对于规定密约从铁路合同“批准举行”后方才生效这个“紧箍咒”（第六款），也感到俄方欺人太甚，不给中方留丝毫回旋余地，因此指示李鸿章转达俄廷，将约稿五六款删去，“即将（前）四条定立密约”^④。

5月24日，李鸿章不得不向俄方提出按约稿前四条签订密约。谈判中，俄方佯示妥协，将第五款改为：“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路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⑤后一句话，当然纯属空头支票。关于第六款，维特和洛巴诺夫则寸步不让，再次威胁说：“六款为通篇结穴，一

① 《复总署电》，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七日。参见《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83—84页。

② 《寄总署电》，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参见《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82页。“合同”草案规定，东省铁路由“中俄集股，不准收别国商股；无论盈亏，岁贴中国二十五万，先交二百万，俟路成五十年或八十年，中国可自收回”。

③ 同上书，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同上书，第84页。详见后文。

④ 《北京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到。《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84页。

⑤ 《寄总署电》，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同上书，第85页。

字不能改动，否则此约作废论”^①。

其实，李鸿章既已对俄国做出根本性的让步，清政府亟欲挽回，终究是覆水难收。软弱的清政府终于全面退却，5月27日，翁同龢会同张荫桓、吴廷芳、李鸿藻、荣禄、庆亲王、恭亲王就此事进行了研究，决定请旨准予李鸿章在密约上签字画押^②。5月30日，李鸿章接总理衙门电，受命“与俄国外部大臣画押”^③。

1896年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俄历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俄密约”的签字仪式。密约的中方签字人是李鸿章，俄方签字人是洛巴诺夫和维特。条约备有中、法两种文本，以法文本为准。密约（见第43页、第44页图）经两国政府批准后，于同年9月28日在北京互换，主要内容如下：

中俄两国“因欲保守东方现在和局，不使日后别国再有侵占亚洲大地之事，决计订立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立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第二款，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

“第三款，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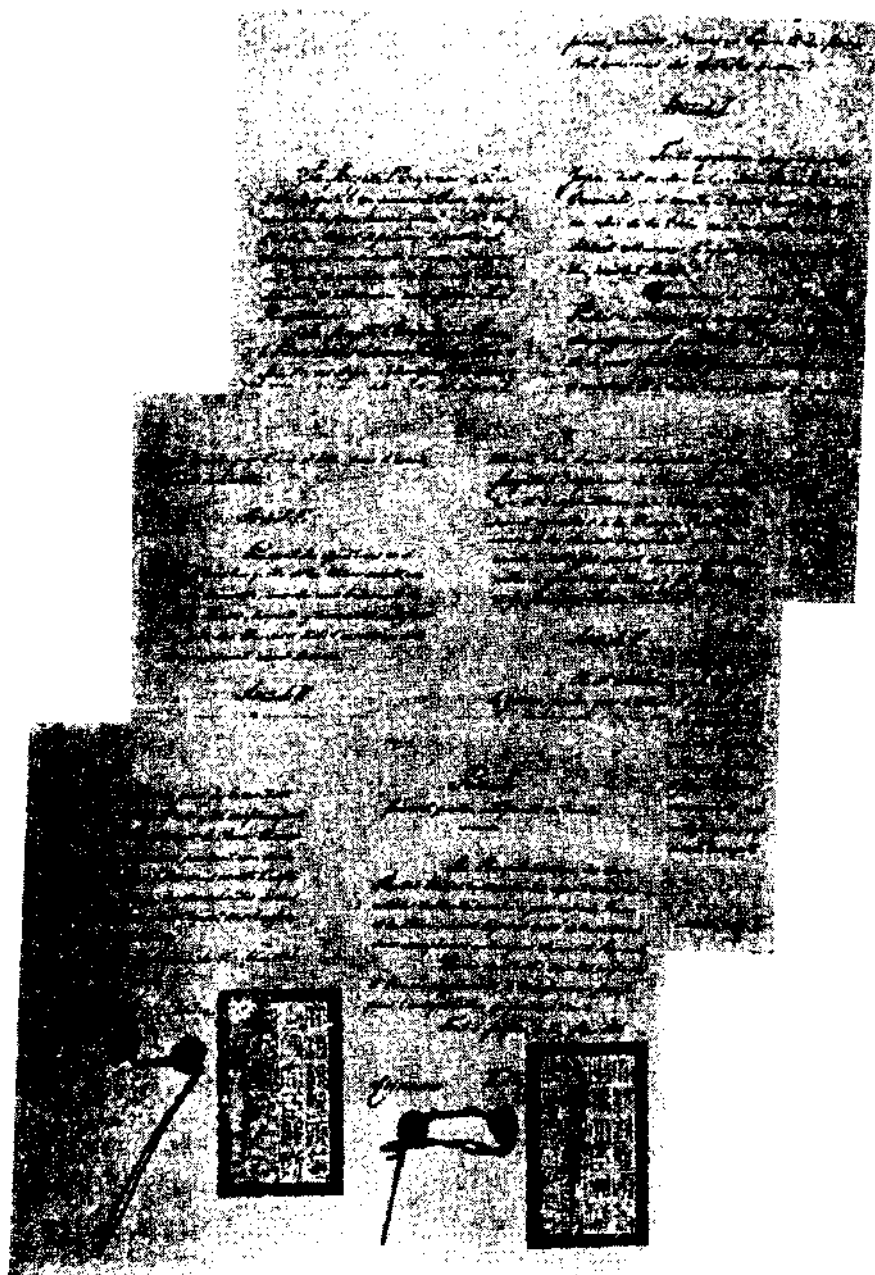
“第四款，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第五款，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路运过境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

① 《寄总署电》，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8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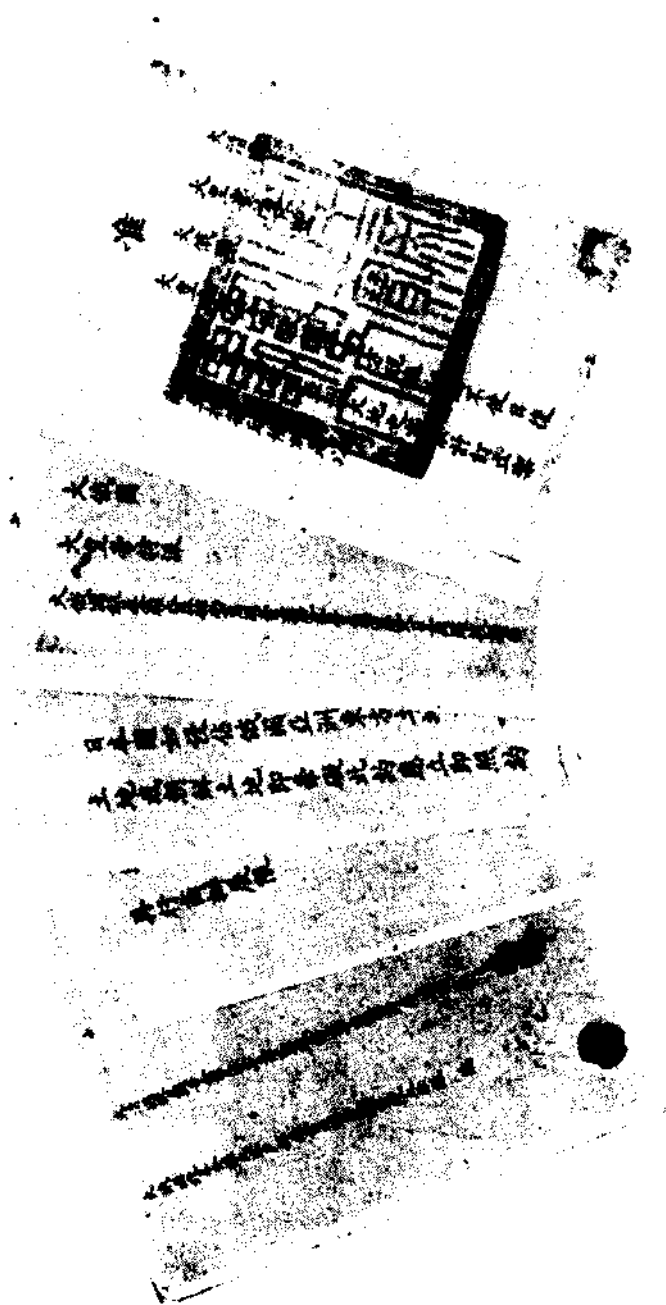
②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五日，第35册，第35页。

③ 《北京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到。《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85页。



“中俄密约”法文本

(采自蒲莱恩《1907—1916 年关于满洲和蒙古的俄日条约》)



“中俄密约”中文本

〔采自《光绪中俄密约全卷》(影印本)〕

“第六款，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限，届期六个月以前，由两国再行商办展限。”^①

上述密约的内容，显然同俄方最初拟定的初稿并无实质上的不同。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虽然对俄方约稿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但是每当俄方施加压力，他就立即让步。维特等也对密约的俄方约稿做过一些更动，但均属细枝末节，或属官样文章^②。俄国的主要侵略目标——借地接路权得到圆满实现。此外，通过“密约”，俄国取得以各种借口派兵进入中国东北和派军舰占领中国所有口岸的侵略特权。

“中俄密约”是俄国对华外交的巨大成功。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独占的势力范围，并把中国置于俄国准保护国的地位。这对于俄国将其侵略矛头进一步伸向华北乃至长江流域，进一步控制清政府，争夺远东霸权，具有决定意义。李鸿章以中国主权的大丧失，换来俄国“御敌互相援助”的一纸空头诺言，使他成了千古的罪人。订约以后，他洋洋得意地宣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③，这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密约”签订后的历史，使这个谎言变成了无情的嘲讽。

“中俄密约”的交涉过程，充分表明了俄国外交的伪善、欺诈和不择手段。“密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大骗局，沙皇政府本来就毫无与清帝国结盟的诚意，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以此为钓饵，搬出日、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怪影来吓唬清政府就范。为了达到侵略目的，它也可以毫不迟疑地施用邪恶的购买伎俩。“密约”签订第二天，它就根据事先的许诺开始对李鸿章“论功行赏”。当天，俄国拟定了一份“议定书”，答应如果“接路”顺利进行，将付给李鸿章300万卢布的“酬金”，到铁路竣工为止，分三次付给，每次100

① 《光绪中俄密约全卷（影印本）》，第1—9页。参见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编《中国约章汇编》，第七部，中俄部分，第356—359页。按：密约原本原以绝密方式藏于慈禧寝宫中。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慈禧仓皇出逃，未及携走。俄国侵津军劫掠皇宫时，被一并劫去，由俄国驻华公使馆转呈当时的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后由俄国归还清廷。（参见《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67—168页）后来，这一原本于中国大陆解放时由国民党携往台湾。60年代台湾整理外交档案时，复见原件，“皮囊已坏，装潢已脱，约文尚属完整。”（《光绪中俄密约全卷》，陶希圣序，第2页）鉴于20世纪初以来，密约多次以私人或官方形式公布，繁简不一，且每有歧异，故不厌其烦，将约文条款按原件中文本影印件全文照录于上。

② 参见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维特伯爵档案材料选编）》，1916年彼得格勒出版，第36—37页；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21页。

③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11，《李肃毅侯逸诗》自注。

万卢布^①。以上种种,有助于人们对沙俄外交有一个本质的认识。

密约的内容和交涉过程无可辩驳地证明,“中俄密约”是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以不正当的手段,诱迫清政府签订的“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②。

三 东省铁路“合同”与东省铁路“公司章程”

沙俄以订立“防守同盟”及行贿赂取东省铁路修筑权后,紧接着又通过东省铁路“合同”和东省铁路“公司章程”,从中国攫取了更大的利权。

“中俄密约”第四款规定,接造铁路之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事实上,早在1896年5月间,即维特等与李鸿章举行秘密谈判期间,俄方就已向李鸿章提出了“铁路合同”草案,并由后者寄回北京,请求对案^③。“中俄密约”签订后,沙俄更是迫不及待地要求按上述规定签订合同条款。俄国指定的铁路合同谈判代表是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中方代表是驻俄公使许景澄。由于许景澄兼任驻德、奥、荷公使,夏秋驻在柏林,仅靠罗启泰与许景澄书信来往诸多不便,因此,6月12日李鸿章离俄后,沙皇政府即派财政部副大臣、华俄道胜银行董事罗曼诺夫前往柏林与许景澄面商。

在谈判中,俄方提议以维特起草并经沙皇批准的铁路合同草案为协商的基础,要求:铁路应自合同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开工;铁路轨距应与俄国的标准一致(宽轨);铁路公司所需土地不纳地价;铁路公司在铁路附近开采矿苗亦皆免税;凡由该铁路运入或运出中国之货物,按中国关税税率1/3纳税;公司得自由规定铁路运费;自通车之日算起,80年后路产全归中国,等等。七月初清政府就铁路轨距、开矿、税收、铁路归还中国的时间等问题提出修改意见,明确要求:铁路轨距应按中国定式,采用窄轨,列车于交界地点换车;铁路沿线开采煤矿,应另议办法,不能免税;俄国经此路运输过境货物,应照中国海关税率减半征收;铁路八十年归还,期限太长,应改为三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15—116页及116页注^①。1897年春,乌赫托姆斯基亲赴上海,并通过中介人送给了李鸿章第一个100万卢布(同上书,第118—119、171页)。

^②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4卷,中文第1版,第204页。

^③ 《寄总署电》,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85页;《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第35册,第49页。

十六年^①。尤其是轨距问题，清政府因正与法国交涉修筑龙州铁路，担心一旦同意俄国要求，“法必争论”，所以主张“各国各轨”^②；同时，为了将来国内各路能联络通车，以利国防和商务，清政府也想划一路轨；因此，迭电许景澄力争使用中国轨式，不能依照俄式宽轨^③。对此，俄方竟根据当时留在俄国的柯乐德的建议，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于7月中旬告诉慈禧，如不按照俄国的要求签订合同，俄国“将探求与别国联合，而与中国的同盟将成为一纸空文”^④。

在沙俄的逼迫下，许景澄与乌赫托姆斯基、罗启泰于9月2日在柏林签订中俄《银行合同》后，又于9月8日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⑤（简称《东清铁路合同》）十二款。铁路合同是主要文件，银行合同是它的附件。

沙皇政府通过铁路合同攫取了更多特权。

（一）名为“中俄合办”，实为沙俄独办；名为私营，实为沙俄政府经营；沙皇政府将中国给予华俄道胜银行的租让权即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转到自己手中。

“合同”第一款规定，“所有股票只准俄华商民购买”，似乎中、俄双方有认股的同等权利。然而，在1896年5月30日，即“合同”签订前，道胜银行已同沙皇政府达成秘密协议，规定东省铁路股份的百分之七十归俄国政府，其余百分之三十由“私人”认购。

同年11月16日，即“铁路合同”签订后，道胜银行董事会又呈书财政

① 《柏林许大臣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一日到。《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90页。参见同书第66页。

② 《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到。同上书，第91页。

③ 参见同上书，第91页；《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七月初五日，第35册，第52、60页。

④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17页注①。按：当时许景澄亦受到同样的警告：“俄户部谓驳此要条，不如并密约俱废。”参见《柏林许大臣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五日到。《光绪中俄密约全卷》，第90页。参见同书第91页《总署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到）。

⑤ 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编印：《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1-7页。按：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72页本件中文名为《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法文本全名则为《建造与经营东省铁路合同》，无“章程”字样。东省铁路又名东清铁路，俄名 Китайская Восточн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简称 К. В. Ж. Д.）。1920年10月由北洋政府交通部代管后改称中东铁路，俄文名称未变（参见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编》，1935年出版，第17册第7章第1页）。本书“东省铁路”（辛亥革命前），“中东铁路”（辛亥革命后）两名互见，所指则一。

大臣说,东省铁路公司的股票“没有提供给第三者的必要”,“银行完全可以使全部股本听任俄国政府支配,并归其所有”。

12月29日,东省铁路公司“招股”,由于招股的时间定在上午9时,认股开始后只几分钟就宣告结束,局外人根本无法前来认股,因此,所有股票全由俄国政府买去^①。这样,俄国政府就成了东省铁路的唯一股东和实际支配者。

另外,按“合同”第六款的规定,清政府为修建东省铁路提供官地,既不给地价,更不作为投资。至于管理权方面,清政府委任的总办,名位虽高,但“合同”第一款规定,其“专责在随时查察该银行(指道胜银行)暨铁路公司于中国政府所委办之事是否实力奉行;至该银行暨该公司所有与中国政府及京外各官交涉事宜,亦归该总办经理”。实际上,这个总办只不过问过一下东省铁路的“勘定方向”,而对铁路的修建和经营,他根本无权过问。所以东省铁路名为中俄合办,实为沙俄独办。

为了掩人耳目,沙皇政府抬出一个华俄道胜银行。但是,这个银行既然事实上由俄国控制,因此,这条铁路也就归俄国掌管。不仅如此,“合同”的许多条款都使沙俄政府成为铁路的唯一的经营者。“合同”第一款规定华俄道胜银行建设经理此铁路,另立一公司,名曰“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实际上,“中国东省铁路公司”与华俄道胜银行无涉,银行完全被排除于铁路管理之外。这个铁路公司实质上是沙俄财政部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办事机构。“合同”规定“经理铁路等事需用华、洋人役,皆准该公司因便雇觅”(第五款),这就把人事大权授予公司的后台沙俄财政部。而且“该公司章程应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一律办理”(第一款),这等于把东省铁路视同俄国国有铁路。日本朝鲜银行在其业务报告中不无根据地指出:“东省铁路不仅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而且为其所经营。”^②就连维持这个合同起草人也承认:这一合同“能保障政府对修建和经营铁路具有绝对的影响”,“实际上”把租让权交给了“俄国政府支配”^③。

(二)蓄意将一些含糊不清之词塞进“合同”,为今后进一步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埋下伏笔。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19—121页。

② 日本朝鲜银行编:《满洲经济史》,1920年汉城出版,第49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19页。

“合同”第六款规定：“凡该公司建造、经营、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又于铁路附近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项所需之地，若系官地，由中国政府给与，不纳地价；若系民地，按照时价，或一次缴清，或按年向地主纳租。……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

第六款中文本和法文本措辞不尽相同，沙俄在这一款上大做文章，是包藏祸心的。法文本的原文是：“La Société aura le droit absolu et exclusif de l'Administration de ses terrains”（“公司对其土地有绝对的独占的经理权”）。由于法文 *administration* 一词兼有经管和行政两重意思，沙俄在此款中塞进这个词，意在今后把“经理”权即业务管理权故意解释为对公司土地进行行政管理和军事占领的权利，为其进一步粗暴地践踏中国主权服务。

“合同”第五款规定：“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由地方官照约办理。”沙俄炮制“铁路地段”这一名词，并把此项规定曲解为东省铁路当局有权依据合同成立一个地方政府来处理上述案件^①。其用心和其在法文本第六款塞进“*administration*”一词相同。

（三）攫取差别关税和差别运费的特惠条件和公司自订运费的特权。

“合同”规定对俄国经东省铁路运输过境货物一概免收关税；对由俄国运往中国之货物（指俄国向中国推销的商品）或对由中国运往俄国的货物（指沙俄要中国供应的粮食等）照各国通商税则减收 1/3（第十款）。铁路公司还享有自订运费（第十一款）的特权。这就保证了俄国经济势力在铁路沿线广大地区取得独占地位。

（四）“合同”关于“铁轨之宽窄应与俄国铁轨一律”（第三款）以及“凡俄国水陆各军及军械过境，由俄国转运，……应责成该公司径行运送出境”（第八款）的规定，使俄国军队得以寻找借口长驱直入中国东北地区，实行野蛮的军事占领。

（五）“合同”规定了苛刻的赎路条件，以便沙俄无限期霸占。

“合同”第十二款规定：“从开车之日起 36 年后，中国政府有权可给价收回。”维特主张，“进行赎路的原则是，我们将花费的全部款项要无例外地得到偿付，并能获得很大的利润”，目的在于使赎路条件“尽可能使人为难”，“从而使赎回满洲铁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②。这笔赎金包括铁路修建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127 页。

② 同上书，第 123—124 页。

费、公司所欠的全部债款及债款的利息。据 1896 年 11 月俄国财政部粗略估计,到 36 年期满之时,中国要赎路得付出约 7 亿卢布的款额^①。至于“八十年限满之日,所有铁路及铁路一切产业全归中国政府,毋庸给价”的规定(第十二款)则纯系形式,实际上是让沙皇政府无限期控制这条铁路。

“铁路合同”满足了沙俄的大部分无理要求,但在两个问题上,沙皇政府未能如愿以偿。一是关于在中国东北开矿问题。据许景澄致总理衙门总办函称:“煤矿一节,去秋成订合同时,威(维)特本欲在第六条提明,不在另议办法之列,弟驳以不归另议,则与开采沙石相同,于理未允。”^②所以,合同第六款有“出矿苗处所另议办法”字样。一是护路问题。“合同”第五款明确规定:“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这显然是违反沙俄的心愿的。

继“铁路合同”之后,沙皇政府又单方面制定东省铁路《公司章程》^③,攫取“铁路合同”所未能取得的利权。

东省铁路《公司章程》由维特起草,1896 年 12 月 16 日经沙皇批准,共 30 款。“章程”第一款说,成立东省铁路公司“系根据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④中国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所签订之合同”;实际上,这个“章程”是沙皇政府背着清政府单方面制定和公布实施的,不少地方甚至违反上述“铁路合同”的规定,因而是完全非法的。

如上所述,“铁路合同”并无沙俄设警或驻军保护铁路的规定,相反,“铁路合同”明确规定保护铁路全属中国政府的职权。但“章程”却擅自规定:“为防卫铁路界内秩序起见,由公司委派警察人员担任警卫之职任,并由公司特定警察章程,通行全路遵照办理。”(第八款)后来沙皇政府又擅将警权扩大为兵权,沿线派兵驻扎。1899 年 4 月,光绪帝上谕命盛京将军文兴阻止统带俄员在东省铁路沿线驻兵说:“铁路合同未经声明驻兵保护,近日俄使亦并未将此节先行知照,何遽以护路为名,派兵分驻?”^⑤

沙俄还攫取了“铁路合同”所未能攫取的开采煤矿或兴办其他工矿业之权。“章程”第一款竟规定:东省铁路公司经中国政府准许有权“开采煤矿,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124 页及注①。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 9 卷,函牍五,第 30 页。

③ 马克谟编:《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 1 卷,第 84—85 页。

④ 此系俄历,即公历 9 月 8 日。

⑤ 《清德宗实录》,第 441 卷,第 6 页。

无论与铁路合办或单独办理”，并有权“在中国组织一切工商矿务之实业”。换言之，东省铁路公司擅自给自己规定了与经营铁路无关的在华（不仅是在中国东北）设厂开矿的广泛特权。

“章程”还把“铁路合同”第五款关于“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官照约办理”的规定歪曲为“凡中东铁路租界内之一切刑、民事诉讼各案件，由中俄两国当地官署并按照约章会同审判”（第七款）。“铁路合同”上的“地方官”一词竟一变而为“章程”上的“中俄两国当地官署”；“铁路地段”一词竟一变而为“铁路租界”，用心十分险恶。

此外，“章程”第三款还明目张胆地规定了东省铁路的任务是为了满足沙俄政府的需要，东省铁路公司要履行所谓“对俄国政府的义务”，诸如东省铁路的运输必须符合“同中国铁路相联接的俄国铁路上的运输量”，“必须接受自俄国铁路而来的列车”，“俄国铁路保有权利向东省铁路建议（改进）它的技术组织不足之处，东省铁路收到此项通知后，有义务加强其业务”，等等，却只字未提东省铁路对中国政府是否负有义务。

“章程”第三款还规定沙皇政府对东省铁路包括制定运费在内的财务控制。在人事方面，“章程”比“铁路合同”更加明确地规定东省铁路公司的实权属于俄人副董事长（即会办），而沙俄财政大臣有权提名（实际上是任命）东省铁路的副董事长、总工程师以及所有其他官员（第二十七款）。所以，东省铁路公司编写的《沿革史》一书也不得不供认：“章程”保证铁路公司至少在80年内保持其“纯粹俄国企业的性质”，通过章程各项规定，“东省铁路成为俄国的广泛的交通网的一个环节，与俄国其他环节不应有任何重大差别”，并且指出，根据“章程”第三款的规定，即使中国政府在80年期满前赎买这条铁路，它仍须负有“章程”所载“对俄国政府的各项义务”^①。

综上所述，沙俄通过“中俄密约”、东省铁路“合同”和东省铁路《公司章程》，事实上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它独占的势力范围，对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起了带头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沙俄在中国攫取铁路租让权，带有明显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特点。英国人欧弗莱区写道，英国在中国取得的铁路让与权“完全由私营公司来行使”，至于俄国，由于它“并未贷款给中国政府”，因此，中国对铁路股

①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22—23页。

东“没有给予保障，也没有以铁路作抵押，……只是俄国政府作担保来保护债票所有者”^①。日本人久间猛也指出：根据“东省铁路合同”，清政府没有对东省铁路作出任何担保，“这点与它对英美铁路合同的做法有所不同”^②。后来的沙俄财政大臣科科弗曹夫在他致外交大臣伊兹涅尔斯基的一封信中供称：“任何国家的政府批准在本国修筑铁路的特权时，通常都自己担保铁路企业的资本和收入……在这方面，东省铁路的修筑却完全建立在另外的基础之上。这条大铁路干线的资本和收入，本该由中国政府担保，但并未这样做，反而由俄国政府担保了。”代替上述担保，“中国政府对这项事业的唯一支持，是根据特许权提供需要数量的土地，供东省铁路公司使用”，并“把管辖权交给公司”。^③沙俄这一将东省铁路的特权全部操诸本国政府之手，并在此特权的掩盖下窃取在中国东北境内的行政权、驻军权的做法，完全证实了列宁的下述论断：“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帝国主义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显露了身手，但是，一般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④

四 东省铁路的动工修筑

“东省铁路合同”签订后，东省铁路公司董事会于1897年初举行首次会议，决定聘原供职于俄国梁赞—乌拉尔铁路的尤哥维奇（茹格维志）担任东省铁路总监工（总工程师）兼工程总局局长，主持铁路的勘察、设计和施工事宜。这一决定迅速获得俄国财政大臣的批准。

同年3月，东省铁路公司正式成立，总公司设在彼得堡，分公司设在北京。在此以前不久，清政府正式任命吏部左侍郎、驻俄公使许景澄为董事长（总办）。俄方推举克尔别兹为副董事长（会办），并任命董事璞科第为东省铁路分公司（驻北京）负责人。

7月，尤哥维奇组织的铁路工程勘察队进入中国境内，分区进行勘探、设计和选择路线。因“合同”第三款规定：自合同批准之日起以十二个月为限，铁路工程必须开工，路局于8月28日在中国境内小绥芬河右岸三叉口

① 欧弗莱区：《外国对华财政控制》，1919年纽约出版，第83、147页。

② 久间猛：《北满的政治经济价值》，1923年大连日文版，第7页。

③ 斯克维尔斯基：《“黄俄罗斯士兵村”——沙俄在满洲的军事殖民计划》，载《东省杂志》1930年第4期，第16页。

④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中文第2版，第674页。



俄国总工程师勘测东省铁路线

(采自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

附近举行了开工典礼。为便于直接指挥施工，工程总局于次年 6 月由海参崴迁至哈尔滨。

沙俄最初拟定的东省铁路干线的走向是行经呼伦贝尔、齐齐哈尔、呼兰和宁古塔以北。但俄国财政部“意欲将原拟路线改移而南”，于是借口兴安岭山峻雪大、冬季行车困难，于 1897 年初通过克尔别兹向许景澄提出改线主张，即“循原线至呼伦贝尔改向东南，沿依奔河、乌奴尔河过（兴安）岭，沿绰尔河上流渡河，经蒙古扎赉特旗地，渡陀喇河，沿嫩江西岸，经蒙古郭尔罗斯前旗地，渡松花江至伯都讷（今扶余），沿松花江北岸至宁古塔至湖布图河渡河出界”^①。这一路线较原拟旧线南移约 150 公里，而且穿越蒙旗、吉林省城，逼近盛京省，它与俄国国境线之间的地域更为广阔，有利于沙俄在中国东北获得更大的势力范围和策划民族分裂活动。这一方案反映了俄国统治集团内极端侵略派的愿望^②。清政府认为新线所经“吉林一带民居较众，拨地不便”，“且自齐齐哈尔之南须经行蒙古境内，为两国原订凭件未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 9 卷，函牍五，第 22—24 页。

②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 1 卷，第 48 页。

载,亦有窒碍”为由,未予同意^①。因铁路勘察队发现南线需穿过的张广才岭一带山路过窄,铁路难以通行;加以伯都讷地势低洼,常有水患,施工困难,尤哥维奇不得不决定放弃南线。

1898年1月,北线勘测工作完成。3月,《旅大租地条约》签订,沙俄获得了修筑东省铁路南满支线的特权(详下节),哈尔滨至旅顺间线路的勘察工作随即开始。4月,尤哥维奇宣布路线选定并开始施工。筑路计划是:

(一)以哈尔滨为中心,往东、往西、往南三线同时施工;

(二)为加速工程进度,同时从大连和俄境乌苏里斯克(双城子)朝哈尔滨方向施工;

(三)一切为了铺轨,其他工程如车站建筑等都处于从属地位;

(四)南满支线战略地位重要,列为整个工程的重点。

筑路工程几乎是以军事行动方式高速度进行的。参加施工的,除为数不多的俄国员工外,极大部分是从山东烟台、天津、上海和铁路沿线招募来的华工,计1898年2万人,1899年3万人,1900年10万人,最多时达20万人。路局对华工实行“包工制”,待遇菲薄,日工资约30戈比,计件工资砌砖1000块才付4个卢布^②。工资常受包工头克扣。华工承担所有土、木、石工及其他笨重的体力劳动,过着日亟劳瘁,不得衣食的艰难生活。在沙俄的役使下,他们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和夏季暴雨江河泛滥的危险,日以继夜,到1900年6月,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兴起,在短短的两年内铺轨达1300俄里。^③

为加快工程进度,东省铁路公司不顾维特原拟要使铁路企业专为俄国重工业提供生意的计划,以高价从美国购进钢轨、车辆和其他设备。1900年路局曾向美国车辆与铸造公司订购3000辆货车和200辆客车^④。这些物资在美国费城装船,运至大连、营口和海参崴起岸。在此以前,路局还从英国和比利时订购了大量船舶,专门用以从伯力向哈尔滨运送建筑材料和装备^⑤。

东省铁路公司修建铁路和车站所占土地大部分是“官地”,由清政府拨给。东省铁路就是沙俄利用外国资金和西方国家的技术装备,剥削中国劳动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9卷,函牍五,第23页。

②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46页。

③ 同上书,第122页。

④ 马洛泽奥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19页,286页注④。

⑤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47页。



东省铁路“护路军”司令部（1898 年）

（采自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

力，无偿占用中国地亩的产物。

应当指出，在东省铁路修筑期间，沙俄就已不断违反“铁路合同”，擅自扩大特权。例如，“合同”明确规定，东省铁路及铁路员工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但早在 1897 年 5 月，即铁路动工前夕，东省铁路公司即召开会议，悍然决定成立特别护路军；“护路军”人员从后备军非军职人员中招募，其编制最初定为骑兵 690 人，军官 120 人。同年 6 月，尼古拉二世发布敕令，特许应召编入“护路军”的预备役军官可享受现役军官的权利，同时保留其退役军人所享有的一切优待。^①

8 月初，铁路公司任命沙俄步兵上校葛伦格罗斯为“护路军”司令。

11 月中旬，由五连哥萨克骑兵计 750 人组成的第一批“护路军”从敖德萨启程，远渡重洋，于次年 1 月上旬在海参崴上岸，然后经陆路越界进入中国境内，在铁路沿线驻扎。^②

随着工程的进展，“护路军”不断扩充：1897 年 10 月着手组织第二批

^①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 1 卷，第 533—534 页。

^②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 1900 年满洲事变概要》，1920 年哈尔滨出版，第 5、8 页；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 1 卷，第 505—506 页。

“护路军”，计10个连，1390人；次年4月他们即由敖德萨乘船东来。1898年底，又从阿穆尔军区招募一个步兵连，计250人；不久即由双城子抵达哈尔滨。就这样，到1900年春，“护路军”已拥有全副武装的8个步兵连，19个骑兵连，共4500余人^①，成了不亚于俄国正规军的特殊武装力量，一支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殖民军。

又如，“合同”第六款规定，铁路公司得在铁路地段内设立电线，专为铁路之用。但该公司于1897年春，擅自在铁路地段外，自俄境双城子接线，经宁古塔至伯都讷。经许景澄交涉，东省铁路公司诡称铁路定线以后将路外电杆移至路内^②，竟不停止在路外架设电线。

第四节 沙俄强租旅顺大连

一 俄德勾结与旅大的占领

攫取中国的不冻港是19世纪末沙俄争霸远东计划的重要环节。沙皇政府取得东省铁路筑路权和经营权后，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在中国黄海岸边占领一两个不冻港，并从东省铁路修一条支线直抵这些港口，以便自由出入西太平洋。

沙俄对远东不冻港汲汲以求，这是它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侵略胃口急剧增大的结果。如本书第二卷所述，沙俄通过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从中国割占了海参崴，并以之作为它的太平洋分舰队的主要基地。但是，海参崴港一年中有5个月封冻，往返中国海岸必须经过朝鲜海峡，易受新崛起的、并在三国干涉还辽后同俄国结下深仇的日本舰队的封锁；兼之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的竞争愈演愈烈，在此情况下，沙皇政府深感海参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它争霸远东的需要，亟谋在中国东北、山东或朝鲜获取不冻港^③。

《俄罗斯思想》杂志在三国干涉还辽后兴高采烈地写道：“俄、法和德国的集体行动大获全胜。我们祖国现在可以通过外交谈判途径获得大洋^④的不

①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507—508页。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9卷，函牍五，第28页。

③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28、37、53—54、65页。

④ 即太平洋。

冻港，并充分巩固我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了。”^①当时的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后来追述 19 世纪末俄国的远东政策时也承认，“近几年来俄国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远东寻求一个交通便利的不冻港。”^②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1895—1896 年冬，沙皇政府得清政府同意，曾派军舰在胶州湾碇泊^③，但是不久发现这个港湾不甚“理想”。1896 年 5 月，维特趁李鸿章到俄国访问的机会，向他提出从东省铁路修一条支线通向“黄海某一港口”的要求。李鸿章没有直接加以拒绝。但在讨论该支线的轨距时，维特坚持“支线与干线^④的轨距无疑必须相同”，即一律采用俄式宽轨；而李鸿章只同意用窄轨建造该支线。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这项谈判没有达成任何结果”^⑤。

1897 年夏，沙皇尼古拉二世又派他的亲信、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来华，要求清政府同意俄国由东省铁路修筑一条直达朝鲜某个港口的支线。李鸿章怵于舆论谴责，对乌赫托姆斯基说：“我们让你们进了院内，你们却想闯进我们家小住的内宅。”^⑥俄国谋求远东不冻港的行动于是再次碰壁。

上述事实表明，虽然俄国在选择远东不冻港的具体目标上时而胶州，时而辽东，时而朝鲜，看得眼花缭乱，举棋不定，而且屡遭挫折，但是，它急于取得不冻港的方针始终未变。其实，在 19 世纪 90 年代变化了的远东形势下，俄国要实现这个方针，其阻力与其说是来自受人宰割的半殖民地中国，毋宁说是来自同它一起在远东大事攫夺的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因此，俄国必须等待时机，并在错综复杂的远东国际关系中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以求一逞。

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意识到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斗争无可调和，正埋头备战，亟思报复。与此同时，英、俄两国一南一北，为夺取对华控制、掠夺权正处于全面对抗的态势中。英、日的共同仇俄，促使两国明显地接近，成为沙俄实行对华扩张的主要障碍。当时在远东积极活动的还有

① 转引自波波夫《沙皇专制制度的远东政策（1894—1901）》，载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 1935 年第 11 期，第 43 页。

② 《红档》杂志 1926 年第 5（总第 18）卷，第 16 页。

③ 见下文。

④ 即东省铁路。

⑤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114 页。

⑥ 同上书，第 171 页。

法、德两个帝国主义国家。

法国自 1892 年起即为俄国的正式盟国，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本已同俄国狼狈为奸，紧密配合；它的侵略目标主要在中国南部，与俄国宿敌英国的矛盾较大。因此，它一般地支持俄国在中国北部的侵略要求。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当它登上帝国主义瓜分世界殖民地的舞台时，发现已经是筵尽席散，杯盘狼藉了。它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这时正积极从事瓜分中国这样一些半独立国家的斗争。德国在对华贸易中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①。在三国干涉还辽后，它自恃对华“有功”，而从中国得到的“报酬”不如俄、法多，因此，一直谋求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海军基地和贸易据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深知必须得到对清政府有巨大影响的俄国的支持。从欧洲政治的角度看，德皇威廉二世政府为了把俄国的注意力从德国正欲染指的巴尔干和近东引开，并减轻俄、法同盟对它的压力，一直企图把沙俄这股祸水引向远东。为此，它不断高喊“黄祸”危险，并力图通过与沙俄在远东的共同行动在俄法同盟中打入一个楔子。这时，俄国正准备拉拢德国组成一个反英的大陆同盟，并通过俄、德接近来保证它致力于远东扩张时的后方稳定，因此并不反对在对华问题上同德国进行某种勾结。正是在上述国际背景下，沙皇政府抓住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有利时机，依靠俄法同盟并通过同德国的勾结，孤立英、日，从而达到了占领旅大的目的。

德国夺取中国海港，先后物色过多次，最终才选定胶州湾。但是，胶州湾邻近俄国的势力范围，而且俄舰曾于 1895—1896 年冬季在该地碇泊过。因此，德国于强占胶州湾以前，有意识地谋取俄国的谅解。1897 年 8 月，威廉二世访俄期间，在彼得堡附近的彼得霍夫曾正式向尼古拉二世表示德国有意占领胶州湾，请求俄国“不要妨碍”德国的占领行动^②。当时，沙俄还没有做出占领中国哪一个港口的最后决定；而且，它自然希望德国在向南更靠近英国势力范围的地方去占领一个据点；此外，俄国自己有一个庞大计划，它担心德国此举将引起列强“对中国领土的全面掠夺”，妨害自己实现独霸中国的计划^③，因此，尼古拉二世回答威廉二世说：“俄国在取得正在考虑中

① 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第 2 卷，第 449 页。

②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 1 卷，第 111—112 页。

③ 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第 2 卷，第 454 页。

的一个更靠北的港口以前，对于保证自己进入该港确实是关心的。”^①但是，他又担心断然拒绝德国的请求可能导致德国转到英、日方面去，使自己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同时，他更不愿看到英国代替德国取得胶州湾。所以，当威廉二世提出“如果德国船舰在必要时并且在征得俄国海军当局的同意后在胶州湾停泊，尼古拉皇帝是否认为有所不便”时，沙皇做了“否定的回答”^②。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甚至向德国表示：一旦俄国决定不占领胶州湾，就将它“移交”给德国，“俾英国不得染指”^③。通过这次对话，威廉二世判明：“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他（尼古拉二世）会阻挠我们进入山东；他的兴趣集中在鸭绿江口附近的土地、旅顺口附近等处……如果将来德国以一个受俄国欢迎的邻居的身份置身于直隶湾的对面，他事实上会感到高兴。”^④沙俄的上述态度，事实上起了鼓励德国占领胶州湾的作用。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在彼得霍夫，对德国占领胶州湾一事，“国君（尼古拉二世）未能坚决拒绝，这样德皇可能认为俄国国君同意了这件事”^⑤。威廉二世也说，他是“在俄皇的同意下去取胶州湾的”^⑥。这位德国末代皇帝的话未免有些夸大事实，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沙俄纵容德国侵略的立场。

彼得霍夫谈话后，德国占领胶州湾只是寻找借口的问题罢了。果然，德国政府利用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的事件，于 1897 年 11 月 6 日悍然命令德国舰队前往占领胶州湾。同时，威廉二世致电尼古拉二世称：“我相信，根据我们在彼得霍夫的谈话，您必定赞成我派遣德国舰队开赴胶州。”^⑦对此，尼古拉二世复电说：“对于您派遣德国分舰队去胶州一事，我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因为我近来才知道，这个港湾仅在 1895—1896 年归我们暂时使用而已。”^⑧这一复电对德国占领胶州湾似乎是模棱两可，漠不关

① 《红档》杂志 1938 年第 2（总第 87）卷，第 33 页；《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第 14 卷，上册，第 3679 号。

② 《德皇威廉二世回忆录》，1922 年伦敦英文版，第 65 页，载《红档》杂志 1938 年第 2（总第 87）卷，第 32—33 页。

③ 《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第 14 卷，上册，第 3679 号；并参见耶路萨利姆斯基《十九世纪末德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和外交》，1948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 459 页。

④ 《德皇威廉二世回忆录》，第 65 页；参见约翰·摩西斯·保罗·肯尼迪合著《德国在太平洋和远东（1870—1914）》，1977 年昆士兰出版，第 125 页。

⑤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 1 卷，第 111—112 页。

⑥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美国文件》，第 1 卷，第 34 页注。

⑦ 《德国外交文件》，第 14 卷，上册，第 3690 号。

⑧ 《红档》杂志 1938 年第 2（总第 87）卷，第 37 页。

心,其实,沙皇通过这一含糊其辞的表态,有意给自己保留了在即将出现的远东混乱局势中自由行动、趁火打劫的余地。不仅如此,它还事实上明确告诉德国人,中、俄两国间并不存在将胶州湾租给俄国的秘密协议,俄国不会去干预和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行动。这就解除了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最大顾虑。美国历史学者兰格正确地指出:尼古拉二世的上述复电,“实际上给了德国人以放手行动的权利”^①。

但是,沙俄这样一个侵华野心甚大的国家,自然不会无代价地支持德国对胶州湾的占领。对于德国占领胶州湾,它的心情是矛盾的,而且纯粹是出于沙俄本身的侵略利益。因此,俄国外交当局在11月7日沙皇复电威廉二世以后的一个时期,曾经做出种种貌似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姿态。它始而对德国占领胶州湾“表示惋惜”,声明俄国自1895年以来对胶州湾就有“投锚优先权”,并指示俄国远东分舰队于德舰进入胶州湾时开进该港,以“肯定”俄国对该港的这一“优先权”^②;同时命令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再一次扮演“调停人”,佯示对华友好,怂恿清政府拒绝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要求^③。

俄国的出尔反尔,使威廉二世勃然大怒,责骂穆拉维约夫“厚颜无耻之极”,“直接与他和他主上在彼得霍夫对我所说的相矛盾”^④。德国首相俾亨洛埃也断然表示,俄国所强调的对胶州湾有“投锚优先权”以及其他种种理由均因11月7日沙皇给德皇的复电“而丧失一切法律效力”^⑤,坚持要对胶州湾实行军事占领。

威廉二世政府对于俄国外交当局的上述表现未免看得过于郑重了。俄国之所以给德国占领胶州湾制造某种障碍,为的是在适当时候借撤销对德占胶州的反对以换取对方支持它进一步掠夺中国。^⑥所以,当德国于11月14日占领胶州湾后,俄国并没有做出重大的反应^⑦。当德国对俄国的态度感到气愤转而寻求英国的支持,英国为了加重俄、德之间的摩擦,并表示德国此举

① 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第2卷,第457页。

② 以上参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上册,第3693、3700号。

③ 同上书,第3694号。

④ 同上书,第3693号。

⑤ 《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上册,第3699、3700号。

⑥ 参见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204页。

⑦ 当时,法国驻华外交官员吕班在给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的一封信中写道,尽管沙俄一再抗议德国占领胶州湾,但“实际上是支持”德国这一行动的。(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对外政策——与列强的关系(1),义和团战争(1897年2月至1899年6月)》,第29—30页。)

“绝不致威胁英国利益”^①时，沙俄扮演的这一出“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的闹剧就草草收场，俄国政策的真实意图也就暴露出来了。

11月20日，沙俄撤销了派遣远东分舰队跟随德舰进入胶州湾的命令^②。对此，威廉二世于同日发表声明，表示“德国人到达胶州湾并不妨害俄国舰只前往该地”^③。

11月22日，德国又照会沙皇政府，保证德国支持俄国的远东政策，希望两国在远东进一步合作，并暗示德国承认朝鲜和“整个中国北部直到北京和黄海的内海”是俄国“独占的势力范围”^④。同日，沙皇在奥斯登—萨肯的一份急电上批道，“德国人自己惹来了麻烦，让他们自己去收拾吧。”^⑤这就是说，对德国占领胶州湾听之任之。

12月1日，穆拉维约夫一反过去的态度，进一步宣布俄国“不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并暗示俄国将对清政府施加影响，促使其满足德国的占领要求^⑥。德国外交大臣比洛夫对穆拉维约夫的上述讲话表示满意，并指示德国驻俄大使拉多林通知俄国：德国“随时准备通过对俄国的酬答使德国因此而获得的利益保持平衡”^⑦。没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了。

12月11日，穆拉维约夫致电德国说：“俄国和德国应该而且能够在远东携手并进。”^⑧此后，沙皇政府在强租旅大的问题上，不仅有盟友法国的支持，而且通过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与德国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取得后者对它的支持。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自此开始，旅大形势岌岌可危！

在俄、德勾结大局已定，俄国从德国得到对它进行“酬答”和支持的保证后，沙皇政府立即着手策划和实施占领旅大的罪恶勾当。

1897年11月23日，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向沙皇呈交一份《备忘录》，内称：德国占领胶州湾对俄国损失不大，相反，这是事态的“有利”变化，给了俄国在中国取得一个不冻港的好机会^⑨。《备忘录》还指出，这样的

① 《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上册，第3710号。

② 同上书，第3716号；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85页。

③ 《红档》杂志1938年第（总第87）卷，第48页。

④ 《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上册，第3711号。

⑤ 耶路萨利姆斯基：《十九世纪末德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和外交》，第475页。

⑥ 《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上册，第3718号。

⑦ 同上书，第3719号。

⑧ 《红档》杂志1938年第2（总第87）卷，第58页。

⑨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43页；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99页。

不冻港应该在辽东半岛获取,“根据不久前我国驻芝罘(烟台)领事报来的详细材料,在辽东半岛东南岸广阔的大连湾内有四个单独的优良的小海湾”,这些海湾“从不封冻”,其地理位置也优于釜山及朝鲜东海岸容易被日本舰队封锁的港口。在这里,“即令日本采取同样的敌对行动,我们分舰队的舰只仍然可以自由地经由黄海驶出”^①。因此,穆拉维约夫建议沙皇立即占领大连湾。他还指出,如果俄国行动迟缓,在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其他强国可能追随德国的先例捷足先登^②。当天,尼古拉二世就批准了穆拉维约夫的上述建议,并写信给后者说:“完全同意”他的结论,“我们决不能失掉时机……我一直认为我们未来的通商口岸应当在辽东半岛,或者在朝鲜海峡的东北角上”。^③

11月26日,在沙皇的亲自主持下,举行了由穆拉维约夫、维特、万诺夫斯基(陆军大臣),蒂尔托夫(海军大臣)参加的会议,讨论占领旅大问题。穆拉维约夫在会上大肆鼓吹占领旅大“恰逢其时”,“因为俄国正想在远东有一个太平洋港口,而且这些港口(旅顺口和大连湾)从战略地位上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地方。”^④他的意见得到万诺夫斯基的支持,但是,遭到维特的坚决反对。维特在会上冠冕堂皇地说:他不同意占领旅大,因为俄国不久前才宣布过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并迫使日本退出辽东半岛;俄国还和中国订立了秘密防御条约,保证中国不受日本侵犯。在此情况下,占领中国港口就是“最大的背信弃义”;而且,其他列强,尤其是日本,“毫无疑问将学习我们的榜样”,这对俄国“十分有害”;不仅如此,“现在我们刚刚开始修筑穿过满洲连接海参崴和西伯利亚的铁路”,占领旅大将使俄国不得不修筑一条从东省铁路通向旅大的铁路支线,耗费巨大,俄国无力支付,而且势必引起全中国的反对,“这将使我们遇到麻烦,导致最危险的后果”^⑤。

其实,占领旅大和白东省铁路修一条通向旅大的南满支线,正是维特攫取东省铁路租让权这一冒险事业的必然结果。穆拉维约夫不同意维特的意

① 维特:《不得已的说明》。本卷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关于日俄战争的总结报告,1911年莫斯科出版,第28—29页;尼鲁斯编:《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56—157页。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00页。

③ 《红档》杂志1932年第3(总第52)卷,第102页。

④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20页。

⑤ 以上参见《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20—121页;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44—45页。

见，争辩说，如果此时不占领旅大，他担心“英国援德国的先例占领旅顺口”^①。对此，维特进一步解释道：他并不是不想在中国占领不冻港，“对西伯利亚大铁道来说，很需要在远东有一个太平洋出海口，而且我国（俄国）在东方的挺进终将拥有这样一个出海口，但是，这需要时间，而且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采用友好协商的手段，而不是采用强力的手段”。他认为，应该在东省铁路修成以后，在“中俄友好”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从中国“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我们的东方政策一贯是以公正著称的，如果我们继续保持传统的对华友好政策而不诉诸强力……则我们必将能比欧洲取得更多的成果。”^②这一席话，暴露了维特这个俄国远东政策“设计师”的真面目。原来，他“反对”占领旅大并不是真的。他在侵华问题上同穆拉维约夫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分歧仅在于侵华的策略和缓急上。

维特比穆拉维约夫等人更熟悉东方事务，懂得什么样的政策最符合沙俄的侵略利益。维特的头脑里有一个长远的侵华计划，他的扩张野心比穆拉维约夫、万诺夫斯基辈要大，眼光比他们远。他深知：赤裸裸的武装占领必然加剧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矛盾，增加国际阻力；同时无疑是自己剥去了“中国之友”的伪装，而这套伪装，却是俄国历来用以掩盖对华侵略，证明是大有成效的。因此，他反对对旅大的过于露骨的武装占领，主张继续保持对华“友好”的假象，发展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现有优势，采用“和平”的经济渗透手段，缓以图之，则若干年后，不仅占领旅大犹如瓜熟蒂落，唾手可得，就是攫取整个中国北部地区，也势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维特的对华方针，无疑是更加伪善、更加危险的。由于他的激烈反对，这次会议没有做出占领旅大的决定。

但是，维特的主张并没有真正获胜。尼古拉二世在 11 月 26 日的会议上虽然勉强同意了他的意见，但是，对这个意见“显然是不喜欢的”^③。他和穆拉维约夫等人对于占领旅大已是迫不及待，因此，当后者向他报告“英国船只现正在旅顺口、大连湾附近游弋”时，尼古拉二世就以此为借口，不待通知维特，就急急忙忙做出了占领旅大的决定，命令俄舰开赴旅大^④。至于以什么借口来占领旅大，尼古拉二世也采纳穆拉维约夫的意见：利用清政府指

①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45 页。

② 同上书，第 46 页。

③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 1 卷，第 121 页。

④ 同上书，第 122 页；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48 页。

望俄国帮助它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幻想^①，让清政府自己出面“请求”俄国的“庇护”，并“向北京解释，我们占领大连湾，是希望往后太平洋发生不利于中国的事件时，我们的分舰队能有一个巩固的立足点。”^②

其实，当时，沙俄已同德国做成了互相支持对方占领旅大及胶州湾的交易，根本谈不上俄国占领旅大是为了“帮助”中国的问题。不过，腐败的清政府还蒙在鼓里，做着指望沙俄助华拒德的美梦^③。

阴谋策划既定，1897年12月1日，沙俄向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不指名地提出租借旅大的问题，“理由”是：“德事愿效力而难于措词，或请中国指定海口，俾泊俄舰，示各国中俄联盟之证，俄较易借口，德或稍敛迹。”^④同时，电示沙俄驻德大使奥斯登—萨肯，要他通知德国，沙俄已决定占领旅大，希望德国予以支持，同俄国在远东“携手并进”^⑤。威廉二世“欣然接受”了俄国的这一“通知”，并保证在远东同俄国“团结一致”：“如果与日本发生纠葛迫使我们采取敌对行动时，（他）甚至可命令（德国）分舰队同俄国分舰队并肩作战”^⑥。这就是沙俄“助华拒德”的真相。穆拉维约夫直认不讳地说道：俄德在瓜分中国问题上的勾结，是这两个国家“采取一致行动反对我们在中国的共同敌人英国”的“必要条件”^⑦。他还说：俄国应当“感激”德国占领胶州湾，因为这件事使俄国“能够更早地获得旅顺口和大连湾，否则俄国几乎不能找到获得旅顺口和大连湾的口实”^⑧。

取得德国支持的明确保证后，1897年12月11日，尼古拉二世指示沙俄外交部通知俄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巴布罗福）：海军少将列乌诺夫指挥下的俄国分舰队已奉命开入旅顺口^⑨。12月14日，俄国太平洋分舰队的舰只“在保护中国的幌子下”^⑩，鱼贯驶入旅顺口。当天，穆拉维约夫向清

① 《红档》杂志，1938年第2（总第87）卷，第41、44—46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87页。

③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46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27卷，第28页。

⑤ 《红档》杂志1938年第2（总第87）卷，第58页。

⑥ 同上书，第58—59页。

⑦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05页注①。

⑧ 《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上册，第3757号。

⑨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36页。

⑩ 同上。



俄军占领下的旅顺口

(采自普特南·魏尔《满洲人和俄国人》)

政府保证：俄舰开入旅顺口，“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摆脱德国人……只要德国人撤走，我们就撤走”^①，同时通知英、日等国，俄舰进入旅顺，只是“暂泊”“过冬”，并无他意^②。对于德国，沙俄表示保证“以最友好的方式”支持它“永久租借胶州湾的要求”^③。就这样，沙俄通过与德国的互相勾结和对清政府的欺骗捉弄，不费一枪一弹，以“朋友”的身份占领了旅顺口和大连湾。

沙皇政府的这一侵略行为，曾引起列宁的满腔义愤。他辛辣地嘲笑俄国“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④。苏联学者阿瓦林也正确地指出，沙俄占领旅大是“对中国政府所表现的非常严重的背信弃义行为”^⑤。就连维特也承认占领旅大是“罕见的阴险狡诈行为”^⑥。可是，李鸿章等人不知中了圈

①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25—126页；法国外交部档案：《政治与商务往来文书》，中国，新辑，第165卷，第54页。

②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1号（1898年），第10页；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1卷，第33页。

③ 《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上册，第3742号。

④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215页。

⑤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36页。

⑥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29页。

套,对俄舰进入旅大不仅“毫不惊慌”,反而表示“高兴”^①。总理衙门甚而指示旅顺守将宋庆:“俄船在旅,所有应用物件随时接济,勿听将弁讹言,致启衅端。”^②这件事固然说明了李鸿章等人自作聪明、开门揖盗的行径愚不可及,误国误民;更暴露了沙俄为了达到侵华的目的,是多么地不择手段!

二 强租旅大交涉和《旅大租地条约》的签订

占领旅大成为既成事实后,沙俄立即自食前言,背弃“暂泊”的保证,逼迫清政府接受租借该地的要求,图谋永久霸占。

在强租旅大的过程中,俄国必须排除来自英、日两国的阻力。前者一开始就注意着俄国在旅大的活动,并先后派遣军舰到这个地区监视俄国的动向^③。它针对俄国的要求,提出开辟大连湾为通商口岸^④,并坚决反对俄国租借旅顺口,认为该地在商业上意义不大,但在战略上便于封锁北直隶湾,从而对北京构成“经常性的威胁”^⑤。它还在北京大肆活动,怂恿清政府拒绝沙俄的租借要求^⑥。日本在沙俄占领旅大后,眼看从自己口中夺走的猎获物被北极熊一口吞下,忿激万分。日本国内随即掀起一股反俄高潮,政界人士提出正式与英国结盟以对抗沙俄的主张;与此同时,又派人来华游说:“日已与英联盟,日愿助中。”^⑦张之洞等为所动,向总署建议联日,“以为联英之阶梯”。^⑧

在此情势下,沙皇政府为了实现它的预谋,采取了依靠法、德支持,通过在朝鲜问题上对日本让步以缓和其反对情绪,从而孤立英国的方针。

德国的态度不必再说。法国由于本国金融寡头“十分愿意把它的资本托付给沙俄在中国的政治领导”^⑨,并指望俄国强租旅大后能“给予在满洲和朝

①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25—126页;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48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27卷,第33页。

③ 《红档》杂志1938年第2(总第87)卷,第50、58页;《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28卷,第4页;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49页。

④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1号(1898年),第11页。

⑤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1卷,第56页。

⑥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第37册,第19页。

⑦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28卷,第8页。

⑧ 同上书,第9页。

⑨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197页。

鲜的法国工业以某些优惠”^①，对俄国此举是大力支持的。事实上，在逼签租地条约的整个过程中，“法国外交界与俄国都是有联系的”^②。剩下的问题就是离间英、日，争取日本，孤立英国，并最后迫使清政府就范了。这一政策，从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的下面一段话可以得到证明：“最重要的是要阻止英日的接近；具体方法是通过朝鲜问题达成一个日俄谅解”，把日本“争取过来”。^③

先是，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通过 1896 年 5 月 14 日俄《汉城议定书》（即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与俄国驻朝公使韦贝签署的备忘录）和 6 月 9 日《莫斯科议定书》（即《山县—洛巴诺夫协定》），在朝鲜确立了与日本的同等地位。但与此同时，沙俄又通过与朝鲜特使达成的秘密协议，取得了对朝鲜国王实行“保护”、向朝鲜派遣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等特权^④。1897 年末，经沙皇批准，俄国政府以华俄道胜银行为模式在朝鲜开设了俄朝银行。法、俄金融集团还取得从汉城到釜山和鸭绿江的两条铁路的修筑权。俄国在朝势力激增，浸浸乎大有排除日本之势。现在，沙俄为了“争取日本”，于权衡轻重之余，决定在朝鲜问题上主动对日本让步，以换取日本默认其强租旅大的活动。为此，它表示愿意从朝鲜撤回俄国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关闭俄朝银行，保证不干涉朝鲜内政，并承认“日本在朝鲜工商企业利益的广泛发展”^⑤。通过俄国驻日公使罗森与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谈判，1898 年 4 月 25 日日俄签订《罗森—西德二郎协定》，就朝鲜问题达成了妥协^⑥。俄国在朝鲜问题上对日本的让步，麻痹了日本，防止了英、日的联合干涉，使英国孤掌难鸣。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付英国的反对并与之达成妥协了。如上所述，列强反对俄国强租旅大以英国为最力。1897 年 12 月，维特答应借给清政府白银 1 亿两以偿付对日本的最后一期赔款，同时提出在辽东租借海港并从东省铁

①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 197 页注②。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205 页注①。

③ 《德国外交文件》，第 14 卷，上册，第 3758 号。

④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141—145 页；朴：《俄国与朝鲜》，第 128—130 页。详见伦森《在朝鲜和满洲的国际抗衡（1884—1899）》，第 2 卷，第 649—682 页。

⑤ 法国外交部档案：《政治与商务往来文书》，中国，新辑，第 165 卷，第 138、166 页；《维特伯爵回忆录》，第 1 卷，第 130—131 页。

⑥ 参见罗森《外交活动四十年》，第 1 卷，第 156—159 页；达林：《俄国在亚洲的兴起》，1949 年纽黑文出版，第 47—50 页；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 1 卷，第 37 页。

路修一支线以达该地等等作为交换条件^①。英国得知此事后,立即表示反对,提出愿意“竭力协助在英国筹集贷款”^②,条件之一是开放大连湾为通商口岸^③。

与此同时,英国在巨文岛集结舰队^④。英国同俄国针锋相对的立场使清政府的态度急剧变化^⑤,它转而向英国谋求借款,并于1898年1月初要求俄国作出撤离旅顺口的书面保证,同时表示将在旅顺口“殷勤接待”英国军舰^⑥。这样,旅大问题和贷款问题纠缠在一起,导致英、俄在中国的尖锐对抗,并引起英、俄进行关于瓜分在华势力范围的谈判。这一谈判因双方利害冲突太大,没有结果^⑦。

在此情况下,沙皇政府为了达到强租旅大的目的,决定在贷款问题上向英国让步,交换条件是英国必须同意俄国“永远保持旅顺口为军港”,“大连湾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⑧。穆拉维约夫向英国驻俄大使欧格讷表示:“我们并不认为俄国订立中国借款有太大的意义……俄国不仅不会阻挠英国资本家订立借款,而且也许能对英国订立该借款助一臂之力,但当然必须有条件,即英国不得向北京政府提出可能对我们的利益有损害,或是同中国早已对俄国承担的种种义务相抵触的那样一些要求。”^⑨2月19日,清政府以接受“不割让”长江流域和只要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占居首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就始终由英国人担任等条件,与汇丰、德华两银行签订了借款1600万英镑的草合同^⑩。

英、德借款成立后,就轮到俄国要求“补偿”了。就在借款成立的当天,沙俄外交副大臣拉姆斯多夫向欧格讷说:俄国“不愿就英、德借款一事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92页。

② 同上书,第195页。

③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02页。

④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95页。

⑤ 同上书,第195页注②。

⑥ 同上。

⑦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1卷,第7页;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第2卷,第358—359页。

⑧ 波波夫:《英俄瓜分中国的协定(1899)》,载《红档》杂志1927年第6(总第25)卷,第114页。

⑨ 同上。

⑩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29卷,第23—28页。按:3月1日,清政府与汇丰、德华两银行正式订立了借款合同。“合同”全文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33—738页。

提出反要求”，只是希望英国同意俄国“租借大连湾和旅顺口或是（中国）北部其他某个港口 20 年……作为铁路的终点站”。他还“大肆强调俄国放弃其在政治上极为重要的贷款优先权所蒙受的牺牲”，声称：“不管女王陛下政府同意与否，俄国决心要坚持留在旅顺，但是该港将开放通商”^①。这时英国已在争揽贷款权和控制长江流域等问题上占了便宜，兼以在国际上处境孤立，也就默认了俄国对旅大的要求。不久，英国内阁做出不因旅大问题同俄国开战的决议，并指示英国驻华公使窦乐“加紧取得威海卫的优先租借权”^②，作为对俄国租借旅大的“补偿”。俄、英等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宰割中国的：它们任何一方从中国躯体上割下一块肉，其他列强就要求“补偿”。在这左一个“补偿”、右一个“补偿”的恶性循环中，拥有数千年灿烂文化的古老中国被肢解殆尽，惨遭厄运。

这样，由于沙俄外交的诡计多端，它成功地做强租旅大取得了法、德的支持和英、日的默认，从而使焦头烂额、疲于奔命的清政府单独同它这样一个恶魔打交道，不得不屈从它的侵略要求。

沙俄在克服国际阻力的同时，策划强租旅大的活动也在积极进行。为此，1898 年 2 月中旬，召开了沙俄海军总司令阿列克塞·亚历山德罗维奇主持下的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维特、穆拉维约夫、库罗巴特金、陆军总参谋长萨哈罗夫、海军大臣蒂尔托夫、海军总参谋长阿维兰。库罗巴特金的主张在会上起了决定作用。此人于同年 1 月中旬接任陆军大臣后，就大肆叫嚷俄国“不仅应该要求中国把旅顺口和大连湾割给我们，而且要割让整个辽东半岛，以组成我们的关东省”。“此外，还必须迅速修筑一条从东省铁路抵旅顺口的支线。”^③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以前，正在积极准备对俄作战的日本可以轻而易举地重新占领旅顺口，而旅顺口对于俄国远东地区的“防御”却是十分重要的。会议通过了以下内容的决议：

（一）租借从普兰店到东岸貔子窝一线以南的辽东半岛南部；

（二）此线以北、自营口经大孤山到东岸五道河口一线以南的地区划为“中立区”；

（三）租借地内除警官外不得驻中国军队；

①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美国文件》，第 1 卷，第 14 页。后来俄国自食其言，没有向列强开放旅顺口贸易。

②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 1 号（1898 年），第 54 页。

③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 1 卷，第 126 页；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 1 卷，第 154 页。

(四) 由俄国修一条从东省铁路到旅顺口或到辽东半岛其他港口的铁路支线。

会议还决定“用武力支持”上述要求，并“立即从海参崴派军队进入旅顺口”。^①

根据上述决议，沙皇政府立即从海参崴向旅顺口增派了舰艇，运去“两个水雷兵中队、辎重及骑兵共约三千人”和“大炮六十七门”^②；与此同时，向俄国太平洋分舰队司令杜巴索夫少将发出了必要时在旅大登陆并占领整个辽东半岛的命令^③。

清政府见沙俄霸占旅大之意已定，指示驻俄公使杨儒谒见尼古拉二世，要求俄舰自旅大退出。2月17日，尼古拉二世在接见杨儒时伪善地宣称：“俄船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据”，“而于退船一层，不答”，并反而向杨儒提出要求说：“中国须拒他国兵船屯泊（旅大）”，“公司铁路将来倘通至黄海尤好”。^④

3月3日，沙俄驻华代办巴甫洛夫来到总理衙门，正式提出“旅大租地及造支路达黄海两事，以为其君决定要办，限五日照复”。^⑤

次日，他又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在3月27日前将此事议结，否则，俄国将不履行1896年6月3日中俄密约规定的“援助”中国“御敌”的义务。^⑥

在沙俄外交、军事双管齐下的压力下，清政府感到惶惑不安，但又觉得事关重大，对巴甫洛夫的上述要求，未予明确回答。为了表明对俄国强租旅大及东省铁路支线问题的立场，并避免在北京谈判招惹各国耳目，清政府在3月3日即巴甫洛夫提出前述要求的当天，决定派驻德公使许景澄为头等钦差大臣，赴俄与沙皇政府直接举行谈判，随即派杨儒为会办，协助谈判事宜。

① 以上参见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53—54页。

② 英国《泰晤士报》，1898年3月7日。

③ 米·巴甫洛维奇：《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载苏联《新东方》杂志，1922年第2期，第7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29卷，第18页。

⑤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第37册，第17页。按：翁同龢在本日所记巴甫洛夫向总理衙门索求两端，只是择其要者而言。事实上，巴甫洛夫提出的要求中还包括允许俄国在旅大设防等内容，其基本精神与上述沙皇政府特别会议的决议相同。参见斯潘德洛夫《南满俄国租借地的前半期（1898—1899）》，1982年美国出版，第53页。

⑥ 总理衙门档案：《清季俄国租地》，第一部分，第8号文件。转引自斯潘德洛夫《南满俄国租借地的前半期》，第55—56页。

3月10日,许景澄自柏林动身赴彼得堡,12日开始与穆拉维约夫举行谈判。在谈判中,穆拉维约夫坚持侵略要求,说:“胶事已定,英已得长江利益,法亦有案件,故俄必须租得不冻港口,为水师屯地。……至租界内收税理民,仍归中国自主。中俄兵船,二口均可同泊。其铁路请中国准听东省(铁路)公司自鸭绿江至牛庄一带,求以择宜通接。”许景澄告以如中国答应俄国条件,其他列强必然援例,有损东方和平,故请俄国放弃此等要求,中国可允俄船在旅大过冬,并扩大俄国在该地的屯煤地段;至于当地水陆口隘,则仍由中国管理。

关于东省铁路支线,许景澄建议以后再谈,俟“干路成时,酌议通接”。对此,穆拉维约夫只是一味强调“俄主意在必成”,“词意坚持,大非昔比”^①。在同一天的北京,巴甫洛夫也前来总理衙门大闹,“谓旅大租地,开通铁路,断不能改。已奉训条在此(北京)议论,限一日复,至缓两日”。总理衙门告以有专使在俄商议,“何得限日?”巴甫洛夫竟说:“可将许使(许景澄)搁开,在我商办”,言毕,“竟拂袖而去”^②。

3月13日,巴甫洛夫代表沙皇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限清政府在两周内答复^③。同日,穆拉维约夫交给许景澄一幅俄国拟租中国领土的地理范围图^④。自此,强租旅大谈判进入紧张阶段。

3月15日,许景澄在向尼古拉二世递交国书时,再次表明了清政府不能租让旅大的理由,他对沙皇说:“中国难以允借旅顺大连湾两口……缘英法两国均思在中国南境图得土地,日本又在威海卫增兵,意图久住,皆视中俄商办旅大两口结束,以定进止。如中国一允俄国,则英、法、日三国皆接踵要求,中国即不能自立,必致东方大局扰乱。”因此,要求俄国实践过去诺言,俄舰只在旅大过冬,不再要求租借该地。尼古拉二世根本不理睬许景澄的要求,借口中国向英、德借款后“东方情形另有变动”,说:“俄国在东方不能不有一驻足之地”,俄方条件“早经筹定,实难改动,惟望转达贵国政府,早日允办”。许景澄无法,只得降低要求,希望俄国的条件有所“减让”,沙皇竟然不予置答,甚而违反国际礼仪,在许景澄递交国书时粗暴地

① 以上参见《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电报,第28—29页。

②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第37册,第20页;并参见《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0卷,第9—10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05页注①。

④ 伦森:《在朝鲜和满洲的国际抗衡(1884—1899)》,第2卷,第777页。

问他：“贵使几时回去？”^①这明明是在下逐客令，表明俄国拒绝同许景澄谈判，企图在北京逼清政府接受它的要求。果然，第二天，穆拉维约夫正式通知许景澄说：“奉国主谕，派巴代办（巴甫洛夫）为全权专使，商办旅大各款，并须如期在京议结。”^②他还威胁许景澄说：“如过三月初六（公历3月27日）未成订，俄国另有办法。”^③巴甫洛夫在北京也向总理衙门进行了同样的威胁^④。

3月17日，总理衙门电告许景澄、杨儒称：“巴使急欲图功，性情刚愎，本署实难与议”^⑤，仍令二人在俄商议。许景澄奉命再次与俄方交涉，沙俄外交部仍然“词甚决绝”，并重申旅大租地事“须在三月初六（公历3月27日）前订定，过期无复，俄国即自行办理，不能顾全联盟交谊”^⑥。沙皇的亲信乌赫托姆斯基则以“密告”的形式对许景澄进一步施加威胁：“俄主已准外部与兵海各部接洽办事，无可疏通，恐过限有变。”^⑦许景澄见俄方规定的时限行将满期，十分着急，于3月20日再次约见穆拉维约夫，后者竟辞而不见。许景澄不得已而致函俄国外交部，请求“展缓期限以便徐议”。对此，俄方答称：“巴使所索各款及期限，万难改动，来函别无可论。”^⑧由于沙皇政府坚持侵略立场并拒绝在彼得堡谈判，许景澄的使命完全失败了。此后，关于租借旅大的谈判重心转到了北京。

为增大对清政府的压力，沙俄于3月17日由海参崴出动军舰，运载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团的一个营及上乌丁斯克第一团的一分队哥萨克，于3月21日驶入旅顺口，加强先期到达的俄军。^⑨

3月20日，巴甫洛夫到总理衙门谈判，提出俄方拟定的租借旅大约稿六条，强要王大臣们在3月21日以前接受。当时，中国国内群情激愤，不断有人上书光绪帝反对租借旅大。总理衙门不敢接受俄国的要求。

① 以上参见《许文肃公遗稿》，第9卷，函牍五，第33—34页。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电报，第29页。

③ 同上。并参见《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0卷，第13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1号（1898年），第53页。

④ 同上。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0卷，第13页。

⑥ 《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电报，第29—30页。

⑦ 同上书，第30页。

⑧ 同上。

⑨ 斯潘德洛夫：《南满俄国租借地的前半期》，第68—69页。

在谈判中，王大臣们再次要求俄国不要租借这个港口，并指出俄方指定的时间太短，“几天内不可能把这样重要的事情谈妥”^①，要求延长期限。

俄国的要求没有得逞。为了在预定的时间内达到侵略目标，沙皇政府曾一度考虑过命令旅顺口俄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②。恰在此时，它获悉清政府任命李鸿章、张荫桓为谈判的全权代表，认为：这两个人比较“了解”俄国，知道“如果俄国坚欲占领旅顺口，甚至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则中国的抵抗是徒劳无益的”^③。从这一估计出发，并为了避免强行登陆必然引起的国际上的强烈反应，沙皇政府决定暂不武装登岸，着重采取进一步贿赂清政府高级官员的卑劣手段，以售其奸。

沙俄又一次收买清政府高级官员的阴谋，早在1898年1月即已决定下来。是时，清政府拒绝了俄国租借辽东半岛海港的要求，维特随即指示璞科第和巴甫洛夫“在华俄道胜银行存款中拨出100万卢布，作为对中国大臣秘密送礼之用”^④；同时，还决定贿赂清政府旅大地方官员，以便“使当地有关当局及有关人士为我（俄）国服务，另方面，可以对我们（俄国）的登陆给以帮助”^⑤。在获知李鸿章、张荫桓被任命为全权代表后的第二天，巴甫洛夫和璞科第“极秘密地”会见了他们，“答应他们，如果旅顺口和大连湾的事按照我们指定的期限并无须我们采取非常手段而办理成功，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⑥。李、张二人接受了俄国的贿赂，同意第二天“去说服太后同意在俄国的提案上签字”^⑦。李鸿章在觐见帝、后时，“使用了他的全副辩才”，说明“俄国对中国并无敌意”。慈禧和光绪帝在这两个被俄国收买的人的劝说下，终于同意了俄方的要求^⑧。3月23日，光绪帝谕翁同龢传旨：“派李鸿章、张荫桓画押”^⑨。在3月23—24日两天的谈判中，李鸿章、张荫桓“未对我们（俄国）的要求提出任何新的反对

①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55页。

② 同上书，第55页；《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28页。

③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56页。

④ 《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287页。

⑤ 同上书，第290页。

⑥ 同上书，第290页。一说璞科第允给李、张分别为50万卢布和25万卢布。参见《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27—128页。

⑦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28页。

⑧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56页；《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28页。

⑨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二日，第37册，第24页。

意见”，“几乎全部接受了我们的要求”^①。

3月24日，巴甫洛夫密电沙皇政府，条约即可签订，并说：“许给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② 维特将此电转呈尼古拉二世，后者情不自禁地欢呼道：“太好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③

就这样，沙皇政府通过外交上的阴谋诡计，通过对清政府的欺诈和背信弃义，通过炮舰和卢布并用的两手，再一次逼迫清政府接受了它的侵略要求。1898年3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1898年3月15日），按照俄国指定的期限，由李鸿章、张荫桓代表清政府，与巴甫洛夫在北京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又称《中俄会订条约》）^④。条约共九款，有中、俄两种文本，发生争议时以俄文本为准。该约于1898年5月30日在彼得堡互换生效，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一款）；大连湾以北，租借若干“旱地”（第二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起，定二十五年为限”，期满后可由两国“相商展限”（第三款）。

二、租借地内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第四款）。

三、旅顺口“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大连湾内除一个港口为俄国军港外，“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六款）。俄国在旅大租借地，有权修造各种

①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56页。

② 《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291页。

③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28页。按：维特堪称是撒谎的能手。他在《回忆录》第1卷第128页写道：在强租旅大期间他对李鸿章等行贿“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个说法完全不合事实。如前所述，早在1895年李鸿章访俄期间，维特为取得东省铁路筑路权就曾许诺给他300万卢布，并为此在华俄道胜银行设立一项“特别基金”。东省铁路合同签订后，1897年5月马赫托姆斯基来华，在上海通过中介人交给李鸿章100万卢布（同上书，第171页）。在强租旅大期间收买李鸿章按先后顺序是第二次，而不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旅大租地条约》签订的次日，即1898年3月28日，璞科第立即“付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292页）。张荫桓因当时受控纳贿，对接受俄国贿赂一事“非常害怕。……他宁愿等到闲话平息以后再说”（同上）。给他的贿款直到他被抄家后的1898年9月21日还没有付成（同上）。但后来他在充军途中，曾请求璞科第“付给他一万五千两”（同上书，第293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2卷，第16—19页；马克漠编：《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119—121页。

海陆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第七款）。

四、租借地界限以北，划一“隙地”。“隙地”内由中国官员治理，“惟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五款）。

五、中国同意东省铁路公司由东省铁路某站（按：后确定为哈尔滨）起“筑一支路”“至大连湾”，或按照需要“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1896 年 9 月 8 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所立铁路合同各条款，“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第八款）。

六、租借地及隙地的确切界限，由许景澄在彼得堡与俄国外交部商定，“另立专条”（第二款、第五款）；东省铁路支线的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亦由许景澄与东省铁路公司在彼得堡商定（第八款）。

《旅大租地条约》的掠夺性质是十分明显的。通过这个条约，俄国取得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以北陆地的租借权。旅顺口成了俄国的军港。该约违反租借旅大谈判期间沙皇政府向清政府谈判代表所作租借地内“收税理民，仍归中国自主”的明确保证，于第四款中规定租借地军政、民政大权“全归俄官”掌管，并禁止中国在此界内驻军，这就把条约第一款中关于租地不侵犯中国主权的规定变成纯粹的空话，把旅大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俄国殖民地。沙俄多年来在远东攫取不冻港的野心，至此实现了。该约规定租期为 25 年，但同时又规定租期届满后两国可以“相商展限”，从而为沙俄永久霸占旅大提供了借口。其实，沙俄强租旅大一开始就存心要永远霸占的。早在策划强租旅大阴谋期间，库罗巴特金就提出要在这块土地上成立俄国的“关东省”，就是明显的证据。

《旅大租地条约》关于在俄国租借地和中国领土之间设立“隙地”的规定，名义上承认该地区的行政由中国官员主持，但又规定中国军队进入该地区必须取得俄国的同意。这就事实上否认了中国对这一地区的主权，便于俄国从租借地随时派兵占领该地。由此不难看出，沙俄并没有放弃占领整个辽东半岛的打算。

《旅大租地条约》关于从东省铁路修一支线到大连湾或辽东半岛某海港的条款，规定这条支线应依照 1896 年 9 月 8 日清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所订合同的各项条例办理，因此这条铁路成了 1896 年中俄铁路合同的一部分。这样，东省铁路像沙俄的魔爪，继伸向东北北部之后，又伸向了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

由于《旅大租地条约》的签订,沙俄事实上已把整个中国东北地区置于它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并使“俄国的海军力量处于令人神往的临近北京的地方……由于现已允许修筑从奉天到旅顺口的南满铁路,因此从外贝加尔和滨海地区出发的俄国第一梯队,在不过五六天的时间内便可到达北京。”^①沙俄强租旅大的成功,“受到其他欧洲列强的热切追随”^②,在掀起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起了带头作用,“构成了历史上最无耻的篇章之……”^③。

三 《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与《东省铁路续订合同》

根据《旅大租地条约》的规定,旅大租借地和隙地的界限以及东省铁路支线的造路方向、经过处所应由许景澄在彼得堡分别与沙皇政府和东省铁路公司商定。为此,清政府指示许景澄继续留在彼得堡谈判有关问题。

关于谈判方针,总理衙门对许景澄作了两点原则性指示:

一、“改减租界”,“金州厅在大连湾北,有文武官驻扎……不能归入租界”;

二、《旅大租地条约》第八款“酌量在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地方造一支路,指地太广,虑其另择别处,通海又添一口”^④,应要求俄国,“铁路专至大连湾,不达别口”。^⑤

据此,许景澄在1898年4月5日向穆拉维约夫提出两点要求:

一、东省铁路支线专通至大连湾,不达别口;

二、“按地势,大连迤北应将山梁以西连海岸一带地自金州城起全不入租界”。

关于第一项,因沙俄已决定以旅大为东省铁路支线的终点,同意了清政府的要求。

第二项,穆拉维约夫借口许景澄的方案“碍俄西面保守,断难允”。

经过争论,穆拉维约夫只同意“在所拟租界内画出周环金州城距三俄里”处,不入租借地。也就是说,金州城外三俄里以外地方连同以西海岸一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5页。

②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1933年纽约出版,第225页。

③ 同上。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2卷,第14页。

⑤ 《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电报,第31页。

带均要划入俄国租借地^①。

4月9日，俄方将单方面拟定的专条交许景澄，计5款：

一、“租地北界从西岸亚当湾（普兰店湾）北过亚当山脊连山脊在内至东岸皮子窝（貔子窝）止并附近水面及附近各岛均准俄享用”；

二、“隙地界线从西岸营口起绕海城、凤凰城、大姑（孤）山至东岸五道河口止”；

三、东省铁路支路通至旅顺、大连湾，“支路经由之地不将别项铁路利益许给他人”；

四、金州城归中国管理，“但不连沿海城、岸”；

五、“隙地地段非俄国应允，不让与他国享用，并不将造路开矿及工商诸利益让给，隙地海口亦不与别国通商。”^②

显然，这个方案仍然坚持要占领辽东半岛南端的大片地方。金州城虽名义上同意由中国管理，但处于俄国租借地的包围中，来往道路及出海通路均被截断，势成孤悬，沙俄唾手可得。隙地界限，几乎包括了整个辽东半岛，其间的各项利益均归俄国垄断。东省铁路支线的终点虽同意选在旅大，但规定沿线利权不得让与他国，只能由沙俄独占，所涉及的地域更是远远超出了辽东半岛。对于这个胃口很大的方案，许景澄根据总署指示提出异议，指出：中国不能同意隙地界线划在从营口到五道河口一线；关于租地界线，应将金州来往道路划归中国管理。但俄方强调同意东省铁路支线通至旅大、金州城归中国管理，已属“退让”，今后金州道路可允中国“行走”，但不能划归中国管理；貔子窝、普兰店湾两地“为保守旅大必需”，不能改动。在隙地界线问题上也未达成协议。^③

4月11日，许景澄对俄方方案提出一个修正方案，内容是：隙地界限“自东岸盖州北盖平河口起，绕岫岩厅过分水岭至大姑山、大洋河口止”；金州城及城外三俄里以内亦归中国管理，金州城外往来道路“两国人民公用”。俄方方案第五款，非俄国应允隙地不开口岸一句中删去“非俄国应允”字样^④。当时，因沙俄欲占金州，俄兵在该地肆虐，激起清兵武装反抗沙俄的事件。沙俄以此为借口，对中国的修改方案无理取闹，甚至推翻金州城外三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电报，第31页。

② 同上书，第31—32页。

③ 同上书，第32页。

④ 同上。

俄里内归中国管理的诺言，并准备派俄军入城，“借端占据”^①。经过反复磋商，俄方只同意不派兵入城^②。

4月20日，沙俄再次将单方面拟出的约稿交许景澄，同时宣称此稿“已呈俄主阅定，不能再改”^③，逼迫许景澄接受。许景澄在俄方的压力下，终于屈服。

4月29日，总理衙门电令许景澄：如俄国同意不在金州制造事端，即着许景澄、杨儒会同画押。

1898年5月7日，许、杨遵命同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④。条约共六款，有中、俄两种文本。遇有分歧，以俄文本为准。此约于同年6月11日在彼得堡交换批准，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租与俄国的旅顺口、大连湾及辽东半岛陆地，“其北界应从辽东西岸亚当湾（按：即普兰店）之北起，穿过亚当山脊（山脊亦在俄国租地内）至辽东东岸皮子窝湾北尽处止。租界附近水面及陆地周围各岛，均准俄国享用。两国各派专员，就地详确勘定所租地段之界线”（第一款）；

二、隙地北界“应从辽东西岸盖州河口起，经岫岩城北至大洋河，沿河左岸至河口，此河亦在隙地内”（第二款）；

三、东省铁路支线末端“在旅顺口及大连湾海口，不在该半岛沿海别处”，所经地方，中国“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人”（第三款）；

四、金州城归中国“自行治理”，“中国兵应退出金州，用俄兵替代”，“此城居民有权往来金州至租地北界各道路，……但无权兼用海岸”（第四款）；

五、“非俄国应允，（中国）不将隙地地段让与别国人享用”，“不将隙地东西沿海口岸与别国通商”，“不得将隙地地段内造路、开矿及工商各利益让给（别国）”（第五款）。

只需对这个条约粗加分析，即知该约除了划分俄国旅大租借地界限，把中国辽东半岛南端大片陆地、岛屿及海域划为俄国殖民地外，整个隙地事实上也被置于沙俄的控制之下。这个地区虽然名义上归中国管理，但又规定非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电报，第33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2卷，第16页。

③ 同上书，第15页。

④ 同上书，第19—20页；马克漠编：《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127—128页。

经俄国允许该地段的各项利益不得让与别国享用，各海口不得与别国通商，实际上是俄国人垄断了该地区的一切权益。这样的地位和俄国旅大租借地已是相差无几。

关于金州城，形式上虽然规定由中国“自行治理”，但中国在该地没有驻军权。沙俄还推翻了城外三俄里以内划归中国管理的诺言，使该城处于俄军紧紧包围中；而且城内居民只能往来金州至租借地北界各道路，不能使用近在咫尺的海岸。在订约的当天，沙俄外交部迫不及待地照会清政府，声明俄军将“屯扎金州城外，作为试办”，如果“城内有乱”，或居民与俄军发生冲突，“俄兵即行入城”^①。这样的“自行治理”究竟是什么东西，自不待言。

《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引起当地中国官民的极大愤怒。对“金州自治”的规定，反应尤为强烈。当时的金州副都统寿长，是一位力主抗俄的爱国将领。他在一封奏文中，对许景澄“鳃鳃然颇以争得金州一城为功”的欺上误国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所谓金州“自治”，其实是“环城以外，尽租与俄，仅留孤城中悬于数百里租界之内，出入皆形阻滞。且界内人民归彼治理，粮租归彼征收，凡城内旗民文武大小官员三千余人，去之则空城犹存，留之则所司何事？”因之，他对这个《续约》的签订表示“骇异”。他责备许景澄“定界于万里外……既不详考地志，又不咨询疆臣”，“率然”订约，“诚不知何所据而云”^②，认为这是许景澄误国的主要原因。他哪里知道，许景澄是清政府内部亲俄派的“台柱子”^③。他是甘心替俄国效劳的。不仅许景澄，就是清政府本身，也患了恐俄、媚俄症。所以，当寿长发出“凡有血气，谁肯事仇”^④的怒吼，并提出抗俄计划^⑤时，他的意见并未得到当局的重视。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此。在具体勘分旅大租地界线的过程中，沙俄又得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3卷，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第187页。

② 以上参见《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4卷，第8—9页。

③ 维特在1901年11月7日给波兹德涅耶夫的电报中说：“随着失掉李鸿章和许景澄”，“我们这一派已经完全没有台柱子了”（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29页注②）。许景澄任东省铁路公司总办，是得到俄国赞许的。更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初英、俄争揽对华贷款权时，巴甫洛夫于1月25日以增加“酬金”为诱饵，点名要李鸿章派许景澄到彼得堡去办理这项交涉（同上书，第199页注②），可见，沙俄对许景澄多么赏识。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4卷，第7页。

⑤ 同上书，第9—11页。

寸进尺,继续扩大租地范围。根据《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第一款,1898年7月19日,清政府派知府福培、同知涂景涛为勘分旅大租地界线委员,与俄方代表、俄国驻华武官沃加克、俄国驻辽东部队参谋伊林斯齐大尉具体勘划俄国租借辽东半岛地界。

10月19日,分界委员会首次会议在金州天后宫开幕。由于作为俄方依据的英国海军军用地图与中方地图地名不一,会谈一开始双方就发生了很大的争执^①。在随后的谈判勘分过程中,俄方代表又不顾《续约》附图关于碧流河口以南为“貔子窝湾北尽处”、东岸北界应以此为断的明确规定,强指貔子窝以东30里、距湾北尽处东山嘴13里的牟(莫)家屯至火神庙海边为界。中方代表对俄方违约多占的无理要求坚不同意,多次据约与俄方代表辩论。当地团众及居民对“俄员强逼画诺”、欲“将盐滩占尽”的行径忍无可忍,誓死抵抗。

11月13日,俄方人员非法越过碧流河,在河的北面绘制地图,当地人民迅即奋起,将其全部逐回^②。但俄方并不死心,仍然坚持要违约占领这一带盐滩,夺走居民生计,甚至威胁要“停止进一步谈判”^③。清政府慑于俄方压力,最后还是不顾人民死活,指示中方代表“相机办理”。福培等得了上级指令,也只得“含忍息争”,“勉允所请”。^④

1898年11月26日,租借地陆界全线勘定,立界碑31处,小界碑8处^⑤。沙俄分界委员公然把界线上第十四碑与第十五碑之间的最高峰楼子山以沙皇的名字改名为尼古拉山,表明在沙俄殖民者心目中,租借地已经不是租借地,而是俄国领土的一部分了。

在勘分租借地北界纬线以南东西两面海中附近岛屿的过程中,俄方也公然违反《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第一款关于俄国只能“享用”“租界附近水面及陆地周围各岛”的明文规定,无理要求将山东登州附近海面的庙岛群岛“一

① 斯潘德洛夫:《南满俄国租借地的前半期》,第197页。

② 盛京将军依克唐阿1898年11月12日电总理衙门称:“因俄人欲违约占盐滩,‘东岸团众,跃跃欲试’。次日又电总理衙门称:‘现在盐滩各团誓死抗,今日俄人过河画图,已被逐回。’”(《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5卷,第18页。并参见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70页。)

③ 罗索夫:《关东占领与当地民俗概述》,1901年旅顺俄文版,第13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8卷,第21—22页;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第194页。并参见苏维罗夫:《满洲》,1904年彼得堡出版,第99页。

⑤ 罗索夫:《关东占领与当地民俗概述》,第15页。

并划入租界”^①。俄国旅大占领军头目杜巴索夫并派俄舰“第米特里·顿斯科伊”号强行占领了这个群岛，造成既成事实^②。沙皇政府还指示巴甫洛夫就此事在北京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对此，总理衙门指出：该群岛不属奉天省，而是属于山东省。俄国提出这个问题“同划界……毫无关系，本身就意味着侵占直隶湾的入口”^③，威胁中国京都，中国万难接受。清政府划界代表也严正指出：条约明文规定俄国只能租借辽东半岛附近的岛屿。距辽东海岸二三十海里的岛屿，尚可谓之“附近”；“至若庙儿（岛）群岛，本在山东海面，与辽海毫不相属，固不得谓之附，且远者将 200 海里，更不得谓之近。况为南北海道要路……倘归俄国专管，诸多障碍，断不允。”^④

沙俄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指示其驻华公使格尔思提出将庙岛群岛做“隙地”处理，以便像辽东半岛的陆上“隙地”一样，保留俄国对此群岛的任意干涉权。这个无理要求也遭到总理衙门的拒绝^⑤。随后，俄方同意庙岛群岛可以不做“隙地”处理，但中国必须“缮具字据”，同意在该群岛“不设炮台，不驻兵”，否则俄方“断难允从”^⑥，并要清政府保证：

- 一、不将庙岛群岛让与任何列强；
- 二、不在群岛上作任何工商业让予；
- 三、不在群岛开放商港。

清政府在俄国压力下，被迫同意了后三条要求^⑦，但对不在群岛设炮台和驻兵，仍然表示拒绝^⑧。

俄国取得以上三点保证后，在该地事实上已经获得了近似辽东半岛“隙地”的权益，又恐坚持不准清政府在群岛驻军将引起他国的干涉，于是表示放弃不准中国驻军的要求^⑨。清政府也指示中方划界代表：除双方已同意庙岛群岛不划入俄国租借地外，金州所属各岛及金州东海海阳、五鳞二岛可以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38 卷，第 23 页。

②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58 页。

③ 同上。

④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3 卷，第 195 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36 卷，第 23 页。

⑥ 同上。

⑦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58 页。

⑧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36 卷，第 23 页。

⑨ 同上书，第 24 页。

划入俄国租借地，并可与俄方委员会同画押^①。

1899年2月26日，中方代表福培、涂景涛，俄方代表伊林思齐在旅顺会同签订了中俄《勘分旅大租界专条》及《辽东半岛俄国租地分界专条附条》^②，分别规定了辽东半岛租借地陆界及海面各岛之界。同年5月7日，清政府及沙皇政府分别指派王文韶、许景澄和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在上述《专条》及《专条附条》上加押生效。

关于东省铁路支线问题，根据《旅大租地条约》及其《续约》，准许东省铁路公司筑一支线直抵旅大海口。为此，清政府应俄方要求，指示许景澄、杨儒在彼得堡与俄国财政副大臣玛罗诺夫及东省铁路公司总局董事齐格勒就此事进行谈判。

1898年5月下旬，俄方提出续订合同拟稿七款，提出：因“现允铁路不通别海口，须暂筑支路送运（材料）”；还要求在东省铁路支线沿线伐木、采煤，甚至开采其他矿产。由于清政府先已被迫接受沙俄的筑路要求，因此，这次“谈判”，其作用只不过是使已确定的原则进一步具体化而已。经过一番实际上是例行公事的所谓交涉，1898年7月6日，许景澄、杨儒与东省铁路公司在彼得堡签订了《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③。合同共7款，主要内容是：

一、东省铁路支线“达至旅顺、大连湾海口，取名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第一款）

二、中国准许东省铁路公司的轮船及挂公司旗的轮船“行驶辽河并该河之支河及营口并隙地内各海口”，运送造路材料，（第二款）并准由南满支线“暂筑支路至营口及隙地海口”运料，但俟南满支线竣工后应将其支线拆去。（第三款）

三、准许东省铁路公司“在官地树林内自行采伐”，“并准公司在此支路经过一带地方，开采、建造、经理铁路需用之煤矿”。（第四款）

通过上述《续订合同》，沙俄在建造南满铁路的特权之外，又攫取了由南满铁路暂筑支线权，在辽河流域、营口及辽东半岛“隙地”各海口行驶轮船权，以及在东北境内伐木、在南满铁路沿线采煤等权利。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第195—196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8卷，第2—19页；许同莘等编：《光绪条约》，第57卷，第22—23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83—785页。

沙俄强租旅大和取得建造南满铁路的权利,是它的侵华外交政策的重大成就。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后来在一封奏文中得意洋洋地写道,俄国“通过非常和平的外交谈判获得拥有两个港口的一整块土地,并获得修筑铁路和开发资源的权利,这在历史上是一件特出的、独一无二的事”^①。由于俄国远东扩张政策的成功,造成了这样一种局势:继东北北部之后,中国东三省南部地区的利权也丧失殆尽。

沙俄对东三省的渗透已无孔不入,沙俄的控制如铁腕在喉。波波夫写道:“获得旅顺口不仅意味着实现(俄国)关于不冻港的宿愿,而且通过与之相连的南满支线,把获取通向暖海的出海口问题和占领整个满洲土地的问题联结了起来。”^②英国《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也写道:“显然,由于俄国舰队泊于旅顺口并有一条铁路连接该地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干线,满洲实际上将成为俄国的一个省,中国首都本身也将处于俄国的掌握中。”^③马士、宓亨利也认为,强租旅大以后,俄国“已经处于可以支配华北和朝鲜的地位了”^④。自此,沙皇政府的侵华目标,除去巩固在东北的既得阵地外,已经是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首先是英国在中国关内进行争夺、互争雄长的问题了。

四 沙俄在旅大的殖民统治

(一) 殖民机构的建立

《旅大租地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即1898年3月28日拂晓,俄国分舰队陆战队在旅顺口和大连湾登陆,俄军从陆上和海上迅速占领了旅顺口的所有工事^⑤。晨8时,俄国人在旅顺黄金山炮台上升起俄国国旗^⑥,炮兵阵地和俄舰上礼炮齐鸣,庆祝俄国占领旅大的正式开始^⑦。

① 穆拉维约夫奏文,1900的2月22日。参见《红档》杂志1925年第6(总第13)卷,第28页。

② 阿·波波夫:《沙皇专制制度的远东政策(1894—1901)》,[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1935年第11期,第46页。

③ 《泰晤士报》社论,1895年10月25日。转引自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156页。

④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427页。

⑤ 3月27日午夜1时以前,提督宋庆龙奉命将旅顺中国驻军撤往营口。

⑥ 同时还升有中国国旗。几天后,俄国人把中国国旗降了下来,只留下俄国国旗。详见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55页;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57页。

⑦ 罗索夫:《关东的占领与当地民俗概述》,第1页;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1918年赤塔出版,第269—270页。

按照《旅大租地条约》，自签字之日起，“租地限期……定二十五年为限”，但是，惯于背信弃义的沙皇政府，根本就没有想归还。他们公然在租借地内屯驻重兵，广筑工事；成立行政、警察、法院、监狱机构，颁布法令、法规；兴建港口、铁路，垄断商业；横征暴敛，欺压、掠夺百姓。租借地事实上成了沙俄图谋永久霸占的“黄俄罗斯”样本，即带有浓厚军事封建色彩的俄国殖民地。

俄军在旅大登陆后，便着手在租借地建立军政合一的殖民政权。开初，由俄国太平洋分舰队司令、关东驻军司令杜巴索夫少将独揽当地军政大权，行政事务由陆军少将沃尔科夫协助。在头五个月内，俄国殖民当局的权力所及尚不超出旅顺、大连两地。1898年8月23日，沙皇敕令由陆军少将苏鲍季奇接任关东驻军司令，并赋予省级行政权力，归阿穆尔总督格罗杰科夫管辖。1899年2月，正式设立行政厅，同时建立了司法机关^①。8月，沙皇政府擅自成立“关东省”，号称俄国的“新边疆”。

根据1899年9月1日批准的《关东省暂行管理条例》，关东租借地设首席长官一人，由深得沙皇宠幸的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中将担任。他“在民政方面拥有高加索最高民政长官那样的权力；在军事方面拥有边疆军区司令的权力，在海军方面拥有舰队和港口司令的权力”^②。也就是说，他既是该地区行政首脑，又是当地的陆军司令官和俄国太平洋分舰队的司令官。他在军事上“受陆军大臣和海军部大臣管辖，在外交事务方面受外交大臣管辖”^③。总之，他是俄国“新边疆”的太上皇，是高居在租借地中国人民头上的独裁者。

“关东省”政府设在旅顺，下设民政厅、财政厅、外务局、警察局、省法院。民政厅、财政厅、外务局各设专员一人。民政厅专员由格罗姆切夫斯基上校担任，财政厅专员由普罗塔西耶夫担任，外务局专员由曾任俄国驻华公使馆秘书、后来任驻华公使的廓索维慈担任^④。廓索维慈自称，他接受这一任命是“参与实行我们（俄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⑤。

“省”以下设区，中文名称叫“抚民府”，由区长主管。这样的区共有五

① 斯潘德洛夫：《南满俄国租借地的前半期》，第115—118、189—191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271—272页。

③ 同上。

④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5页。

⑤ 同上。

个，即金州行政区、貔子窝行政区、亮甲店行政区、旅顺行政区和岛屿行政区（包括大连在内）。

区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为乡和村，介于乡和村之间并设置一层上传下达的“方”。乡设乡约，方设方长，村设村长。

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设立和区平行的市。隶属“关东省”的市有 3 个，即金州市、貔子窝市和旅顺市；大连城则划为特别市行政区，归财政部管辖^①。

与俄国远东其他边疆省不同，“关东省”在行政上不归沙皇政府内务部管辖。“省”所属各厅、局首脑由陆军部任免，他们同各区区长一样，一般由俄国军官担任。乡以下政权的头目则由当地封建上绅担任，但必须由俄国人指定。俄国刺刀和当地中国封建势力的这一结合，使旅大租借地的俄国政权带有明显的军事封建殖民政权的性质。这是沙俄对租借地内 20 余万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统治的专政机器。

按照《关东省暂行管理条例》，为了“管理经济和整顿大连市”^②，沙俄决定在大连设立市议会。市议会以市长为主席，成员由东省铁路公司指定 1 名，其余 6 名由“选举”产生，选举人有严格的财产限制。这样的市议会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御用殖民机构，也未付诸实行。根据 1902 年 5 月 29 日沙皇谕旨，市议会召开前由大连港的总工程师（尤哥维奇）代行其职权^③。尤哥维奇住在约两千里外的哈尔滨，他直接听命于财政大臣维特。这样，大连市的一切，实际上由“具有相当独裁倾向”^④的财政大臣维特一个人说了算。

旅顺的情况是又一个例子。根据 1901 年 9 月 15 日阿列克谢耶夫批准的《旅顺暂行管理条例》，旅顺市成立了市议会。市议会主席由市长（必须是军人）兼任，代表由陆军部门、海军部门、财政部、东省铁路公司、警方、卫生界各指定 1 名，须由“关东省”最高长官批准，任职无定期；另由城市居民选出市议会成员 3 人，也须由“省”最高长官批准，任期一年。市议会的职权是决定旅顺市的各项事项并对执行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但市议会的大多数决定须经“省”的最高长官批准。

① 以上参见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 3 卷，第 272 页。

②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231 页。

③ 同上书，第 232 页。

④ 席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 4 页。

根据上述《条例》组成的市议会,10名成员中有7名是俄国军政官员,3名是常住居民代表^①。由于前者在数量上占明显多数而且任期可以无限,后者在数量上是明显少数且任期只有一年,因此,所谓“常住居民代表”不过是装点门面。这样的市议会只能是俄国军事殖民当局手中得心应手的工具,当地中国居民毫无民主权利可言。

按照《关东省暂行管理条例》,在该省施行俄国审判法,并在旅顺成立隶属于伊尔库茨克中级法院的地方法院,管辖“关东省”所属各市区的法庭,审理东省铁路南满支线附属地的有关案件,特别重大的案件则移交军事法庭按战时法规审处。

为了强化统治,1903年8月,沙皇颁布《远东暂行管理条例》,在旅顺设立远东大总督府,统辖外贝加尔、阿穆尔、滨海、堪察加、库页岛、大连市以及东省铁路沿线附属地。将旅大租借地和俄国远东各省置于同等地位并将旅顺定为俄国远东地区的首府,这是尼古拉二世企图永久霸占旅大、吞并中国全东北野心的大暴露。

(二) 旅大殖民地的“建设”

沙俄为了永远霸占旅大,并出于争霸远东的需要,于强租旅大之后在该地进行了广泛的大规模建筑工程,包括旅顺要塞和城市的建设,大连港和城市的建设,铁路的修筑,等等。

旅顺口原为辽东半岛尖端的一个渔村。1883年,清政府决定将这个地方的建设为北洋水师的基地;1884年,疏浚了东面黄金山一面的港口,建了船舰修理厂和船坞,安设了从此地经牛庄、天津到北京的电话线,挖了战壕,并在山上修筑要塞,设有海岸炮台和陆地炮台18座。由于旅顺扼渤海锁钥,屏蔽京、津,四面环山,形势天成;加以已经筑有坚固的炮台,因此,租借旅大以后,沙皇政府决定把几世纪以来它所梦寐以求的这个远东不冻港建设为俄国的“远东第一军港”,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库之一和一支大舰队的碇泊港”^②。

1900年初,沙皇批准了旅顺口“防御”工事计划,决定于是年开工,1909年完成,并为此拨款总额8927775卢布,第一期拨款4631757卢布^③。

① 以上参见托尔加谢夫《远东的冒险》,1907年莫斯科出版,第182—184页。

② 法国外交部档案:《政治与商务往来文书》,中国,新辑,第167卷,第81页。

③ 维特:《不得已的说明》,第20页。并参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89页。

在司令部工程管理总局代表、工程兵少将维列奇科的主持下，沙俄先后疏浚了旅顺西部港口^①，改建并加固了码头，使旅顺口成为“最宜于军舰和商船的停泊处之一”^②。此外，又在旧炮台外修起一座座新的炮台，把旅顺变成了一座武装到牙齿的俄国要塞。库罗巴特金承认，旅顺和海参崴两个要塞的兴建和维持费占俄国 1898—1902 年用于全国要塞的费用“总数的 1/4”^③，“在我们所有的陆地和海岸要塞中，只有在喀琅施塔得花的钱比旅顺港多”^④。在谈到旅顺和海参崴时他还写道：“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1000 多门大炮从俄国的欧洲地区运往这两个地方。”^⑤ 俄国陆军部定做的 11 英寸口径的堪乃特大炮和大口径迫击炮，大部分用来装备了上述两个军港^⑥。

沙俄陆军部也承认，在 20 世纪初，“我们加强战备的全部工程，主要集中在远东”^⑦。据维持统计，沙俄支出的“关东半岛防御费”主要用于“购置旅顺口炮兵装备和建立炮兵贮备……以及构筑防御性和非防御性工事”（“派驻关东部队”的军需费用还不在此数）。这项“防御费”1899 年是 500 万卢布；此后至 1903 年总数是 2500 万卢布^⑧。另一方面，1900 年末和 1901 年初，即中国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还用夺自中国的大批武器弹药、钢铁、机器等，“卓有成效地”加强了旅顺口的俄国陆、海军^⑨。与此相应，旅顺的俄国占领军也逐年增加，到日俄战争前的 1903 年底已达 3 万人^⑩。同在 1903 年，俄国在旅顺口要塞“已贮备足供一年半消耗的必需给养”^⑪，并贮煤 100 万吨^⑫。库罗巴特金写道：为了使俄国“在关东能有足够的部队，陆军部被迫削减了敖德萨和基辅军区 6000 人的编制”^⑬。足见沙俄对武装新占领的旅顺口是何等重视。

① 托尔加谢夫：《远东的冒险》，第 176 页。

② 佚名：《中国与中国人》，1901 年莫斯科出版，第 132 页。

③ 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英文版）第 1 卷，1909 年伦敦英文版，第 126 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 129 页。

⑦ 维持：《不得已的说明》，第 22 页。

⑧ 同上书，第 18—19 页。

⑨ 详见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 1 卷，第 73 页。

⑩ 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英文本），第 1 卷，第 190 页。

⑪ 维持：《不得已的说明》，第 76 页。

⑫ 法国外交档案：《政治与商务往来文书》，中国，新辑，第 169 卷，第 48 页。

⑬ 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英文本），第 1 卷，第 70 页注。

旅顺作为“关东省”的首府，它的城市建设自然受到殖民当局的特别关注。在这里，同俄国在中亚等地的殖民地一样，沙俄侵略者奉行了典型的种族隔离政策，即将旅顺人为地分为三个部分，除原来的中国旧城区（在港口东面）外，另辟欧洲人新城区和中国人新城区^①。

欧洲人新城区于1904年开始兴建，位于从白玉山南麓向西的港口西部。俄国人在这里修了大马路、广场、公园、剧院、商场、旅馆、教堂、货栈和学校。“关东省”首席长官官邸、陆海军机关、财政部机关、法院、兵营、华俄道胜银行旅顺分行等殖民机构以及俄国人办的工商企业和俄国人的住宅即位于此城区^②。

中国人新城区于1902年才开始兴建，规模与规格远逊于前者。中国旧城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俄国人到来后，在这里大量抢占民房，将居民赶到乡下去，留下的人也被迫“把锅灶让给俄国居民”^③。俄国殖民当局“为了军事及行政需要占领了靠近港口的大量建筑”，其余的房子则被俄国居民占领，这些人过了不久就认为自己是“他们所占领的房屋的所有者，开始把房屋租给新来的人。……租金高到神话般的程度”^④。可是，俄国殖民当局认为自己的强盗行为是当然合理的，在给欧洲人城区大量拨款的同时，仅从俄国国库给中国旧城区拨付1300卢布的修缮费^⑤。这个极其可怜的数字当然谈不上能满足什么需要，于是市政当局只能动用中国旧城的房租、中国新城各地段的租金和欧洲人新城出卖地皮的收入等等来充作旧城的修缮费^⑥。

按照俄国当局的规定，为了利用中国人的资金，中国人可以出钱在洋人区买地建房，但建的房必须租给欧洲人使用。中国人无权在洋人区居住，只能住在华人区^⑦。中国人必须出钱向俄国人买中国人的地，已属咄咄怪事，买了地建了房又不许中国人居住，更是典型的民族歧视和殖民主义的做法。

在沙俄殖民当局的苦心经营下，旅顺的人口由1897年的5000人增为

① 托尔加谢夫：《远东的冒险》，第179页。

② 同上书，第186—187页。

③ 同上书，第181页。

④ 同上书，第181—182页。

⑤ 同上书，第186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书，第189页。

1904年初的4.3万人^①，其中中国常住居民在1903年已超过2.34万人^②，大多数是苦力。旅顺人口的急剧增加，主要是由于俄国驻军的增加，修筑港口、要塞对劳动力的需要以及建立各式殖民机构的需要造成的。

除旅顺以外，大连是沙俄在旅大租借地着重建设的另一港口。和旅顺口不同，沙俄计划中的大连港主要不是军港，而是俄国的“远东第一商港”^③。这主要是财政大臣维特的主意。“维特追求对东方的不流血的征服”，他一直主张俄国在太平洋上拥有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商港”，“建设一个飘扬着所有国家旗帜的大港湾来夺取东方市场。”^④他认为大连港具备这样的条件：这里海岸宽阔，能避风浪，地势平坦，风景如画；更重要的是它“位于历史上俄国孜孜以求的温暖的冰冻海岸”，“终年通航而且距中国商业中心较近”^⑤。通过东省铁路及其南满支线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连，就可以用便捷的铁路运输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代替迂回缓慢的远洋航运。因此，大连港是一个比海参崴优越得多的俄国远东出海口，它“从一开始就成了维特，或确切些说，成了授意维特建立一个俄罗斯殖民帝国的那帮人的宠儿”和“政府所关心和慷慨拨款的对象”^⑥。正是从这一“夺取东方市场”和“开辟世界贸易新局面”的巨大野心出发，沙皇政府才决心予以永久霸占，“不是作为租借人，而是作为所有者在这里更牢固地站稳脚跟”^⑦。

《旅大租地条约》签订后两天，即1898年3月29日，沙俄《政府公报》发表一项特别公告称，俄国“决定从现在起修建一个西伯利亚^⑧最大的码头。通过这个码头的中介，大连港将把旧大陆的两个边陲联结起来。向各大国商船队开放大连湾港，这就在太平洋上为各国工商企业创造一个新的广阔活动的中心”^⑨。这个公告，无疑反映了维特的看法。

① 苏维罗夫：《满洲》，第131页；并参见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87页注。

② 托尔加谢夫：《远东的冒险》，第185页。按：关于这一时期旅顺的人口数，众说不一。参见奎斯特德《“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1895—1917）》，1982年香港出版，第111—112页。

③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27页。

④ 托尔加谢夫：《远东的冒险》，第177页。

⑤ 同上书，第234页。

⑥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51页。

⑦ 托尔加谢夫：《远东的冒险》，第200页。

⑧ 在这里，沙皇政府显然已把大连视为俄属西伯利亚的一部分，这是沙俄在“租借”旅大时根本就不想归还的又一个证据。

⑨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58页。

1898年6月3日,在旅大占领军头目杜巴索夫的主持下,最后选定了大连港建港处所^①。6月9日,沙皇批准了大连港建港方案^②。1899年7月12日,沙皇谕令向全世界宣布大连对各国工商业开放,并责成财政大臣维特负责照管大连城及大连港的建设^③。根据维特的倡议,中国的港口大连竟然以俄国名字命名为“ДАЛЬНИЙ”^④。

自此以后,大连便在维特的“监督和庇护下”^⑤加紧建设。俄国殖民者在这里强行“丈量沿海口岸12里,告居民迁移,不准耕种”^⑥。从1899年下半年到1902年秋维特访问大连为止,大连港已疏浚为退潮时平均水深28英尺、可供当时最大的远洋轮船碇泊的海港。港口水域面积43万平方俄丈,约等于敖德萨港;修成了总长2500余米的码头,可容8艘远洋轮船和10艘近海轮船同时碇泊;建成了一个为修理东省铁路所属船只用的干船坞;为了避免俄船远涉日本从事修理,开始在大连修一个供修理远洋轮船用的干船坞^⑦。

在建港的同时,俄国殖民者还加紧修建大连市街。这一带海岸原来有大约五十个中国村落,居民“不下千户”^⑧,主要从事渔业和农业。沙俄为了修建大连城,强逼当地居民于1898年4月24—28日将房地“照数腾清,不愿者亦须腾”^⑨,办法是“以每亩七卢布的售价”将土地卖给东省铁路公司。旅大殖民当局并勒令居民迁坟。卖去土地的居民,可“仍留原处,每年按卖地所得的百分之五向东省铁路缴纳地租”。原住在预定修城地区的居民,则勒令他们迁往别处^⑩。沙俄靠这种使中国居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残酷手段,仅花60万卢布,就从中国居民手中夺取了75平方俄里的土地^⑪,并从中划出约30平方俄里修建大连城^⑫。

①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58页。

② 同上书,第160页。

③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28页。

④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60页。

⑤ 托尔加谢夫:《远东的冒险》,第198页。

⑥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29卷,第6页。

⑦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64页。

⑧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29卷,第6页。

⑨ 同上书,第131卷,第13页。

⑩ 以上参见托尔加谢夫《远东的冒险》,第200—201页。

⑪ 同上书,第201页。

⑫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109页。

至于劳动力,殖民者主要从当地中国居民中,以及从山东和直隶来的中国破产农民中去寻找^①。除抓工、派工外,殖民当局还雇用大量中国工人。这些穷苦的中国人“从清晨到夜晚在陆上和海上设计宏伟的建筑工程中工作”^②,“一天挣三十戈比”^③,住的是简陋不堪的窝棚,其中不少人因饥寒、流行病、繁重的劳动和俄国殖民者的野蛮迫害折磨致死。沙俄就这样在中国劳动者的尸骨堆上建筑了大连城和大连港^④。

俄国殖民者在大连的暴行激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愤怒。他们纷纷到当地中国惟一的地方政权机关金州厅泣诉沙俄对他们的迫害^⑤。1899年8月3日,大连人民“不满的暗潮爆发为反对俄国人的示威”。示威者“聚集了400多人”,他们“大声宣布自己不愿意卖地,……向(土地征用)办事处扔石头;有几个人往里冲,撕毁了几张地契,拽走了中国译员和文书”^⑥。俄国殖民当局闻讯,急忙派骑兵“从大约三俄里外飞奔而来,抓了205名造反者。不久,护路队步兵赶到,把俘虏来的一群人监视起来……”^⑦。大连人民这次反占地斗争就这样被俄国殖民当局极其野蛮地镇压下去了。

为了“把大连变成活跃的国际商业中心”^⑧,“把满洲的全部贸易吸引过来,并且为了向全世界炫耀”,沙俄在建设大连的“市容上力求豪华”^⑨。按照殖民者的蓝图,大连城“分为三个区:行政管理区和两个商业区——欧洲人商业区及中国人商业区”^⑩。行政管理区于1902年建成,其中有市政府大楼,港口及城市管理局大楼,东省铁路轮船公司大楼,华俄道胜银行分行,教会学校、法院、医院、公园、餐馆、网球场、槌球场、跑马厅、音乐厅以及供高级官员专用的游乐场^⑪。各种享受应有尽有,堪称殖民者的人间伊甸

①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107页;并参见罗索夫《关东占领与当地民俗概述》,第25页;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62页。

② 托尔加谢夫:《远东的冒险》,第198页。

③ 苏维罗夫:《满洲》,第131页。

④ 旅顺的情形也是一样。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29卷,第6页;第131卷,第13页。

⑥ 罗索夫:《关东占领与当地民俗概述》,第22—23页。格林斯基关于此事的记载略有不同,他写道,大连示威者“毁掉了土地征用办事处,抓走了一些工程师”(《日俄战争的序幕》,第72页)。

⑦ 罗索夫:《关东占领与当地民俗概述》,第22—23页。

⑧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31页。

⑨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109页。

⑩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63页。

⑪ 同上;并见托尔加谢夫《远东的冒险》,第209页。

园。与此同时,开始修建欧洲人商业区和中国人商业区。根据《关东省暂行管理条例》,可将大连地皮拍卖给私人。后维特指示,可将城区的整个地段卖给俄国人兴办工商企业^①。为了吸引日本资金,以弥补俄国资金的不足,并允许日本人在大连长期租用地段从事经营^②。中国人则只许在城市边远地方购地^③。通过这种“吸引商业居民”^④的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连出现了几百家商店和厂房,几千所住宅,变成了俄式殖民主义的橱窗。

据统计,俄国人在1903年以前为修建大连至少花去约1885万卢布^⑤,开销不可谓不大。但是,沙皇政府力求从其他来源得到补偿,其中首先是出卖地皮。维特写道,为了弥补建港的开销,“出售地皮可以收回半数费用,港口维持费可以用港口税收弥补”^⑥。他还算了一笔细账:1902年11月大连市卖出地皮16843方俄丈,收入425027卢布,平均每方俄丈收入25卢布。随着商业的发达和居民的增加,地价势必上涨。大连计划拍卖的地皮为60万方俄丈,全部出售,仅卖地皮一项即可收入1500万卢布,而上述60万方俄丈仅占大连可卖地的四分之一^⑦。不难看出,财政大臣维特确是善于“理财”,滴水不漏。不过,他的这个靠出卖中国地皮来建设俄国殖民天堂、不用俄国出钱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如愿以偿。

在建设旅大的同时,沙俄役使大量华工修筑从旅顺通往哈尔滨的东省铁路南满支线。该线长约1000公里,耗资不少于1亿卢布^⑧,1902年底全线通车。

为了促进大连港的发展,1899年2月17日和7月11日,沙皇两次谕令东省铁路公司经营太平洋航运,以便抢在日本人之前,垄断中、日、朝海运,发展与东省铁路衔接的海陆客货联运^⑨。1900年6月,维特取消了海参

①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32页。

② 同上书,第233页。

③ 托尔加谢夫:《远东的冒险》,第209页。

④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31页。

⑤ 波克罗夫斯基:《十九世纪沙皇俄国的外交和战争》,1923年莫斯科出版,第372页;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66页。按:日本人估计为3000万卢布(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86页)。

⑥ 维特:《不得已的说明》,第33页。

⑦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66—167页。

⑧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30页;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62—63页。

⑨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71页。

崴和庙街的自由港条例^①，以利于大连港的兴旺。1901 年 7 月 22 日，沙皇批准《东省铁路公司海运处条例》，规定其任务如下：

- （一）联结旅大租借地、滨海省、库页岛港口及中、朝、日港口；
- （二）联结符拉迪沃斯托克、鄂霍次克海及白令海航线；
- （三）在东省铁路建设期间保证及时运送铁路所需的货物、材料及工人，以促进铁路的顺利修建；

（四）在铁路运行期间，以轮船航运联结大连、海参崴和中、朝、日的主要港口，以保证及时运送往返于远东的邮件、旅客和货物。

到 1903 年，东省铁路公司的“俄国太平洋商船队”已拥有 20 艘巨轮（多数购自西方，较小的海轮不在此数），船队总值达 1150 万卢布。东省铁路公司还先后在大连、旅顺、海参崴、烟台、营口、广岛、庙街、库页岛、上海、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波谢特、天津、釜山、香港等处设立了办事处、仓库、煤站或专用码头，一度显得十分活跃^②。但是，沙俄这一以大连为主要据点控制远东商业的打算，连同其在旅大租借地以及中国整个东北地区的庞大殖民计划，在 1900 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受到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后来在俄日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东北而爆发的日俄战争中，又遭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致命打击。

第五节 俄英争夺中国铁路利权和两国 在华铁路范围协定的订立

一、俄英对中国铁路利权的争夺

在中国投资修筑铁路，是帝国主义列强输出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发展和加强其势力范围的重要工具。沙俄强租旅大和取得修筑东省铁路南满支线的利权后，一面积极巩固在中国东三省的既得阵地，一面力图向中国关内地区伸展其势力。财政大臣维特早就鼓吹“必须用种种方法将中国北部的铁路网转入己手”^③，“我们将通过历史的道路走向南方”，“整个中国——它的全部财富主要是在南方”^④。这就是说，俄国不仅要控制

①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 193 页。

② 以上参见《东省铁路沿革史》，第 1 卷，第 171—173 页。

③ 《红档》杂志 1932 年第 3（总第 52）卷，第 96 页。

④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80 页。

华北的铁路,逼近京畿以挟持清政府,还想插足富饶的长江流域。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经济实力雄厚、在长江流域称霸、并力图向华北、东北扩展其势力范围的英国相搏了。争夺中国铁路利权,遂成为19世纪末俄英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重要内容。

(一) 沙俄势力渗入卢汉铁路

卢汉铁路从北京附近的卢沟桥直达长江中游的汉口,是一条贯通华中、华北的大干线,无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大意义。早在1889年,清政府就准备修建此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又提出修建这条铁路的问题。1896年10月,清政府接受这一建议,并决定为此举借外债,成立铁路总公司,由盛宣怀任总公司督办。张之洞等人对卢汉铁路寄予很大希望,称:“卢汉一路,乃中国全路之大纲。将来南抵粤海,北接吉林,中权扼要在此,生发根基亦在此。气势畅通,全局自振。”^①

清政府决定举借外债修建卢汉铁路的消息一经传出,英、德、法、美等大国纷纷前来争揽贷款权,因条件过苛,清政府都没有答应。盛宣怀说:“英德现议四厘半九扣,法议五厘不扣,美议四厘九扣,不能不干预,费一日不还清,权一日必下移。金达(关内铁路英籍总工程师。——引者)尚不易驾驭,况银东乎。”^②对于沙俄承揽贷款的企图,张之洞感到威胁尤大,更不能答应。他在1897年5月15日的一份电报中说:“俄欲揽办中权铁路,闻之骇异,此患太大”。“如归俄办,则此铁路不如不修之为愈矣。”^③在这种情况下,沙俄决定勾结法国,通过欧洲小国比利时出面承揽,以掩盖插手卢汉铁路的事实。

张之洞不明底细,认为“若比国承造,自无此虑”^④,因为“比系小国,以钢铁起家,重在工作,……别无他志,并虑及他国干预,条款内载明中国铁路总公司只认比国公司,不认别人”^⑤。因此,同比利时的铁路借款谈判很顺利。1897年5月27日,由盛宣怀与比利时银团代表在武昌签订了《卢汉铁路借款合同》。接着,7月27日,在上海签订了《续订借款合同》^⑥。直接

① 《愚斋存稿初刊》,第21卷,第6—7页。

② 同上书,第26卷,第13—14页。

③ 《愚斋存稿初刊》,第27卷,第4—5页。

④ 《张文襄公全集》,第153卷,第2页。

⑤ 《愚斋存稿初刊》,第1卷,第35页。

⑥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09—712、722—724页。

参与其事的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供认：“法国与比利时、俄国协同一致，从一八九七年起，以借款和经营的方式获得了中国这个第一条铁路大干线的让与权。”^①

在上述借款合同中，较少涉及政治、经济利权，这是俄、法集团使用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它们的本意。事实上，它们认定，只要清政府在合同上签了字，以后便可相机增提条件。果然，1897 年末，德国占领胶州湾后，俄、法两国趁清政府接受容闳建议拟筑津镇铁路的机会，又怂恿比利时出面，借口津镇铁路与卢汉铁路平行，将分占卢汉铁路的利益，强迫清政府修改借款合同^②。清政府拒绝了比利时的修约要求。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主张改向美国借款^③。法国和俄国驻华公使闻讯，立即出面干预，分别向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提出质问。俄法集团还通过比利时国王直接致电李鸿章说：“卢汉铁路于中、比两国所关甚大，且深知中堂亦深愿此事之成。明公智深识远，故乞电催盛京卿（盛宣怀）将请改数条即行允准，庶俾此事早底于成。”^④

1898 年 6 月 26 日，在俄、法压力下，盛宣怀根据李鸿章的指示^⑤，与比利时银团代表俞贝德在上海签订了《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29 款和《卢汉铁路行车合同》10 款^⑥，并于同年 8 月 11 日奉旨批准。

《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 450 万英镑，年息五厘九扣，自 1909 年起分 20 年还清，以“该条铁路及车辆料件行车进款”作担保，“如果中国总公司未能按照合同付利还本，比公司或另有比商接替之公司”，得“照顾其一切权利”。《行车合同》则规定比国公司选派人员代为办理调度、经理、行车等事项，“行车合同自签押之日起，以三十年为限”，如借款到时未清，“以展至借款清讫为度”。值得注意的是，借款合同规定：

1. 比公司认购股票之款（除一部分汇交督办铁路大臣和比公司共同指定的银行外）及大部分未认购的本借款股票，均由华俄道胜银行“代为收存”

① 施阿兰：《使华记》，第 188 页。

② “卢汉比款，则因胶州之役，情势变迁，颇欲翻议，又执津镇为言，延不交款，多方要挟。”（《愚斋存稿初刊》，附录，引述，第 29 页）

③ “如此废约，卢汉并归美办，另借五百万镑，悉照粤约。”（《愚斋存稿初刊》，第 31 卷，第 29 页）

④ 《愚斋存稿初刊》，第 32 卷，第 1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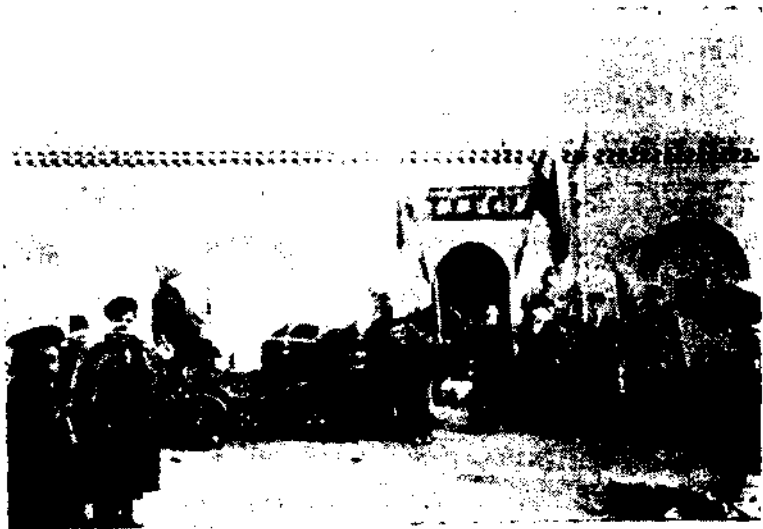
⑤ 李鸿章先后致电盛宣怀说：“美战（指美西战争）难遽停，款不可恃。若比约竟废，必多口舌，慎之”；“似可先画押，再会奏。”（《愚斋存稿初刊》，第 32 卷，第 15 页）

⑥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773—782 页。

(第十八款)：

2. 先由道胜银行，继由中国总公司、比公司公同指定之银行，每月付给中国总公司“敷用之款”。

上述银行并享有在某种情况下“停止付款之权”(第二十款)。沙俄对卢汉铁路的控制，于是得到加强。对此，当时中国的《国闻报》曾正确地指出，中国卢汉一路，“暗受俄人之挟控”。^①



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1899年)

(采自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

英国对于沙俄插手卢汉铁路，把势力向南伸展的企图早有警惕。1898年2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乐要求总理衙门保证长江流域永不割让给他国，以为“防范”。总理衙门随即做了肯定的答复^②。比利时在俄、法支持下提出修改卢汉铁路借款合同的要求后，英国立即出面干涉。

1898年6月9日，即卢汉铁路借款合同签订前不久，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电示窦乐说：英国政府对比利时辛迪加承办京汉线一开始即持有异

①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93页。

②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1号(1899年)，第17-18页。

议；如华俄道胜银行——这家银行等于是俄国政府——出资修筑该路的南段，我们就更加反对。这种性质的让予，已不再是工商企业活动，而是一种反对英国在长江流域利益的政治活动。为此，应该警告总理衙门：“如果在把满洲和山东的特殊利益分别给与俄国和德国的同时，又给予这些国家或其他强国以在长江流域的特别机会或特殊权益，则女王陛下政府不可能在有关中国的事务中，继续以友好的态度进行合作。”^①随后，英国要求清政府保证将长江流域的铁路投资权和修筑权交给英国公司^②。但英国的反对并未见效。

清政府批准卢汉铁路借款合同后，英国十分恼火。8月13日，窦纳乐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说：如果中国政府得不到应有的报复，李鸿章就会使他的同事们相信得罪英国比得罪其他列强安全得多^③。为了发展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侵略势力，并抵制法俄集团的卢汉铁路计划，8月21日他向总理衙门要求修筑天津—镇江、山西（或河南）—长江沿岸、九龙—广州、浦口—信阳、苏州—杭州—宁波五条铁路^④。同时，英国政府扬言准备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9月6日，清政府被迫表示除津镇铁路“允另议”外，同意由英国修筑其他4条铁路^⑤。英国在中国的竞争地位随之获得改善。

《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和《行车合同》的签订是俄法集团的胜利，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写道：“在中国铁路的问题上，法国同它的盟国俄国及其合股人比利时一起，取得了真正突出的地位。这第一次的决定性的战役，对我们来说，是以无可争辩的胜利告终的。”^⑥“合同”批准后的第七天，德皇威廉二世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庆贺说：“你的外交刚刚在中国取得了另一个重大胜利，为此我冒昧地向你庆贺，由于这个胜利的取得没有费一枪一弹，并且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吵嚷，所以我更加为你庆贺。”^⑦

（二）沙俄攫取正太铁路利权

沙俄势力在渗入卢汉铁路的同时，还攫取了该路的重要支线正（定）太

①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1号（1899年），第114页。

② 同上。

③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1号（1899年），第187页。

④ 苏杭甬铁路档，卷1，页4。参见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1953年中华书局出版，第433—434页。

⑤ 苏杭甬铁路档，第7页。参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435页。

⑥ 施阿兰：《使华记》，第189页。

⑦ 歌兹编：《威廉二世致沙皇的函件，1894—1914年》，1920年出版，第311页。转引自菲利浦·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第356页。

(原)铁路的利权。山西省煤铁资源丰富,沙俄与英国都为之垂涎三尺。因此,沙俄获悉清政府批准修筑正太铁路,就抢先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推荐法国工程师越黎从事该路的勘察工作,后又通过买办方孝杰议借华俄道胜银行银680万两承造此路^①。与此同时,为了调整与英国在山西省的利害关系,沙俄又请李鸿章进行调停。1898年4月26日,在李鸿章的衙署,当着他的面,由华俄道胜银行与主要是英国资本的福公司签订了一个瓜分山西省路矿利权的合同,内规定:“福公司不建筑从正定到太原的铁路或在〔该路〕两边各百里内的任何路线,福公司并同意在即将与总理衙门缔结的合同中订明此条”(第一条);“福公司在本约签字日起两年内,设立公司采其所获得的各个矿区前,俄华银行不向中国政府要求山西境内任一采矿让与权”(第四条)。“合同”最后说:“福公司与华俄道胜银行彼此同意,在山西,各在其范围内融洽合作,并在可能时相互支援。”^②这是一个牺牲中国的分赃合同。沙俄通过这个合同,与英国达成了由俄国包揽正太铁路借款权的谅解。但时隔不久,买办方孝杰因“专交通洋人,图饱私囊”^③,被驱逐回籍,清政府宣布其“于定章程,概不准用”^④。沙俄眼看刚抢到嘴边的肉又要吐出,自然不能答应。于是,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与沙俄驻华代办一起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宣称华俄道胜银行与方孝杰所订借款合同“业经山西巡抚遵照奏案批准”,并已报告沙皇政府备案,“断难更改”。在沙俄的压力下,清政府只得将原订合同稍作修改,将“方孝杰订立公司名目,一律删除,统归山西商务局任办”^⑤。

1898年5月,山西商务局与华俄道胜银行正式签订了《柳太铁路^⑥借款合同》,规定:由山西商务局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约合华银680万两,年息6厘,铁路通车后30年内还清;在借款未还清期间,该路沿线“左右各一百里内兴造铁轨路及各项机械运行之路”,“应由商务局稟明山西巡抚立案,概

① 经济研究所藏抄档,邮电路矿类,第7册。参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409页。

② 原件英文,经济研究所藏日文档案。参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419—420页。

③ 经济研究所藏抄档,路电邮航类,第7册。参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408页。

④ 同上书,第412页。

⑤ 同上书,第412—414页。

⑥ 正太铁路东起正定府属之柳林铺,西至山西太原,又称柳太铁路。

不准行”，并由华俄道胜银行派洋员“专任稽查银款，勾稽出入”；自铁路通车至借款还清之日止，30%余利拨归华俄道胜银行；此外，合同还规定：“商务局若不按照定限归本付利，即将此段铁路暂时由银行代管。”^①这样，沙俄通过这一“合同”不仅将获得重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将对这条铁路实行全面的控制。对此，英国自然是不会甘心的。1898年8月，英国要求承建山西（或河南）—长江沿岸一路，正是针对沙俄取得正太铁路筑路权而发的。

当时有人指出，沙俄重视正太铁路，有可能将其往西展筑至西安，然后与俄国中亚细亚的铁路延长线会合^②，从而将中国的西北、华北与东北连成一片，使之成为沙俄巩固的势力范围，并牢牢地控制中国的京城——北京。很难说上述分析是毫无根据的臆测。后来，由于山西省地方势力竭力反对修筑这一条铁路，加以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该路并未动工修筑。1902年10月15日，清政府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盛宣怀与华俄道胜银行重新签订了《正太铁路借款详细合同》^③，借款4000万法郎（原订柳太路借款合同随即作废），沙俄承筑正太路的特权，于是得到确认。

（三）俄、英对关内外铁路的争夺

关内外铁路联结松辽平原与华北平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争夺这一铁路是19世纪末俄、英争夺中国铁路利权的重要一环。这一斗争的实质，在俄国是为了使东省铁路经北京与卢汉铁路相连，在英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插入一个楔子；在英国则是为了阻止沙俄势力南下，并在俄国的禁脔中国东北占一席之地。

事实上，由北京经天津至山海关的关内线，已于1897年建成，因主要借用英款，并由英籍铁路总工程师金达主持一切事务，路权掌握在英国人手里。从山海关向东北延伸直达吉林的关外线，清政府早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即已着手进行，旋因中日战争，“无款停办”，只修了从山海关至中后所的64公里铁路线。1897年，清政府又筹议修至新民屯，并筑沟帮子至营口支线，且设立以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顺天府尹胡燏棻为首的关内外铁路总局，掌管山海关内外铁路的全部事务。

对于关内外铁路的修筑，沙俄一直十分关心。早在1896年初，俄国阿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60—763页。

② 参见肯德《中国铁路发展史》，1907年伦敦出版，第170—171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1982年三联书店出版，第118—126页。

穆尔总督杜霍夫斯科伊就曾赤裸裸地宣称,修筑山海关—沈阳—吉林铁路线“已经出现竞争者了。上帝保佑我们,此线不要落在外国人手里,尤其是不要落在英国人之手!必须把此线包括在我们的租让计划中,并且必须坚持”^①。1897年5月,沙皇政府派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来华,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同李鸿章商谈修筑一条从东省铁路干线到锦州的支线,以与关内铁路相连接。因李鸿章不敢贸然答应,这位公爵的计划落空^②。

1897年7月31日,清帝谕令津榆(山海关)铁路归并津卢铁路,由胡燏棻接续办理,“逐渐展拓,以竟全功”^③。至于关外铁路,清政府显然无钱修筑,但既已设立一铁路总局兼管关内外铁路,则关外铁路的修筑势必由原关内铁路总工程师英人金达负责,并很可能借用英款。对此,沙皇政府十分不安,向清政府提出警告说,锦州迤北一路与俄国计划中的铁路相接,“中国自造准接,若以他国代造,则不准接,英毋庸议。”^④8月17日,俄驻京代办巴甫洛夫又照会总理衙门说:“此工为俄国之要,修造之时,必不能置俄人于度外,应先与俄国相商,择以此路之趋向,何之最便,若借助于俄矿师,更属秉公之道,如有用款,亦可相助觅求”;并强调:“此事于未得本国外部见复之先,幸不定准。”^⑤总理衙门表示拒绝。不久,巴甫洛夫受权又来总理衙门,要求以俄国的工程师取代金达。英国政府立即起而反对,并说:“除非认为山海关向北延展的铁路是一条俄国的铁路,否则俄国便没有理由反对中国政府雇用它所愿意雇用的任何国籍的工程师。”^⑥清政府考虑到撤换金达将引起英国的不满,且改用俄国工程师对中国威胁更大,因此决定不辞退金达,但巴甫洛夫拒不让步。10月18日,他在同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交涉时,公然声称“俄国政府认为与俄国接壤的叫中国各省除俄国外不能置于任何国家的影响之下”;俄国“要驱逐金达,并非因为他是英国人,而是因为他并非俄国人”!^⑦

1898年3月,清政府着手举借外债接造关外铁路,并任用金达为铁路总

① 《红档》杂志1932年第3(总第52)卷,第88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71页。关于乌赫托姆斯基此次来华活动情况,参见法国外交部档案《政治与商务往来文书》,中国,新辑,第165卷,第25—41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407卷,第2页。

④ 《愚斋存稿初刊》,第26卷,第24页。

⑤ 清总理衙门档案。参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第332—333页。

⑥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1号(1898年),第4—5页。

⑦ 同上书,第5—6页。

工程师。巴甫洛夫闻讯后再次要求撤换金达，将他从津榆线上调走，并重申“山海关以北的铁路，应该用俄国的资本和工程师来建筑。”但在英国的干预下，清政府没有答应这一要求^①。

这时，沙皇政府正为强租旅大事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为了缓和同英国的矛盾，决定放弃撤换金达的主张，并指示巴甫洛夫设法收买金达为俄国服务^②。英、俄关于金达去留问题的争辩，于是平息。

不久，沙俄取得了修筑东省铁路南满支线的特权。清政府中部分官员深感俄国威胁太大，力图借英国之力以为牵制。胡燏棻在“请借英款赶办关外铁路片”中说：近已允许俄国接路至大连湾，“奉、吉两省东南之利益，尽为所占”。“现在不得已而思其次，计惟有由大凌河赶造至新民厅，以备联接沈阳之路，并可兼获蒙古、热河一带地方矿务；一面由营口至广宁，庶中国海关不致为俄侵占，尚可保全奉省西北之利，最为要着。倘失今不图，恐数年后，俄必接西北一路，势将全局俱失，榆关门户岌岌可危。”^③

为了实现上述筑路计划，1898年6月7日，胡燏棻与英国汇丰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华银1600万两的《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以整个关内外铁路作抵押^④。签约当天，巴甫洛夫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声称，“这样的抵押违背五月七日由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签署的协定（指“旅大租地续约”——引者）。”对此，总理衙门授权胡燏棻加以驳斥，指出该协定明确规定不包括这条铁路在内。胡燏棻在交涉中“回顾了租借旅顺口后巴甫洛夫在一次会见中所做的明确许诺，即展筑至牛庄的铁路线，不管雇用何国国籍人员或向何处举借筑路借款，将同俄国无关”^⑤。但是，巴甫洛夫不容分说，仍然重复他上次的抗议，并向清政府提出三点要求：

- 一、不得以该铁路抵押借款；
- 二、该铁路将永为中国政府的财产；
- 三、该铁路不得为外国人控制。^⑥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一度想用关外铁路的利权与卢汉铁路利权交换^⑦，

①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899年），第1页。

②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80页。

③ 轨政记要初编，轨7，第62页。参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第326页。

④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67—768页。

⑤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899年），第37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书，中国，第1号（1899年），第161页。

在得知卢汉铁路借款合同业已正式签订后，又转而在关外铁路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7月24日，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宣称：“昨接外部来电，如借英款修路，无论何国与中国有征战之事，英国必愿相助。”“修铁路事，若交英国人办理，后来不论有何国向贵署争论，英国均有办法。”^① 27日，他又照会总理衙门，反对俄国驻华代办提出的三点要求，说：“盖一经照允，实与中英交涉大有关系。今中国既知英国政府帮助中国，转以不允为是。”^②

然而，英国的目的没有达到。在沙俄的坚持下，总理衙门接受了它提出的三点要求，并于8月1日照会英国驻华公使说：“关于铁路借款一事，俄国署大臣与本衙门议明借款不得以此路作押，中国国家嗣后应永为此路之主，无论如何，永不得以此路或此路之段借词托故改为外国人产业，亦不得归外国人经管，亦不准外国人干预铁路相关之事。”^③

为了挽回局面，8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约见中国驻英国公使说：俄国无权抗议汇丰银行对牛庄铁路的抵押借款，“中国对俄国政府的抗议应置之不理”^④。然而木已成舟，除非英国采取极端行动，就难以改变这个既成局面。

前已论及，英国政界对沙俄在中国所取得的进展怀有某种恐惧心理。这一见于俄国占领旅大之后，再见于清政府接受俄国关于关内外铁路的三点要求之时^⑤。加以英国在国际上颇为孤立，这些因素导致英国不愿同沙俄在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倾向于同它达成某种谅解。俄、英关于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谈判和两国在华铁路范围协定的订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二 俄英瓜分在华势力范围和两国在华铁路范围协定的订立

如上所述，早在占领旅大后不久，沙皇政府就急急忙忙地宣布：“中国北部各省，包括全部满洲、直隶及新疆在内，是我们独占的行动范围”，“我们不能让任何外国政治势力侵入这些地区。”^⑥ 俄国的行动引起英国的极大忧虑。据俄国驻伦敦大使斯塔耳报告：当时，“与俄国占领关东地区有关的那

① 苏杭甬铁路档，第1卷，第1页。参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第33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档案，第3页。参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第337页。

④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899年），第5页。

⑤ 《红档》杂志1927年第6（总第25）卷，第119页。

⑥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210页。

种恐慌笼罩着伦敦政界”^①。为了阻止沙俄南下侵入英国的势力范围，1898年1月17日，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指示驻彼得堡大使欧格讷询问维特，“两国在中国是否可以合作”，并告诉他，“我们双方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严重抵触的程度。然而，我们彼此都能给对方造成巨大损失，如果我们要这样做的话。因此，双方最好能取得谅解。如果我们觉得俄国愿意合作，我们是能够对俄国发展在中国北部的贸易尽力帮助的。”^②

这时，俄国正谋求同清政府缔结旅大租地条约，为减少来自英国的阻力，也表示愿意同英国谈判。随后，英国建议以黄河以北为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并主张划分在华势力范围必须同划分中近东势力范围一起考虑。这就是说，英国企图借此全面调整与俄国的关系，而不限于中国问题。但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坚持“目前我们同英国的谈判只能涉及远东问题”^③，因而在谈判的范围问题上同英国发生了根本分歧。

在中国问题上，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认为，同意英国的建议“乃是上策”，因为这将使俄国“在直隶湾内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可以排除英国对中国北部事务的任何干涉”^④。他在1月19日对欧格讷说：“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实际上是从天津到北京，从北京到满洲的整个中国北部。”^⑤1月22日，维特会见欧格讷，重申由于地理位置，“迟早必能确保俄国在中国北部的优势”；谈话中，他“从仔细锁着的书桌里拿出一幅中国地图，先是用手指着直隶、山西、陕西和甘肃等省说，俄国很可能迟早会合并所有这些地方。然后他用手指指着兰州说，西伯利亚铁路总有一天会修一条支线通向这个城镇，而且他已经掌握了关于这条支线的距离、修建费等方面的细节”^⑥。同时，维特表示：“如果英国不妨碍俄国在（中国）北方的目标，他将支持英国的现实商业政策，他认为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当然的势力范围。”^⑦

看来，俄、英瓜分在华势力范围的想法似乎相当接近。穆拉维约夫在2月14日呈报沙皇的一份节略中说，“英国恰如其分地确认了我们在中国北部

① 《红档》杂志1927年第6（总第25）卷，第119页。

②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1卷，第5页。

③ 《红档》杂志1927年第6（总第25）卷，第116页。

④ 同上书，第115页。

⑤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1卷，第6页。

⑥ 同上书，第8页。

⑦ 同上书，第7页。

占据优势地位的权利,因此,我们准备承认英国在南方的势力。”^①同一天,欧格讷向俄国政府递交备忘录,列举英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一些基本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长江流域的任何部分不割让给他人^②。但是,俄、英两国在世界范围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诸如波斯问题、阿富汗问题、争揽对华贷款权问题以及旅大问题等,双方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因而这次谈判未取得什么结果。

不久,关内外铁路问题又成为英、俄两国在中国争夺的爆发点。以此为契机,1898年8月12日,英国代理外交大臣巴尔福在会见俄国驻英代办雷萨尔时,要求与俄方就划分在华势力范围问题重开谈判^③。谈判中,雷萨尔坚持山海关—牛庄铁路不能抵押给英国汇丰银行,并说:如英国不再坚持原有主张,同意由另外的财源支付银行的贷款,则俄国不再反对建筑这条铁路,并同意不在长江流域谋求租让权,同时英国也不得在中国东北地区谋求租让权^④。8月18日,英国驻俄大使斯科特往晤穆拉维约夫,表示赞成雷萨尔的建议^⑤。由于这时清政府已批准“卢汉铁路比国借款合同”,沙皇政府认为通过卢汉铁路向华北和华中地区伸展势力有了指望,所以临时改变态度,不愿与英国立即达成妥协。为此,穆拉维约夫冷淡地回答说:“雷萨尔的建议纯粹是他个人的建议”,“目前最好是哪一方面都不要作肯定的建议。”^⑥

在此期间,英国与其他列强关于划分在华铁路利权范围的谈判也在进行。9月2日,英、德两国银行团正式签订协定,确定了各自在华的利益范围。英国与美国关于划分中国铁路利权的谈判也有进展。英国与德、美在华矛盾的缓和,使沙皇政府不能不有所顾忌。与此同时,英国认定在关外铁路问题上俄国不可能让步,也改变策略,提出以山海关—天津—北京铁路作为向清政府贷款修筑山海关—牛庄铁路的担保^⑦。这不能不说是英国的让步。沙皇政府对此感到满意,9月10日,外交大臣致电巴甫洛夫说:“鉴于这条路原本就在英国人手中,看来没有理由不同意伦敦内阁的建议,以结束所有

① 《红档》杂志1927年第6(总第25)卷,第11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20页。

④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898年),第7页。

⑤ 同上书,第12页。

⑥ 同上。

⑦ 《红档》杂志1927年第6(总第25)卷,第121页。

的争吵。”^①同日，俄国外交大臣奏报沙皇说：“显然，我们没有理由指望以更有利的条件同英国在牛庄铁路问题上达成协议。”沙皇表示同意^②。俄国外交部于是建议就此问题起草照会文本，以便双方互换。

但是，英国的意图不仅是要讨论关内外铁路问题，它向俄国说明，铁路租让问题不能同俄、英两国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总问题分开，它希望以山海关—牛庄铁路问题上的让步，促使俄国和它就一切在华利权问题达成一揽子交易。为了消除俄国的疑虑，9月21日，斯科特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协定草案：

一、修筑山海关—牛庄铁路，可利用汇丰银行贷款，但该路应永为中国的铁路线，并置于中国人监督之下，不得抵押给任何非中国的公司。

二、俄国政府承担义务不在长江地区为俄国或俄国臣民谋求任何铁路租让权，并且不直接或间接阻挠为英国政府支持的在上述地区申请铁路租让权的活动。

三、英国政府承担义务不在满洲为英国或英国臣民谋求任何铁路租让权，亦不直接或间接阻挠为俄国政府支持的在上述地区申请铁路租让权的活动。

四、上述铁路租让不得含有任何有利于获得租让权国家的铁路优惠运价或客、货运特别税率的规定。

五、两国政府将本协定通知本国驻华代表，由后者提出建立同中国铁路租让有关的英俄两国银行、辛迪加之间的联系，并促使其与两国政府的行动协调一致。^③

对于英国的这个照会，俄国财政部和外交部之间的意见不一。财政大臣维特认为，对俄国最为有利的是在远东保持完全的行动自由，而英国提出的协议草案“实际目的只是扩大英国的利权，尽可能限制俄国的利权，且不给它任何补偿”：

一、根据草案，列入英国铁路建筑范围的是长江地区，面积有 3.6 万平方英里^④，列入俄国铁路建筑范围的是满洲地区，总面积只有 1.7 万平方

^① 《红档》杂志 1927 年第 6（总第 25）卷，第 121 页。

^② 同上。

^③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 2 号（1899 年），第 23—24 页；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84 页。

^④ 旧俄 1 英里等于 7.42 公里，1 平方英里等于 55.0564 平方公里。3.6 万平方英里约等于 198 万多平方公里。

米里亚。前者大于后者逾两倍,而且,其居民多得多,也富裕得多。

二、草案关于铁路运价及差别税率的规定,显然是为了使俄国根据“东省铁路合同”所享有的关税和运价的优惠化为乌有。

三、根据“旅大租地续约”,俄国已经取得了在整个东省铁路区域内不向其他外国人提供任何铁路租让权的保证,协议草案关于英国不在满洲谋求这种租让权的承诺,并不能给予俄国任何新的优惠,况且那个草案还隐含着由英国掌握山海关—牛庄线的目的。

此外,维特认为草案限制了华俄道胜银行的活动范围,因此,“对于俄国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利的”^①,“从经济观点看来”是“不可行的”和“极有害的”^②。

维特的上述意见,实际上是拒绝同英国达成妥协。但是,形势于维特不利。一方面,这时俄国国内发生了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尖锐;另一方面,中国亲俄派大官僚李鸿章于9月被贬,清政府对沙俄势力南下的戒心增大,不愿借俄款建筑关外铁路,而倾向于借英款。10月10日,中英签订北京至牛庄铁路正式借款合同,规定该路“永远为中国产业,无论何国不得借端侵占”;但在借款期内,总工程师应任用英人,铁路办事负责人员及司账均由欧洲人充当,以“督理”该路的建造和款项的使用;新线建成后的运价进款应首先用于归还借款^③。这样,英国取得了对该路的一定的控制权。

英国的成功引起了俄国的嫉恨,为此,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向总理衙门提出了抗议,但反应甚微。这种局势迫使俄国政府重新考虑维特提出的“高要求”。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得出结论说:“在目前政治条件下,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在远东问题上同英国达成亲善协议。”^④ 1899年1月8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也写信责备维特说:“去年以来,华俄道胜银行就已大力扩展它的活动。因为这家银行是由俄国政府负责的,我们可能被迫在长江中游(到汉口)和下游(到镇江)的租让权方面,或正定府和太原府之间的租让问题上卷入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件中去。满洲同俄国有着几千俄里的共同边界,我明白有必要保卫俄国在满洲的利益,但是,要求用俄国人的鲜血去保

①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84-86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17页。

③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899年),第29—32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831—832页。

④ 《红档》杂志1927年第6(总第25)卷,第125页。

护华俄道胜银行在长江流域或北京以南地区的利益，我认为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而且对俄国是极其危险的。”^① 由于维特的主张受挫，俄国的目标也就回到上年 9 月 21 日的英国草案上来。1 月 27 日，外交大臣启奏沙皇说：“我们唯一的出路，是采纳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六日^②英国照会中所陈述的关于彼此划分在华铁路租让权的最初建议。按照我们的地图方案，这至少可以保证我们在中国北方，主要是在满洲的绝对影响。”^③ 至于英国同清政府签订“山海关—牛庄铁路借款合同”的问题，沙俄也决定不再同英国争论，而是“逼迫中国政府对俄国作出相应的补偿”^④。

2 月 7 日，穆拉维约夫照会英国大使，要求重新讨论 1898 年初的英国建议，首先在关于修筑和经营中国铁路的问题上达成如下协议：

“一、俄国不阻挠英国在长江地区的任何铁路事业；

二、英国也不阻挠俄国在长城以北地区的铁路事业。”^⑤

显然，这个照会只表示彼此互不反对对方在划定的势力范围内的铁路投资，对于一方可否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进行铁路投资的问题则只字未提，而这恰恰是英国所十分关心的。为此，英国提议必须明确规定各自不得在对方势力范围内进行铁路投资。沙俄对此做了让步^⑥。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同意沙俄将其势力范围由中国东北地区扩展到整个长城以北，并表示在协议中不再提出铁路运价和税率问题。在北京至牛庄铁路正式借款合同问题上，沙俄也对英国做了让步。1899 年 3 月 6 日，穆拉维约夫遵奉沙皇谕令指示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通知英国公使：“俄国并不反对缔结为建筑这条铁路提供英国借款的合同，而是要使中国政府注意其不遵守对俄协定的倾向。”^⑦

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1899 年 4 月 28 日，俄、英两国终于以互换照会和补充照会的形式正式订立了铁路范围协定，主要内容是：

一、英国不在中国长城以北、俄国不在长江流域谋求铁路租让权，同时英国不阻挠俄国在长城以北、俄国不阻挠英国在长江流域对铁路租让权的任何要求。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226 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② 原文如此。据前引《英国议会文书》，应是公历 9 月 21 日。

③ 《红档》杂志 1927 年第 6（总第 25）卷，第 125 页。

④ 同上书，第 126 页。

⑤ 同上书，第 127 页。

⑥ 参见《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 2 号（1899 年），第 74 页。

⑦ 同上书，第 70 页。

二、上述总的安排不应侵犯英国根据“北京—牛庄铁路借款合同”所享有的权利，意即俄方同意由英国贷款并由英国人负责建造这条铁路，但“该路仍为中国铁路，由中国政府管理，不得抵押或让给非中国人的公司”。此外协定还规定：从小黑山到新民屯的支线，“应由中国自行建造，中国可以聘用欧籍的——不一定是英籍的——工程师定期视察该路，以检验工程的正常进行”。作为“补偿”，“协定”规定，俄国政府有权支持俄国臣民或机关申请铁路租让权，建造由满洲铁路干线西南行、穿越中国新民屯和牛庄铁路所在地的铁路^①。

俄、英铁路范围协定是在牺牲中国的基础上签订的，实质上是“俄英瓜分中国的协定”^②。但该协定却冠冕堂皇地写着：双方无意侵犯中国主权，这一协定必将“巩固远东和平并符合中国的最基本的利益”！^③在这里，宰割中国的强盗行径被说成是维护和平和于中国有益的正义事业。这是十足的伪善。

总理衙门在得到两国有关的通知后，曾于5月22日分别照会俄、英两国公使，郑重宣布：“扬子江一带，长城以北，乃中国土地，权在自主。”“将来中国设或欲作某处铁路，应由中国自主。即某国愿意承办何处铁路，亦应听中国商明准驳，方于自主之权无损，自不得以贵国与某国自行商议之事，作为中国允许之据。”^④但是，俄、英帝国主义对这个申明竟不予置理。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斯密电沙皇政府说：“对中国的答复将不予书面批驳”，“一当有方便的机会，就重新向中国大臣们申明，长城外的中国无疑包括在我们的利益范围之内。”^⑤这就是俄国的态度。

通过俄、英铁路范围协定，沙俄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全部目标，但是它仍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一、由于这个协定，它在“长城以北”即在整个满洲和蒙古的利益范围，头一次在国际上得到了自己的“最大的敌人”英国的承认^⑥。

二、它在中国东北地区关税方面和铁路运价方面没有向英国承担任何

①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899年），第90页；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86—87页。

② 《红档》杂志1927年第6（总第25）卷，第111页。

③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899年），第90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8卷，第25页。

⑤ 《红档》杂志1927年第6（总第25）卷，第128页。

⑥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23页。

义务。

三、它已获得英国认可，有权要求中国给予建筑 and 经营由东省铁路“西南行”的铁路支线的让与权，这就是说，俄国可以从东省铁路干线向西南修筑支线，穿越英国控制的关外铁路区域。

俄国驻伦敦大使馆参赞雷萨尔直认不讳地写道：这个协定对俄国“是最为有利的”。“以我们目前的财政和经济状况而言，在今后若干年内我们还不能在那里（指长江流域——引者）开展自己的活动；当务之急是在满洲集中我们的力量，不仅为了完成经济的任务，而且，主要地为了完成我们在那里的迫切的政治任务”。不仅如此，这个协议还使英国人“失去了在北部中国拥有铁路的权利，而舍此，他们的所有其他活动和租让权就永远只能是商业性质的，对我们没有危害，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具有政治的意义”。因此，这个协定“大大束缚了英国人的手脚”，同时却使俄国“保持了同中国政府自由交往的充分权利”^①，即任意压迫、宰割中国的权利。

应当指出，英、俄铁路范围协定是这两个殖民帝国在华侵略势力相对平衡的产物。这个平衡是不稳定的、暂时的。为了从政治上控制中国的京城——北京，英俄协定成立后仅两天，东省铁路公司董事会驻京代表就迫不及待地向清政府要求建筑 and 经营从东省铁路某站至北京的铁路支线，声称俄国政府不能容忍英国人在直隶省占有优势，“不得不为平衡局势寻找出路”；并说，提出“新线的要求也是从中国本身的利益出发的，因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目前对英国处于毫无防御的状态”^②。也就是说，沙俄勒索由东省铁路干线到北京的铁路租让权，是为了帮助中国抵御英国的侵略！这与当年沙俄借口帮助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向清政府勒索东省铁路租让权，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政府鉴于该路直抵京畿，为害至大，起先没有答应。但为时不久，又屈从了俄国的要求。1899年6月1日，总理衙门照会俄国公使说，中国政府认为：“将来如添造铁路，由北京向北或向东北俄界方向，除用中国款项及华员自行造路不计外，设或有托他国商办造路之意，必应将此意先与俄政府或公司商议承造，而断不允他国或他国公司承造之。”^③于是，俄国取得了承

① 《红档》杂志 1927 年第 6（总第 25）卷，第 130—131 页。

②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88 页。

③ 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编》，第 5 册，1935 年出版，第 3516 页。

建由东省铁路通往北京的铁路线的优先权。

英国担心这条铁路可能使京奉铁路遭到破产，向清政府表示关切此事。6月8日，总理衙门向英国保证：“中国政府业已决定，设或俄国公使再度提出要求，将坚决予以拒绝”^①，英国这才罢休。其实，当时东省铁路干线和南满支线，正在紧张施工，沙俄暂时无力承造此铁路，因此决定推迟承建日期，而不放弃这项要求。正如7月7日俄国驻华公使的一份报告所述：“我关于该路的谈判只能达到一种成果，即中国给与我们租让权的问题将始终保留在议事日程上，从而，一旦帝国政府认为时机成熟，便可以更加苛刻的方式提出我们的要求，使它能够比较容易解决。”^②这个问题也就这样暂时拖延了下来。不久，中国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沙俄乘机出动大批侵略军独占了我国东北地区，并抢占关内外铁路，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随之出现了新的局面。

^①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1号（1900年），第132页。

^② 《红档》杂志1927年第6（总第25）卷，第130页。

第二章

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对中国的侵略

第一节 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残酷镇压 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

一 阴险狡猾的侵略方针

1900年春爆发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直接产物。关于这次运动的起因，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说过这样一段话：“列强开始掠夺中国，它们那样推论：既然俄国可以自行占领旅顺口和关东半岛，那我们为什么不同样去占领呢？——于是列强开始强占中国另外一些港口，并以强迫相威胁，向中国索取各种让与权。”他接着承认：“对中国的这种掠夺刺激了当地居民，发生了义和团暴动”，“这是穆拉维约夫所提出的掠夺中国领土政策的结果。”^① 维特的这段话虽然怀有攻击政敌的动机，而且把自己粉饰得一千二净，然而却道破了一个事实：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引起的，而俄国，正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始作俑者。

义和团运动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指向包括沙俄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是理所当然的，这引起了列强对义和团的极端仇视。当时清政府内部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出现了剿、抚两派的激烈斗争。沙皇政府从自己的侵略利益出发，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力图胁迫并假手清政府，把义和团运动扼杀在摇篮里。

1900年4月，义和团运动延烧到京郊，沙俄驻华公使格尔思感到“情况十分严重”，于同月15日假惺惺地对总理衙门说，其他列强准备举行海军示

^①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57—158页。

威,派兵来华,俄国“诚意警告中国,希望不致产生类似后果”,并“劝告总理衙门要不失时机,在义和拳尚未坚固和尚未在集结于北京周围的大队士兵中获得信徒之时,将他们强力镇压下去。”^①第二天,总理衙门电直隶总督裕禄称:“查拳会渐及近畿,早有所闻,俄使所言,不为无因。此事关系紧要,务须赶紧严密查办,免滋事端。”^②但是清政府的防范未能奏效,义和团反帝斗争的烈火从畿辅烧到了京城。5月15日,格尔思再次警告总理衙门说:“各国政府以为中国自己不能管辖其民,势必派兵来京,自行保护。……中国现在如不赶紧设法,严禁拳匪,恐貽后患。”^③格尔思装得对清政府关怀备至,似乎俄国不忍看见各国派兵来京,扰乱中国,其实是借刀杀人,企图假手清政府来镇压义和团;与此同时,他又背地加紧勾结其他国家的驻华使节,策划对中国实行武力干涉。5月19日,格尔思电请本国政府从旅顺口派军舰将陆战队送到秦皇岛,以便必要时召来北京^④。20日,俄国公使与英、美、德、法、日等11国驻华公使举行会议,决定向总理衙门联合提出严厉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六项要求^⑤,各国舰队很快集中到大沽口,战争一触即发。

当时俄国在旅顺口驻有1.2万名正规军,逼近京师,朝发夕至。旅顺俄军当局得令后,于5月22日已做好派遣陆战队的准备。5月30日,俄国分舰队将陆战队运往大沽^⑥。第二天,75名俄军同其他国家的陆战队一起开往北京^⑦。

各国陆战队的进驻北京,激起义和团的坚决反抗。清政府内部对义和团剿、抚两派的分歧愈益尖锐。6月4日,西太后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翹赴涿州察看义和团。赵舒翹力主招抚。义和团趁机将势力发展到北京城内,将各国派来的陆战队围困在使馆区。格尔思见清政府镇压义和团无望,遂于6月7日和9日两次致电彼得堡,强调“公使们在北京的作用已经结

① 《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10页。

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79页。

③ 同上书,第99页。

④ 《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11页。

⑤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3号(1900年),第273件,附件6。

⑥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1902年彼得堡出版,第1编,第1册,第1—2页。

⑦ 杨切维茨基:《在停滞不前的中国的城墙下》,1903年旅顺口出版,第7页。

束,事情将转移给海军将领们”,请求迅速派大军来华^①。6月12日,俄国陆军部奏请尼古拉二世批准,命令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从旅顺口向大沽派出4000俄军^②。

6月10日,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纠合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约2000人,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攻。列强对义和团的血腥屠杀宣告开始。这时,关于联军统率权的问题突出地提上列强的议事日程。16日,阿列克谢耶夫致电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建议对中国“采取坚决措施”,并任命一名兼有军事指挥权和外交权的全权代表,以便“与正竭力要支配列强的一切活动的西摩尔海军上将相抗衡”^③。阿列克谢耶夫所谓的“坚决措施”,就是集中兵力进攻北京,他所要求任命的“全权代表”,就是他自己^④。

但是,当时沙皇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俄国利益比较集中的中国东北三省。在这里,贯穿全境的东省铁路及其支线尚未竣工;当地义和团运动还未形成对沙俄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沙俄还指望东北地方当局来遏制运动的继续发展。同时,沙皇政府希望保留中国“盟友”这副假面具,以便日后捞取更多的好处,逼使清政府加倍报答俄国的“友谊”。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穆拉维约夫在接到阿列克谢耶夫电报的第二天即上奏尼古拉二世,明确主张俄国“决不应把各国联军的统率权操在自己手中”,也就是不充当联军统帅,不公开领导对华作战。同一份奏折中还指出,华北的俄军有4000人,非经俄国同意,列强“不可能采取任何有效的政治措施”^⑤,意即俄国可以凭借实力与其他列强抗衡,保持行动的独立性,不必听从它国指挥。奏折当即得到沙皇的批准。穆拉维约夫随即电告阿列克谢耶夫说,俄国的对华政策与其他国家“不同”,俄国的利益要求在“暴乱”停止以后和清政府恢复“最友好的关系”;俄国“决不应使列强的总兵力集中指挥,更不能把这种领导权让给任何一国的军事指挥官”,但是俄军应该同其他国家的军队“协调一致”^⑥。6月28日,代理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更加明确地说:俄国“不和其他国家分开”是为了“密切注视他们的行动,并能随时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应

① 《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12、14页。

②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1册,第3页。

③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8页及注①。

④ 同上。

⑤ 《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14—15页。

⑥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20页注①。

当避免使俄国的“行动自由受到任何束缚”，“或使中国人发现俄国怀有敌意的任何证据”。^①这就是说，沙俄既要与其他国家合伙打劫，共同宰割中国，又不受其他国家的任何约束；既要从中国获得最大的侵略利益，又不愿名义上充当联军魁首，以便把自己继续装扮成中国的朋友。这一方针，充分暴露出沙俄外交极端阴险狡诈的特性。

为了保证侵华意图的实现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争夺，沙俄从6月中旬起加紧向华北调兵遣将。从大沽炮台陷落到北京的占领，俄军在联军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俄军将领在一些大的战役中实际充当了组织者和指挥者。

二 组织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和天津

当西摩尔率联军向北京进攻时，沙俄决定向华北派出的4000俄军尚未到达，只有300余名俄军随西摩尔西进。在此情况下，沙俄便急忙把军队运往天津。

6月11日，阿尼西莫夫上校率首批俄军两个步兵营，带4门大炮和一排工兵、一排哥萨克骑兵，共约2000人，从旅顺口起航，驶往大沽^②。临行前，阿列克谢耶夫签署了给直隶总督裕禄的通牒，要求给俄军以登陆方便^③。裕禄未能阻止，阿尼西莫夫顺利登陆。12日，俄军进驻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控制了交通线^④。

西摩尔率联军进犯北京，以及大批沙俄侵略军进驻天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仇恨。天津地区的义和团奋起打击侵略者。6月16日凌晨，阿尼西莫夫指挥老龙头车站的俄军与盘踞在天津租界的各国侵略军一起向义和团开炮，使义和团遭受大量伤亡。以曹福田、韩以礼为首的静海义和团和以刘十九、杨寿臣为首的天津义和团联合起来，进攻火车站和租界，给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清政府为保证京、津安全，决定不再允许各国军队在大沽口登陆，同时调集军队，加强大沽炮台的防卫。沙俄为使大批侵略军能继续迅速运送京、津地区，扩大对华侵略，便策划攻占大沽炮台。阿列克谢耶夫6月15日给俄国总参谋部的电报说：“在大沽炮台一带，中国军队活动频繁，正在设水

① 《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16页。

②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2编，第1册，第2页。

③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6—17页。

④ 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第1卷，1901年伦敦出版，第130—140页。

雷障碍和集结军队。鉴于此种情况，我认为有必要建议分舰队的长官同各国外国海军将领一起占领炮台，以便保障交通联络。”^①



在大沽登陆的沙俄侵略军（1900年）

（采自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

同一天，俄国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根据彼得堡的旨意，在巡洋舰“俄罗斯号”上召集并主持了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制定攻占大沽炮台的作战方案，决定先把300名日本海军运往东沽，作为进攻炮台的先头部队。第二天上午，基利杰勃兰特又召集第二次各国海军将领会议进行策划。会上决定向大沽炮台守将与直隶总督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方面于17日凌晨二时以前把大沽炮台交出，否则用武力攻占^②。最后通牒由基利杰勃兰特领衔，法、英、德、日、意、奥等国海军将领或舰长署名^③，于当日傍晚由俄国海军少校巴赫麦季耶夫送往大沽，递交炮台守将罗荣光。罗荣光表示，没有直隶总督的命令，绝不交出炮台。巴赫麦季耶夫蛮横地说：“中国意见，各国均已看破，不得强词掩饰，如两点钟不交出营台，定即开炮轰夺。”^④与此同时，另一名俄国海军军官前往天津，把内容相同的最后通牒通过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交给直隶总督裕禄；通牒“标二十（日）发，二

①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2编，第1册，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1编，第1册，第13页。

③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1号（1901年），第196号文书附件。

④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4—165页。

十一日卯刻始行送到”，“文到已逾时刻”^①，使裕禄措手不及。

罗荣光收到通牒，一面派专差飞报天津，一面严令各营“加意备战”^②，但为时已晚。

早在基利杰勃兰特发出最后通牒之前，各国海军将领已做好武力夺取炮台的部署。16日，基利杰勃兰特在俄舰“海龙号”上召开了最后一次各国海军头目的会议，详细拟定了攻打大沽炮台的具体方案。当天下午3点，各国舰队共派出水兵935人（其中沙俄侵略军150人）登陆，准备从水陆两路攻打大沽炮台^③。黄昏以后，联军炮艇偷偷于炮台内侧进入阵地。

16日午夜，敌舰队在俄国舰长多勃罗沃利斯基指挥下，集中炮火，向南北炮台发动猖狂进攻。炮台守军开火自卫，重创敌舰。各国来犯舰船共6艘，其中俄舰3艘，均被击伤：“基利亚克人号”中弹4次，下沉搁浅，死伤54人；“朝鲜人号”中弹起火，死伤26人；“海龙号”也有伤亡^④。其他侵华国家的舰只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联军在海陆作战中共死伤255人，占来犯者总人数的28%，其中俄军共死伤87人^⑤。但罗荣光仓促应战，又得不到裕禄的支援，最后南北几个炮台的火药库相继中弹爆炸，敌人水陆夹攻，炮台于6月17日晨6时30分失守。

攻占大沽炮台是联军侵华战争中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战斗。沙俄在这次战斗中自始至终充当了组织者、指挥者和主力军。1935年，苏联出版的一部《俄国军队史》记述俄军在此次战斗中的作用时指出：“那时，接替西摩尔的俄国海军将领基利杰勃兰特决定占领封锁着白河口的威力强大的中国大沽炮台。”“夺取炮台时，在陆上和海上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俄国人——炮艇‘基利亚克人号’和‘海龙号’以及首先冲进炮台的斯坦克维奇中尉率领的第十二西伯利亚团混成连。”^⑥

大沽口是京、津的门户。联军占领大沽炮台，为进攻京、津铺平了道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页。

② 同上书，第165页。

③ 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115页。杨切维茨基：《在停滞不前的中国的城墙下》第172页记载：从各国舰船上派出登陆的各国侵略军共935名，其中沙俄侵略军168名。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一（《北清事变》上册），第632页；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120页。

⑤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289页；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藏：《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1册，第15页。

⑥ 克尔斯诺夫斯基：《俄国军队史》，第3卷（1881—1917年），1935年出版，第528页。

路。中国各阶层无不感到民族危亡的严重威胁。6月21日，清政府被迫发布宣战上谕。义和团共约2万余人，纷纷奔向天津，投入了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同时，清军爱国官兵也奋起抗战。

在6月17日大沽失陷的当天下午，清军聂士成部炮击天津租界，向盘踞在那里的各国侵略军发起攻击。与此同时，义和团和清军进攻老龙头火车站的俄军^①。俄军四面被围，弹药行将告罄，指挥官阿尼西莫夫上校派人赴大沽求援^②。21日，沙俄援军搭乘的火车被义和团设障倾覆，援军被阻；另一路500名俄军在军粮城附近遭义和团伏击，受重创后被迫退却^③。从17—23日，被困在火车站和租界的俄军，在中国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处境十分狼狈；一个亲历此境的俄国外交官说，如果中国人攻取火车站，使租界变成与外界断绝联系的孤岛，那么俄军“就只好投降了”^④。

6月23日，旅顺口俄军当局紧急派出斯捷谢利率领2000俄军进入天津，与阿尼西莫夫所部会合后占领白河左岸，俄军猛增至4000人；其他各国侵略军约2500人占领白河右岸的租界区^⑤。斯捷谢利的到达，改变了各国侵略军的被动局面，并使俄军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占绝对优势，从而取得了指挥者的地位。英国海军将领卜鲁斯当天的电报说：“联军海军将领公推以俄国海军中将为首席司令官”，“由于海军将领会议对一切战事行动有最高决定权，为了避免摩擦的发生，陆战部队的指挥官也应当与海军将领会议主席，即首席舰队司令为同一国籍。如目前情况，当为俄国人。”^⑥其他各国将领也赞成卜鲁斯的主张。于是，当时无论是大沽口的各国海军，还是天津地区的登陆部队，均由俄国军官充任指挥官。

6月24日，西摩尔败退天津，占领西沽武库，被清军和义和团围困，面临灭顶之灾。斯捷谢利立即派希林斯基上校率领以俄军为主力的2000余人的队伍前往救援，使西摩尔得以冲出重围，于26日逃回天津租界^⑦。被围困在租界里的侵略者，也由于俄军的到来而免于被歼的厄运。其中一个活下来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16页。

②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23页。

③ 吉普斯：《华北作战记（至天津陷落）》，1901年伦敦出版，第40页。

④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23页。

⑤ 吉普斯：《华北作战记（至天津城陷落）》，第53页。

⑥ 同上书，第37—38页。

⑦ 西摩尔退到天津时，所率联军死伤289人，其中俄军死10人，伤27人。参见《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3号（1900年），第219号文件。

的侵略者说,他们“能保住性命一事应该归功于俄国人”^①。

西摩尔远征失败后,列强加紧调兵遣将,继续筹划攻取津、京。6月27日,尼古拉二世授予阿列克谢耶夫战时独立军团司令的权力^②,责成他独立指挥南满和华北地区俄军对华作战。阿列克谢耶夫受命组成野战司令部,第二天乘军舰赴大沽^③,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与此同时,大批俄军从旅顺口源源而来。至6月30日,天津地区的俄军增至5900余人,占全部联军的42%^④。

在阿列克谢耶夫到来之前,斯捷谢利指挥2000名俄军攻下了北洋机器局(东机器局)^⑤。但清政府从山海关和芦台调来援军,加强了对火车站和租界里沙俄等国侵略军的攻势,联军每天都有伤亡。阿列克谢耶夫到达后,先将司令部设在塘沽,后来为了就近指挥战斗,又把司令部搬到天津城郊^⑥。他一到天津,“立即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⑦7月9日,俄军伙同其他国家的军队攻占了西机器局,迈出“攻占天津城的第一步”^⑧。

12日,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电示阿列克谢耶夫,“为占领天津城和中国人的炮台,并彻底打垮天津四郊的中国人”,至少要集中12个步兵营、3个炮兵连和配有臼炮的攻城部队,要求他一定要集中兵力,并指定利涅维奇全面指挥天津战役^⑨。当天,阿列克谢耶夫召集在天津的各国司令官开会,决定第二天早晨攻打天津城。日、英、美、法、奥侵略军,由日军少将福岛指挥,进攻天津南门,俄军担负具有决定意义的扫除天津外围的任务。战斗于7月13日凌晨四点半开始,阿列克谢耶夫亲自带领沙俄侵略军四大队,野战炮兵两中队,共2600人,进攻芦台运河堤岸上义和团与清军的阵地。另有德、法军队3000人,由俄国军官斯捷谢利统率,作为后援部队。沙俄侵略军在白河左岸镇压了义和团和清军爱国官兵的抵抗之后,夺占了黑炮

① 古普斯:《华北作战记(至天津城陷落)》,第45页。

②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1册,第29页。

③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24页。

④ 古普斯:《华北作战记(至天津城陷落)》,第48页。

⑤ 同上书,第45页。

⑥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28页。

⑦ 克尔斯诺夫斯基:《俄国军队史》,第3卷(1881—1917年),第528页。

⑧ 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176页。

⑨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2编,第1册,第107页。

台，使天津城失去最有力的火力支持，而陷于孤立地位。福岛率联军进攻天津城，集中全部大炮猛烈射击，顿时平原上空硝烟弥漫，城内烈焰冲天^①。中国军队进行了一整天的英勇抵抗，当晚守将裕禄、宋庆、马玉昆等撤往北仓。义和团继续守城。14日，天津城南门为日军轰塌，义和团血战后撤走，天津城为联军占领。

天津城保卫战，因敌人的压倒优势而失败了。但中国广大军民的英勇抵抗沉重地教训了侵略者。联军参战兵力共8000人，伤亡约900人（其中俄军180人），死伤占总数的11%。联军攻占天津后，俄军占领了天津富庶的东北郊地区，继续镇压义和团的反抗，并策划在天津建立殖民统治机构，将无数中国人民投入血海。

三 参加联军攻占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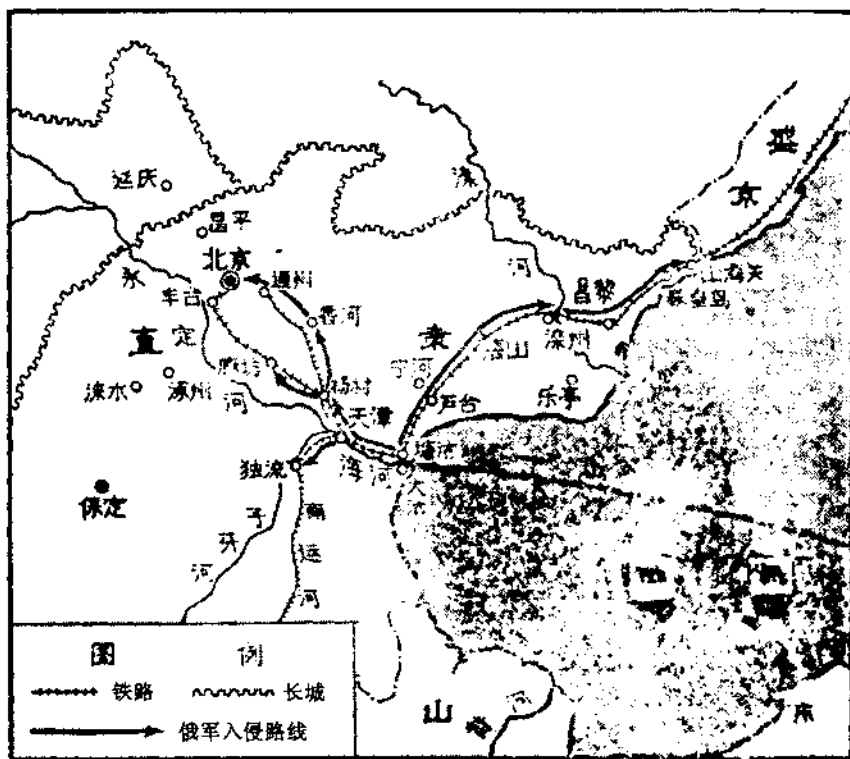
在天津即将陷落之际，库罗巴特金声称：对俄国重要的是向前推进，攻占北京^②；接着，他要求沙皇命令阿列克谢耶夫做好随时向北京进军的准备^③。这时，尼古拉二世正发兵大举侵犯中国东三省，难以向直隶地区增兵，单凭集中于天津的兵力尚不足以担当进攻北京的任务；同时，俄国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指望通过乌赫托姆斯基和李鸿章举行秘密谈判，撇开别国单独与清政府达成协议，表示“不应急于向北京进军”^④，以便继续扮演“中国救星”的角色，他们估计，直隶地区的雨季结束前联军不会进攻北京，在此期间，用什么方法“平息”义和团“暴乱”，控制北京，俄国尚有选择的余地。但是，联军占领天津后不久，英、日、美等国提议不等雨季过去，立即向北京推进。在7月下旬到8月初联军召开的几次会议上，他们一再坚持己见。沙俄既无法阻止其他列强进军北京，又不甘心独自落人之后，加以乌赫托姆斯基来华尚需时日，中俄谈判不能很快开始，不战而控制清廷的计划无法迅速实现，便决定与其他列强采取共同行动。8月1日，库罗巴特金遵照沙皇的旨意，任命陆军中将利涅维奇为直隶地区俄军司令，并指示他参与占领

① 吉普斯：《华北作战记（至天津城陷落）》，第59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56页。

③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1册，第73号文件。

④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57—258页。



1900年俄军入侵京津地区路线示意图

北京^①。

这时联军尚未确定统帅的人选，一些国家主张成立一个协议组织，由参加联军各国派员轮流主持。库罗巴特金反对这种组织形式，主张联军统帅应有“牢固而又统一的权力”，并于7月12日建议赋予阿列克谢耶夫“以统率各国部队的总指挥权”；如果其他国家不接受上述建议，则俄国也不将其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其他国家^②。俄国外交部基于上文提到的理由，不赞成由俄国将领出任联军统帅，以便继续保持对华友好的假面具。代理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甚至认为，在直隶地区日军业已超过俄军的情况下，如果俄国不大举增兵，在数量上对联军其他各国形成压倒优势，即使由俄国总司令出任联军统帅，也难以履行其统帅的职责^③。然而，他并不同意把俄军的作战指挥权交给别国，特别是交给那些与俄国的侵略利益相敌对的国家将领手里，在这个基本点上，他与库罗巴特金并无二致。因此，在8月6日尼古拉二世同意由德国元帅瓦德西出任联军统帅后，拉姆斯多夫等人便不再坚持其“不急进”进军北京的主张，而是把注意力转向确保俄国在联合侵华阵线中的行动自由。最切实的办法自然是赶在瓦德西率军来华之前攻占北京，从而使联军统帅权对俄军失去实际意义^④。为此，沙俄临时调整了满洲战场的作战计划，将进攻盛京的战役推迟到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以便就近增援进攻北京的俄军。拉姆斯多夫事后毫不掩饰地说：“这个统帅职务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瓦德西）率军到来之前，要末我们已经到达北京，要末中国政府已出面开始谈判。”^⑤

8月3日，利涅维奇在天津召集各国司令官和参谋长会议，决定第二天进攻北仓，开始向北京进军。这时，集中在天津一带的俄军有6250名步兵、377名骑兵，有22门大炮、8挺机枪^⑥，数量仅次于日本。但俄军

①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60号文件；《维特致西皮亚金的信》（八），《红档》杂志1926年第5（总第18）卷，第40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53页。

③ 《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18—19页。

④ 维特等估计，瓦德西来华将走40天的路程，到那时，“可能事情已经完全平息”。见《红档》杂志1926年第5（总第18）卷，第35—36页。

⑤ 《维特致西皮亚金的信》（七），《红档》杂志1926年第5（总第18）卷，第38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59页。

⑥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68号文件。

控制着铁路，又有旅顺口作后援基地，它在联军中仍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苏联的一部军事史所说：“俄国人是这支国际部队的核心。”^①



由天津进犯北京的俄国步兵（1900年）

（采自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

8月4日下午3时，八国联军1.88万人，带着100门炮从天津出发，沿运河向北京方向进发，其中俄军4800人，带着16门大炮^②，与法国侵略军担任右翼，沿运河左岸前进，日、英、美侵略军担任左翼，沿运河右岸前进，另有6000联军留守天津，由俄军上校阿尼西莫夫指挥，继续镇压天津人民的反抗^③。同日，库罗巴特金奉旨电告阿列克谢耶夫所部“以进攻北京为当前主要任务”，并速调营口或旅顺口俄军，取道大沽，“投入攻打北京的战斗”^④。同时，库罗巴特金告诉德国驻俄武官：日前向北京推进非日本人和俄国人莫属，其他各国的军队，包括英军在内，人数极其有限。俄人有8000

① 克尔斯诺夫斯基：《俄国军队史（1881—1917）》，第3卷，第528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68页。

③ 杨切维茨基：《在停滞不前的中国的城墙下》，第355页。

④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2编，第2册；第38页。

人，一俟满洲局面许可，这个数目将增加一倍^①。表示俄国为夺取侵略果实，不惜付出高昂代价。

8月5日黎明，八国联军对北仓的中国阵地发起强攻，义和团和清军在阵地的右翼前沿放水阻拦，布置了地雷，并在阵地上构筑了掩蔽体，对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打死打伤敌军300多人^②。上午10点钟，北仓阵地的右翼和两座铁路桥被俄国军队占领，同时，日军、英军、美军和越过阵地右翼的俄国军官斯捷谢利率领的第三步兵旅团占领了北仓。

8月6日，联军进攻杨村，再次遇到中国军民顽强抵抗，俄军官兵被击毙击伤19人^③。激烈的战斗从早晨4时一直进行到下午2时，最后，阵地被联军突破，当天杨村失陷。利涅维奇为不使中国军队得到喘息和加强的机会，联合其他国家的军队，实行“不停顿的进攻”^④，10日占领码头，11日占领张家湾，12日占领通州。

联军占领通州后，利涅维奇提议稍事休息，联军将领会议决定15日进军北京^⑤。俄军为夺取“头功”，提前于13日傍晚从通州向北京进发，并于次日凌晨两点钟攻占了东便门，首先冲入北京城。义和团和清军对沙俄侵略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东便门的战斗持续达14个小时之久，俄军遭受重大伤亡：少将瓦西列夫斯基胸部被枪弹穿透，身受重伤；打死上校1名，士兵20人；打伤军官5人，士兵102人^⑥。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听到俄军攻城的枪炮声后，也赶紧进攻北京城。在战斗中，义和团和清军共毙、伤八国侵略联军400余人。14日，北京陷落；次日清晨，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离宫，出德胜门逃往太原。16日，俄、法侵略军又联合进攻并打败了围困北堂的义和团和清军，北京城内的战斗基本结束。

① 《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104章，第4601号文件，《外交大臣布洛夫伯爵上威廉二世电》，1900年8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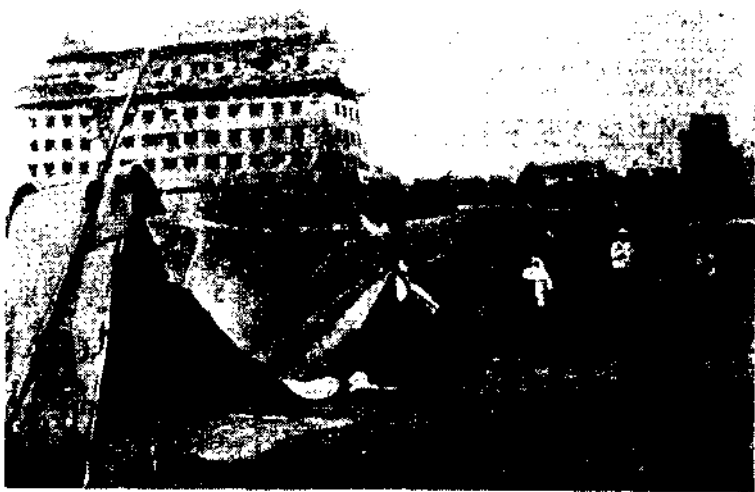
②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121页。

③ 同上书，第138—139页。

④ 同上书，第187—188页。

⑤ 同上书，第254页。

⑥ 同上书，第241—242页。



俄军侵占北京东便门(1900年)

(采自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

四 沙俄侵略军在京、津地区的暴行

沙俄侵略军同其他各国的侵略军一样，是一伙打着“文明”旗号、实际上极端凶残、野蛮和贪婪的强盗，他们在中国土地上犯下了擢发难数的罪行。据俄国报纸通讯员的记载，沙皇侵略军在这次争相屠杀、洗劫中国人民的大比赛中，“成绩”比其他侵略军毫无逊色^①。

联军统帅瓦德西抵达中国后，记述了八国联军对京、津地区的破坏情形：“从大沽至天津之间，以及天津重要部分，已成一种不可言状之荒芜破碎。据余在津沽路上所见，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颓垣废址，——塘沽系5万居民之地方，——已无华人足迹。从此地到北京之一段……凡军队行经之地，但见一片凄凉荒废而已。即北京自身，亦因烧抢之劫而大受破坏。”“从大沽经过天津直到北京之路线上，至少当有50万人，变成无家可归，散处于附近之地。”^② 据中国史料记载，八国联军一路洗劫到北京，使“沿途所

① 《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104章，第4686号文件，《外交部参事福尔斯坦因的记录》，1900年12月14日。

② 王光祈译：《瓦德西拳乱笔记》，1928年上海出版，第28、29、47、48页。按：译文个别字句略有改动。

见，若河西务、杨村、北仓，皆一片瓦砾。”“沿河数百里之间，高粱、麦、稻无人收获，委为尘泥。”^①沙俄侵略军是这些暴行的主要制造者之一。他们与美军一起火焚了塘沽和附近的农村^②；占领天津后，又与其他侵略军一起“为所欲为地抢劫一天”^③，“一切对他们无用的东西都乱扔一通，除了金条、银块与皮毛之外，什么也不看重。”^④廓索维慈也承认，“我们的士兵特别倾向于毁坏财产。”^⑤因此，在沙俄侵略军守卫着的天津总督衙门里只见“一片荒凉”，“衙门大厅里的东西被抢光了，地上满是成包的命令和政府文件。”^⑥沙俄侵略军头目还盗窃了天津海防公所里珍藏的艺术珍品^⑦，劫掠了造币厂的存银^⑧。经过这伙强盗洗劫之后，在天津城内“但见死人满地，房屋无存”，而“俄人所踞之地，被害特甚，抢掠焚杀，继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⑨阿列克谢耶夫一手策划成立的天津地区的军事殖民机构——“天津都统衙门”，对义和团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杀戮（详后）。

俄军进入北京之后，悍然宣布北城根以南一带和南城均归其“管辖”，在这一地区“遇有执持枪械等华人，定必即行正法。若由某房放枪，即将该房焚毁”^⑩。被沙俄侵略者大量屠杀的是和平居民。俄国财政部驻北京代表璞科第承认，这伙强盗实行暴力，“杀死大量中立的和平华人”^⑪。中文史料记载：北京“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稚呼救声，街上尸骸枕藉，洋兵驱华人昇而埋之，畚鍤既毕，即将昇尸之人，尽行击毙，亦埋坑中”^⑫。而沙俄侵略军最为凶残，“俄国占领区凌辱和暴行最为显著，也最持久”^⑬。

①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48页。

②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27页。

③ 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190页。

④ 同上书，第209页。

⑤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41页。

⑥ 同上书，第40页。

⑦ 同上书，第68页。

⑧ 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189--190页。

⑨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157页。

⑩ 北京历史博物馆藏：沙俄占领军《布告》。

⑪ 《俄国驻北京财政代表致财政大臣电》，1900年8月4日（17日）。《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27页。

⑫ 中国文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70—471页。

⑬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90页。



沙俄侵略军在北京俄占区张贴的告示（1900年）

（原件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兽兵在屠杀的同时，伴以抢劫和奸淫。俄军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入城后，成帮结队公开抢劫三天，其后继以单人抢劫。侵略军“搜得金银珠玉，为数甚夥，古董衣服，更难屈指，因不便携藏，遂贱值售出。妇女遭受辱而自颈者不少”^①。俄军司令利涅维奇带头行抢，成为“其他军官效法的榜样”。在他回国时，除行李之外，“从北京带回十大箱贵重物品。”^②俄军所“保护”的冬宫“其中大部分贵重物品，尤其是较大之件，皆被窃去”^③。并将其他各物“打成粉碎”^④。俄军撤出南海时，“工人挑出书籍字画各物七挑，悉被俄兵撕作大使用剩之物。据挑者云，海内书片字帖，狼藉满地，有不堪言状者；所有上用物件，俄兵掠取殆尽。”^⑤俄军还抢劫了颐和园。瓦德西证实说：颐和园“大部分贵重物品，亦已被人抢去，此事必非华人所为，因该宫邻近无有华人，而且从俄军撤出到英军入占之间，为时甚短故也。”^⑥胡思敬在《驴背集》中说：颐和园“为敌人踞之，括其所有，用骆驼运往天津，累月不尽。”^⑦政府机关也是劫掠的对象。例如，俄军趁“守护”总理衙门的机会，“将其痛抢一次”^⑧，并将户部衙门焚毁。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说：八月二十六日（公历10月19日）“户部因俄、日争取大钱，将库焚烧。今俄人查知户部曾经义和团设坛，又引火焚之，至头门而止，南则烧至湖广司为止，仅存陕西、贵州、江南三司，火未延及，余均与地平。”^⑨又如，俄军占据吏部衙门以后，“将看守之官役人等全行逐出。迨俄兵退后，各司处窗壁门扇均经拆毁，存储账房、应用桌张等项俱已无存。”^⑩值得一提的是，就连藏在西太后卧室中的“中俄密约”正式文本也被俄军劫走了^⑪。

① 李秋：《拳祸记》，上编，第193—194页。

②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67页。

③ 王光祈译：《瓦德西拳乱笔记》，第43页。

④ 同上书，第52页。

⑤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33页。

⑥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38页。

⑦ 同上书，第2册，第510页。

⑧ 王光祈译：《瓦德西拳乱笔记》，第95页。

⑨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34页。

⑩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242—1243页。

⑪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67—168页。详见本卷第一章第三节。

第二节 沙俄在直隶地区的侵略活动

早在 1898 年初,沙俄就企图将直隶地区划为它独占的势力范围^①,由于英国的坚决抵制,未能如愿以偿。八国联军侵入直隶地区后,沙俄凭借其军事优势,极力争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

一 抢占关内铁路

1900 年前,由北京经天津至山海关的关内铁路,实际为英国所控制。因该路战略地位重要,俄军入侵直隶地区时,首先加以抢占。1900 年 6 月 11 日,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致电总参谋长说:“我们必须控制北直隶湾登陆地点和到北京的铁路,将它变成军用铁路,以便保证部队的作战和供给。该线一些最主要的车站必须设立岗哨。”^② 6 月 12 日,阿尼西莫夫率派遣军到达天津后,便占领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接着,库罗巴特金命令火速向该部派出工兵与土木工程师,并供给各种器材,以建立交通线上的站所并经管铁路^③。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库罗巴特金又指示阿列克谢耶夫迅速修复大沽至天津段铁路^④。7 月 3 日,俄国半连铁道兵到达,赶走了英籍总工程师金达及其下属人员^⑤,开始修复工作。

俄国的行动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7 月 10 日,英军司令、海军上将西摩尔致函阿列克谢耶夫,要求把铁路的修复工作交给原来的中英联合管理当局。阿列克谢耶夫答复说:由于目前存在军事行动,“必须把铁路交给拥有大量人力物力、能修复、管理和保护它的国家,即交给我们(俄国)掌管。”但西摩尔坚称:英国即将从印度调来工程师、专家和部队^⑥,很快就能承担铁路的修复工作,并强调:“铁路是用英国资本修筑的,因此英国最关心它

① 《德国外交文件》,第 14 卷,上册,第 3743 号文件。

②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 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 2 编,第 1 册,第 7 号文件。

③ 同上书,第 18 号文件。

④ 同上书,第 57 号文件。

⑤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 7 号(1901 年),第 2 号文件。

⑥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 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 1 编,第 1 册,第 131 号文件。

的管理问题。”^① 双方争执不下。7月16日,各国舰队司令举行会议,除英、美外,多数国家同意将大沽至天津路段交俄国守卫和管理^②。7月18日,俄军正式接管这段铁路。英国政府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但向俄国政府申明:“该铁路已被抵押给英国的债券所有人”;“在目前的冲突结束后,该铁路应恢复其原来的经营管理。”^③ 俄方表示同意。双方交涉到此虽暂时告一段落,但矛盾并未解决。沙俄并不满足于控制大沽至天津线,还企图控制整个关内铁路,从而导致俄、英更为尖锐的斗争。

联军占领天津后,俄国拨款10万卢布供修复天津至北京路段之用^④。克列尔上校率半连铁道兵到达天津,开始修复京津铁路^⑤。8月22日,铁路修到杨村附近^⑥。28日,沙俄又派遣一支特遣部队驻扎在丰台南面附近地方。英军立即作出反应,占领了丰台铁路交叉点,开始修路铺轨。俄军要求英军撤退,英军坚持不撤^⑦,并抗议俄国军事当局“违反海军将领7月16日达成的只把大沽到天津一段铁路划归俄国人暂管的协议,坚持要控制大沽到北京的全线”^⑧。

这时,俄军从盛京省海城进攻盛京的战役即将开始,战争重点已从直隶转移到中国东北地区,沙俄准备放弃从杨村到北京段铁路的控制权,着手抢占塘沽至山海关铁路,以便打通同关外的联系。

9月20—28日,俄军相继攻占北塘、芦台、唐山、开平和古冶,控制了一些战略重镇和开平煤矿,掠夺了“三十辆机车,数百节车厢和平板货车,极好的工厂、仓库、车库,几万根枕木和钢轨,几百万普特煤”^⑨。沙俄当局明知津榆铁路是中国政府以铁路收益作保,向汇丰银行借款修筑的,但为了打通同关外的联系,仍然抢占了这段铁路,又一次给英国以极大的刺激。

正当沙俄侵略军沿津榆铁路向秦皇岛、山海关进逼时,联军统帅瓦德西

①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49页。

②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7号(1901年),第4件。

③ 同上书,第6件。

④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2编,第1册,第219号文件。

⑤ 同上书,第1编,第1册,第131号文件。

⑥ 同上书,第3编,第2册,第341号文件。

⑦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7号(1901年),第19号文件。

⑧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17—118页。

⑨ 杨切维茨基:《在停滞不前的中国的城墙下》,第528页。

于9月25日到达大沽,并立即委托西摩尔召集各国舰队司令官会议,决定派兵在秦皇岛登陆,轰击山海关炮台^①。阿列克谢耶夫的外交专员廓索维慈随即向派到瓦德西处工作的俄国公爵延加雷切夫探听瓦德西对山海关的意图,延加雷切夫说,瓦德西认为:“山海关是他的活动范围,那里将要建立跟北京联络的德国基地,所以,阿列克谢耶夫必须放弃自己的企图。”^②阿列克谢耶夫获此情报,立即命令俄军迅速向山海关推进。途中,俄军少将采尔皮茨基把奉命入关劝阻俄军前进的锦州知府章樾扣为人质,逼他答应撤退铁路附近驻军,供应粮秣,允许俄兵到滦州安营,以此换取俄军“不出关”的空头许诺^③。采尔皮茨基押着章樾到滦州,立即向山海关炮台记名提督郑才盛下最后通牒,限他至迟于10月2日撤出炮台,否则将发动攻击^④。

9月29日,俄军乘车至距山海关50多公里的安山,挟持章樾致电临榆县令俞尧钦、副都统富顺到距关30里处与采尔皮茨基商谈所谓“联好、息兵、候和”问题,并以“水陆并进,杀害居民要挟”,限一天内答复^⑤。俞尧钦等人采取缓兵之计,回电章樾:“关城驻兵十数营,非请示难遽退撤;住车一日,万难办理妥洽。请转致俄将,候两礼拜再议;否则各营非弟所能节制,难保不开枪对敌。”^⑥沙俄侵略军考虑到山海关水陆设防,“是一个强大的要塞;如中国人执意抵抗,夺取它将比夺取大沽炮台更为困难”^⑦,未敢贸然进攻。

与此同时,阿列克谢耶夫电令廓索维慈,逼迫当时正在天津的清政府和议全权大臣李鸿章下令将山海关炮台于10月1日中午以前交出^⑧。但西摩尔已令英国驻朝鲜总领事禧在明一行18人乘“侏儒号”军舰抢先出发,于9月30日中午在山海关登陆。他们向富顺等宣称:俄军由北塘据唐山,欲占关内铁路,直达东三省,中国如果要保全山海关,“可将铁路暂交英国”^⑨。

① 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第383页。

②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12页。

③ 《榆关纪事》,卷二。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74页。

④ 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383页。

⑤ 《榆关纪事》,卷二。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74—175页。

⑥ 同上书,第175页。

⑦ 杨切维茨基:《在停滞不前的中国的城墙上》,第529页。

⑧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15页。

⑨ 《榆关纪事》,卷二。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75页。

中国守军 3000 人奉庆亲王、李鸿章命令于当天午夜撤离山海关炮台。英国人随即占领了火车站和炮台，并插上了英国国旗，为延缓俄军到达，英军“停火车、止电报，并禁西路来往”^①。俄军先头部队闻讯赶来，见车站已有英军，“不敢妄动，遂占铁路学堂”^②。采尔皮茨基率俄军 4000 人于 10 月 2 日尾随而至，强占了山海关车站和桥梁工厂。守卫车站的英军人数极少，对之无可奈何。但其他国家的侵略军接踵而来，纷纷抢占地盘，从而形成列强共同占领山海关的局面。

由于从杨村经天津、塘沽至山海关的铁路均在俄军控制之下^③，瓦德西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于 10 月 4 日决定将山海关至杨村段铁路交给俄军管理。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认为，“这个决定是不公正的”，因为“整个这条铁路是用英国资本在英国人的监督和控制下修筑的”。他立即将此事电告英国政府，并准备与瓦德西谈判^④。阿列克谢耶夫无意退让，致电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表示，“继续管理”该路，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⑤。拉姆斯多夫于是照会英国政府说：“自塘沽至山海关的铁路以及通往天津的那段铁路，……对俄国具有特殊的军事上的重要性”^⑥，不能交给英国。德皇威廉二世主张对英国稍加安抚，于 10 月 11 日电告瓦德西说：“目前我们的政策，是希望不要在英国或俄国引起好像德国肯定站在这边或那边的印象。因为这个缘故，请您尽可能迁就英国关于铁路问题的合理愿望。北京与杨村间的铁路在缔结协定由我们管理后，也许可能转让英人。”^⑦ 据此，瓦德西于 10 月 13 日与俄国将领达成协议，规定北京至杨村段铁路移交联军总部，杨村至山海关路段仍由俄国占领^⑧。但是，英国对这一协定仍然不满，希望将杨村至山海关铁路归还原来的英国管理机构^⑨。

列强担心英、俄矛盾继续激化，将导致联合侵华阵线的破裂，敦促俄国放弃独占关内铁路的要求。沙皇政府野心勃勃，图谋通过控制该路，把侵略

① 《榆关纪事》，卷二。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176 页。

② 同上书，第 177 页。

③ 杨切维茨基：《在停滞不前的中国的城墙下》，第 531 页。

④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 7 号（1901 年），第 24 号文件。

⑤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 118 页。

⑥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 7 号（1901 年），第 64 号文件。

⑦ 《德国外交文件》，第 16 卷，第 4740 号文件。

⑧ 同上书，第 4757 号文件。

⑨ 同上。

魔爪伸向京津地区,但为了避免外交上陷于孤立,不能不考虑其他侵华国家的意见。1900年12月26日,瓦德西就关内铁路问题与沙俄军事当局订立新协定,规定:杨村至山海关路段“归联军统帅支配”;各国军队只在军事上使用该路,“至于产权则绝无改变”;俄国军事当局得保留使用为管理山海关至牛庄间铁路所必需的部分车场与管理设备^①。根据这一规定,俄军当局“带走了全线2/5的车辆,同时,把山海关的桥梁工程,实际上拆除殆尽”^②。

这样,沙俄长期占领关内铁路的企图虽未实现,但此时仍占领着山海关—营口—新民厅铁路,直至1902年9月22日签订中俄《交还关外铁路条约》为止。不过该条约规定,沙俄在山海关至营口的铁路线上仍有驻兵权。

二 策动建立天津地区的军事殖民统治机构——天津都统衙门^③

联军占领天津城后,阿列克谢耶夫为控制天津地区,立即以恢复秩序为名,邀请联军各司令官开会,提出建立管理天津的临时机构问题^④,并打算由俄国军官沃加克上校担任该机构的首脑。为此,他提议:“委派一名具有行政权的总督来管理天津华界。根据出兵的国家数目,总督下设一拥有发言权的八人委员会。”^⑤英、日、德等国司令官对此纷纷提出异议。德国冯·乌泽多姆大尉建议“把全部管理工作交给俄国和日本”,以挫败沙俄独霸的企图。阿列克谢耶夫则以“直隶的骚乱是由八国平息的,因此排除其中任何一国参加管理都不公平”为理由,坚持“最好是由一人掌权”,并成立只有发言权的委员会^⑥。由于意见分歧,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未能作出决定。

会后,阿列克谢耶夫派廓索维慈分别拜会联军各司令官,为沃加克当选总督游说。但英、日、德坚持原议,廓索维慈的活动毫无结果。

7月18日,在第二次联军各国司令官会议上,阿列克谢耶夫再次建议推选总督,又遭到英、日、德的反对。英国将军多瓦德宣布他本人无权决定这一问题,需要请示本国政府,并说,“他认为城市已安定下来了,没有必要匆忙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将军福岛也建议不必急于成立行政机构,主张

① 《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4774号文件。

② 肯德:《中国铁路发展史》,第63页。

③ “天津都统衙门”全称为“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英文名称为“天津临时政府”,1901年初,因扩大了辖区,改名为“天津地区临时政府”。

④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45页注①

⑤ 同上书,第42页。

⑥ 同上书,第43页。

“最好按盟国的数目将城市分成几个地段，保留军事管制。”^①阿列克谢耶夫觉察到由俄国人出任总督的方案不可能通过，于是提出由俄、英、日委派三名委员共同负责的折中方案，并获得通过。三人委员会由俄国的沃加克上校、日本的青木大佐、英国的鲍维尔上校组成；某些管理部门则由其他国家的代表负责^②。

这个由三人委员会代替总督一人掌权的折中方案，“解决了因联军间的竞争而造成的困难。”^③7月30日，天津都统衙门正式成立。俄国委员沃加克起草了天津都统衙门的章程^④，并负责处理天津都统衙门的日常事务。沙俄虽未能完全控制这一军事殖民统治机构，但仍能利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通过自己的委员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天津都统衙门成立后，对当地人民实行了残酷的军事殖民统治。都统衙门的布告贴满全城，宣布：“如有串通匪徒滋事，或窝藏不报者，一经查出，或被告发，立即严拿，治以军法，决不宽贷”；禁止“私自设立各会”及“张贴匿名揭帖”；收缴民间所藏武器，如过期不交，“定以斩首之罪”，^⑤如此等等。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都统衙门还成立了由俄、日（各200名），美、英、法、意、德（各100名）侵略军组成的巡捕队，俄国巡捕驻防在天津城南运河以北地区。同时“将城乡内外各地方划为八段，添设华捕”，“华捕仍听候洋巡捕作为领袖”，统归都统衙门巡捕官管辖^⑥。天津都统衙门对于天津人民的权力是“无限的”^⑦。直接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沙俄帝国主义分子廓索维慈叙述天津都统衙门司法处的情形说：“我穿过了几个院子，一些被判处枷刑的中国人（在那里站着和坐着），脖子上锁着大木枷。”义和团民被判处死刑，“砍下的头颅装在笼子里，挂在衙门的大门口”^⑧。据《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一书记载，从1900年8月7日至1902年7月26日两年时

①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46页。

⑤ 西村博编：《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1903年天津北清印字局出版，第1—3、15、17、23、37页。

⑥ 西村博编：《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3—4页。

⑦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93页。

⑧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49—150页。

间内,天津都统衙门仅布告斩决的中国人就有66人,其中许多是义和团民。

天津都统衙门还经常派兵到天津附近村镇烧杀。1900年9月8日,联军将独流镇完全焚毁^①。当天,天津都统衙门张贴布告,威胁说:“独流镇系属拳匪聚集之所,是以各国统兵大员立将该村剿除净尽,俾他处村庄知儆。如果他村仍蹈此覆辙,亦照此法办理。”^②这仅是天津地区村镇遭到烧杀抢掠的一个例子。

“天津都统衙门章程”规定,该机构要负责为联军提供营地、备置粮秣、征集运输工具——牲口、车辆、船只,以及苦力等。八国联军进军北京,天津便成为后勤基地。都统衙门乘机巧立名目,对天津人民横征暴敛,并任意没收中国政府的财产和居民的财物。^③

天津都统衙门成立初期,实际上为俄军所把持,以致“盟军无法掩饰由于俄国在中国成了主角而产生的懊恼心情”^④。但联军进攻北京后,留在天津的俄军减至700人,大大少于日军、英军,甚至也少于美军,俄军对都统衙门的控制力也相应下降。联军统帅瓦德西到达天津后,便开始改组天津都统衙门,增加了德、法、美、意各一名委员,委员由3名增至7名。他把都统衙门视作联军统帅的下属机构。德国委员法里肯亨坚持都统衙门必须服从瓦德西一人,并在这个机构中取得“左右一切”的地位^⑤。俄国委员沃加克因病于9月3日离职,由沃隆诺夫上校代理,从此俄国在天津都统衙门中的地位更加低落。

1900年12月,德军司令什瓦尔茨戈弗将军在北京主持召开联军司令官会议,讨论天津都统衙门委员会起草的天津都统衙门新“章程”草案,“会上,一切都为了以下两个目的:使临时政府归瓦德西伯爵一人领导,把俄国委员从委员会中排除出去。”然而,瓦德西的作用虽然大大加强,俄国委员并没有被挤出天津都统衙门。1901年2月1日,沃加克又回到了临时政府委员会中^⑥,不久就充当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天津都统衙门对天津地区人民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军事殖民统治,直到

①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国联军在天津》,1980年山东齐鲁书社出版,第448页。

② 西村博编:《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7页。

③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1号(1901年),第347号文件附件。

④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49页。

⑤ 同上书,第150页。

⑥ 《天津临时政府行政会议会议录》,1901年2月1日。

1902年8月15日,也就是《辛丑条约》签订近一年之后,天津的管理权才交还中国,但清政府被迫接受了列强提出的移交条件:都统衙门是“代表中国政府行使职权的,中国政府应当承认它所有事业的合法性”^①。也就是说,帝国主义通过天津都统衙门践踏中国主权,残害、奴役中国人民,其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中国政府必须正式予以肯定。此后,天津都统衙门虽已不复存在,却仍然保留着它的反映帝国主义利益的行政命令,使其一般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继续下去^②。

三 强建天津俄租界

1900年6月,俄军一进入天津,就抢占了白河左岸老龙头火车站一带水陆交通要冲地区。从此,俄国便想在这里建立自己的专管租界,以求在天津站稳脚跟。联军攻占天津城后,各国竞相抢占土地。俄军首先在天津武备学堂和盐坨上插上俄国旗,接着又在白河左岸插上俄国旗和“奉军事当局命令占用此地”字样的牌子^③,以防其他列强抢占。

10月,英军在英租界对面河东岸地面上架设电报线,被俄兵阻止。英军提出抗议,要求天津都统衙门出面干涉^④。当时,天津都统衙门为沙俄所控制,自然不予支持。这件事加快了俄国在白河左岸建立专管租界的步伐。此后不久,俄国茶商要求在未来的俄国租界取得一块建立货栈的地方。为此,俄国驻天津领事将建立租界的问题,通过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转呈俄国财政部裁夺。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也积极支持军事当局建立租界的要求,并建议“尽可能将中国官地划在其中,出卖官地所得可充作建设租界的资金,使(俄)租界和英法的设备完善的租界相匹敌。”^⑤俄国军政首脑均赞成这一想法,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指示将俄军占领的白河左岸,包括东局子在内,都划入租界范围。财政大臣维特也表示赞同。不过,彼得堡当局鉴于列强代表和清政府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提出租界问题尚非其时,决定“暂缓与中国人进行正式联系,而当务之急是实际占领地段”,并指派廓索维

① 《天津历史资料》1965年第4期,第92—93页。

② 同上。

③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36—137页。

④ 《天津临时政府行政会议会议录》,1901年2月1日。

⑤ 《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37页。

慈参与其事^①。

这时,其他国家开始抢购白河左岸的土地。利涅维奇有鉴于此,于11月6日通过俄国驻天津领事照会各国领事,声称白河左岸地段是俄国“依靠武装力量和俄国人流血牺牲的代价才得以占有”的,因此,这块长约两英里包括火车站在内的土地,已成为俄国通过“战争而取得的财产”,应由俄国单独控制^②。俄军当局此举引起其他侵略者的强烈不满。

英、日、美、德等国对上述照会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领事郑永昌声称,日本士兵在这块土地上也作过战,他们“对左岸也有同样的权利”^③。美国公使表示,联军在华北地区尚处于军事行动时期,拥有公共火车站以及其他财产的面积广大的白河左岸地带,“必须由各国公有,而不应被一个国家占为私有。”^④英国根本不理睬利涅维奇的照会,在白河左岸俄国准备占作租界的一个地段上,插上了一些标着“太古洋行”字样的桩子;俄军立即在该地段上,甚至在英国“福伯士”公司已有围墙的土地上,都插上俄国旗,以示回敬^⑤。双方争夺愈演愈烈。

11月下旬,英军在白河左岸修建一条铁路侧线,俄方进行阻拦,双方军队隔着路障在相距只有几码远的地方互相对峙,持续了几个星期^⑥,几乎发生火并。与此同时,英、德等国的商人准备召开抗议俄国的大会。俄军领导人面对各国联合反对的局面,认识到租界问题不早日解决对自己不利,便赶忙在选定的租界周围竖立木桩,并测绘了整个租界的平面图送交彼得堡,同时向被占村庄的中国居民发出告示说:白河左岸土地由俄军占领,当地居民应向俄国领事馆呈交标明自己地界的地契。

与此同时,沙俄积极谋求与清政府进行建立俄租界的谈判,使其军事占领合法化。

12月30日,俄国公使格尔思利用列强提出“和议大纲”的有利时机,诱迫李鸿章签订了《天津俄国租界条款》^⑦,划定了租界范围,并决定两国另派委员,制定“经营”俄国租界的各项章程。这样,包括天津老龙头火车站

①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39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824页。

③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40页。

④ 1900年11月14日康格致格尔思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1年,第45页。

⑤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43页。

⑥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47页。

⑦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83页。

在内的白河左岸大片土地，成了俄国租界。

1901年4月26日，李鸿章委派直隶后补道钱镠赴天津，会同天津道张莲芳据《天津俄国租界条款》与俄国驻天津领事珀佩等商议划定租界四至。5月19日，中俄双方开始会谈。俄方坚持“所划之地，上自先农坛对河盐坨起，下至土围子门外世昌洋行煤油栈边止，东北至铁路，西边至海河，约计界内之地有五六千亩之谱”。并声称：“此界系上年俄国兵官踩地，已达知本国外部，不能再为更改。”钱镠等提出开平矿局、铁路车站、武备学堂等数处房地码头，“均须留存”；所占盐坨之地，除上次勘明允许调换外，新占的土地“须与各盐商商办”；英、俄互争季家楼孙姓之地，“须俟查明再定”。俄方允将开平矿局之地留出，盐坨地准另议；至于武备学堂，俄方认为：“既为中国国家之产，此次又为兵力所得，自应归为俄国。”^①最后，1901年6月，中俄双方议定地界条款如下：

“一、天津俄国租界上以药王庙衙口迤北南北行路起，向南进贺家胡同过饭市再南顺盐坨官沟至河边为界，下面从世昌洋行煤油栈西首迤北至铁路道旁为界。前临海河，后抵铁路道边为界。

二、界内铁路车站、开平矿务局煤栈，此两处应查照英租界内招商局、日本租界内厘捐分局章程，所有地基码头均存留自用，其地界由矿局铁路派员会同勘定。”^②

最后划定的天津俄租界，占地达5974.8亩^③，占天津13处外国租界总面积的28%^④。

沙俄的行动开了抢占租界的恶例，其他国家便群起效尤，大肆扩展租界区：法国租界向西扩展到泥墙，面积由60英亩左右扩展到430.3英亩；英租界从墙子河扩展到海光寺道以外，展地588英亩有奇，几为原租界面积的两倍；原先没有租界的国家也抢占租界。这样，天津各国租界的总面积由1900年前的5235亩增至22131亩，即增加了3倍多。

①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海关，目录号1，卷号1190，《为天津俄国设立租界事》。

② 参见《天津各国租界地条款》，1914年天津大中华商报铅印本。

③ 《（河北）天津县新志》，天津政俗沿革记，第16卷，第40页。

④ 威罗贝著，王绍坊译：《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第315—316页。

第三节 东北三省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其 对沙俄侵略者的沉重打击

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备受沙俄侵略之害的中国东北各族人民,同俄国入侵者展开了英勇的反抗斗争。这些斗争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武装斗争的特点。东北三省的义和团运动,正是这些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东北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初在个别地区开始酝酿,6月全面爆发,7月达到高潮,其主体是当地广大农民群众。从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山东及河北等地招募来修筑东省铁路的十余万民工,积极参加斗争,是推动当地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力量。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东北地区统治集团的内部也出现了裂痕,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样,东北义和团运动在短短几个月内,就风涌各地,给俄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一 东北三省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沙俄通过“中俄密约”、强租旅大和兴修东省铁路,逐步把中国东北三省变成其独占的势力范围。它不断增加旅顺口的驻军,到1900年6月,驻旅顺口海陆军达1.35万人^①,控制了渤海湾出入口,威胁着京津地区的安全。同时,沙俄擅自组织的东省铁路护路军,也逐年增加,1900年6月已达6000人^②,分驻于东省铁路和南满支线的车站、桥梁和一些码头、矿山、林场等要害地区。他们通过铁路线和旅顺口驻军联为一气,使旅顺口和铁路沿线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俄军占领区。大批俄军出现在东三省的腹地和门户,严重地加剧了整个东北的危机,使东北人民遭受无穷的祸患。

护路军经常以追缉“红胡子”为名,越出路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致使当地人民居无宁日。例如,1899年6月23日,沙俄当局从哈尔滨派出一支讨伐队,在齐齐哈尔、安达、呼兰等地横行16天,行程1100俄里^③。护路军在同“红胡子”的战斗中,往往杀死无辜居民,经清朝地方当局交涉,

①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3页。

②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2编,第2册,第17—18页。

③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36—40页。

也只赔偿几百卢布了结，而且不准以后“提出任何其他要求”^①。护路军大都是由镇压中亚居民的哥萨克退役军人组成的，他们本来就是掠夺成性、行迹恶劣的无赖之徒，再加上居住分散，一些哨所的给养直接从当地取给，有的直接居住在中国村庄，这就更增加了他们扰乱居民的机会。阿瓦林指出，护路军“在各村肆意占据民房，强奸妇女，诈骗勒索钱财，抢劫财物，强取食品和粮食，以各种方式扰乱和欺侮居民，致使居民无法生活”。^②

东省铁路当局借筑路之机，大肆抢占土地，严重破坏了当地中国居民的生计。按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的规定，凡铁路必需用地，若系官地由中国政府给予，不纳地价；若系民地，“按时价”由公司给予；铁路遇有“庐墓、村庄、城市皆须设法绕越”。东省铁路以及南满支线纵横东三省腹地，特别是南满支线沿线居民田园庐陵比比皆是。铁路当局不按合同规定改变路线，蛮横地抢占民田，即使同意付给地价和青苗补偿费，也作价极低，而且从不如数支付，结果，失去土地的农民“变得一无所有，只好背井离乡另寻生路”^③。沙俄还经营银行、矿山、森林采伐、工厂等实业，进行经济掠夺。东北人民的膏血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沙俄侵略者的腰包。

随着东省铁路的修筑，俄国东正教势力也侵入了东北。1898年哈尔滨和旅顺都修起了东正教堂，再加上其他国家修建的大小69个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④构成了一股很大的侵略势力。传教士和俄国商人、冒险家等形形色色的殖民强盗横行乡里，鱼肉人民，进一步加深了东北人民的仇恨。

沙俄侵略者的行为“一开始就激起了居民中最广泛阶层的憎恨”^⑤。这种憎恨很快就发展成各种形式的反抗：武装袭击护路军及其哨所和进攻武装护卫下的铁路勘测队等。1898年6月，沙俄铁路段长齐文斯基在乌吉密被击伤，7月，在同一地方一个沙俄铁路勘测队被袭击^⑥，8月，在哈尔滨附近二名哥萨克被击毙^⑦，一个哨所被袭击^⑧。南满支线沿线居民稠密，这里的反抗斗争更为激烈。8月，15名哥萨克在老少沟附近宿营，居民从邻

①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63—64页。

②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50页。

③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59—60页。

④ 李秋：《增补拳匪祸教记》，第228、264页。

⑤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50页。

⑥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26页。

⑦ 同上书，第22页。

⑧ 同上书，第24页。

村用排枪射击这伙侵略者^①。12月，俄军大尉切尔诺夫在昌图府附近测量地形，中国居民开枪猛攻，逼其“匆忙撤离”^②。同年，盖平南乡居民“因俄强占田地，发价太少”，群起抗争，迫使路方占田“按公估价，遇有庐墓绕道改划轨线”^③。

1899年，随着东省铁路工程的进展，人民反抗斗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参加的阶层也更为广泛。4月和5月，宽城子一带居民曾两次武装进攻俄国铁路勘测队，迫使它一度撤退。后来铁路当局又增调哥萨克冲进村中镇压，逮捕了14名民团，才把这次反抗斗争镇压下去^④。7月底，铁岭以南几个村子的居民为反抗铁路当局无偿占地、毁坏青苗，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俄国工程师谢列金斯基一走进村子，就听见锣鼓喇叭齐鸣，众乡民持枪站在村头。村长指出，无中国铁岭当局命令，铁路不得开工，并要求铁路当局赔偿青苗和占地的损失。铁岭当局进行调解，乡民毫不让步。俄方凭恃武力，强行“在田里插标划线”，几个中国士兵奋起开枪，接着“一群群武装的中国人和民团呐喊着”向俄国人“冲了过来”，击伤一名哥萨克和两匹战马。当俄军休息的时候，“中国人又开始枪击，发起了进攻。”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居民使用了步枪和旧式大炮，并挖了战壕；中国地方当局同情中国居民，个别士兵还参加了战斗^⑤。此后，筑路工人也参加了抗俄行列，他们用劳动工具痛打甚至杀死沙俄护路军和监工，在整个路区的各主要路段，都出现了这种反抗行动。到8月份，铁岭等地驻军在爱国军官的率领下，也大批加入了抗俄斗争的行列^⑥。

1900年初到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的前夕，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进一步高涨。除了爱国官兵外，一些地方官员也站在人民的一边。4月初，在宽城子附近的十里铺村，俄国护路军抢劫中国居民的马车，附近村民奋起反抗，把抢劫者关在一个大院子里。俄兵打死村民，驱车逃跑。中国士兵逮捕了罪犯，并把他们押送知县审理。知县按中国法律程序予以审判并把他们关押起来。俄军中尉法捷耶夫带兵赶来，强行把犯人抢走；中国士兵奉命追捕，又

①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33页。

② 同上书，第34页。

③ 石秀峰：《盖平县志》，民国十九年版，第3卷，第25页。

④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48—49页。

⑤ 同上书，第50—54页。

⑥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49页。

把他连同罪犯一起抓回^①。中国爱国官吏和士兵的正义行动,进一步鼓舞了军民的斗志。这次事件不久,在宽城子附近的一个采石场,中国士兵逮捕了一名俄国工长和一个译员,俄国护路军连长杨特克维奇上尉冲进被拘押者的院子,打死打伤中国军民7人,中国士兵被迫还击,击毙杨特克维奇和一名哥萨克,重伤1人^②,给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自此以后,宽城子人民的反抗斗争进一步发展,东省铁路西线的兴安岭地区发生了工人“暴动”,东线从宁古塔到小绥芬车站一带袭击铁路哨所的事件接连发生,即使在东省铁路的中心哈尔滨附近,也发生了中国居民痛打俄国军官和士兵,收缴其枪枝和军刀的事件^③。遍布东三省的反抗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它为东北地区伟大的义和团爱国运动的全面爆发揭开了序幕。

东北地区的义和团,于1900年初首先出现在营口^④。三四月份锦州传闻有“神师降世,专收幼孩为教徒”,逐渐“强年壮丁亦相率从之,乡野村庄,十有九信”^⑤。五六月份,义和团进入京津,东北地区的义和团受到极大鼓舞,沿铁路线从南向北迅猛发展。到7月份,从辽东半岛到黑龙江畔的瑷珲,从靠近东部边界地区的珲春、牡丹江到西部的札兰屯,几乎整个东北都燃起了义和团运动的烈火。

二 东北三省义和团运动对沙俄侵略者的沉重打击

(一) 盛京省义和团的抗俄斗争

1900年5月,义和团从营口扩展到盖平、熊岳、海城、辽阳、盛京、铁岭、开原和宽城子等城镇^⑥。6月,营口义和团提出了“保国”、“安民”、“扫除外国洋人”的口号^⑦,熊岳一带的义和团“发动反抗俄国人的全体起义”^⑧,将斗争锋芒直指沙俄侵略者。很快,在凡有传教士的地方,以及离铁

①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79—82页。

② 同上书,第87—90页。

③ 同上书,第77—78页。

④ 佐原笃介等辑:《拳事杂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239页。

⑤ 佐原笃介等辑:《拳匪纪事》,第2卷,第37页。

⑥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100页。

⑦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9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1959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04页。

⑧ 库莎科夫:《1900年南满之乱》,1902年阿斯哈巴德出版,第79页。

路线较远但有沙俄护路军哨所和铁路职员的其他居民点也出现了义和团^①。

在盛京,6月30日至7月2日,义和团焚毁了城内的俄国铁路公司和全部教堂^②,接着又进攻城外的俄国护路军哨所。盛京车站护路军队长瓦列夫斯基少尉集中附近哨所的士兵和职员共84人企图负隅顽抗。7月5日,义和团和一支清军封锁了车站附近的开阔地,次日发动进攻,烧掉了车站附近的桥梁和俄军营房。6日夜,瓦列夫斯基率部企图逃往烟台煤矿,途经辽阳时,在义和团的痛击下退入太子河边的丛林里。入夜,瓦列夫斯基率部向东逃往朝鲜,在路上被击毙,该部遂分为两股:一股继续向东逃跑,到达朝鲜;另一股南下营口,内有数人为义和团截获,押解到盛京处决。^③

盛京义和团的胜利把全省的抗俄斗争推向高潮,南起熊岳城北至开原,到处都成为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战场。

辽阳车站是沙俄护路军的重要据点。护路军南满支线司令米申科上校调集附近哨所的200余名俄军^④,对义和团进行镇压。6月底,辽阳义和团开始烧毁铁路桥梁,攻击俄军营房^⑤,7月3日,烧掉茨儿山煤矿^⑥,并把这里的护路军赶往辽阳^⑦。俄军“旋因得胜营子俄站小房被烧,该俄人遂迁怒乡民,屡将尤家庄等处民房焚毁,杀伤多人”^⑧,在土坎村,俄兵一次就杀伤200余名中国人^⑨。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义和团的更大反抗。7月7日晨,义和团与爱国士兵向辽阳城西米申科的营房发起猛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9名俄兵和90匹战马被击毙。当夜米申科冲出包围,经鞍山、海城退到大石桥(今营口市)^⑩。盛京以南的沙河、鞍山等各哨所的护路军也先后退到了大石桥和米申科汇合。这股俄军“忽来忽往”,四处侦察军情;等待俄国大军抵达,伺机反扑。

熊岳地区的义和团于6月底进入熊岳城,驻熊岳的中国军队一部分转向

①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101页。

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21、247页。

③ 库沙科夫:《1900年南满之乱》,第60—62、65—72页;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205—207页。

④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186页。

⑤ 同上书,第103—104页。

⑥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06页。

⑦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188页。

⑧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06页。

⑨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188页。

⑩ 同上书,第190—200页。

义和团一边，一部分在城守尉的率领下撤往营口和盖州，义和团控制了全城^①。7月初，驻熊岳城附近的沙俄护路军率先破坏中国的电线和电线杆，甚至武装冲击熊岳城城门。义和团和爱国官兵被迫还击，打退了这帮强盗，并把击毙者的头颅挂在城头。从这时起，“居民、军队和义和团联合起来一起反对俄国人”^②。驻守熊岳城的一部分清军联合义和团组成了一支500人的队伍，其中一半是骑兵，他们采取隐蔽灵活的战术，战斗在营口、盖州之间^③。7月26日，他们烧毁盖州车站及其所有的仓库和车厢等铁路器材，拆毁附近的桥梁和电话，切断盖州与大石桥俄军之间的联系^④。



辽南义和团拆毁的东省铁路桥梁

（采自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

铁岭城北的柴河是沙俄护路军的又一个重要据点，5月5日，护路军骑、步兵200余名集中到这里。次日，俄军公然闯进铁岭城开枪镇压义和团，制

① 库沙科夫：《1900年南满之乱》，第80页。

② 同上书，第81页。

③ 同上书，第86—87页。

④ 吉尔什曼工程师致财政大臣电，第4520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141页。

造流血事件^①。义和团在当地中国军队的支持下奋起反抗，烧毁铁路，向车站进攻，把俄军赶进一个大院子里^②。7月7日晚，中国军民发起总攻，俄军在尔热武茨基上尉率领下于当夜向哈尔滨方向逃跑^③。7月9日，开原城守尉“协同拳勇，督率兵捕迎击”，把尔热武茨基一伙赶入吉林地界^④。这伙穷凶极恶的匪徒，沿途烧杀劫掠，激起中国军民的无比义愤。沿路中国驻军堵截追打，居民转移一空，不供给他们饮水和粮食，迎接他们的只有仇恨的子弹和刀矛。当他们于7月18日辗转到达哈尔滨时，已有43人被打死打伤^⑤。

到7月中旬，盘踞在盛京省的俄国护路军和铁路职员在义和团的打击下，在盛京以南的撤退到旅顺口和营口、大石桥一带，铁岭以北的撤往哈尔滨。为断其来路，义和团在进攻俄军的同时，将北至开原，南至海城，计500里，所有俄人铁路桥房一律拆毁^⑥。

(二) 吉林省义和团的抗俄斗争

1900年5月，几乎与盛京出现义和团的同时，宽城子和吉林城也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⑦。但义和团掀起全省规模的反抗运动是在7月上旬以后。

义和团一出现，吉林将军长顺就加以严格控制。他认为拳民“未可深恃”^⑧，要求清政府保持同俄国侵略者的“友谊”和“同盟”关系^⑨。他还写信给东省铁路总工程师尤哥维奇，表示要“竭尽全力”保护铁路的安全^⑩，制止义和团的活动。但是吉林省义和团很快就冲破了长顺的阻挠，展开了英勇的抗俄斗争。7月9—12日，伊通州和长春府的教堂以及三道沟的“俄房”先后被义和团焚毁^⑪。从哈尔滨到铁岭一线，中国工人全部“抛弃”了工作。

①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244—245页。

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07页；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204页。

③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245—247页。

④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07页。

⑤ 陆军中将格罗杰科夫致陆军大臣电，第2759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20页。

⑥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07页。

⑦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101页。

⑧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51页。

⑨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93页。

⑩ 同上。

⑪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3页。

沙俄侵略者惊呼，义和团运动“就像大火一样迅速地蔓延开来”^①。刘永和率领 500 名武装精良的义军，在横道河子车站一带准备向俄国护路军发动“毁灭性”的进攻，并组织“居民和工人起来反对俄国人”^②。三姓军民在巴彦一带猛烈射击俄国拖船“齐必斯号”，打死船长、退役上校文尼科夫等沙俄侵略者^③。很快，吉林省“拳民遍地”，使将军长顺“防不胜防”^④。

在吉林义和团和爱国官兵的打击下，东省铁路当局被迫决定将吉林境内的护路军全部撤退：吉林城以北和横道河子以西各站的俄军撤往哈尔滨，横道河子以东各站撤往绥芬河。

7 月 12 日，俄军哥萨克骑兵大尉萨维茨基率俄国护路军从吉林城撤退。长顺发给他一张护照，以保证他沿途安全。但沿途军民仍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老少沟驻军“约会民团助剿”，与这股俄军“鏖战两时，立毙俄人九名”^⑤，萨维茨基本人也被击伤^⑥。当这支 70 余人的队伍到达哈尔滨时，被打死 20 人，伤 6 人，失踪 3 人，死伤近半^⑦。在萨维茨基撤退的前后，宽城子、陶赖昭等站的俄军也撤到了哈尔滨，

哈尔滨至绥芬河车站，驻有俄国护路军骑、步兵 12 个连，由杰尼索夫上校统辖^⑧。横道河子以西各站俄军先撤到哈尔滨，其余的俄军在杰尼索夫率领下撤到牡丹江，遇上了从海参崴和双城子派来的增援部队——3 连俄军和 1 个炮兵排，这两支俄军会合后便在牡丹江盘踞下来。刘永和义军和牡丹江地区军民虽多次出击，但未能将其赶走^⑨，使其后来得以猖狂反扑。7 月 25 日，杰尼索夫率这支俄军的两个骑兵连西上，于 8 月 4 日到达哈尔滨^⑩。

（三）黑龙江省义和团的抗俄斗争

1900 年 4 月，省城齐齐哈尔出现义和团，他们在中国工人和居民中进行

① 陆军大臣 1900 年 7 月 1 日奏折；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 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 1 编，第 1 册，第 95—96 页。

②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 1900 年满洲事变概要》，第 350 页。

③ 库兹涅佐夫：《1900 年的满洲暴动》，1901 年彼得堡出版，第 56—64 页。

④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 23 卷，第 15 页。

⑤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378 页。

⑥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 1900 年满洲事变概要》，第 208 页。

⑦ 尤斯维奇致格罗杰科夫电；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 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 3 编，第 2 册，第 20 页。

⑧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 1900 年满洲事变概要》，第 112 页。

⑨ 同上书，第 157—159 页。

⑩ 同上书，第 289 页。

抗俄宣传^①。到六七月间,瑗珲、呼兰、北团林子(绥化)、庆城(庆安)、宾州(宾县)、阿拉楚喀(阿城)、双城、宁古塔、乜河(今牡丹江市兴隆乡)和三姓(依兰)等处,也先后建立义和团组织^②。呼兰是哈尔滨西大门,当水陆要冲。这里的义和团在筑路工人中进行宣传,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土夫散入城乡”,和义和团联合,“辄以烧教堂杀教民为事”^③。富拉尔基“土夫因使工钱,与俄人争殴,被俄人枪毙多名,土夫亦将俄人买卖房屋及江上木桥烧毁”,逼俄铁路人员撤走^④。江省筑路工人有“十数万人”^⑤,是一支巨大力量。当7月份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时,他们一齐停止为俄人工作,有些人还加入“义胜军”,大大加强了抗俄声势。即使在沙俄侵略者的大本营哈尔滨也掀起了抗俄浪潮,包括仆役、厨师在内的几乎所有为俄国做工的中国人“一同抛弃了工作”,使俄国铁路当局的一切活动全部瘫痪^⑥。

7月11日,哈尔滨至满洲里的护路军开始全面撤退:富拉尔基以西各站经兴安山口撤往阿普该图和老祖鲁海图,富拉尔基及其以东各站撤往哈尔滨。

哈尔滨跨松花江岸,连吉、江两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东省铁路修筑以来,这里成为联结东省铁路及其南满支线的枢纽,东省铁路局、护路军司令部、华俄道胜银行支行等机构都集中在这里,是沙俄侵略中国东北最重要的据点。由于吉、江两省和盛京一部分护路军先后到来,至7月中旬,沙俄武装力量达8个步兵连、10个哥萨克骑兵连,再加上临时武装起来的战斗人员共3500名^⑦。东省铁路总工程师尤哥维奇和东省铁路护路军司令葛伦格罗斯少将指挥俄军挖壕筑垒,负隅顽抗。他们以“防御”为名,将哈尔滨附近的中国村庄付之一炬,“上百栋的房屋寸木无存”,成群的中国居民被赶在田野;哥萨克骑兵四出围捕村民,强迫他们修筑工事,甚至进行“随意的屠杀”^⑧。俄军的暴行,激起吉、江军民的无比义愤,义和团和爱国官兵很快从齐齐哈尔、呼兰城和阿什河西、北、东三面把盘踞在哈尔滨的俄国武装殖民

①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152页。

② 黑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等编:《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1978年哈尔滨出版,第6页。

③ 黑龙江省博物馆存:《呼兰知府李鸿桂等请建倭都护专祠》文。

④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1页。

⑤ 同上书,第380页。

⑥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203页。

⑦ 同上书,第215—216页。

⑧ 库兹涅佐夫:《1900年的满洲暴动》,第33—34页。

强盗包围起来^①。

7月10日，义和团剪断俄人电线，哈尔滨和外界一切联系中断，粮源断绝^②，俄军被吓得惊慌失措。7月25日，中国军民猛攻江北的船坞，逼俄军第五连退到江右^③。同日，定禄率呼兰军队从哈尔滨东攻入五道街，占据元聚烧锅，并进击俄军防守中心道里。定禄小胜轻敌，在烧锅内“屠牛宰豕，众大醉噉”^④。俄军援兵骤至，管带荣保战死，全军退据元聚烧锅。俄军集中兵力对烧锅四面环攻，中国军民从炮楼、院墙猛烈还击。最后俄军破壁入院，焚毁房屋。中国军民冒着浓烟烈火，拼死搏斗，4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⑤。进占香坊田家烧锅的另一路中国军队攻占香坊车站，俄军又集中兵力向田家烧锅反扑。7月29日，双方展开激战。中国军队以密集而准确的火力使俄军蒙受严重伤亡，侵略者不得不拖着大批尸体，趁夜色狼狈撤退^⑥。7月25日以后的几天中，吉、江军民共毙伤俄军官兵153名^⑦，狠狠地教训了沙俄侵略强盗。

在这次驱逐哈尔滨俄军的战斗中，吉、江两省共动员1万余名的兵力，敌人孤立无援，处于绝对劣势。如果两省通力合作，坚决作战，敌人不难驱逐。但是，由于长顺等人畏葸不前，以邻封为异国，致使功败垂成。黑龙江将军寿山本来约定长顺于7月10日会攻哈尔滨，长顺一再推诿，把战期推迟了15天^⑧，使俄军得以集中兵力，给战斗增加了困难。在战斗进行的关键时刻，长顺命令距哈尔滨仅20余里的阿什河驻军按兵不动，使俄军全力对定禄进行反扑。寿山督饬通肯副都统庆祺率呼兰部队出击，庆祺却指示部下说：“此松花江一水，南为吉属，北为黑属。如逾江一步，即为越界。若战于限外，不但败溃可耻，即胜亦无光，总不如犯我界来攻之有理。”^⑨定禄冲

①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182页。

②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203页。

③ 库兹涅佐夫：《1900年的满洲暴动》，第25—30页。

④ 黄维翰：《呼兰府志》，第8卷，武事略，第32页；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25页。

⑤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281—283页。

⑥ 同上书，第293—296页。

⑦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68页。

⑧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73页。

⑨ 孙蓉图：《瑷琿县志》，第9卷，人物志，第63页。

破庆祺的禁令，攻入松花江南岸的哈尔滨道里区，但得不到庆祺的支援，反胜为败，最终导致这场直接关系到吉、江两省安危的作战草草收场，使俄军占据吉、江两省腹地，对下一阶段两省军民抗击俄国侵略军全面入侵的作战极为不利。

但是，总的来说，东三省军民经过约两个月的艰苦奋战，仍然取得了抗俄斗争的巨大胜利。除哈尔滨、牡丹江和大石桥几个据点外，铁路沿线上的沙俄武装被全部肃清。据一个俄国军官称，仅南满支线上的俄军就死伤 129 名，而东省铁路东线和西线上的伤亡，也决不会少于这个数字^①。这次驱逐沙俄护路军的战斗，是东北军民抗击沙俄侵略军全面入侵的预演，大大伸张了民族正气。

东北义和团和爱国官兵在作战的同时，还摧毁了沙俄的铁路设施。据东省铁路当局的统计，东北义和团共拆毁铁路 550 俄里，剪断了几乎所有的电话线，破坏土方工程 1.7 万立方俄丈，石方 1.2 万立方俄丈，烧毁桥梁 4500 俄丈，枕木 50 万根，毁损车头 45 个，车厢 1600 节，驳船十艘以及其他设备和设施，总值为 7000 万卢布^②。东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俄国资本，推迟了东省铁路竣工时间一年以上，打乱了沙俄侵华的步伐。

第四节 沙俄武装进攻中国东北的序幕——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血案

一 沙俄的军事动员与中国黑龙江当局的和平努力

义和团运动在中国东北的蓬勃兴起，标志着维特的“和平”的“经济上征服满洲”政策的破产。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俄国军人集团和上层贵族，遵循为帝国开疆拓土的侵略路线，决定利用列强联合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岌岌可危的有利时机，对中国实行赤裸裸的武力征服政策。趁中国东北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初，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就叫嚣出兵东北，将它“变成第二个布哈拉”^③。他的这一主张，反映了沙俄统治集团的强烈的侵略欲望。代表俄国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财政大臣维特，多次主张采取比较谨慎、较少风险

① 库莎科夫：《1900 年南满之乱》，第 58 页。

②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 1 卷，第 121 页。

③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 1 卷，第 157 页。

的对华政策，试图通过经济渗透的办法，逐步将中国东北置于俄国的控制之下。为了避免产生不利后果，削弱俄国在西方的力量，起初他曾反对出兵中国东北。但是，当义和团运动直接威胁到俄国在东北的侵略势力时，他一反常态，附和好战派的主张，于1900年7月9日奏请尼古拉二世火速派兵进占哈尔滨和牡丹江^①，并叫嚷要集中10万—15万军队，“打垮中国”^②。维特侵华策略的改变，进一步坚定了尼古拉二世武装侵华的信念。此后，沙皇政府便开动战争机器，积极准备对华战争。

还在6月初东北三省义和团运动刚刚开始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时候，俄国陆军总参谋长就电令阿穆尔军区司令官兼阿穆尔总督格罗杰科夫“密切监视”边境地区，为防止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蔓延”采取“相应的措施”^③。格罗杰科夫加紧搜集东三省中国驻军和义和团运动的情报，向盘踞在哈尔滨的俄军运送武器弹药，为武装进攻东北三省镇压义和团运动做军事准备。

6月23日，尼古拉二世发布上谕，宣布阿穆尔军区的军队进入战争状态，并授权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拟定“一切有关的命令”^④。同一天，库罗巴特金和代理海军大臣阿维兰、代理内政大臣斯季申斯基共同下令阿穆尔军区司令员和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于6月25日同时进行军事动员^⑤。6月29日，这两个军区分别开始征召16855名和9515名预备役兵员入伍^⑥。

接着，尼古拉二世又授权关东地区首席长官阿列克谢耶夫在辽东半岛租借地征集预备役兵员入伍^⑦，并相继宣布阿穆尔省、哈巴罗夫斯克州第一区、乌苏里哥萨克州、南乌苏里州和海兰泡、伯力、双城子、海参崴等城市^⑧，以及外贝加尔省靠近中国东三省的几个州处于战争状态^⑨。从6月25日起至

① 御前大臣维特致皇帝陛下的奏电，第20759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1册，第60页。

② 《红档》杂志1926年第5（总第18）卷，第32—33页。

③ 总参谋长致格罗杰科夫电，第1385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2编，第1册，第4页。

④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1册，第21页。

⑤ 同上书，第2编，第1册，第22页。

⑥ 同上书，第1编，第1册，第45—46页。

⑦ 同上书，第1编，第1册，第35页。

⑧ 同上书，第1编，第1册，第147页。

⑨ 同上书，第1编，第2册，第41—42页。

7月中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沙俄在东起海参崴西至七河省的省份和地区,全面进行了军事动员。

此外,沙俄政府还动员了莫斯科、基辅等军区的大量兵员和作战物资,从海上调往中国。与此相配合,沙俄报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拼命在人民中挑起对中国的仇恨。在沙皇政府的煽动下,俄国充满沙文主义的狂热。

沙俄的军事动员,引起中国东北地方当局的严重不安。6月28日,黑龙江将军寿山在给东省铁路总工程师的电报中指出,俄国阿穆尔军区集中大量军队准备进攻东三省,这将在中国居民中引起严重骚乱;并表示他将保证俄国员工和居民的安全,要求俄国不要诉诸武力^①。7月8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致电尤哥维奇,请他转达格罗杰科夫,再次呼吁俄国不要派兵;并在电报中指出,俄国护路军在东三省枉杀居民,焚烧房屋,引起了居民的无比愤慨,在这种情况下,恢复秩序已十分困难,要求俄国首先撤离武装人员,“以免再启衅端”;至于俄国职员和居民将在中国士兵护送下出境,东省铁路的全部财产由中国官员接管,待秩序稳定之后,俄国人员再重返施工^②。尤哥维奇对以上呼吁和各项建议,均一一拒绝,甚至挑衅说,东北当局如不能平息“叛乱”,“则应向俄国政府,亦即向关东地区首席长官求援”^③。这种答复是对中国主权的蔑视,也是一种武力恫吓。中国东北三将军见俄国侵华战争势不可免,不得已动员军民,布置战守,以武力驱逐俄国护路军,同时对俄国非武装居民和职员均予以保护。

盛京省义和团运动爆发不久,盛京及其以南的南满支线上的俄国妇女和儿童首先撤往旅顺口,后来又撤往海参崴。其余俄国妇女、儿童和职员,根据《建筑东省铁路总工程师第168号命令》分别撤往外贝加尔、阿穆尔省、旅顺口、大连等地,靠近哈尔滨各段的撤往哈尔滨^④。鉴于俄军大举入侵迫在眉睫,哈尔滨集中了大批的妇女、儿童和职员,黑龙江将军寿山郑重地通知尤哥维奇,为了在交战中不伤害俄国和平居民,建议俄方“立即将妇女、儿童和非武装人员送走;同时他还命令各要塞和驻军不得射击这些运载非武

①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91页。

② 同上书,第201页;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346—347页。

③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347—348页。

④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202页。

装人员的船只。”^①尤哥维奇选拔 1000 名职员和工人编成义勇兵，与护路军一起留在哈尔滨；将其余的非武装人员分批运往伯力，于 7 月 12 日安全地运出第一批^②，7 月 24 日又运出 2500 人，总计 3000 余名妇女、儿童和非武装人员均安全抵达伯力^③。中国地方官指出：“六月十五日（公历 7 月 11 日）富拉尔基俄国监工人等，闻警逃避西路陆行者，约有数千名口，无不保送出境，其流落在后者，均交素识商人收养，毫无凌虐；由哈尔滨乘船顺流而下者，听其驶行，不准阻拦。”^④

以上事实证明，尽管中国的和平努力归于失败，中国东北地方当局仍然对俄国非武装人员采取了多方面的保护措施。但是和中国官员这种人道主义的做法相反，自称是执行“文明使命”的俄国当局，竟然对俄境的中国和平居民实行血腥的大屠杀。

二 海兰泡大血案

海兰泡原是中国一个村庄，位于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右岸两江汇合处。1858 年沙俄通过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将它强占，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后来成为沙俄阿穆尔省首府，至 1900 年约有 4 万人^⑤。居住在城内的中国人主要从事商业，其中大商号有“二百三四十家”^⑥。此外，还有大量的流动华工——雇工、小商贩和手工业者^⑦，郊区居住着很多农民，中国侨民总数约为 1 万—1.5 万人。

6 月 25 日，阿穆尔省实行军事动员后，海兰泡不断发生迫害华人的暴行，不堪虐待的中国人纷纷逃回江右^⑧。因家庭、财产拖累未来得及离开的

①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 2750 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 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 3 编，第 2 册，第 1 页。

②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 215 页。

③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 2750 号与 3501 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 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 3 编，第 2 册，第 1、182 页。

④ 程德全：《庚子交涉偶录》，第 33 页。

⑤ 关于海兰泡的人数，1897 年统计为 32506 人（参见《1900—1901 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 1 编，第 1 册，第 105 页），1898 年统计为 37368 人（参见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璦琿》，1900 年海兰泡出版，第 184 页），呈增长之势。据此估计，1900 年约有 4 万人。

⑥ 长顺：《为俄罗斯占据东三省拟请按照公法与之理论书》，1901 年 9 月拟。参见曹廷杰《拟放姓属荒地章程》，手抄本，第 2 册。

⑦ 马洛泽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 140 页。

⑧ 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璦琿》，第 3—5、10 页。

大量中国人，全部成为被屠杀的对象。

7月9日，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经沙皇批准，命令伯力和双城子的两路俄军在边境集结，待命进攻哈尔滨和牡丹江^①。外贝加尔的增援部队不断经海兰泡乘轮下驶，黑龙江上布满战争的阴云。

7月14日，俄轮“米哈依尔号”拖着四艘驳船和军舰“色楞格号”从海兰泡下驶，与左岸的俄军纵队平行前进，准备伺机将纵队渡向右岸^②，进攻瑗珲。此前，中国瑗珲当局探知俄军“马步七千人”定于7月15日“由陆路进发”“假道瑗珲”的情报，下令严加戒备^③。15日，俄舰果然进入瑗珲江面，瑗珲驻车便“飞渡往阻”^④，俄方置之不理。由于俄方已做出进攻瑗珲的部署，并且采取了渡江入侵的实际行动，在此情况下，中国驻军为了自卫，被迫向俄船开火，阻止俄轮和俄军入侵^⑤。在交火中，俄舰多处中弹，俄官兵被击毙2人，伤5人^⑥。

为了煽起战争狂热，沙俄当局遂以上述事件为借口，策划对海兰泡中国居民进行血腥的大屠杀。在“米哈依尔”号下驶的当天，海兰泡市议会决定征集义勇兵，从此全城充满了战争恐怖气氛，迫害华人的暴行有增无已。中国居民代表请示阿穆尔省军政长官格里布斯基，城里的中国人是否需要撤离，他欺骗说，中国人“可以不用担忧地留居原地”，因为俄国政府“决不允许和平的外国人受到骚扰”^⑦。第二天下午，他下令禁止中国人渡江，并将全部渡船扣留在左岸；派骑兵赶散了准备渡江的中国人群，蓄意将江左的中国人杀绝^⑧。

7月16日，格里布斯基命令一个不剩地逮捕所有的中国人，全城立即开始了疯狂的大搜捕，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和志愿兵闯进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1500多中国人

①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2编，第1册，第77页；第1编，第1册，第95页。

② 同上书，第1编，第1册，第137页。

③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2—363页。

④ 同上。

⑤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1册，第137页。

⑥ 同上。

⑦ 多伊奇：《在西伯利亚十六年》，第330—331页。

⑧ 石光真清：《谍报记》，第16—20页，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珲》，第28—31页。

逃到城外躲藏，也被哥萨克搜出，许多人被刺刀活活捅死，活着的人“像关进兽栏子一样被赶进警察局”。这一天共搜捕了3000—3500人，警察局容纳不下，当晚又被押送到精奇里江边的一个锯木场里。^①

7月17日，海兰泡市警察局根据格里布斯基的命令，把所有关押起来的中国人赶到上布拉戈维申斯克，谎称用船将他们渡过对岸。但是那里连一只船也没出现。到了江边，哥萨克兵便挥动战刀，把所有的中国人“一直赶进水里”^②。“当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抛往岸上，乞求至少饶孩子一命时，哥萨克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他们的刺刀上，并将婴儿割成碎片。”^③一个母亲“把孩子留在岸上，而她自己走进河里”，但走了几步以后，又回来抱住孩子走进水中，最后又不得不上岸“放下她宝贵的孩子”，惨无人道的哥萨克们便挥刀刺杀了孩子和他的母亲^④。如此残忍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个参与屠杀的人讲述了整个屠杀的过程，现引述如下：

“到达上布拉戈维申斯克时，东方天空一片赤红，照得黑龙江水宛若血流。……手持刺刀的俄军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开始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人群发狂一样喊叫，声震蓝天，有的想拼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国兵一齐开枪射击。喊声、哭声、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的景象。……被杀的一方总想挣扎逃生，得免于难；或者拼死狂奔，或者伏地哀泣。杀人的一方，则完全灭绝人性，不是魔鬼，便是畜牲。在人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及今思之，简直就是—场噩梦。”

“清扫现场的工作，紧跟在一场血腥的屠杀之后立即开始进行。……那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部分是气息未绝的活人，周身肝脑

① 石光真清：《谍报记》，第16—20页；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珲》，第28—31页。

② 维列沙金：《满洲旅行记（1900—1901）》，1903年彼得堡出版，第15页。

③ 《泰晤士报》，1901年7月15日第十版，利特夫人（1900年在海兰泡作记者）的报道，参见古奥尔基·莱思奇《文明的战争》，1901年伦敦出版，附录第四部分，第307—308页。

④ 多伊奇：《在西伯利亚十六年》，第336页。

进溅，血肉狼藉。……不管是死是活，被一古脑儿地投入江流。……清扫过后，黑龙江水浮着半死的人们象筏子似的滚滚流去，残留在江岸大片血泊中的只是些散乱丢弃的鞋、帽和包袱之类。就是连这些遗物，也都被蹂躏得一无完形。”^①

对岸的中国人民也目睹了这一惨剧。瑗琿副都统衙门笔帖式杨继功记述：

“二十一日（公历七月十七日）午前十一钟时，遥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②

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一直进行到7月21日^③，共夺去五千余名中国人的生命，只有少数身强力壮的男子游到了右岸而得生^④。7月22日，阿穆尔当局宣布，海兰泡市的中国人被全部“肃清”了^⑤。

三 江东六十四屯大血案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精奇里江江口以南至霍（豁）尔莫勒津屯、黑龙江左岸沿岸地带，南北长200余里，东西宽90余里^⑥。在这片土地上曾出现过64个村庄，而黑龙江自精奇里江口转向南流，这些村庄地处瑗琿江东，故称瑗琿江东六十四屯。

1683年，清政府为清剿盘踞在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在精奇里江口以南一带设立了一些军屯点^⑦。江东六十四屯就是由这些军屯点发展起来的，占

① 石光真清：《谍报记》，第23—24页。

② 孙蓉图：《瑗琿县志》，第8卷，第28页。

③ 伦森：《俄中战争》，1957年美国版，第91—94页。

④ 孙蓉图：《瑗琿县志》，第8卷，第28页。

⑤ 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琿》，第34—35页。

⑥ 张伯英等编：《黑龙江志稿》第2卷作“袤一百八十里，广九十余里”。宋小濂：《北徼纪游》作“长二百余里”。《瑗琿县志》第12卷艺文志作“纵一百四十里，横五十一七十里”。此处长宽分别据《北徼纪游》与《黑龙江志稿》。

⑦ 昆冈等辑：《大清会典·事例》，第1127卷，第7页。

瑗珲城的遗址后来成为六十四屯之一的白旗屯的所在地^①。

1858年，沙俄以武力逼签不平等的中俄《瑗珲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中俄由额尔古纳河沿黑龙江到海口，左岸属俄国；右岸顺江至乌苏里河，属中国；“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②按照这一规定，中国被迫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割让给沙俄，但保留了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在原地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

江东六十四屯居民由汉族、满族、达斡尔族组成，据俄方统计，1881年已有居民1.4万人^③。《阿穆尔报》负责人估计，惨案发生前中国居民达3万—3.5万人，除去临时居住的中国矿工等流动人口，常住居民不少于2万人^④。

自中俄“划江为界”以来，中国瑗珲当局对六十四屯的居民一直实行有效的管辖，这里的居民参军纳粮，履行自己对祖国的应尽义务。

江东六十四屯“土地膏腴，人民勤农为务，年产诸粮，富甲全省”^⑤，是黑龙江中游最富庶的地方。《瑗珲条约》签订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俄国殖民者从这里购买粮食、蔬菜，得到很大好处。法国历史学家雨拉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半野蛮的俄国人当中，这些中国人是仅有的文明成分，他们是当地仅有的农民、园丁和工匠。没有他们，（俄国人的）生存几乎都是不可能的。”^⑥

19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移民大量涌来，对土地的需求量不断增加。阿穆尔省共有4000万左右俄亩土地，大部分是森林、莽野和沼泽地，只有黑龙江中游一带适于耕种^⑦。六十四屯这块中国人民辛勤开发的肥田沃土，于是成为沙俄侵略者侵吞的目标。经过沙俄的不断吞食，六十四屯的土地面积不断缩小。但是，由于中国地方当局的正当保护和六十四屯人民的英勇反抗，沙俄并未实现最后侵吞的阴谋。俄国对华战争的爆发，给阿穆尔当局提

① 张伯英等编：《黑龙江志稿》，第2卷，地理，第2页。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85—86页。

③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委员会编：《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材料汇编》，第31册，1886年彼得堡出版，第185页。另据孙蓉图《瑗珲县志》，第5卷外交志记载，当地中国居民共七千余人，第8卷武事志记载为万余人。

④ 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珲》，第185页。

⑤ 孙蓉图：《瑗珲县志》，第8卷，武事志，第28页。

⑥ 雨拉：《俄华帝国》，1904年伦敦英译本，第273页。

⑦ 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珲》，第184—185页。

供了武力夺取的时机；加之这里与黑龙江省的北方门户瑗琿隔江相望，是进攻瑗琿的最理想的基地，因此，在俄军进攻中国东北之前，首先在这里下了毒手。

7月17日，沙俄当局在对海兰泡中国居民进行搜捕和屠杀的同时，派出一支俄军渡过精奇里江，扑向江东六十四屯^①。俄军驱赶大批屯民“聚于一大屋中”举火焚烧，逃出者不到一半人^②。几十名俄军“沿屯发火”，将中国居民的房屋“毁尽”^③。死里逃生的中国居民赶到黑龙江边，争先抢渡。沙俄骑兵随后追来，“枪击如雨”^④，中国居民的鲜血再次染红了黑龙江水。

驻瑗琿的中国官兵见俄兵“在江东恣行焚戮”，激起无比义愤。为“保护屯民过江”，瑗琿副都统凤翔派统领王良臣等带骑步炮兵300余名于17日夜偷渡黑龙江，趋精奇里江口，“截俄援兵”。18日辰时，中国官兵与俄军战于精奇里江口的博尔多屯，“各将士奋不顾身，大呼直前，俄势不支，败退河北”^⑤。在这次战斗中击伤俄军连长巴索夫中尉，打死打伤士兵多人^⑥。中国官兵以英勇战斗，为江东六十四屯人民渡江赢得了宝贵时间；之后，于18日申时退回黑龙江右岸^⑦。

在瑗琿官兵渡江作战的同时，瑗琿水师营调用商船20余只同水师营战船共30余艘，“昼夜摆渡，飞棹如梭”，把对岸幸免于难的部分骨肉同胞渡回江岸^⑧。

7月18日，又一支俄军渡过精奇里江，继续焚烧“满人村屯”，仅在博尔多屯一处就枪杀了上千名中国居民^⑨，又将“未及过江者，不分男妇老幼，农夫工匠，负贩商贾及民间各行等业一同逼入江中，通共浮水得生者不过六

①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2册，第13—14页。

② 徐曦：《东三省纪略》，第1卷，第15—16页。

③ 孙蓉图：《瑗琿县志》，第9卷，人物志，第83—84页。

④ 同上。

⑤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81页；《西巡大事本末记》，第2卷，第45页。

⑥ 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琿》，第35—37页。

⑦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81页。

⑧ 孙蓉图：《瑗琿县志》，第8卷，武事志，第28—29页；第9卷，人物志，第83—84页。

⑨ 俄国“义勇兵”说，在7月18日的战场上（博尔多屯）有上千具满人尸体。中国渡江清军只有300人，没有付出多大伤亡，这些尸体显然是被杀害的中国居民。参见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琿》，第37页。

七十人，其余均被逼溺死江中，浮尸蔽江者数日。”^①至7月21日，这伙殖民强盗把中国居民的村庄“全部捣毁干净”，中国人“一个也没有了”，所见到的尽是失去主人的牛、马、猪、鸡。凶残的俄军在这片废墟上“组织了真正的围猎”，俄军当局还“为围猎发行了特殊的证券”^②。

沙俄阿穆尔当局在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屠杀中，共杀害中国和平居民7000余人，“浮尸蔽江而下，江水为之奇腥”^③。据亲身经历这一惨案的老人回忆：“六月二十四日（公历七月二十日）那天下雨打雷，江里的死尸都漂上来了，像冰排似的流了四五天，水面浮着一层油，江水都不能喝了。”实际情况比这位老人的回忆更为悲惨。一个俄军上校在事件发生三星期后，从海兰泡乘轮船去伯力，将他亲眼目睹的事实写进了他的旅行记里。他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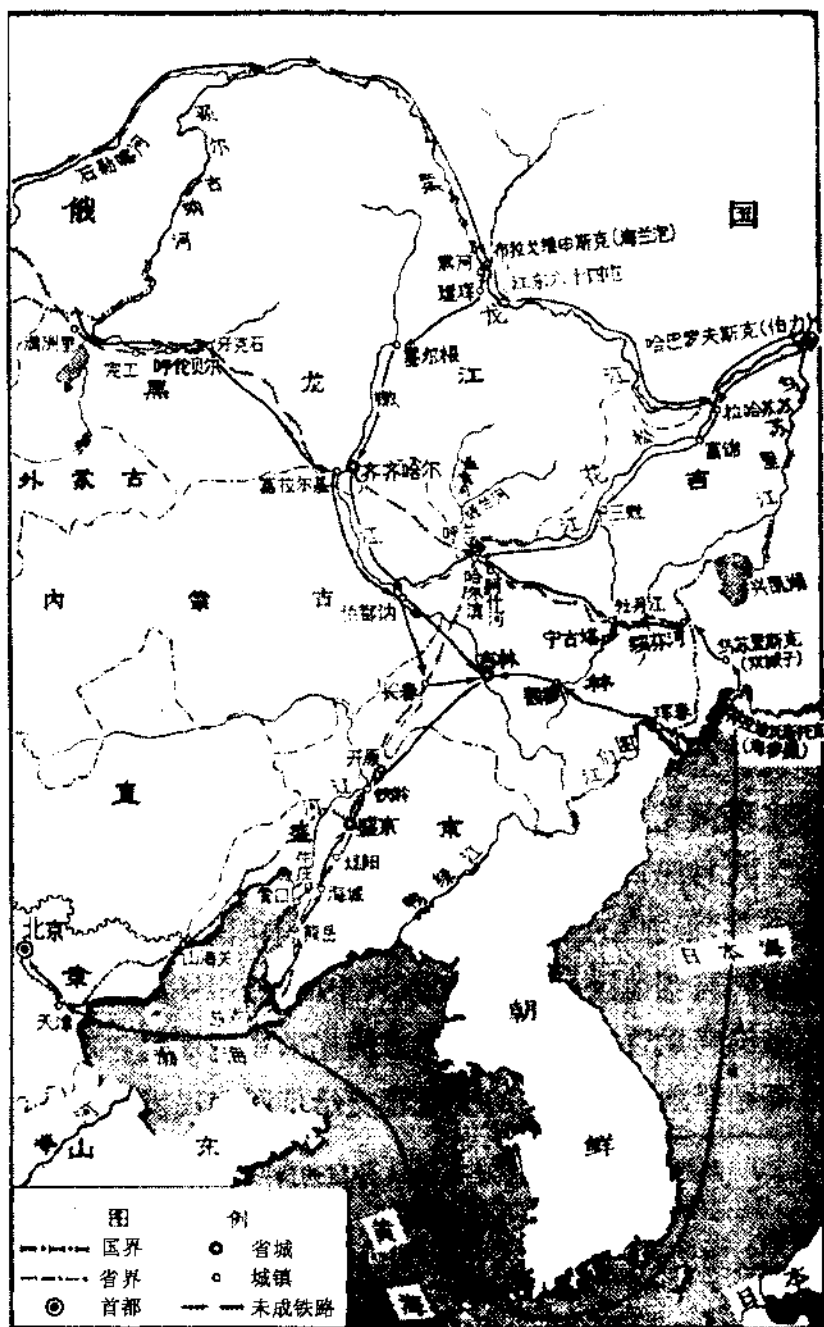
“七月二十四日（公历八月六日），我们一行人又乘轮船继续向前行驶。……‘中国人！’老领水员轻轻地对我说。……领水员并没有错。轮船很快就赶上一具溺尸。他赤身裸体，皮肤暗红，两臂象藤蔓一样牵拉着，两腿张开，在水上漂游，面孔扎在水里，好象还在想着什么。……在他的后面，又出现了第二具、第三具尸体。就这样，在黑龙江的整个的宽阔的水面上，一具具尸体漂游着，好象在追逐着我们的轮船。……很显然，这是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淹死的那些最不幸的人。他们在河底躺了一些时间，膨胀了，现在就浮上来了。……在一个平整的沙滩上，一下子冲上来很多溺尸。……‘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尔上校轻轻地数着。这片浅滩远远的发着白光，而那些黑色的和粉红色的尸体所堆成的长长的带子，就象花边一样镶在沙滩的水边上，周围的空气被严重地毒化了，我们都不得不用手帕堵住鼻子。……很难估计出我们这一天赶上了多少尸体。但是，据判断，仅在一个小沙嘴上我们共数出一百五十具，可以想见，中国人的尸体是不少的。”^④

① 长顺：《为俄罗斯占据东三省拟请按照公法与之理论事》。参见曹廷杰《拟放姓属荒地章程》，手抄本，第2册。

② 长顺：《为俄罗斯占据东三省拟请按照公法与之理论事》。参见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瑷珲》，第44—45页。

③ 张伯英等编：《黑龙江志稿》，第30卷，武备志，第57—58页。

④ 维列沙金：《满洲旅行记（1900—1901年）》，第18—21页。



1900年沙俄入侵中国东北进军路线示意图

滔滔的黑龙江水流不尽中国人民的血泪，也冲刷不掉沙俄侵略者的罪行！这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而且也引起世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同声谴责。

美国历史学家贝弗里奇说，这一惨案是“俄国在远东最近历史中臭名昭著的‘丑闻’”^①。日本人石光真清指出，这是黑龙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②俄国人多伊奇认为：“沙俄现在实行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只有与中世纪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和西班牙对异教徒、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迫害才可以相比拟。”^③

事件发生不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④。列宁对沙皇政府的严厉谴责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代表了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正义立场。

8月4日，俄国阿穆尔省军政长官格里布斯基发布命令：“根据《璦琿条约》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辖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按：即江东六十四屯）……的土地，已归俄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区，他们的土地将交给俄国移民者，供其专用。”^⑤就这样，中国人民世代辛勤开发的田地，被沙俄以武力强占了，用血汗积聚的大量财产被全部抢走了^⑥。

与此同时，沙俄军事当局为扫清进攻中国东北的障碍，保障后勤供应，派小股军队沿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国一侧，实行野蛮的“净化”措施，捣毁了沿江地区的全部卡伦并占领了漠河金矿。俄军所到之处，村镇被毁，居民被杀，富庶的居民点变成了无人区。一场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开始了。

① 贝弗里奇：《俄国的推进》，1904年纽约出版，第242页。

② 石光真清：《谍报记》，第20页。

③ 多伊奇：《在西伯利亚十六年》，第335页。

④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215、217页。

⑤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5号（1901年），第23号附件1。

⑥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5卷，第36—38页。

第五节 沙俄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与东北 军民的英勇抵抗

一 俄军的作战部署

沙皇政府于1900年7月上旬决定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即调兵遣将,部署对华战争。东三省地域广阔,俄军又参加八国联军在华北的争夺,沙俄在军事和外交上都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为便于军事指挥和及时处理外交事务,彼得堡当局将北直隶和南满战场(旅顺口至盛京)交关东地区部队和太平洋海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中将指挥,将北满战场(吉、江两省)交阿穆尔军区司令格罗杰科夫指挥^①。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指挥全军,直接向尼古拉二世负责。沙俄军事当局动员了12个军区的部队,官兵总数达116290人^②,组成四个军团,进攻中国东北和华北。西伯利亚第一军团的基地为旅顺口,前方基地为大沽、天津和营口,作战方向是北京和盛京;西伯利亚第二军团基地为伯力,前方基地为哈尔滨,作战方向是伯力—哈尔滨—盛京;由阿穆尔军区部队的右翼组成的西伯利亚第三军团,基地为斯列田斯克,前方基地为老祖鲁海图、海拉尔和海兰泡,作战方向是分别经海拉尔、海兰泡直趋齐齐哈尔和盛京;由阿穆尔军区部队的左翼组成的登陆军团,基地为海参崴,前方基地为宁古塔,作战方向是宁古塔

① 尼古拉二世于6月27日授予阿列克谢耶夫战时独立军团司令的权力,主管华北战场,于7月9日责成他镇压旅顺口至盛京一线的“叛乱”,主管南满战场;同日,授予格罗杰科夫战时独立军团司令的权力,主管北满战场。参见《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1册,第29、78页;第2编,第1册,第78页。

② 截至7月13日,沙俄调集对华作战的军队数目为:

(1) 阿穆尔军区为54 $\frac{1}{4}$ 个营,39个骑兵连和哥萨克骑兵连,78门炮,共62480人;此外,从欧俄派出19 $\frac{1}{2}$ 个营,48门炮,共20500人,总共73 $\frac{3}{4}$ 个营,39个骑兵连和哥萨克骑兵连,126门炮,共82980人。(2)“关东省”加上从阿穆尔省到达的增援部队,除供北直隶作战的部队以外,还有18个营,13 $\frac{1}{2}$ 个骑兵连和哥萨克骑兵连,56门炮,6 $\frac{1}{4}$ 个技术兵连,共23330人。(3)专供北直隶的作战部队为8个营,3 $\frac{1}{2}$ 个连,4 $\frac{1}{2}$ 个哥萨克骑兵连,16门炮,共9980人。以上总数为116290人。参见同上书,第1编,第1册,第84—85页。

吉林—盛京^①。其中以旅顺口、海兰泡和伯力三路为主力。俄军的策略是分兵合击，将中国东三省的守军吸引到边陲各地，使其彼此不能相顾，然后各个击破，迅速控制三省的交通线，攻占三省省会，打垮三省的指挥系统，全面占领东三省。

7月上中旬，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正处于高潮，俄军与西方列强的军队在华北战场上十分吃紧，解决华北问题成为沙皇政府当务之急。7月14日，库罗巴特金在奏折中指出：目前攻占北京“具有世界意义”，只有结果北京政权，才有可能迅速扑灭满洲的大火并使蒙古以及东土尔克斯坦（按：指新疆地区）的火灾不致发生^②。于是沙皇政府决定集中力量参加华北战场的作战，把全面进攻东三省的军事行动推迟到7月下旬。

阿列克谢耶夫所指挥的旅顺口的俄军，因承担华北和南满两个战场的作战任务，兵力分散，在7月底和8月初占领盛京省的营口和海城之后，不得不停止向北推进，转而集中兵力向北京进军。进攻东北的其他各路俄军，于7月下旬从东北的西、北、东边境地区分头出动，长驱直入，按预定方向直插东三省腹地。

二 俄军的血腥暴行与东北军民的英勇抵抗

（一）海兰泡—齐齐哈尔

7月31日，陆军中将格里布斯基发布进攻瑷珲的命令。8月1日夜，俄军47个半步兵连、8个哥萨克骑兵连，配备50门大炮和5艘轮船，在陆军少将苏鲍季奇的指挥下，向瑷珲上游70华里的黑河屯发起进攻^③。

俄军选择黑河屯上游7华里的五道崮洛为登陆点。为转移中国守军的注意力，俄军出动“色楞格”号等兵轮在黑河屯以下的江面上穿行，不断向岸上开炮。部署在瑷珲对岸的俄军，同时以猛烈的炮火轰击瑷珲城，造成即将从江岸登陆的假象，牵制瑷珲驻军对黑河屯的支援。黑河屯守将统领崇玉误认为俄军企图在精奇里江口对岸登岸，忽视了侧翼的防守，给俄军以可乘之隙。集结在上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俄军于8月2日凌晨1时和3时半偷渡过

^① 陆军中将库罗巴特金奏折，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1册，第139—140页。

^② 同上书，第1编，第1册，第99页。

^③ 格里布斯基给布拉戈维申斯克部队攻占瑷珲的命令，1900年7月31日，第20号。参见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瑷珲》，第85—89页。

江,未遇任何抵抗便在五道崮洛登陆,接着进攻黑河屯中国守军的侧翼,江面上的俄轮集中火力从正面轰击^①。

中国军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坚持作战,重创俄轮“色楞格”号^②,给从江面进攻的俄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对侧翼进攻的敌军,也进行了顽强抵抗。据俄国军官记载,“中国人百折不挠。一个中国士兵被哥萨克砍落马下”,他“仍然仰面向哥萨克开枪”^③。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中午12时,中国军队因伤亡过重,被迫放弃黑河屯^④,一路边战边退,至大四嘉屯驻守^⑤。

俄军占领黑河屯后,立即进行血腥屠杀和洗劫,“将未及逃走的居民全部杀戮投入火堆”^⑥,连妇女和儿童也无一幸免;“把仅有的几座完好的建筑物付之一炬”^⑦。“全部夷平了一个拥有五千或六千名居民的城镇”。这一扫荡一直扩大到黑龙江右岸的“每一个居民点”^⑧。扫荡后的江岸地带,“无论哪里都看不到中国村民,也看不到一座中国人的房子,只是偶尔有一些燃烧着的卡伦闪着火光”^⑨。这些富庶的中国村庄,顿时变成了一片片的废墟。

8月3日,俄军主力沿通向瑷珲的驿道进攻坐落在黑河屯和瑷珲之间的卡伦山,另一路俄军向瑷珲右翼迂回,准备切断中国瑷珲守军退往齐齐哈尔的大道,部署在江东六十四屯的俄军继续以猛烈的炮火轰击瑷珲城,协助岸上的俄军进攻^⑩。

卡伦山是中国瑷珲守军的一个重要阵地,林木茂密,地形盘错,中国官兵和义和团顽强地抵抗来犯之敌。俄军先头部队一到达,就遇到中国军队“密集而又强大的火力”射击,被迫退出山前的丛林^⑪。在炮火的掩护下,敌

① 孙蓉图:《瑷珲县志》,第8卷,第29—30页;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瑷珲》,第93—94页。

②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228页。

③ 维列沙金:《满洲旅行记(1900—1901年)》,第13页。

④ 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瑷珲》,第95页。

⑤ 孙蓉图:《瑷珲县志》,第8卷,第30页。

⑥ 石光真清:《谍报记》,第28页。

⑦ 伦森:《俄中战争》,第117页。

⑧ 古奥尔基·莱恩奇:《文明的战争》,第308页。

⑨ 维列沙金:《满洲旅行记(1900—1901年)》,第17—18页。

⑩ 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瑷珲》,第102—105页。

⑪ 同上书,第106页。

人以四个骑兵连的兵力“举行多次猛烈的冲锋”^①，守军则全线出击，包围敌军两翼，并从正面向敌军发起进攻^②。敌人以强大的炮火集中轰击山上的阵地，守军被迫撤退。当哥萨克骑兵连长沃尔科夫率骑兵冲上卡伦山夺取中国守军的大炮时，中国炮手毅然引爆坐在身下的火药箱，沃尔科夫和几名哥萨克当即被炸成齑粉^③。这位无名英雄用他的热血谱写了中国人民抗俄斗争史的壮丽篇章。俄军攻占了卡伦山，中国守军退入附近的村庄继续抵抗。村中两个弹药库中弹爆炸，草房起火，烈焰冲天，中国士兵和义和团战士冒着浓烟烈火顽强战斗，直到午后失去一切隐蔽物后，退往瑗珲城边的头道沟驻守^④。

8月4日，俄军抵瑗珲城郊。苏鲍季奇率主力沿驿道从北面进攻，另一路俄军在瑗珲以南登陆，堵截沿江通道，第三路俄军绕瑗珲侧翼，堵截通往齐齐哈尔的驿道，大批兵轮从江面炮击瑗珲城，造成水陆三面夹攻的局面。中国瑗珲守军，除阵亡、负伤者外，只剩3000余人。黑龙江副都统北路翼长风翔，分兵三路，“死力拒敌”^⑤。俄军进入城郊，中国官兵坚守阵地，许多战壕和工事，都是经过逐个争夺才易手的；“三四百名中国步兵英勇不屈地战斗到底，直至全部牺牲，个别幸存者宁愿自尽也不投降。”俄军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才于晚上7点钟把“战线推到瑗珲城前”。俄军从江面登陆的部队，也“遇到了比预期更为强烈的抵抗”，“渡江也被推迟了”。^⑥

瑗珲被炮击起火，凤翔率部队和难民夺西门退出。从侧翼迂回的俄军截住西门大桥，切断通往齐齐哈尔的驿道。凤翔指挥炮兵打退俄军，率军民冲出包围，当夜沿通往省城的驿道退至额裕尔站^⑦。

留在城内的清军继续坚守，俄军总攻击被推迟至次日天明。当俄军进入瑗珲城时，“中国士兵和居民据守房屋进行顽强抵抗”，“几乎每所房子”俄

①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108—109页。

② 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珲》，第106页。

③ 同上书，第108页。

④ 孙蓉图：《瑗珲县志》，第8卷，第30页；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珲》，第115—117页。

⑤ 同上。

⑥ 伦森：《俄中战争》，第119页。

⑦ 孙蓉图：《瑗珲县志》，第8卷，第30—31页。

军“都必须通过战斗才能占领”^①。“中国人死守着炮架直至阵亡，有的纵火焚烧房屋，在火焰中死去，表现出最后的宁死不屈的精神。”^②俄军攻打瑗珲城外的一座火药库，8名中国士兵和1名军官从毗邻的房子里向俄军猛烈射击，俄军点燃了屋顶，强迫投降，中国官兵“不愿投降，炸毁了房屋”，在天地轰鸣声中壮烈牺牲，同时炸伤了8名俄国强盗^③。黑龙江世管协领玉庆，城陷被俘，以俄语骂敌，身受离割，仍“誓不绝口”，直到最后一息^④。

中国军民这种宁死不屈的气概，使侵略者惊恐万分。一个亲历这次战斗的俄国人评论说：“总之，令人惊讶的是‘和平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像真正的英雄。假若他们的长官不是那样的卖国求荣、腐败无能和侵吞薪饷，而让士兵自谋衣食的话，那么俄国人占领瑗珲的代价远不会如此低廉。甚至，被摧毁的可能不是瑗珲，而是布拉戈维申斯克。”^⑤

8月5日，俄军占领全城，“四向焚烧，满城烟火，鸡犬飞噪，数千余房，毁尽为墟。”^⑥这座具有二百余年历史、上万人口的瑗珲古城顷刻化为瓦砾，仅留下清军的营盘和火药库为俄军专用^⑦。

8月12日，格里布斯基颁布“条例”说，凡“我军所占领的整个满洲地区，今后不受中国当局的管辖，完全置于我们的权力和法律之下。”“前中国瑗珲城和黑河屯居住地及其附近的领土，将暂时交给军事当局单独管辖，绝对不许任何个人在前瑗珲城与黑河屯居住地及其附近地区居住。”^⑧

8月14日，格里布斯基将黑河屯和瑗珲城分别改称“伊利亚哨所”和“玛丽娅·玛格达丽娜哨所”^⑨，并带领官员、军队和宗教人士在黑河屯的废墟上举行感恩仪式，庆祝“伊利亚哨所”的命名。大司祭科罗普罗夫说：“现在在阿穆尔河彼岸竖立了十字架，该地昨天是中国人的。穆拉维约夫曾

① 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珲》，第124页。

② 伦森：《俄中战争》，第120页。

③ 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珲》，第135—136页。

④ 李述：《程中丞庚子函牍钞略》，第33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四，第12772—12773页。

⑤ 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珲》，第124页。

⑥ 孙善图：《瑗珲县志》，第8卷，第30页。

⑦ 格里布斯基致陆军大臣电，第810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231—232页。

⑧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5号（1901年），第23号附件1。

⑨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3557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253页。

预言，此岸迟早会属于我们的。”^①

在这伙侵略强盗欢欣鼓舞，感谢上帝赐福的同时，黑河屯的“废墟上还冒着烟”，黑龙江上还漂着被他们投入江中的“和平的中国居民的尸体”^②。中国大地上血与火的惨景组成了沙俄侵略者的“文明”征服图。

璦琿的占领，大大膨胀了沙俄领土扩张的野心。格罗杰科夫在给尼古拉二世的贺信中写道：“五十年前的八月一日，涅维尔斯科依在阿穆尔河口的左岸升起了俄国旗，并奠定了我们对这条伟大河流的所有权。现在，经过顽强战斗，我们占领了阿穆尔河的右岸”，从而“巩固了把整个阿穆尔河归并于俄国领土之内（使该河成为内河，而不是界河）的伟大事业”^③。沙皇在信上批示道：“我衷心感谢军队打得漂亮。”对格罗杰科夫妄图吞并大片中国领土的叫嚣表示赞许。几天后，格罗杰科夫提出归并“阿穆尔河全部右岸”的方案，将俄中边界向南推进，以大兴安岭、伊里胡里阿赖、小兴安岭、那兰哈达、肯特阿赖、老爷岭等山的山脊划界，“把额尔古纳河、阿穆尔河的右岸和乌苏里江的左岸”大片中国领土划归俄国版图。同时，他还提出在黑河屯一带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要塞作为俄国继续推行武力征服政策的可靠支柱^④。由于沙皇政府当时正集中全力夺取整个东北，不愿为吞并东北的一部分领土过早地冒国际风险，便将这一方案暂时搁置下来。但俄军长期赖在璦琿地区不走，直到1906年才将璦琿地区交还中国。

俄军经过几次扫荡在璦琿站稳脚跟之后，立即向齐齐哈尔进攻。格里布斯基向中国居民发布布告说：“璦琿城和阿穆尔河沿岸的村庄已被焚毁；你们的军队已被战败；满洲人尸横遍野，血染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俄国人很快就要来到你们所有的城镇和乡村。……如果任何人胆敢枪击和刺伤俄国人，你们就将大祸临头。我们就将举火把所有的村庄或城镇烧毁，不让一个人活着。”^⑤这篇文告毫无掩饰地暴露出沙俄帝国主义极端野蛮凶残的本性。俄军当局妄想以血腥烧杀来瓦解东北军民的反抗意志，但事实恰恰相反，酷爱独立自由的东北军民掀起了更为坚

①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1号（1901年），第375号附件1。

② 古奥尔吉·莱恩奇：《文明的战争》，第307—308页。

③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3551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239—240页。

④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1929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294—295页。

⑤ 伦森：《俄中战争》，第124—125页。

决的抵抗。

凤翔撤离瑗琿后，且战且退，行抵额裕尔，与从省城赴援的两营义胜军会合，当即利用有利地势，督率各队组织阻击。8月7日，俄军骑、步、炮兵1000余人在连年刚博夫少将率领下从瑗琿尾随而来。难民络绎于途，俄兵刀砍枪击，死者枕藉^①。俄军气势汹汹地进入额裕尔，立即陷入两山之间的沼泽地里，进退维谷。凤翔抓住时机，挥军包抄敌人两翼，从中路冲向敌阵^②。中国官兵奋勇向前，毙伤敌军官兵37名，战马46匹，打败了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连年刚博夫汇合3个步兵营、1个骑兵连和1个炮兵连的援军^③，再次反扑。凤翔“督兵相杀上下数次”，终因“阵亡太甚”，连夜撤往兴安岭凭险据守^④。他“齐集各军”，伏兵“于岭下两旁山侧”，准备待敌兵深入“岭底”，即从四面“包击”^⑤。

8月10日，俄军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伏兵不待敌人主力深入，便仓促开炮，过早暴露了作战意图^⑥。连年刚博夫指挥俄军冲击凤翔的中路和右翼，并分兵向主阵地后方迂回，实行反包围。凤翔督军反击，将正面进攻之敌切为两截，同时打退了从侧翼包抄的敌人^⑦，粉碎了俄军的反包围。凤翔在作战中“右臂左足两受弹伤，坠马者三，辄复跃上，鏖战不休”^⑧，不幸坠马身亡^⑨。统领恒玉接替凤翔指挥全军，清军将士在凤翔爱国精神的激励下奋勇向前，毙伤俄军65人^⑩，逼其“败退三十余里”^⑪。

8月14日，恒玉接任北路翼长，继续“凭据岭险，布置战守”。由于中国守军“抵抗顽强”，俄军共集中了6个步兵营，5个半骑兵连，20门大炮，

① 李途：《程中丞庚子函牍钞略》，第36页。

②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3227号、第3239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164、179—180页。

③ 同上书，第179—180页。

④ 孙蓉图：《瑗琿县志》，第8卷，第31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3544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227页。

⑧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四，第12772—12773页。

⑨ 孙蓉图：《瑗琿县志》，第8卷，第31页。

⑩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319页。

⑪ 孙蓉图：《瑗琿县志》，第8卷，第31页。

于16日黎明再次进攻北大岭^①。恒玉督率官兵浴血奋战，重创俄军，但孤军无援，武器落后，统领崇玉战死，“各军官长上兵死伤无数”，不得已于当晚撤往博尔多站^②。俄军随即过岭，于17日攻陷墨尔根城（今嫩江县治）^③。

大岭失守后，寿山派行营营务处总理程德全北上监军。程德全行次博尔多，正值谟讷尔河水暴涨，数万难民哭号争渡，而站上兵不满千，已无力组织抵抗。19日，寿山接到清政府的议和令，当即指派程德全与俄军议和^④。

22日，连年刚博夫至博尔多河北岸，格罗杰科夫命令他“不和中国人谈判，坚决向齐齐哈尔进攻”^⑤。程德全三次赴俄营求和，企图阻止俄军前进，均遭拒绝。24日，俄军渡过谟讷尔河，29日进占齐齐哈尔。寿山自杀，黑龙江省失陷^⑥。

8月30日，连年刚博夫入齐齐哈尔城，“先将将军府什物掳掠一空，复将练饷、兵饷及各杂款银钱，并军械、军装、火药库、军器库及一切官物”等尽行强占和劫走，又将“各官所存储书籍、律例、案卷、舆图、藏经、战图”等“搜罗一空”^⑦。自齐齐哈尔副都统以下各官备受俄兵凌辱，驱之如牛马。至于百姓，更是如蹈水火。瑗珲、呼伦贝尔、墨尔根、布特哈及台站20余处人民流离失所，齐奔省会而来。俄兵沿途追杀，不留孑遗。仅从墨尔根至博尔多的路上被俄兵砍杀的难民就达150余人^⑧。难民逃至省城，命运更为悲惨。28日，俄军从北、东、西三面包围齐齐哈尔，难民涌向南门，俄军对准人丛开炮，“击死逃出兵民无数”^⑨。俄国兽兵淫掠无忌，将成群难民围在江边。妇女不甘受辱，不少人投江而死。侥幸活下来的居民，也处于“啼饥号寒、露宿风餐，疮痍满目，惨不忍睹”的绝境。后来瘟疫流行，日死“七八百数”，昔日繁荣的省会，变成了一座“市断人稀，街面几无人迹”的

①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808号、第3595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252、253、274、275页。

② 孙蓉图：《瑗珲县志》，第8卷，第31页。

③ 李述：《程中丞庚子函牍钞略》，第2页。

④ 同上书，第37页。

⑤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4027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339页。

⑥ 李述：《程中丞庚子函牍钞略》，第39页。

⑦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45页；下册，第844页。

⑧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3669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306—307页。

⑨ 孙蓉图：《瑗珲县志》，第8卷，第32页。

死城^①。

(二) 伯力—哈尔滨

7月18日,沙俄总参谋部少将萨哈罗夫率舰队从伯力附近的米哈依洛谢苗诺夫斯卡娅驶入松花江,占领富锦县的拉哈苏苏,在该地安设大炮,留兵驻守,作为第一个设防点,以为后援^②。随后,舰队继续沿江上行,于7月25日驶抵三姓。驻扎在城外倭肯河右岸的清军开炮拦击。俄军登岸,将三姓城四面围困,枪炮齐施。守军在枪林弹雨之中奋力抵御,“阵亡八十余名”,退回三姓城,会合主力,凭险拒守^③。三姓城由松花江、牡丹江、倭肯河三面环护,江中浅滩密布,俄轮无法靠近。清军又在狭窄的沙滩地带筑起战壕,派兵防守,使俄军遇到严重困难。萨哈罗夫于27日写信给三姓护理副都统依英阿,约他在指定地点“谈判”,企图诱降^④。依英阿慑于军民的压力不敢同意“谈判”,但又不作认真抵抗。27日,俄军占领城北的倭肯砬子,第二天居高临下,以重炮向城内轰击,同时一部分步兵涉过浅滩,猛攻城北^⑤。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依英阿率一部分清军弃城逃走,严重地削弱了守军的战斗力。留城的清军奋勇作战,炮兵表现“坚毅不拔”,步兵也十分顽强,他们从所有的掩体里阻击俄军前进,击毙击伤戈尔斯达耶夫中校等俄军官兵8人^⑥,使敌军无法靠近三姓城。从上午九时起,俄军炮击三姓城3个小时,中国官兵“阵亡者一百十三名”,城中起火,“百姓逃生,哭声遍野”^⑦。下午清军撤出,三姓城失陷。

三姓素称松花江第一要口,储存大量作战物资。俄军仅大炮就获取22门,至于枪支弹药,官府银两,民间财产,更无法计数。俄军抢劫之后,继以烧杀,将富克锦至三姓沿松花江“两岸居民房舍尽数烧毁,遇有男妇老

① 孙葵图:《绥化县志》,第8卷,第33页。

② 陆军中将库罗巴特金奏折;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2册,第111页。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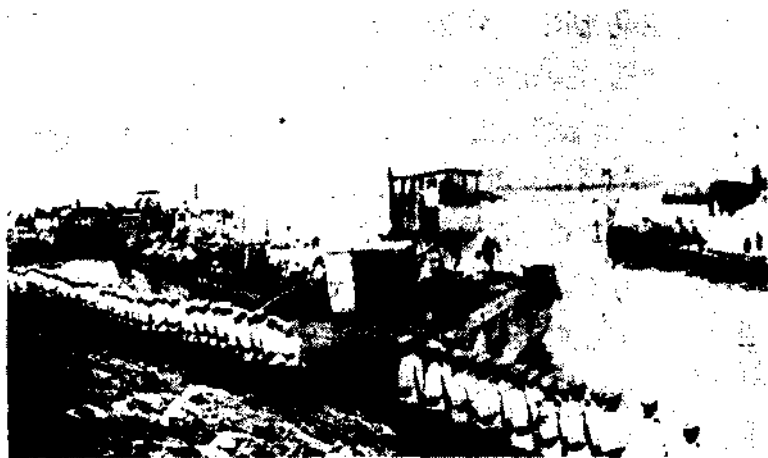
③ 杨步燾:《依兰县志》,政治门,兵事,第17页。

④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3029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57—58页。

⑤ 杨步燾:《依兰县志》,政治门,兵事,第17页。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3029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58—5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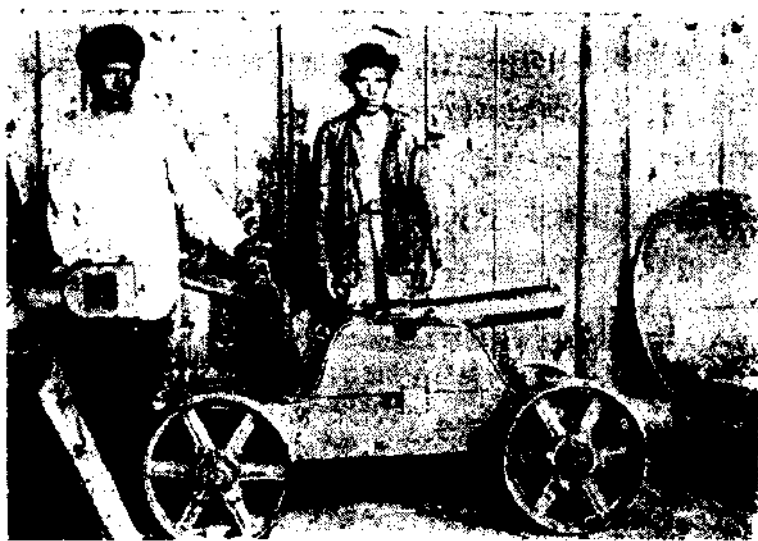
⑥ 同上。

⑦ 同上。



沙俄侵略军在哈尔滨登岸（1900年）

（采自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



驻哈尔滨俄军铸造的大炮（1900年）

（采自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

幼 或在家看守房屋，或出外逃生者 一概杀戮，不留一人。”^① 萨哈罗夫洗劫三姓后，驱轮上行，进攻呼兰。

7月28日，俄军两艘先遣舰到达呼兰，中国驻军“集于呼兰河口”阻击，俄舰攻石头河，被统领孙自镛击退^②。8月3日，俄主力舰队到达，俄兵登岸劫持清军辎重队，孙自镛兵出击，与俄兵交火，牺牲30余名^③。此后中国军队据守江北，俄舰队通过呼兰河口，于当晚驶抵哈尔滨松花江码头。

在萨哈罗夫率军进入松花江后，格罗杰科夫自7月30日起陆续派出后续部队乘船西进，与萨哈罗夫会合。8月3日这天，共有骑、步炮兵6000余人，分乘70余艘舰只到达哈尔滨^④。哈尔滨原有350名俄军，两批俄军会合后，即以哈尔滨为基地，四路出击。

俄军到达哈尔滨后，松花江沿岸军民并未停止反抗。8月上旬，巴彦苏苏驻军几乎每天都射击在松花江上来往的轮船^⑤。萨哈罗夫为控制航道，首先派兵占领巴彦苏苏对岸的巴彦通要塞，并在该地建立兵站，设炮驻军据守，同时派出七艘战舰在松花江上巡航^⑥，凡曾阻击过俄国轮船的中国村镇悉被摧毁。

俄军摧毁松花江沿岸清军据点后，便北攻呼兰，南侵阿城。8月10日，6艘俄舰“复攻石头河”，清军“力战二时许”，兵丁阵亡45名，遂退达子营驻守^⑦。8月底，省城齐齐哈尔沦陷后，呼兰、巴彦军民仍坚持抗战，多次挫败俄军，9月1日，俄军攻入呼兰城南五里的包家店，纵火焚烧民宅，炮轰呼兰街口，清军发炮还击，毙伤俄兵27名^⑧。俄军受挫，转攻巴彦苏苏。10月5日，同知铭琦、协领聂车布投降^⑨，巴彦沦陷，使呼兰失去犄角而成

① 长顺：《为俄罗斯占据东三省拟请按照公法与之理论事》；曹廷杰：《拟放姓属荒地章程》，手抄本，第2册。

② 黄维翰：《呼兰府志》，第8卷，武事略，第32—33页。

③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3241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180页。

④ 库兹涅佐夫：《1900年的满洲暴动》，第51页。

⑤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3544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226页。

⑥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3581号；同上书，第3编，第2册，第261—262页。

⑦ 黄维翰：《呼兰府志》，第8卷，武事略，第33页；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57—558页。

⑧ 黄维翰：《呼兰府志》，第8卷，武事略，第35页。

⑨ 同上。

为一座孤城。10月12日，萨哈罗夫以俄马队一营于呼兰口子登岸，抄呼兰后路，“又以兵轮四艘，载步兵溯呼兰河而上”，猛攻呼兰城。守城清军孤立无援，统领孙自谔率军退往北团林子，当天呼兰失陷^①。

俄军攻占呼兰后，兽性大发：闯入民宅，奸淫妇女，杀伤无辜，焚烧民宅，扣压人质，强征劳工，运走枪械，勒索米面牛酒，无所不用其极。据呼兰方志统计，呼兰、巴彦二城死伤人口218名（不包括阵亡的官兵），焚毁房屋2004间，损伤庄稼2万余垧，巴彦协领署营房案卷全被焚烧^②。俄兵的抢劫更是惊人，首饰、衣服，乃至鞋子无所不抢。一个俄国目击者写道：“从各方面看，这伙形形色色的满洲的征服者都是很奇怪的：他们的哥萨克制服不翼而飞，一个人穿着中国人肥大的长袍，另一个穿着蛮子（指汉人。——引者）短袄和绸小褂；一些人戴着古怪的中国帽，另一些人则穿着靴鞋和绣花鞋，甚至很多人手上还装饰着中国银镯和戒指”。“这伙野兽似的败类其纵欲和嗜血的本性是无止境的”，“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显出发财的欲念和无止境的纵情淫乐的心理。”^③

早在8月9日，格罗杰科夫命令萨哈罗夫竭尽全力占领哈尔滨至牡丹江的铁路，以便与从双城子出发的俄军会合，并在可能情况下切断齐齐哈尔与吉林的水上交通^④。萨哈罗夫于是改变原拟从哈尔滨进军盛京的方案，集中主力由哈尔滨东进。

位于哈尔滨以东40华里的阿城，是阿勒楚喀副都统的治所，从7月以来这里屯驻约3000名中国军队，控制着哈尔滨通往牡丹江和吉林的通道，成为东侵俄军的必争之地。萨哈罗夫责成尤哥维奇致函阿勒楚喀副都统钮楞额，提出阿城驻军撤往吉林和东省铁路复工等8项要求^⑤。钮楞额复信说，东省铁路复工必须以俄军撤离东北为前提，拒绝俄军的要求^⑥。萨哈罗夫诱降失败，于8月17日率15个步兵连、12个骑兵连，配备16门大炮，向阿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95页；黄维翰：《呼兰府志》，第8卷，武事略，第33页。

② 黄维翰：《呼兰府志》，第8卷，武事略，第33页。

③ 库兹涅佐夫：《1900年的满洲暴动》，第94—95页。

④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3241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180—187页。

⑤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20页。

⑥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302页。



中国阿城信差知照俄军撤出所占要塞(1900年)

(采自尼科尔斯《东省铁路沿革史》)

城进攻^①。第二天，俄军强占阿城。萨哈罗夫下令捣毁副都统衙门及其他官邸，将城墙夷为平地^②。在攻城之前，钮楞额就率主力退往拉林河，留城的清军战败后也相继南撤，与钮楞额一同退往吉林。萨哈罗夫很快控制了阿城、双城等地，轻而易举地切断了齐齐哈尔与吉林的交通。

8月24日，萨哈罗夫派东省铁路护路军司令葛伦格罗斯率俄军从哈尔滨沿铁路东下，向牡丹江进军。杰尼索夫上校尾随其后，重建阿城至牡丹江一线的铁路哨所^③。25日，俄军进入帽儿山附近的峡谷，守卫在该地的一部分清军奋勇出击，一大批义和团战士“挥舞刀剑，直奔骑兵杀来”，他们前仆后继，穿过敌人的散兵线，进行英勇肉搏。义和团牺牲20余人，其中大半

①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362页。

② 同上书，第316页。

③ 同上书，第311页。

是十二三岁的童子^①。义和团的这种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勇敢精神，连沙俄侵略者都为之惊叹^②。但因这一线的清军在阿城失守后大部分相继撤走，帽儿山的军民未能阻止俄军的前进。9月3日，葛伦格罗斯抵达牡丹江，与盘踞在那里的俄军会师^③。由于哈尔滨至牡丹江一线的铁路上被杰尼索夫占领，从双城子进入牡丹江的俄军便取消了向哈尔滨进军的计划，转攻宁古塔。

（三）斯列田斯克—齐齐哈尔

7月24日，沙俄组成西伯利亚第三军团，军团司令部设在尼布楚^④。该军团兵员主要由外贝加尔哥萨克组成，从7月初陆续集中在斯列田斯克。从斯列田斯克至海拉尔只有一条供俄国铁路人员通行的小路，不宜大部队和辎重通行。沙俄军事当局为使俄军尽快地出现在海拉尔一线，决定先派出该军团的一半人向齐齐哈尔方向进军。其作战意图是吸引中国齐齐哈尔驻军的注意力^⑤，配合从海兰泡和伯力出发的俄军主力部队作战。

7月25日，奥尔洛夫少将率两营先头部队到达阿巴该图，与从中国境内撤出的一个护路军骑兵连会合后，越过中俄边界，沿海拉尔河左岸东进^⑥。

呼伦贝尔副都统西路翼长依兴阿对阿巴该图一线没有设防。奥尔洛夫长驱直入，于7月29日占领完工车站，威胁呼伦贝尔城（今海拉尔市）。

7月30日，依兴阿驱军西进。当时盘踞在完工车站的敌军只有3个连的兵力，采取守势。战斗从清晨3时半开始，中国军队深入俄军阵地1000余码，敌人处境危急。但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军队的指挥者犹豫不前，给俄军以反扑的时机。中午俄军后续部队到达，总兵力达2500人，并配备8门大炮。午后，俄军反攻，中国部队损失200余人后，边战边退^⑦。阻击部队从树丛和掩体内顽强射击，不少侵略者饮弹毙命，俄军司令官奥尔洛夫也几乎丧生。战场上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中国官兵以殊死战斗保卫国土，一个身

①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312—313页。

② 同上书，第314页。

③ 同上书，第316页。

④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1册，第148页。

⑤ 同上书，第2编，第1册，第90页。

⑥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134页。

⑦ 陆军中将库罗巴特金8月3日奏折；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2册，第8—9页；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136—137页。

材魁梧的战士高举大旗，威严地逼向敌人面前，一群士兵在他的感召下奋勇厮杀。这位无名英雄迎着敌人的枪弹倒下了，其余官兵全部战死，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的鲜血染红了呼伦贝尔草原^①。

完工战役是中国呼伦贝尔军民与沙俄侵略军第一次认真的较量。中国军队数量上占优势，士兵们作战勇敢，杀伤不少俄军，一度迫使敌人后退，但由于指挥失误，结果导致不应有的失败，挫伤了广大爱国官兵的士气。

完工战役后，依兴阿仓忙率军东撤。8月4日，俄军没有遇到抵抗即占领呼伦贝尔城，获得11200普特粮食，150箱茶叶，以及其他大量军需物资^②。

8月11日，俄军先头部队穿过牙（雅）克石车站，占领牙克石山口。统领保全当日率所部由札兰屯奔赴前敌^③。第二天举行反击，夺回牙克石山口，逼俄军败退30余里^④，同时收复乌牛河大桥，再次逼敌后退，13日，又夺回大道以南4座山梁，“追出十余里”^⑤。保全出师后接连获胜，使西线俄军大为惊慌。奥尔洛夫急调后续部队一旅，于14日发动全线反攻^⑥。保全督令全军奋勇出击，从晨6时起，激烈交战直到下午1时，多次逼敌后退，并一度突入敌军右翼。下午2时，俄军后续部队到达，总兵力达4300人^⑦，战局突变。当战斗进行到最危急的时刻，保全手擎军旗，“大呼陷阵”，挺身冲到全军阵前^⑧，以视死如归的精神激励将士奋战到底。保全不幸殉国，军中失去统帅。接着天降倾盆大雨，中国军队阵地被淹，俄军乘机大举反攻，清军付出巨大伤亡，撤往兴安山口。

牙克石战役后依兴阿被革职听参，统领全德护理呼伦贝尔副都统，负责指挥西路清军作战。这时西路军仅义胜军左路五营和省城新拨义胜军左右两

① 伦森：《俄中战争》，第170页。

②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267页。

③ 辽宁省档案馆等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1981年沈阳出版，第566页。

④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140页。

⑤ 辽宁省档案馆等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第567页。

⑥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276—277页。

⑦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141—142页。

⑧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213页；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97页。

营尚有作战能力，总兵力约 3000 人^①，只能采取守势。全德将全部军队集中在雅克岭的兴安山口，凭险据守，以保省城。

8 月 23 日，俄军先头部队占领伊列克得车站，另一路俄军袭取山口南边的火燎沟，截断清军退路，从侧翼包抄兴安山口^②。8 月 24 日，俄军主力从伊列克得正面攻击，清军腹背受敌，四处溃散，兴安山口陷落^③。此后，奥尔洛夫未遇到任何抵抗就到达富拉尔基。

由于连年刚博夫已于 8 月 29 日抢先占领齐齐哈尔，奥尔洛夫便经齐齐哈尔南下，于 9 月 11 日进占伯都讷城。21 日，俄军将伯都讷副都统嵩昆劫往呼伦贝尔，抢劫白银 32499 两又 11 箱，市钱 11440 千，谷物 2394 仓石，以及副都统衙署的全部档案^④。9 月 22 日，奥尔洛夫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于 9 月 27 日返哈尔滨^⑤。

（四）海参崴—宁古塔—吉林

这一线侵华俄军分为两路，由沙俄南乌苏里军政长官陆军中将奇恰戈夫统一指挥。一路出双城子，进占牡丹江；另一路从新基辅斯克出发，进攻珲春。

前一路俄军于 7 月 25 日集中于牡丹江车站，和撤往这里的沙俄护路军会合后，分出一部分兵力沿铁路线赴哈尔滨，其余部队驻扎在牡丹江车站一带，等待后一路俄军占领珲春以后，合兵进攻宁古塔。

进攻珲春的俄军由 3 个步兵团、3 个炮兵连和 2 个骑兵连组成，在艾古斯托夫少将率领下，于 7 月 30 日夜抵达珲春城外。第二天早晨 5 时战斗开始，俄军首先扑向黑顶子，驻守该地的一营清军退回珲春，俄兵直抵城下。珲春炮台发炮迎击，毙伤俄军 12 人。战斗进行到晚上 8 时，珲春东炮台震裂失守，西炮台失去应援，帮办英联撤往凉水泉子，当晚珲春失陷^⑥。

俄军入城，捣毁珲春副都统衙署，将民房市廛烧毁过半。沙俄海参崴当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897 页。

②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 1900 年满洲事变概要》，第 145 页。

③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 年俄国在华军事资料》，第 3 编，第 2 册，第 379 页。

④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932 页。

⑤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 1900 年满洲事变概要》，第 149 页。

⑥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 775 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 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 3 编，第 2 册，第 41—42 页；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425 页；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 3 卷，第 805 页。

局专门派出的文化侵略分子鲁达科夫教授将珲春所有图书、档案搜掠一空。俄兵烧杀之后，大肆抢劫，从金银器皿到簪环、手镯、戒指、钮扣等妇女的装饰品尽被掠走拍卖。在沙俄强盗的洗劫下，这座古城到处是“燃烧着的屋架，一片片房屋均已荡然无存。举目四顾，只有一个个黑乎乎的烟囱”^①。



沙俄掩埋被吉、江军民击毙的“护路军”军士（1900年）

（采自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

俄军占领珲春后，便全力进攻宁古塔。从珲春至宁古塔 220 俄里，道路难行，粮食供应困难；而从绥芬河至宁古塔只有 78 俄里，补给线较短。俄军鉴于这一情况，决定占领珲春的部队停止前进，集中兵力于牡丹江，然后攻取宁古塔^②。

8月2日，艾古斯托夫派部队沿牡丹江两岸前往艾河村侦察，中国驻军在村南高地上对来犯者猛烈射击，击毙俄军 19 名，战马 15 匹^③。俄军受挫后停止前进，等待后续部队的到达。

8月27日，两团俄军先后到达牡丹江车站。当天，艾古斯托夫指挥俄军

① 维列沙金：《满洲旅行记（1900—1901年）》，第41—44页。

②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783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92—93页。

③ 同上。

再次进攻艾河村。艾河是宁古塔中国驻军的一个重要阵地，位于牡丹江右岸，枕山带河，形势险要。但指挥者只考虑到防堵来自珲春的俄军，把火力点集中指向南方，而俄军恰恰从东方发起进攻，阵地的侧翼刚好暴露给敌人。28日，俄军未经严重战斗，就占领了艾河村^①。随后分两路纵队，直扑宁古塔。

艾河失守后，宁古塔副都统双龄步步退缩，将牡丹江右岸的清军全部撤往左岸，放弃牡丹江渡口，连渡船也丢给了敌人，大大便利了俄军的进攻。29日，俄军渡江，副都统双龄逃往额穆，宁古塔城不战而失^②。

吉林将军长顺早在8月25日即派已革记名副都统达桂到哈尔滨与尤哥维奇“议和”，约定以白旗相见。宁古塔沦陷后，俄军少将克雷热诺甫斯基率部队经额穆直扑吉林，沿途清军奉命未开一枪，举白旗投降。9月23日，俄军先头部队入吉林城，长顺投降，吉林省全部沦陷^③。

从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日起，长顺就采取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方针，当俄军大举入侵之际，更不顾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屈膝投敌。俄军一入吉林，首先突入长顺的衙署，“守住电机，索酒食，索铺陈，纷扰不已”，接着开始了野蛮的破坏和抢劫。9月24日，俄军“开放狱犯”，占据机器局，“将局员、司书、工匠、护兵悉行驱出”，“并将局中各物，莫不据为己有”。吉林机器局是清政府苦心经营将近二十年的军火工厂，所存价值不下数百万两的机器设备和枪炮、子弹、火药以及物料、银两等物，均被洗劫一空。俄军又将银元厂所存“银元、银条、银坯计重不下百数十万两，抢散大半”，余者用骡马饱驼而去^④。次日晚，俄兵将“江南火药两库轰毁”，“声震天地，商民惊惶逃走”，吉林城一片火海。此后，连年刚博夫、克雷热诺甫斯基、艾古斯托夫率大批俄军接踵而来，“沿途奸掠杀劫，惨不可言”。据长顺报告，仅黑龙江、松花江“上下江沿”，“死亡受害者不止十万名”，^⑤对此，长顺负有推卸不掉的罪责。当时，一位有见识的东北地方官员指出，“俄情狡狠，

① 格罗杰科夫中将致陆军大臣电，第783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1册，第136—137页；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327页。

② 戈里岑：《中东铁路护路军参加1900年满洲事变概要》，第161—163页。

③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藏：《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3—814页。

④ 同上书，第814、992页。

⑤ 长顺：《为俄罗斯占领东三省拟请按照公法与之理论事》。见曹廷杰《拟放姓属荒地章程》手抄本，第2册。

不因我之敢战而不争，亦不因我不战而见好”，长顺不战而降，“谓可取谅于俄，图安旦夕。是何异放虎自卫，求其不我祸也，势必不能。”^① 对待沙俄的武装入侵，只能以人民的民族战争挫败其侵略战争，舍此别无他途。

（五）旅顺口—盛京

这一线俄军的作战行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占领金州、营口和海城，第二阶段占领辽阳和盛京。

从6月中旬至7月上旬，沙俄驻营口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和南满支线工程师基尔什曼多次要求阿列克谢耶夫从旅顺口派兵，占领营口和营口以南的铁路沿线地区。但由于旅顺口的俄军全力投入北直隶战场，无力北顾，金州以北地区一直处于清军和义和团的控制之下。

7月14日，联军攻占天津，俄军压力大为减轻。22日，库罗巴特金致电阿列克谢耶夫转达沙皇的命令说，当前向北京进军尚处于准备阶段，天津的俄军暂不需要加强，命令阿列克谢耶夫利用进攻北京之前的间歇，迅速集中旅顺口的军队拿下营口及其以南地区，当进攻北京时，再从旅顺口和营口把军队调往北直隶战场。^②

阿列克谢耶夫接电后从天津赶回旅顺口，决定取消金州自治。27日，格罗姆切夫斯基上校率俄军占领金州，署副都统福升、协领继德、富伦等45名官员和士兵被押往旅顺口，后来转到库页岛做苦役^③。接着，阿列克谢耶夫到金州“视察”，命令俄军将金州建成一个巩固的军事要塞，架设各种大炮51门，机枪8挺，设立3座炮台，^④ 作为俄军向北推进的基地。

7月25日，俄军北上，进攻熊岳。熊岳城守尉逃往盖州，城中只有少部分清军和义和团据守。战斗一开始，义和团不顾敌人密集的炮火，成群地冲向敌人的火力点。他们只有低劣的冷兵器，又得不到清军的有力支持，大都壮烈牺牲。俄军未经严重战斗即占领了熊岳，随即转攻盖州。盖州驻军撤往牛庄，只有一支500人的队伍坚持战斗在熊岳和盖州之间，因兵力单薄，未能阻止俄军进攻，盖州于8月1日失陷。俄军一路实行所谓“示范性的惩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1页。

② 陆军大臣致阿列克谢耶夫电，第2529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2编，第1册，第157页。

③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10页；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60—61、256页。

④ 阿列克谢耶夫致陆军大臣电，第144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61页。

罚”，对“沿铁路居民，烧毁无遗类”。^①

熊岳、盖州失守，营口危急。清军翼长寿长赶赴牛庄，令营口道台坚守，并增派清军进入营口。道台畏敌潜逃，营口军民群情激愤。8月4日，义和团向领事馆区示威，驻守在那里的一连俄军开枪镇压，杀害拳民9人。清军奋起还击，冲向俄军防区。驻扎在市郊俄国居民村的俄军，在弗列依谢尔少将的指挥下攻打营口南门，停泊在浑河口的“勇敢”号等3艘俄舰炮击市区，清军退出，俄军于当天晚上入城，第二天早晨在海关和其他衙门公然以俄国国旗取代了中国旗^②。随后，阿列克谢耶夫任命俄国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为营口行政长官，授权他发布行政命令，向当地居民征收赋税，蓄意把中国的这一重要通商口岸变成在他管辖下的俄国港口^③。

营口失守后，盛京副都统晋昌将清军主力集中在海城和牛庄，此外，岫岩、复州至盖州地区还有几千清军，对俄军占领区构成一定的威胁。鉴于这一情况，阿列克谢耶夫以营口作为前敌基地，向大石桥集中了4个野战营、400名护路军和24门大炮，准备进攻海城；在营口、盖州、熊岳一带，配置10个步兵连、2个骑兵连和8门大炮，作为后卫，以保证后勤供应和通讯联络^④。总兵力为官兵7476人^⑤。

8月10日，俄军在弗列依谢尔的指挥下分三路纵队向海城进发^⑥。大石桥至海城66余华里，清军驻守在其间的邓家台、唐王山、亮甲山等高地和一些村镇里。俄军先头部队到达虎獐屯时，中国守城部队以猛烈炮火迎击，击毁俄军1门大炮，击伤许多战马。俄军入城后，四处放火以示“惩罚”，“火舌迅速地吞没了一座座楼房和一条条街道，几次爆炸声后，无数条白色的火龙冲上天空”，整个城镇顷刻荡然无存，“只留下一堆堆瓦砾和灰烬”。^⑦杀人强盗们将这种罪恶的火光作为庆祝他们胜利的“焰火”而加以欣赏，以毁灭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乐。

11日，俄军攻邓家台。清军以“小枪奋力御敌，自早至午伤亡相继”，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03页。

② 库莎科夫：《1900年南满之乱》，第112页。

③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55—59页。

④ 阿列克谢耶夫致陆军大臣电，第153号；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3编，第2册，第147—149页。

⑤ 同上书，第210页。

⑥ 同上书，第230页。

⑦ 库莎科夫：《1900年南满之乱》，第114—115页。

退向唐王山和亮甲山,“与守山之军会合捍御”^①。两山一带集中了大批清军、民团和义和团,并且配备有快速大炮。但指挥者寿长在编练仁字军和育字军时被夺去副都统职^②,临时启用为全军翼长,威望未立,致使各营清军处于互不统属的状态。晋昌亲临唐王山督战,但他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指挥系统,唐王、亮甲二山实际上是各自为战。署海城知县凤鸣守亮甲山,守军大都是临时招募的民团,不习战阵;唐王山又未及时援应,亮甲山首先被俄军攻取。亮甲山失守,唐王山三面受敌,大炮被敌军摧毁,晋昌惊慌弃山北撤,退据海城东北隅的双山^③。

俄军冲上唐王山占领清军阵地,埋伏在山下的义和团成群地杀上山来,企图把阵地夺回。俄军“向他们开起排枪,但却不能吓退他们的勇敢冲锋。前头的一些人倒下了,但后面的人仍然爬上了高地。一些十二三岁的童子、年青的姑娘、老年人全都可怕地冲向敌人”,进行英勇的肉搏战。一些童子和姑娘惨死在哥萨克的刀下,但另一些童子“仍抓住哥萨克脚,把他们从马鞍上拖下来,用牙齿狠咬”^④。这种勇敢行为,无疑是民族献身精神的集中表现。那种认为义和团是由于愚昧无知而充当了无谓的牺牲品的人们,无异于肯定了那些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民族败类们的可耻行为。

12日,俄军进攻海城。清军据双山开炮迎击。俄军被击毁“快炮一尊”,伤亡“数十人,凶威稍挫”,于是分派部队包抄。晋昌率清军撤往鞍山^⑤,海城沦陷。

俄军入城“大杀十日,近城二十里俱遭惨戮”,受害者“不下千余人”^⑥。大屠杀之后,俄军又在城内四出搜查,把找到的三四十名老人、妇女和儿童赶进一个帐篷里集中看管。到了晚上,这些中国人的住地变成了“一幅令人惊恐的野蛮图画”:两个老人倒在血泊里,他们遍体刀伤;一个肚子上受了伤的7岁的儿童在痛苦地抽搐。其余的人据说是被送往城外,但他们的命运更为悲惨。从水中救出的一个老太太说,她一家人从城中往外走,遇上了俄国兵,她丈夫被杀,她和女儿不甘污辱,从山上跳进了河里^⑦。海城经洗劫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87页。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第12061页。

③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87页。

④ 库莎科夫:《1900年南满之乱》,第123—124页。

⑤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87页。

⑥ 廷瑞等修:《海城县志》,第3卷,地理兵事,第44页。

⑦ 库莎科夫:《1900年南满之乱》,第127—128页。

后，万户萧疏，举目无人。

这时，联军已开始向北京进军。沙俄为在夺取对京津地区的控制权方面取得有利地位，决定从南满抽调大部分兵力开赴华北，从而将进攻盛京的战役推迟。北京失陷后，俄军重新集中兵力于南满战场。8月24日，库罗巴特金在奏折中指出：随着北京的占领和俄国使馆的解围，俄军在北直隶战场的军事行动已经完成，北直隶已不再是主要战场了，而“包括盛京在内的满洲战场正取代这一地位”。他决定抽调华北战场上的9营步兵、4连骑兵、2连炮兵、一个连半的工兵到旅顺口和营口，争取在月底开始攻取盛京^①。

沙皇政府为配合它即将在南满开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于8月25日电令驻法、德、英、美等国使节向驻在国政府发表声明，诡称俄国进军中国的目的，旨在保护使团和帮助中国政府恢复秩序，并没有“任何自私计划”，俟满洲秩序恢复以后，它将从满洲撤军。“声明”建议其他列强在北京政府恢复之前，将联军全部撤往天津，并表示俄国使团和军队将首先撤往天津^②。

沙俄在满洲战场攻城略地，图谋永久占领东三省，引起了其他列强的严重不安，特别是它独霸营口，招致了英、日帝国主义的强烈反对。在联军攻占北京前，由于共同军事行动的制约，列强之间尚能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但北京一经攻取，英、日与沙俄的矛盾立刻表面化。沙俄所谓将从东北撤军的“诺言”，正是为了暂时缓和这一矛盾，欺骗世界舆论，以使其能够顺利向南满进军，实现独占东三省的野心。俄军撤往天津是为了进犯南满，但“声明”却把这说成是为了恢复中国合法政府而采取的主动行动，从而骗取清政府的好感，以便在随后的谈判中牟取最大利益。沙皇政府认为，其他列强如不接受从北京撤军的建议，他们自然会在清政府的心目中造成更加恶劣的形象，更利于俄国从中渔利。正如苏联历史学家罗曼诺夫所指出的：这一建议的用意是指望产生这样的外交效果：“使俄国在中国政府心目中不同于其余外国政府。”^③

总之，这篇“声明”一箭双雕，以冠冕堂皇的词句，掩盖卑鄙肮脏的侵略意图，十足地暴露出沙俄外交极其阴险狡诈的特性。

①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编，第2册，第62—66页。

② 《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28—29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60页。

8月27日,库罗巴特金电令华北战场俄军司令利涅维奇中将立即执行沙皇的旨意,集中俄军于天津^①。此后,北京、杨村一带的俄军相继到达天津,并转赴旅顺口。从敖德萨出发的俄军经海路也陆续到达旅顺。这些部队沿铁路北上,至9月21日,海城共集中了约50个连,计9000人,28门大炮^②。同一天,沙俄南满部队司令苏鲍季奇抵海城,指挥俄军向盛京进攻。

盛京副都统晋昌把前敌部队布置在鞍山和牛庄,总预备队集中在沙河,准备将俄军引向纵深,由牛庄部队攻击俄军侧翼,最后将俄军包围在千山山脉。海城失守后,晋昌“收拾溃军,复经添拨新陈各军,共50营”^③,并配备有一定数量的克虏伯大炮等先进武器^④。但是,北京的失陷,吉林的投降,特别是清政府执行与列强“议和”的方针,再加上北来自吉、江两省和南来自营、海等处的难民及溃兵“盈途塞道”,使“举省人心益为震动”^⑤,大大影响了清军的士气。

苏鲍季奇将俄军分为3路纵队:左路纵队由弗列依谢尔少将率领进攻牛庄,中路纵队在阿尔塔莫诺夫上校指挥下进攻鞍山,右路纵队由米申科上校指挥,绕过清军左翼,从铁路线以东进攻鞍山侧翼^⑥。

9月23日,弗列依谢尔从海城向牛庄进发,寿长惟恐被俄军切断退路,将部队布置在通向辽阳的大道上。牛庄坐落在一望无际的平原,田野里满布高粱,只有狭窄的田间小路可以通行。

24日,俄军抵达。中国军队从村庄的墙后和高粱地里向俄军猛烈射击。俄军不辨路径,不断陷入伏击,伤亡官兵27人^⑦。俄军“随以快炮连环排击”,清军“阵亡官六七员,兵三百名余”,退往沙河^⑧,当天牛庄失守。

9月26日清晨,俄军中路纵队和右路纵队从海城进攻鞍山^⑨。右路纵队

① 陆军大臣致阿列克谢耶夫电,第4108号急电;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2编,第2册,第171页。

② 库莎科夫:《1900年南满之乱》,第131页。

③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04页。

④ 清军练军,每营500人,50营共约2.5万人。据俄军侦察,清军配备有克虏伯、马克辛姆等大炮60门,步兵有带弹仓的来福枪,骑兵用带弹仓的双筒枪。参见库莎科夫《1900年南满之乱》,第131页。

⑤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06页。

⑥ 库莎科夫:《1900年南满之乱》,第136、140页。

⑦ 杨切维茨基:《在停滞不前的中国的城墙下》,第540页。

⑧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05页。

⑨ 杨切维茨基:《在停滞不前的中国的城墙下》,第553—554页。

由俄国护路军组成，他们长期活动在铁路沿线，熟悉当地地理情况，出发后沿山路绕清军左翼，占领了鞍山附近的大屯村，并尽可能地而后方运动^①。弗列依谢尔占领牛庄后，于26日晨赶到鞍山，从西面攻击清军右翼。中路俄军主力从正面攻击鞍山^②。清军只向威胁自己退路的右路俄军发动进攻，击毙击伤俄官兵8人^③，打开退路后，撤往沙河。

27日，寿长率牛庄退军抵达沙河，和沙河驻军会合后，占据了一座马蹄形的山地迎击俄军。俄军上校米申科率轻装部队首先进入清军阵地，被清军包围。俄军大炮被毁，炮手负伤。正当这伙侵略军面临灭顶之火的时候，中国军队的指挥者却迟迟不下令冲锋，结果使俄军后继部队赶来，贻误了战机。从上午11时起，激烈的战斗进行到下午4时，中国军队不断击中俄军炮兵、大炮和辎重，并从两翼发动进攻^④。但由于指挥失误和不统一，军队又缺乏严格的纪律，阵地终于被俄军攻破，寿长率清军退往辽南首山铺一带扼守^⑤。

沙河失守后，辽南清军完全失去了战斗力。9月23日，正当俄军开始向北进攻的关键时刻，晋昌擅离职守，调育字亲军四营，从辽阳跑回盛京^⑥，使前敌减兵失帅。寿长连战连败，更无法约束部下。28日，苏鲍季奇指挥左、中、右三路俄军逼近辽阳^⑦，清军败走，寿长逃回盛京。29日晨，俄军占领辽阳^⑧。

辽阳失守，盛京失去屏蔽。盛京将军增祺向阿列克谢耶夫乞和未成，于29日夜逃往新民厅；晋昌出法库门，逃往喇嘛王旗，“在省文武各官相率西奔”^⑨，盛京大乱。10月1日，俄军大尉杰尼索夫率轻骑部队从南门入城，占领皇宫和将军府等衙署^⑩，掳去克虏伯等新式大炮50门，以及大量炮弹、步枪、子弹、火药等军用物资^⑪。军火等局被毁，爆炸声不绝。俄兵四处枪

① 库莎科夫：《1900年南满之乱》，第140—141页。

② 杨切维茨基：《在停滞不前的中国的城墙下》，第553—554页。

③ 库莎科夫：《1900年南满之乱》，第143页。

④ 同上书，第151—152、154—155页。

⑤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05页。

⑥ 同上书，第705页。

⑦ 库莎科夫：《1900年南满之乱》，第160页。

⑧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05页。

⑨ 同上书，下册，第687页。

⑩ 杨切维茨基：《在停滞不前的中国的城墙下》，第559—560页。

⑪ 库莎科夫：《1900年南满之乱》，第188页。

杀居民,“阖城人民泣号奔逃,惨苦万状”^①。

10月3日,苏鲍季奇入城,任命俄军上校多姆勃罗夫斯基为盛京省军政长官^②。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处于俄军赤裸裸的军事占领之下^③。

第六节 沙俄图谋霸占中国东北和中俄 彼得堡谈判的破裂

一 逼签《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1900年9月末,俄军即将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惯于交替使用武装进攻和外交讹诈的沙皇政府,为巩固和扩大侵略成果,开始谋求和清政府单独谈判,订立秘密协定。

9月26日,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在致驻北京公使格尔思的电报中指出,在和中国政府即将举行的谈判中,“应当把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分开:一个是有关各国的共同问题;另一个是个别问题,即将来调整俄国和中国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容许其他国家的任何干涉。”^④所谓“共同问题”,即列强共同对中国实行“制裁”;所谓“个别问题”就是要肯定俄军占领中国东三省的现状。它表明沙俄既要和列强坐地分赃,又想通过单独谈判,把中国东三省牢牢控制在手。这一策略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批准。

当时,清廷已取道太原、远逃西安,北京已被联军严密控制。如何打开与清政府单独谈判的渠道,沙皇政府为此曾采取私人交涉,同中国东北地方当局分别订约和政府间谈判等几种方案。

先是,财政大臣维特应即将离广州北上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之请,于7月间决定派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以私人代表身份来华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的本意是与乌赫托姆斯基“共商挽救时局之策”^⑤,维特赋予乌赫托姆斯基的使命却是安排一项协定,以保持俄国在满洲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18页。

② 杨切维茨基:《在停滞不前的中国的城墟下》,第559—560页。

③ 1900年9月,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军计有3900名军官和17.3万名士兵,参见纳罗奇尼茨基等著《远东国际关系史》,第1卷,1973年莫斯科出版,第205页。

④ 《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35页。

⑤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4卷,第1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57页。

的特殊利益。8月7日，李鸿章于晋京途中受命为全权议和使臣。9月29日，乌赫托姆斯基到达上海，因李鸿章已去天津，便与留在上海等候他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会晤。由于军事形势发展迅速，如何保证“发祥之地”不为俄国久占，自然成了清廷对李鸿章的属望所在。因此，李经方在会晤中代表李鸿章说，如俄国政府宣布不把东三省据为己有，中国将付给俄国一笔巨额赔款，并把同俄国毗邻的蒙古和喀什噶尔的资源以私人公司名义无条件地交给俄国开发经营^①。乌赫托姆斯基的目标是为俄国政府攫取东三省，而李鸿章却要求俄国放弃它，这种会谈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加以李经方并未受权谈判“满洲问题”，于是乌赫托姆斯基离沪北上。这是纯粹以私人方式开始的中俄单独交涉的第一幕。

沙皇政府为实现预定目标采取的另一个步骤是与中国东北地方当局直接谈判。早在9月20日，俄国驻关东地区首席长官阿列克谢耶夫就已向拉姆斯多夫提议，由他与格罗杰科夫分别同东三省的将军们就有关问题进行谈判。这一意见当即得到后者的同意^②。

接着，10月3日，俄国财政部驻北京代表璞科第致电维特，指出中国全权大臣庆亲王和李鸿章的影响“等于零”，劝告俄国政府“不要追逐幽灵般的中国中央政府”。他建议通过阿列克谢耶夫从速与中国东三省的将军们交涉，分别订立地方性临时协定，等时机成熟后再把这些协定纳入俄国将来与中国中央政府缔结的条约之中^③。璞科第的电报旋即获得沙皇的赞许。在研讨谈判的具体方针时，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鉴于8月25日本国政府已发表了将有条件从满洲撤军的声明，于10月8日别有用心地向阿列克谢耶夫提出了“如何才能最可靠最迅速地恢复盛京省的秩序”问题。

阿列克谢耶夫在同月11日的复电中承认，“由于政治上的种种原因”，即由于面临着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和列强联合干涉的可能，在中国东三省“实行俄国管理”，或按布哈拉的模式“实行兼并”，都是危险的；加以俄国“缺乏合适的公职人员”，根据关东地区的殖民统治经验，在东三省立即实行“以俄治华”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主张保留盛京省原有的行政机构，实行“以华治华”，逐步为将来实行兼并创造条件。尽管如此，他仍向库罗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63页。

②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20—121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64页。

巴特金提议,为了对中国的将军进行“领导与监督”,应仿照英属印度的制度,在将军衙署设置俄国陆军部和外交部的全权代表,同时要求中国同意,任命东三省的将军须与俄国商定。这一建议为维持等人所同意,于是,阿列克谢耶夫被授予直接与中国盛京将军谈判缔结军事协定的全权^①。

盛京将军增祺早在逃离盛京之前,就已致函阿列克谢耶夫,呼吁停战,听候朝廷议和,但遭到了拒绝。10月7日,增祺从康平县三面船转到新民厅,重新拟定了照会,并于11日派革职道台周冕、候选同知瑞安、候补知县蒋文熙持照会前往盛京,与阿列克谢耶夫谈判,“以为弭兵暂计”^②。10月27日,周冕等人到达盛京,11月3日被俄军“护送”到旅顺口。次日,阿列克谢耶夫会见周冕一行,双方随即开始“谈判”。

增祺在给阿列克谢耶夫的照会中明确指出,周冕仅受权就全省“安辑商民”,会筹“地方与铁路互相调剂办法”,保护陵寝宫殿等问题进行交涉^③。但阿列克谢耶夫未予理会,竟命令他的外交专员廓索维慈单方面拟定了远远超出上述范围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以下简称《暂且章程》)草案九条,强迫周冕签字。周冕阅后声明,章程的“某些条款有损中国主权,是根本无法接受的”。同时指出,这个章程没有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盛京将军不会签字,“他本人也无权签署如此重要的文件”。阿列克谢耶夫威胁说,如果周冕拒绝签字,他就将他们“押送回去,也不放将军(增祺)出新民厅”^④。周冕被迫屈服,于11月9日和廓索维慈分别代表增祺和阿列克谢耶夫在《暂且章程》上签字,旅顺口“谈判”且剧于是结束。11日,周冕将《暂且章程》抄本托人经烟台密呈李鸿章^⑤。

周冕走后,增祺一直被俄军软禁在新民厅,与外界联系断绝,实际上成为俄军的俘虏。他知道周冕久去不归,必将“别生枝节”,两次致电阿列克谢耶夫要求待他回到盛京时“再议”,但阿列克谢耶夫根本不予理睬^⑥。11

①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26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46卷,第26—27页。

③ 《增祺致阿列克谢耶夫照会》,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八日。载近代史资料专刊《杨儒庚辛存稿》,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237页。

④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28页。

⑤ 同上书,第131页,《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册),第371—374页。

⑥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46卷,第28页。

月10日,增祺又写信给俄军南满司令苏鲍季奇,要求进省“详商”^①,还不知道周冕已于前一天签署了《暂且章程》!直至11月19日俄军中尉瓦维洛夫“护送”周冕一行回到新民厅,将《暂且章程》展示在增祺面前,强迫他签字时,他才看到这个以他的名义签署的文件。增祺发现章程条款“与原旨不符”,斥责周冕越权;同时声言他要亲赴旅顺口重新谈判^②。瓦维洛夫转达阿列克谢耶夫的话说,增祺“必须画押,方可回省(城)”^③,增祺坚持他未奉到全权,不能签字。最后阿列克谢耶夫在电报中诱骗说,“此章程是暂且的商议,可以申明改换。”^④于是,增祺申明章程须“另行具奏,核议办理”后,于11月30日,有保留地签押用印^⑤。随后,增祺向奕劻和李鸿章正式报告了签约经过,并附上《暂且章程》抄本,请求审定^⑥。

《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共9条,主要内容是:

一、盛京将军“回任后,应任保卫地方安静,务使兴修铁路毫无拦阻损坏”。“沈阳应设俄总管一员”,“凡将军所办要件,该总管应当明晰”。

二、“奉天省城等处现留俄军驻防”,将军及地方官“随时尽力帮同,譬如住宿处所及采买粮料等事”。

三、盛京将军“将所有军队一律撤散、收缴军械”;俄军“未得之军械库所存各军装枪炮,统行转交俄武官经理”;“奉天各处俄军未经驻扎炮台营垒……一并拆毁,若俄员不用火药库亦照前法办理”。

四、盛京通省城镇只许“设立巡捕马步各队”,并“不得用炮”,“倘遇地方有事,不足于用”,“可由将军就近知会俄总管转请俄带兵官尽力帮同办理”。

五、“营口等处俄官暂为经理,俟俄廷查得奉省确实太平,再许调换俄员。”^⑦

根据以上规定,盛京全省军政大权归于俄国总管,盛京将军名义上仍是

① 《杨儒庚幸存稿》,第237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46卷,第28页;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30页。

③ 同上书,光绪朝,第146卷,第28页。

④ 《杨儒庚幸存稿》,第226页。参见《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44卷,第19页。

⑤ 同上书,第227页。

⑥ 同上书,第223页。

⑦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44卷,第17-18页。按:本章程以俄文本为准;俄文本第六条“设立巡捕马步各队”句后有“但不得用炮”字样,参见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29页注。

该省最高官员，实际上他的职权仅仅是在俄国总管监督之下，为俄国占领者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东省铁路而已。盛京省中国原有军队被全部解散，武器被收缴，军事设施被拆毁，而沙俄侵略军得驻扎全省各地。这就剥夺了中国在盛京省的自保权和管辖权，使该省实际上变为俄国的殖民地。所谓“地方有事”俄军“帮同办理”，就是说沙俄有权随时用武力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另外，《暂且章程》第五条规定，在俄国政府确定盛京省“确实太平”以前，营口等城均由俄官“暂为经理”，这实际上就是长期占领的同义语。总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表面上保留了盛京省的行政体制，实际上，“中国所得者特一空名”^①，沙俄占领者仍主宰一切。正如苏联学者阿瓦林所说：“这种条约无疑会破坏中国政府的主权，但在战时谁重视（中国的）主权？重要的事实是，俄国在满洲驻有军队，就像在‘家里一样’随便。”^②因此，沙皇政府对这一“章程”的签订十分满意。

《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只涉及东北的一省。为确定沙皇政府在整个满洲夺取的“政治权力的实施界限与方法”，并为不久后与中国缔结的协定规定基本原则，差不多与阿列克谢耶夫逼签《暂且章程》同时，维特与库罗巴特金、拉姆斯多夫于11月13日拟定了《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③。其主要内容是：满洲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得保留原有的行政机构，但中国军队必须从该地区撤出；为保障地方安宁，一部分俄国军队得留驻满洲；允许中国东北三将军设立武装警察，其数量由俄军司令官确定；警察中不得有外国人，不准用炮；东省铁路隶属俄国财政部，其行政当局得就铁路事宜或向中国将军的外交代表、或通过驻北京的董事向俄国公使提出要求；俄国护路军是隶属其长官的特殊部队，它与俄国军事当局的关系如同边防军和军事当局的关系。

《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还规定关东地区俄军司令和阿穆尔军区司令有权分别对盛京省和吉林、黑龙江两省实行总监理，监察三省将军不得有敌视俄国的活动，使其致力于维持当地秩序、协助东省铁路和俄国军队，并且不得采取恢复正规军和加强警察的措施，不得运入武器；三将军处均设俄国“军事委员”和“外交代表”；将军和副都统的任命，中国政府应和俄国公使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46卷，第3页。

②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53—54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69页。

商定；在俄、中两国政府签订协定前本《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均有效^①。

显然，《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不仅与《暂且章程》的内容基本一致，而且有些条款比《暂且章程》更为苛刻。例如，它公然规定中国东三省将军受俄国关东地区俄军司令和阿穆尔军区司令监督，三省将军和副都统的任命必须得到俄国公使的同意，东省铁路也由形式上的中俄合办改为归俄国财政部管辖，这就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将东三省完全置于俄国军事与财政当局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如果《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得到实施，“让俄国在满洲三省中把化整为零地侵吞（中国）中央政府权力的活动加以发展和扩大，那就等于（中国）丧失了整个（东北）地区”^②。12月17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一《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下一步就是如何用外交手段将《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变成约文，让中国接受的问题了。

这时，李鸿章已经到达北京。11月2日，格尔思在会晤时向他强调：“必须将满洲原有的将军、副都统一概罢免”，“将来满洲将军、副都统的任命，非经俄国政府同意不可”。第二天，璞科第向他暗示，东省铁路边境各站的关税收入应“让与俄国经管”^③。稍后，刚到北京不久的乌赫托姆斯基根据维特的指示，又向李鸿章声明，俄国政府在单独谈判中不仅要“使（东省）铁路得到保障”，而且要巩固俄国“在满洲的绝对势力”，务请李鸿章给以“充分的协助”^④。李鸿章由此明白了沙俄的谈判意图。非正式的交涉既然已经碰壁，李鸿章于是请求俄国外交当局公布其对满洲的要求，并任命乌赫托姆斯基为全权代表，在北京开始正式谈判。维特认为李鸿章可能利用俄国和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对俄国代表施加影响，并利用他与乌赫托姆斯基的个人关系，在谈判中讨价还价，因此对李鸿章的提议表示反对。11月23日，他电告乌赫托姆斯基：“在未明了别的大国如何动作时，我们不能签订单独协定，以免作茧自缚。”^⑤

但是，格尔思的主张与此不同。12月11日，他致电拉姆斯多夫说：鉴于庆亲王和李鸿章迫切希望俄国尽早把满洲归还中国，而俄国已决定将东三省的行政权交还中国，这就部分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因此，俄国现在就应

①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39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73页。

③ 同上书，第273—274页。

④ 同上书，第274页。

⑤ 同上书，第276页。

当同中国签订单独协定,以保证俄国获得在满洲及整个势力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和修筑铁路的租让权;否则,“很可能以后将较难取得中国的同意了”^①。拉姆斯多夫立即将格尔思的建议提交财政大臣和陆军大臣讨论。“单独谈判”遂越出私人交涉的范围。这时,列强经过长期,激烈的争吵,即将就对华共同要求(即“议和大纲”)达成协议,维特也急剧改变原来的主张,转而认为在列强尚未与中国缔和、“联军”继续占领直隶、瓦德西推行的“报复与恐怖政策”对清政府继续发生作用时,与中国单独缔约是“适时的”。库罗巴特金也赞成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是,沙皇政府很快拟定了“单独协定大纲”,并于12月26日获得沙皇批准。这一“大纲”的基本精神是“巩固《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的效力”,并从中国取得“价值相当的特惠”,以充当赔款,而具有首要意义的问题则是保持俄国在满洲的驻军权^②。为使谈判能在俄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下秘密而快速地进行,俄国外交部决定将谈判地点移到彼得堡。为此,拉姆斯多夫于12月22日电令格尔思要求清政府授予驻俄公使杨儒进行谈判的全权^③。清政府表示同意。为引起他国对中俄单独谈判的注意,李鸿章私下将《暂且章程》透露给了第三人^④。

二 中俄彼得堡谈判的开始及其破裂

1901年1月2日,清政府任命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商办接收东三省事宜”,并说在交涉中应“随时电商奕劻、李鸿章,互相参酌”^⑤。杨儒于4日接到电旨,即赴俄国财政部会晤维特,开始了中俄两国关于交收东三省的正式谈判。谈判主要分为“废暂约”和“立正约”两个阶段。

杨儒在开始谈判前对《暂且章程》的内容和签订的情况一无所知。1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刊出《暂且章程》要点,杨儒还将信将疑。8日,

① 《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40-41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78、281页。

③ 《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46页。

④ 关于将《暂且章程》向外人透露的情况,大体有三说:一说由李鸿章交给了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一说由李交给了日本人(参见麻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31页);一说莫理循的资料源自美国驻华使团头等参赞司快尔,后者与李鸿章的亲信、外籍顾问兼英文秘书美国人毕德格关系甚密[参见杨国伦:《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1970年英国出版,第271页],意即《暂且章程》是由毕德格泄露的。按:莫理循由北京向《泰晤士报》发送《暂且章程》要点的的时间是1901年12月31日;在此前一天,日本驻华公使西德二郎已向日本外相加藤密寄了该章程日译全文(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册),第1314号文书)。

⑤ 《杨儒庚辛存稿》,第65页。

杨儒往晤维特，维特予以证实。杨儒当即表示，他未收到政府有关《暂且章程》的训令，“恐政府尚未知之”，“且疑各款非出政府及增将军本意”，暗示《暂且章程》不具有法律效力。接着，他进一步指出，“诸款中遣散华兵、交出军火、毁拆全省炮台、火药局，俄派驻员预闻要公各节，不但夺其兵权，且干预内治，侵我主权”，绝对不能“照办”。^① 10日，杨儒将《泰晤士报》所载《暂且章程》九款电告奕劻、李鸿章，指出：“此事果确，流弊无穷”，俄国所谓交还东三省，“是吏治而非兵权，有空名而无实惠”，“倘彼挟此成见，东省不失而失”。^② 清廷觉得事态严重，于18日发布上谕，宣布《暂且章程》无效，并决定将增祺“交部严加议处”，飭令奕劻、李鸿章与杨儒以东三省“吏治、兵权，均不失我自主”为原则，与俄方谈判废除《暂且章程》^③。

1月21日，杨儒在谈判中指出，《暂且章程》是革职道员周冕擅自订立的，“政府全不知情”，因而“不能作数”。但维特坚称《暂且章程》“业已画押”，必须由两国政府批准，不能废除^④。第二天，杨儒会见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重申前说。拉姆斯多夫坚持先批准《暂且章程》，才能议立“正约”。杨儒断然予以拒绝^⑤。这样，《暂且章程》的废存问题就成了中俄交涉的焦点。

应当指出，《暂且章程》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而且与1900年10月列强为避免彼此之间的武装冲突达成的“保全中国”即共管中国的协议相矛盾。因此，《暂且章程》一经透露，立即引起其他大国的普遍关注。特别是日本政府，因沙俄独占东三省于己不利，加以与俄国有“三国干涉”之仇，率先于1月4日要求沙皇政府澄清，但俄国外交副大臣矢口予以否认^⑥。1月11日，日本外相加藤再次命令珍田公使询问俄国外交部《暂且章程》是否属实，是何性质^⑦。但直到1月16日拉姆斯多夫会见珍田时仍拒绝提供任

① 《杨儒与维特第二次谈判》，《杨儒庚辛存稿》，第14—15页。

② 《电奕劻、李鸿章》，冬月二十日，《杨儒庚辛存稿》，第65—66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475卷，第20页。

④ 《杨儒与维特第四次谈判》，《杨儒庚辛存稿》，第23页。

⑤ 《杨儒与拉姆第二次谈判》，《杨儒庚辛存稿》，第24—26页。

⑥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90页。

⑦ 同上书，第102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4页。

何确实的消息,并说所谓中俄协定,“纯属虚构”^①。在事实真相已无法再隐瞒后,俄国驻日公使伊兹渥尔斯基只得以“个人名义”于22日向加藤诡称,《暂且章程》是临时性的,签订的目的是为了“把满洲交还中国”^②!日本政府对此说自然不信。为阻止中俄单独缔约,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于1月16—17日两天分别向奕劻和李鸿章发出警告:俄国在东三省留兵,“于中国大有损害”;“若东省阴为俄有,英必占长江,德必据山东,日本亦不得不起而争利。”^③英国政府因忙于在南非同布尔人作战(1899—1902年),对此事态度十分谨慎,但也并不自视局外。1月2日,英使萨道义向伦敦发送《暂且章程》英译全文;次日,英国外相兰斯敦即指示驻俄大使斯科特考虑他应如何行动(但不要向俄国提出正式质问)^④;1月12日,他又明确要求斯科特向拉姆斯多夫婉言说明:“(英国)议会可能提出这一问题”,他想知道届时“应作何回答”^⑤?在这种情况下,维特为平息国际舆论对俄国的不满情绪,不得不向他国表示,“东三省俄兵必全行撤退,土地全还中国,以复旧制,决不侵占”^⑥;同时,拉姆斯多夫于1月24日正式通知杨儒,俄国同意将批准《暂且章程》一事作罢^⑦。

沙俄放弃《暂且章程》后,便按原定计划,逼杨儒速订“正约”。如前所述,沙皇政府于上年末制定了“单独协定大纲”;随后,即着手拟制协定草案。1月22、24日,维特向拉姆斯多夫递交了两份独立的、各自按完备形式拟就的协定草案:一是中俄两国政府间的协定,一是东省铁路公司与中国政府间的协定。经过多次修改,沙俄外交、财政、陆军三大臣会议于2月8日在维特草案的基础上,制定了两国政府间协定的正式草案;至于维特草拟的另一个方案,则留待东省铁路公司、道胜银行与中国政府通过“私方”交涉来解决^⑧。由于希望“从速行事”^⑨,早在1月17日即俄国声明废止《暂且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08页。参见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34卷,第110—111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45卷,第8—9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30卷,第35页。

④ 杨国伦:《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第273页。

⑤ 尼什:《英日同盟史》,1966年伦敦出版,第112页。

⑥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45卷,第8页。

⑦ 《杨儒庚辛存稿》,第28页。

⑧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96页。

⑨ 同上书,第284页注③。

章程》之前，维特便迫不及待地向杨儒口述了他正在拟订的约稿“要旨”十三条，进行试探；其中包括：中国简放东三省将军须先与俄国商明；东三省只设巡捕兵，其数量与俄国商定；三将军处俄各派文武二员“佐之”；中国满蒙及北省各项利益不得让与他国；满蒙等处中国不得建造铁路；金州城归入俄国租借地；俄国代理满洲税关；俄国用兵费赔款购买山海关至营口的铁路；等等^①。这些条款不仅使“东省权利尽去”，而且将中国的蒙古地区和北方省份也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半个中国的主权将被夺走。

在彼得堡谈判之初，杨儒一再恳求沙俄政府“做一好榜样”，履行交还中国东三省的诺言。维特提出上述要求，使杨儒大失所望。1月18日他致电奕劻和李鸿章说：“一国如此，他国效尤，……倘英于长江一带、德于山东全省均欲援例，何以应之！”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杨儒提议暂缓与俄国单独订约，待与各国签订公约之后再议，以免他国援例^②。奕劻、李鸿章代奏西安行在。清政府准杨儒“从缓商办”^③，后因沙俄同意《暂且章程》不必批准，并一再表示“正约”一定使中国“满意”，清政府才令杨儒继续和俄国谈判。

2月16日，拉姆斯多夫向杨儒提出约稿12条，主要内容是：

一、将东三省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第一条）；

二、允许俄国在东三省驻兵保路，直至“地方平靖”及清政府完全履行约稿末四条为止（第二条）；

三、铁路竣工之前，东三省“不设兵队”，“军火禁入”（第四条）；

四、“凡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

五、东三省只设马步巡捕，数目与俄商定，不得用炮，不得使用他国人（第五条）；

六、“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第六条）；

七、废除金州自治（第七条）；

八、“连界各处，如满蒙及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于阗等处，矿路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与他国或他国人；

九、非俄允许，中国不得自行造路”；

① 《杨儒与维特第三次谈判》、《电奕劻、李鸿章》，冬月二十八日；《杨儒庚辛存稿》，第16、67-68页。

② 《电奕劻、李鸿章》，冬月二十八日；《杨儒庚辛存稿》，第68页。

③ 《奕劻、李鸿章电》，12月14日；《杨儒庚辛存稿》，第70页。

十、除牛庄外，不准将地租与他国人（第八条）；

十一、末四条即第九、十、十一、十二条，包括赔偿军费，铁路及铁路人员的损失、误工补贴由中国和铁路公司商定，中国“以他项利益作抵”，以及俄国从东省铁路向北京方向造路直达长城等。^①

杨儒细绎各款，认为约稿虽较维特口述各条删去了“商放将军、派文武将察两节”，但其用心“周密深远”又远比口述条款为甚：

一、在东北“留兵名为保路，实注意末四款”，也就是说，末四款实现不了，沙俄侵略军就赖在东北不走，而末四款中“铁路赔款用他项利益相抵，盖指关税矿路等事，隐而未露”^②，这就为沙俄日后勒索关税、路矿等新的特权埋下了伏笔^③。

二、“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等于宣布华北各省为沙俄的势力范围；“又建入京支路”，把东北和华北联为一气，目标是与英国争夺直隶。

三、三省将军“经俄声诉，即予革职”，即沙俄对东三省将军有罢免权，三将军必须唯沙俄之命是从，否则就以“不合邦交”而被免除职务。

四、中国的满、蒙和新疆等处“矿路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他国或他国人”，将这一广大地区的种种利权“一网打尽”！至于把“地方平静”作为俄国撤军的先决条件，更表明沙俄愿把东三省交还中国云云，只不过是一句漂亮的空话而已。

拉姆斯多夫向杨儒一再强调，约稿“凡可让之处淘汰已尽，所存者均不可少之款”，逼杨儒画押^④。杨儒辩驳说，约稿“只将字面避去，而事实未稍

① 《电奕劻、李鸿章》，12月30日，《杨儒庚辛存稿》，第72—74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96—299页。

② 《杨儒庚辛存稿》，第74页。

③ 维特拟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私方”合同，为东省铁路公司谋取的特惠有：（1）盛京、吉林以及黑龙江省小兴安岭南坡全部金矿的开采权，以及东北全境所有石油和镍矿的开采权；（2）在公司的铁路区域内全部煤矿的开采和沿铁路10俄里的地带内与公司矿区五俄里的范围内不许任何其他企业家经营；（3）在鸭绿江流域选择2000平方俄里的地段采伐木材5年，并有权在该处敷设铁路、电报和电话线路；（4）将东省铁路沿线10俄里地带内的全部土地交与公司；（5）在秦皇岛、营口、鸭绿江口以及江口附近的一个岛上划出地段，供公司建筑码头、货栈、油站和住宅之用；（6）改南满铁路到营口的临时支线为固定线路。1896年9月8日东省铁路合同第五与第六两款对铁路用地的规定，也适用于以上地段，将铁路“租让地”面积扩大到3万平方俄里，等等。参见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86—287页。

④ 《电奕劻、李鸿章》，12月30日；《杨儒庚辛存稿》，第74页。

改动”；蒙古、新疆等地“俄兵并未占据，何得包括在内？”不准中国在满、蒙、新疆等地区自行造路，“太无道理”。拉姆斯多夫蛮横地说，“该数省虽未经俄兵占据，然俄之兵力足以占据。”^①但杨儒据理力争，不为威胁所动。

与此同时，沙俄驻华公使格尔思于2月27日到李鸿章的寓所恫吓说，中国如“不愿立约，则东三省必永为俄有”^②。璞科第则按维特的指令向李鸿章约许，如能促成条约签字，订约后即付给酬金50万卢布^③，并说待十月间维特东来后再付给若干。之后，维特又亲自给李鸿章打电报，让他将约稿“从速核准”，“否则暂据将成久据”^④。李鸿章在沙俄的诱胁下倾向于签约。他在给杨儒的电报中说，约款“除第八款蒙古、新疆矿路外，似尚无甚纰缪”，“宜早定为是”。^⑤

沙皇政府在彼得堡和北京对清政府代表展开的外交逼攻，使日、英等国政府感到不安。虽然直到2月27日它们通过非官方途径才获得俄国的约稿全文，但日本驻华公使小村早在1月27日即已获悉维特向杨儒口述的13条要求^⑥；2月初，日本驻俄公使又从维特处得知拟议中的约稿部分内容（计八条）^⑦。日本政府于是立即决定进行干预，一面向中国驻东京公使说明中国不应同任何一个大国缔结涉及中华帝国领土权利的协定，一面于2月5日授权林董向英国外交部通报上述情况，并建议英国政府向中国驻英公使发出类似的通知^⑧。

经过外交磋商，2月13—15日间，英、日、德三国外交部分别召见中国驻使，并通知清政府，反对中俄单独订约。日本政府的声明说：“此次议款，中国万不可割地，如允割地与一国，或虽未明割而允其设官置兵，亦是暗让；一经允定，他国必群起效尤，大局尚不可问，财政及各种利权亦然。”^⑨英国外交部认为，拟议中的中俄协定有损中国领土主权，将成为中国的一个

① 《杨儒与拉姆第八次谈判》；《杨儒庚辛存稿》，第38页。

② 《奕劻、李鸿章电》，正月初九日；《杨儒庚辛存稿》，第76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01—302页。

④ 《杨儒庚辛存稿》，第77页。

⑤ 《西巡大事记》，第5卷，第19页。

⑥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15—116页。

⑦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6号（1901年），第37页；参见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292页。

⑧ 同上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4页。

⑨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60卷，第15页；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39—142页。

“祸根”^①。英、日两国一致提出：“东三省不宜另立约章”^②，“宜归入各国公约并议”^③。德国^④、美国^⑤、意、奥^⑥等国，随后也向清政府发出了内容与英、日两国大体相同的照会。在此期间，英、日驻上海、汉口的领事，与刘坤一、张之洞多次接触，督促他们向清廷“力陈此约万不可允，惟有将所索各条布告各国公议”^⑦。盛宣怀受英、日的影响，也主张“借力各国牵制”沙俄^⑧。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一面电令奕劻、李鸿章、杨儒“设法（与俄）辩驳”，一面分电驻日、英、德、美使节，恳请驻在国政府“联约向俄廷善为排解”^⑨，并飭令刘坤一、张之洞请英、日等国“协力向俄说项”^⑩。

3月5日，杨儒将清政府指驳条款写成节略，交给拉姆斯多夫，内要求删去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废除金州自治，以及从东北修筑铁路直达长城等三款；作重要修改者三款：

一、“路上未竣，不设兵队”，应专指铁路两旁相近地段；军火禁入满洲，当明定年限，不得永禁。

二、蒙古、满洲矿路利益，不得让与他国人，但中国自办者，不在此例。

三、第十一款所谓他项利益，应声明只限于与此次公约（指《辛丑条约》。——引者）各国利益相埒，并于本国主权、利权无大碍者。

此外，还提议：交还东三省应定明限期；留驻东北俄兵“明定年限人数”；东三省将军经俄声诉即行“革职”，应将“革职”改为“调离”等。拉姆斯多夫阅后变色说，“如此驳改，实有不愿俄交还东三省之意”，当即表示拒绝。^⑪

同时，他指示格尔思和璞科第在北京对李鸿章进一步施加压力，逼清政

①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6号（1901年），第41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31卷，第47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7页。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60卷，第15页。

④ 同上书，第21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32卷，第14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6页。

⑤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32卷，第9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10页。

⑥ 《杨儒庚幸存稿》，第77页。

⑦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60卷，第25页。

⑧ 《杨儒庚幸存稿》，第240页。

⑨ 同上书，第78、197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6号（1901年），第93页。

⑩ 《杨儒庚幸存稿》，第240页。

⑪ 同上书，第44、47、79页。

府“定限画押”，声言：“如逾期则须增出条款，再逾期则决裂不与商办。”^①清政府坚持对约款“择要商改”，以期定约后“各国不致另生枝节”^②。杨儒焦惶无计，电催驻德、日、英、美公使敦促驻在国政府出面“劝阻”^③。英国拒绝直接与沙俄交涉，表示待“商明德、美、日政府再复”，中国得到答复之前不要答应俄国的要求^④。杨儒遂以列强干涉为理由，坚持约稿必须“商改”。3月11日，拉姆斯多夫向杨儒表示，约款可“稍改”，但定稿后必须签字。杨儒坚持必须按中国所驳各节删改，否则另加一条：“异日他国向中国借口效尤为难，有俄国一面承当”，或者“俟公约订定后再商”。拉姆斯多夫予以一一拒绝^⑤。杨儒进行激烈争辩，表示俄方“如必不肯商改”，他只有请朝廷另派新使^⑥。沙俄见威逼无效，于3月12日提出《二次改稿》——协定修正草案。

改稿计十一款，除删去原稿第六款“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外，其他删改处有：沙俄在东北“设兵保路”，改为在“租归铁路地段”内驻兵；中国在东北“不设兵队”，改作中国在东北设兵应和俄国商定兵数和驻扎地方；禁运军火入满，改成按“各国公约办理”；东三省将军大员“经俄声诉，即予革职”，将“革职”改成“调离”；在关东租借地另立专章一款中，删去废除金州自治一节；满蒙及新疆矿路利益不得让与他国一款，删除蒙古、新疆两处，改作“中国政府在满洲全境内，如未与俄国政府先行商明，不允他国或他国人造路开矿及一切工商利益”；自满洲向京造路一款，删去“向京”二字改为至满洲直隶交界处之长城为止。^⑦

改稿较初稿略有更易，但并未改变沙俄企图独占中国东北的实质。东北铁路沿线沙俄仍可驻兵，而且未规定驻兵期限，东北各项工商权利被夺殆尽，东三省的政权、兵权受到严重限制。不难看出，沙俄在改稿中放弃对中国其他地区的一些要求，其目的是为了集中全力攫取中国东北。

拉姆斯多夫抛出改稿时声言，“不再更易一字”，限杨儒14天内画押，

① 《奕劻、李鸿章电》，正月十七日；《杨儒庚辛存稿》，第80页。

② 同上书，正月二十一日；《杨儒庚辛存稿》，第81页。

③ 《电吕海寰、李盛铎、罗丰禄、伍廷芳》，正月二十一日；《杨儒庚辛存稿》，第81页。

④ 《罗丰禄电》，正月二十二日；《杨儒庚辛存稿》，第82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17、18、21号文书。

⑤ 《杨儒庚辛存稿》，第50页。

⑥ 《电奕劻、李鸿章》，正月二十一日；《杨儒庚辛存稿》，第82页。

⑦ 同上书，第58—60页。

“逾期则交收（东三省）作罢”^①。此后，俄方一再催逼杨儒，“或允或否，一言而决”^②，“如逾期不画（约），勿再议交收，勿再言友好，前告各国不占地之文（指1900年8月25日声明。——引者），当收回作废。”^③清政府担心，如超过约期，沙俄将永据东省；但更害怕一旦签约，各国竞相效尤，中国立遭瓜分。因此，于3月19日电令杨儒请求俄方修改约款并放宽期限。对第一款末段“吏治一切照旧”，要求改为“一切照旧”，以争回利权和兵权；第二款俄兵驻期至条约的末四款“办到之日为止”，改作“开办之日为止”，以缩短俄兵留驻期限；第七款满洲全境不允他国或他国人造路开矿及获得一切工商利益，增添“中国自行设法造路开矿等项利益不在此例”一段，以免各国猜忌。^④

杨儒于20日接电后，“即刻约晤外部（外交大臣），以无暇辞”。杨儒“不得已，将电文撮要写成节略送去，仍被原封交回，致‘展限之言，竟无由达’。”^⑤第二天，杨儒又约晤沙俄财政和陆军二部，同样遭到拒绝^⑥。与此同时，沙俄公使格尔思在北京进一步恫吓李鸿章，“愿与俄好则画押，若愿决裂听便。”^⑦清廷在沙俄将要决裂的威胁下，对是否按期签约游移不定，竟于3月20日谕令奕劻、李鸿章通知英、日等国，“中国势处万难，不能不允”，恳请英、日联络美国，要求俄国展限^⑧。23日，军机处复电杨儒说，如展限和商改两项“均不能行，惟有请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也”，将是否签约的决定权踢给了杨儒^⑨。李鸿章认为，电旨表明“内意已松”，立即电杨儒“酌量画押，勿误”^⑩。

但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签约。3月15日，上海爱国士绅在张园集会，要求清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⑪。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地群众表

① 《电奕劻、李鸿章》，正月二十三日；《杨儒庚辛存稿》，第83页。

② 《电李鸿章》，正月二十五日；《杨儒庚辛存稿》，第84页。

③ 《电奕劻、李鸿章》，正月二十八日；《杨儒庚辛存稿》，第87页。

④ 《盛宣怀电》，正月二十九日；《杨儒庚辛存稿》，第90页。

⑤ 《电奕劻、李鸿章》，二月初一日；《杨儒庚辛存稿》，第90页。

⑥ 同上书，二月初二日；《杨儒庚辛存稿》，第92页。

⑦ 《奕劻、李鸿章电》，二月初一日；《杨儒庚辛存稿》，第91页。

⑧ 《清德宗实录》，第480卷，第12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6号（1901年），第136—137页。

⑨ 《军机处电》，二月初四日；《杨儒庚辛存稿》，第94页。

⑩ 《奕劻、李鸿章电》，二月初四日；《杨儒庚辛存稿》，第94页。

⑪ 《中外日报》，1901年3月16日。

示支持。香港、澳门同胞和新加坡、檀香山等地华侨，纷纷电请拒签俄约。各省督抚和清政府驻外代表也力主拒签。与此同时，英、日两国继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3月16日，日本外务省获悉沙俄提出修正草案并限期答复后，一面通知其驻英、德、美公使联络驻在国政府重申过去的立场，一面训令其驻华使领分头活动，说明俄约修改稿“于中国有无限之害，必须决然拒斥”^①。英国外交部与日本协调行动。3月23日，兰斯敦向中国公使宣布，如中俄签署有损英国利益的协定，那么它得考虑“英国将要求得到何种补偿”^②。在此以前，萨道义指令英驻沪、汉等地领事，促张之洞、刘坤一等力阻李鸿章在英、日、美、德做出答复前采取签约的单独行动。同时，张之洞向清廷牒陈允订俄约、列强效尤之害：“一与定议，瓜分立见，悔不可追。”^③他强调“中国一线生机，惟恃各国牵制”^④，建议“将东三省全行开放，所有路矿通商任便各国同享利益”，并说这是“救急”良策^⑤。3月24日，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联名致电杨儒，“俄约各国哗然，立待效尤。中国士大夫已多病公，行在亦无成见。如此约果定，各国另生枝节，中外矢集，窃为公危。请统筹全局，格外慎重”^⑥。杨儒深感责任重大，遂致电奕劻、李鸿章说：“通国士夫，群焉力阻；该督等身在中国，必确有所见而云。然朝廷俯察民情，亦不便轻违公议；即儒在外洋办事，亦不敢罔顾众论，谬然允行。”^⑦他坚持“未奉画押之旨，不敢擅专”^⑧，毅然违抗李鸿章等人的指示，拒绝签字。

当时，维特业已获悉李鸿章要杨儒“酌量画押”，签字与否取决于杨儒，于是和拉姆斯多夫集中全力诱迫杨儒签字。3月24日，即满限的前两天，他向杨儒谎称：“如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中国政府“如欲加罪于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杨儒厉声责问维特：“贵大臣

① 《杨儒庚辛存稿》，第250页。

② 伦森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1895—1904）》，1968年东京重印版，第149页。

③ 《西巡大事记》，第5卷，第34页。

④ 《张文襄公全集》，第82卷，电奏10，第9—13页。

⑤ 《杨儒庚辛存稿》，第249、251页。

⑥ 同上书，第95页。

⑦ 同上书，第95—96页。

⑧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34卷，第12页。

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此言甚为贵大臣所不取也！”^① 维特满面羞惭，悻悻而去。第二天，拉姆斯多夫又约会杨儒，限次日 9 时 20 分以前画押，“语毕即起，不容赞一词。”^② 杨儒在外临强敌，国内主政者彷徨畏葸了无定见，山河破碎，各方煎迫中，忧愤交加，回使馆下车时，适值天寒雨雪，滑跌堕地，从此一病不起，终至死于任所。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满怀爱国热忱，不顾个人荣辱安危，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在外交战线上尽到了捐躯报国的神圣职责。

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英、日等国的干预，清政府终于决定先议公约，后议俄约，并于 3 月 26 日即沙俄限满之日电令杨儒婉告俄国外交部，“非展限、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③，拒绝对方限期签约的无理要求。

沙俄政府为掩饰其谈判的失败和摆脱外交上的困境，于 4 月 5 日在“政府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冗长的声明，以挑衅性的口吻歪曲义和团运动爆发以来中俄关系的进程，恬不知耻地说什么“俄军进入邻国领土，决不是追求某种敌视中国的目的”，而是在“平叛”斗争中给中国政府以“极其重要的帮助”，甚至连俄军在大沽、天津以及黑龙江沿岸和东北地区的血腥屠杀，也说成是俄国政府“为维护中国自身利益”做出的努力。关于谈判的破裂问题，声明只字不提俄国约稿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掠夺性质和俄国政府代表要挟清政府代表签约的卑劣行径，反说由于外国报刊散布反俄舆论，以及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受到严重阻碍”，致使从满洲撤兵一事不能立即办理。声明最后说，何时归还满洲，只有待中国恢复正常局势，中央政府在北京确立之后并保证俄国再不受去年变乱之害时再议。俄国“将静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④。这表明，只要中国政府不答应俄国的无理要求，它就可借口中国地方不清，对东三省继续实行非法占领。

① 《杨儒庚辛存稿》，第 52—54 页。

② 同上书，第 97 页。

③ 同上。

④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163—170 页；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4 卷，1980 年三联书店出版，第 121—126 页。按：关于该宣言发表的日期，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等书作 4 月 6 日。证诸《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 2 号（1904 年），第 36 号文书（1901 年 4 月 5 日电），似应为 4 月 5 日。

第七节 东三省人民反抗沙俄占领的斗争

沙俄在外交方面加紧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使其武装占领中国东三省合法化的同时,在中国东北继续进行军事征伐,并按照《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和《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的规定,建立和强化军事殖民统治,以实现其最后吞并东三省的野心。

武装占领初期,沙俄取消了东三省原有的军政机构,将其置于俄国军事当局的直接“监理”之下,由关东地区首席长官阿列克谢耶夫“兼管奉天”,阿穆尔总督格罗杰科夫兼管吉、辽两省。大批俄军驻扎在三省省城、铁路沿线、主要城镇和战略要地,并以驻扎地为中心设立卫戍区或军事区,由驻军长官包揽各省军政大权。“省城管兵各官外,又有统辖各驻扎之总管,理案之刑官,办交涉之廓米萨尔,及电报官、管地面之格必丹”等头目^①,分掌民政、司法、交涉诸要务。原三省各级官员,有的被赶走,有的被抓走,留下的则被驱使,在刺刀逼迫下为俄军提供军需、驻防设施、交通工具。三省官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限制,“无论华商贩运货物,及空身人远行”,都必须向俄官“领票”,“即官中差员,亦须一律照办。”^②后来,随着占领局势的稳定,沙俄逐步交还了三省省城和各省主要城镇的行政权,但三省将军的任免均须得到沙俄认可。盛京将军增祺擅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清政府下令“交部议处”,沙俄竟出面干涉,清政府只好收回成命,让增祺继续留任^③。吉林将军长顺,早已是沙俄中意的人,他又最早投降,更得到另眼看待,自然继续任职。黑龙江将军寿山,战败自杀,清政府任綽哈布为黑龙江将军,但因俄方反对,终未到职^④。三省军队被强行一律解散,另设马步巡捕,经三省一再商求,盛京省允设 6000 人,吉林省 4300 人,黑龙江省仅 3000 余人(省城千余人,呼兰等地 2000 余人)^⑤。“统领曰统巡,管带曰总巡,哨官哨长曰正巡、副巡”,“衣用中俄旗式,枪有俄文火印,分驻各州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1073 页。按:廓米萨尔(Комиссар)即委员,格必丹(Канитан)即陆军大尉,此泛指俄军官。

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1325 页。

③ 《杨儒庚幸存稿》,第 29 页。

④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932—933、1244、1305 页。

⑤ 同上书,第 999、1033、1073、1090 页。

县,御盗贼,每县不过百人而已。”^①每队一切行动必须事先“知会”俄官,稍有龃龉,便被缴械。沙俄实际上不让三省留一兵一卒。三省从吏治到兵权都被紧紧地控制在俄军的手中,将军、副都统及其以下各官成为沙俄军事当局的傀儡,“华官无地方之权”,“华民举足皆罪”,沙俄所谓“交还”三省,只不过是—个空名义而已。

这时,驻扎在东省铁路界内的“护路军”,人数迅速增加。1900年已从最初的七八百人增至1.1万人,并配置了炮兵^②。同年末,维特奏请沙皇允准,将该部扩充至1.6万人^③。1901年2月初,“护路军”充入新设的外阿穆尔军区,编制扩大到2.5万人,司令部设在哈尔滨,隶属于俄国边防军独立军团,其性质由原来“单纯”护路的部队变为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前沿部队”或“常驻基干部队”^④。这是沙俄加强对中国东三省殖民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同年6月,经尼古拉二世核准,该军区分为8个常备队和4个预军队,编为4个旅,下设55个步兵连,55个哥萨克骑兵连,6个炮兵连,25个教导队。他们按俄国陆军部的要求,在铁路沿线建筑了大量军事设施,^⑤直接控制着帆三省的腹心地带。

沙俄加强对东三省军事殖民统治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实行移民。早在1896年1月,阿穆尔总督杜霍夫斯科伊在给尼古拉二世的奏文中,即已建议“在建筑满洲铁路时,不仅要牢牢地用军事力量保温它,而且要移殖俄国人来保卫它,在所有区域建立俄果政权”^⑥。为适应殖民的需要,维特在同年曾下令为铁路购买大量土地^⑦。旋因义和团运动,这项计划被迫停顿下来。1901年初,格罗杰科夫“特来东三省,周历各处”^⑧,了解当地政治、经济、军事、居民等情况,事后在呈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强调,义和团事件证明了俄国“保卫东省铁路的困难”。由于“护路军”数量有限,他也建议向铁路附属地段移入众多的俄罗斯人,他们“至少能够对受到武装进攻的铁路沿线

① 常有巽:《边疆叛迹》,1901年,手抄本。

②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503—504、511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80页。

④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512页。

⑤ 同上书,第512—513页。

⑥ 《红档》杂志1932年第3(总第52)卷,第87页。

⑦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20页。

⑧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302页。

进行起码的保卫”^①。沙皇批准了这个奏折。于是俄国军事部门决定向东省铁路沿线移入外贝加尔哥萨克，并在当地筹建“土兵村”^②。沙俄正是利用对中国东三省军事占领的便利条件，大肆抢占土地和安插移民的。中国东北地方官员指出：“中俄铁路两旁，原约本有定数，并无听俄随意占地之文。乃自停战以来，俄人携眷来此者益众，入冬之后，尚建造无虚日。”^③即使在路区之外，俄人“亦多择地扼扎”，甚至拆毁中国兵营和民房，“另建洋房”，“作久居之计”。结果，在三省路区之外，又出现了“俄官兵与本地旗民共相杂处”、“喧宾夺主”的局面^④。沙俄的意图，就是“狡猾地诱骗‘土兵’迁入其在满洲设立的军事殖民地”^⑤。

俄军和形形色色的沙俄殖民者用最野蛮的方式推行殖民统治，哪里出现反抗，他们就“剿洗”哪里的百姓，即使邻近村镇也难幸免。俄军所到之处，所用车马、粮草、牛酒等项，均就地取给，“供亿之繁，需索之多，悉由公款开支”^⑥，仅呼兰一地，在半年时间里用于应酬就花费“数千金”^⑦。各地所存银两，早被俄军抢劫一空，这笔巨额开支只有向居民搜刮。三省人民饱经战乱，秋禾无收，已经到了“无衣无食”的地步，加上这笔摊派，更加难以维持生计。特别是俄军长期驻扎之后，“卿兵散出各屯，劫掠淫乱，不堪言状”^⑧，使东北三省几乎没有一块净土让居民得以安生，士农工商，相率奔逃，百业凋零，惨不忍睹。苏联学者阿瓦林指出：“俄国占领军在满洲作为太上皇继续胡作非为，逮捕、死刑、强制迁出住所，制止当地居民搬迁，侵占好住房作为兵营，对妇女施暴——所有这一切都是直到日俄战争开始前最后一天占领情况的写照。”^⑨正是俄军的这些暴行，逼迫东北人民继续拿起武器，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

东三省的抗俄武装力量有以下几种：

① 斯克维尔斯基：《“黄俄罗斯的土兵村”……沙俄在满洲的军事殖民计划》。载《东省杂志》1930年第4期，第15页。

② 同上。

③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99页。

④ 同上书，第1000、1073页。

⑤ 斯克维尔斯基：《“黄俄罗斯的土兵村”……沙俄在满洲的军事殖民计划》。载《东省杂志》1930年第4期，第15页。

⑥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5页。

⑦ 同上书，第999页。

⑧ 同上书，第695页。

⑨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92—93页。

一是清军余部和散兵。盛京副都统晋昌从盛京退往湄噜王旗后,“整顿各军,已足七营,粮饷尚可支发放四五月,枪械倍之,子药已敷现有各营数战之用”,是一支较大的势力。他联合湄噜“远近各蒙王旗,共筹大计”^①,许多清军闻声来归,至1901年初已有很大的声势。散兵包括三省遣散的部队和战场上的溃兵,他们携带武器,或三五结伙,或千百成群,比比皆是。

二是民团。民团在战时是三省军队的重要辅助力量,清军败后,一些民团承担起保护难民、打击俄军的任务。如盛京省吉洞峪一带地势险固,“团练尤齐,聚族往依者以千万计”^②。

三是所谓的马贼或红胡子。其成分比较复杂,但基于力量是抗清农民武装。在俄军大举进攻之际,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归附清军,共同抗俄;在三省投降之后,他们举起反抗沙俄侵略者的大旗,成为抗俄的主力,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刘弹子。

四是义和团。主要集中在盛京至大连一带,金州一地就有1500人的队伍,小股队伍遍布辽南城乡。这些武装力量彼伏此起,此呼彼应,与沙俄占领者展开了殊死战斗。

在俄军占领初期,各种抗俄武装尚处于积聚力量的阶段,斗争规模较小,也比较分散,主要是袭击小股俄军和破坏交通。1900年末至1901年初,各种抗俄力量势力大增,开始进攻俄军占领下的厅县和重要城镇,打击沙俄傀儡政权。盛京失陷后,辽南义和团余部和清军的散兵联合,切断了盛京至金州的铁路和电线。俄军前往镇压,在宁远被义和团围住,拳民勇敢杀敌,毙伤俄兵62人^③。此后,金州一带的铁路电线随修随拆,沙俄不得不主要依靠旅顺至营口的海运。珲春、宁古塔的清军主力撤退之后,余部在宁古塔附近的东京城集结,与俄军激战三天,打死俄军军官2名,打死打伤俄兵23名^④。在吉林城附近的另一支清军余部,联合该处“马贼”,“袭击俄军,彼此死伤俱多”^⑤。呼兰地区的一支农民武装在首领“两响”的率领下,于1900年底攻陷呼兰厅城,擒获降俄协领聂车布、同知铭琦,“俄队溃出”。这支农民武装被击溃后,以占北为首的另一支农民武装于1901年初再陷巴彦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卷,第719—720页。

② 同上书,第642页。

③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258页。

④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328—329页。

⑤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258页。

城,袭击俄兵^①,给俄军很大的打击。与此同时,湖南刘率一支农民武装,集合“逃勇千余名”从黑龙江南下吉林,在宾州厅一带与俄军交战,被俄军、吉林巡捕队和地方民团击散。接着,孙楼率领的农民武装在敦化县的交河一带打击俄军,兵败后重新集合1000余人,“分东西两路进逼县城”,俄军出动骑步炮兵“迎剿”,农民军再次失败^②。一系列的抗俄作战,暴露出这些武装力量各自为战、力量单薄的严重弱点。为适应斗争的需要,一些抗俄武装逐步走上联合作战的道路,最后形成了韩登举和刘弹子两支较强大的队伍。

韩登举,吉林延吉厅豪族,中日甲午战争时率士兵500人加入清军以抗日本,从此名声大振,被称为韩边外^③。俄军入侵之前,他受命办团练御俄,很快形成了一支较大的势力,再加上珲春、宁古塔败溃清军的到来,力量大增,对俄军形成严重威胁。俄军占领吉林之后,便抽主力部队对他们进行“讨伐”。

1900年10月下旬,俄军从吉林派出福克少将和连年刚博夫少将率领的骑步炮兵,分别从北、东两面进攻磨盘山一带韩登举的部队。28日,连年刚博夫从双阳村前进,100余名中国步兵直奔连年刚博夫和军旗冲杀上来,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几乎死于非命。连年刚博夫被士兵救出后,继续前进,沿途不断受到袭击,进展缓慢,三天后到达韩登举的磨盘山阵地。守军见俄军到来,立即从城堡四周和营盘的围墙上猛烈开火,接着一大群士兵冲出东门,向俄军两翼迂回,进行包抄。侵略者在中国步兵的勇猛的打击下,慌忙带着伤员,撤退到营盘附近的一个凹地里。城堡中的守军趁机杀出,堵住了俄军的退路,子弹从四面八方射向凹地。这时雨雪交加,俄军不辨路径,子炮所剩无几,眼看就要全部被歼。在这关键时刻,一个教士给俄军带路,把他们领出了包围圈。连年刚博夫率残兵败将狼狈逃走,于11月4日回到吉林^④。

韩登举的主力部队集中在东面和连年刚博夫拼杀时,福克率领俄军趁机从北面逼近韩登举的山寨。通向山寨的玛延河岭山口守军很少,没能阻止俄军前进。11月3日福克攻占了韩登举的山寨塔尼扎城,第二天“焚毁该城和

① 黄维翰:《呼兰府志》,第8卷,“武事略”,第23—24页。

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217—1218页。

③ 黄锡爵:《桓仁县志》,第15卷,“忠义军南军记略”,第36页。

④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321—324页。

弹药”，于11月5日返回吉林^①。韩登举的部队一部分战死，一部分逃散，大部分加入了刘弹子的部队。韩本人降俄，后充当俄军的帮凶。

刘弹子，原名刘永和，山东人，猎户出身，曾在吉林省珲春一带投身绿林，因枪法超群，外号刘弹子或刘单子。中日“甲午之役，刘在吉林投降管带防军，迨后罢兵遣队，刘复入山”^②。1900年夏，吉林省为御俄军入侵，“无论马贼土匪，一律附编为镇东军”^③。刘弹子所部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其军称忠义”，刘称统领，在珲春副都统英联营中效力^④。英联兵败，永和在吉林东南龙冈山一带，“派兵散粮，护送难民”，“多有感颂者”，于是“土寇败兵”纷纷往附，队伍很快达1.5万余人。军中设有总统、帮统、分统、总巡、稽查、营哨等官^⑤，永和自任总统，其族弟秉和任帮统，“不受官饷，亦不归节制”^⑥，独立树起抗俄斗争的大旗。

11月，刘永和由吉林官街南下至盛京省海龙厅朝阳镇，与俄军遭遇失利，转赴通化县界，遣人前往县衙门“借地御俄”。通化知县陈璋，决心投靠沙俄，斩来使五人。永和大怒，挥军大战于羊子哨，大败陈军，遂踞通化县，拔队南下怀仁县。增祺指示怀仁知县张兆骏携刘永和的代表马逢春赴省城谈判，“招抚”忠义军。阿列克谢耶夫不允：“杀马而囚张”，决定出兵进剿^⑦。刘永和在这次事件中受到深刻教育，丢掉受抚幻想，决心抗俄到底。

1901年2月23日，刘永和回师海龙，正值王和达、董毅敏率领的义和团余部在海龙起事。海龙总管依凌阿派兵镇压，军官李贵春、栾鸿钧率部起义，加入了王和达的队伍。刘王合师，攻下了朝阳镇^⑧。接着杨玉麟率镇东营也来到海龙。杨原为吉林垦务营管带，后被编入镇东军抗俄，因不满长顺投降，率军南下。三股抗俄武装，互为应援，声势大张，“刘股蔓延至两万余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300—301页。

② 常有瑕：《边疆叛迹》，手抄本。

③ 黄锡爵：《桓仁县志》，第15卷，“忠义军南甯记略”，第36页。

④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99页；常有瑕：《边疆叛迹》，手抄本。

⑤ 常有瑕：《边疆叛迹》，手抄本。

⑥ 黄锡爵：《桓仁县志》，第15卷，“忠义军南甯记略”，第36页。

⑦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99页；常有瑕：《边疆叛迹》，手抄本。

⑧ 依凌阿：《海龙战守事迹》序，第1册，第4页。

人，杨亦五六千人。”^① 晋昌于喇嘛王旗投书刘永和，“约令进攻沈阳”^②。沙俄侵略者坐立不安，省城“一日数警，有不可旦夕之势”^③。

俄军赶忙从铁岭至大孤山设一条警戒线，以防晋昌与刘永和诸部会合；随后又“大集师徒，一由辽阳趋怀通，一由吉林伊通州趋海龙，其都统柴尔必思克（采尔皮茨基）自统大队，由省城趋兴京”，向刘永和诸部全面进逼^④。

采尔皮茨基于3月31日到兴京，率主力赴通化，留四五百人驻陵街^⑤。刘永和避实就虚，派奇兵忽出西路，于4月8日“将俄兵击退”，毙俄兵9名，伤俄官3员、俄兵14名，据新宾堡^⑥。当时俄军前队“探报不通”，后路又被“截断”，处境十分狼狈，但忠义军因“火药不继”，“退距（踞）十二牌以东”待援，使俄军免于灭顶之灾^⑦。新宾堡地邻省城，又是清室陵寝重地，俄军损兵折将，进退维谷，引起省城极大震动。采尔皮茨基被迫抽调赴通化、海龙的部队，回援兴京。但姜海山率忠义军的援兵先期到达，于14日从五凤楼、湾甸子等处“复折入兴（新）宾堡”，于堡南拔补沟和俄军交战，俄军施重炮轰击，义军分据南北各山头“冒死一再迎拒”，激战两天，给俄军造成重创。16日，刘永和率主力从通化西北杀来，与姜海山合兵一处，“仍入兴（新）宾堡”。当天傍晚，俄军由陵街西堡开往兴京老城^⑧，双方做好大战前的准备。18日，忠义军集合万人，携大炮六尊，直攻老城，19日老城被克，义军越战越勇，于20日发起总攻，“四路进兵，层层逼近”，俄军“势甚危迫”。刘永和准备拿下兴京后进军盛京，收复省城。但21日采尔皮茨基从北路赶来，击忠义军后路，义军腹背受敌，被迫分南北两路撤出新宾堡^⑨。战斗在通化、海龙一带的忠义军在山城、柳河等地先后与俄兵接战4次，毙伤俄官兵50余人^⑩。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99页。

② 常有巖：《边疆叛迹》，手抄本。

③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99页。

④ 同上。

⑤ 兴京副都统灵熙咨文，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交涉总局档案，第1537号。

⑥ 盛京将军增祺札，奉天交涉总局档案，第1537号。

⑦ 兴京副都统灵熙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咨文，奉天交涉总局档案，第1537号。

⑧ 盛京将军增祺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致奉天交涉总局札，奉天交涉总局档案，第1537号。

⑨ 兴京副都统灵熙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一、二、三日咨文，奉天交涉总局档案，第1537号。

⑩ 奉天交涉总局档案，第1538号。

忠义军三战新宾堡，重创俄军。采尔皮茨基以新宾堡易攻难守为辞，撤回沈阳，“驻兵城外，挑挖巨壕，置炮城上以防之。”^①另外两路俄军，在通化、海龙、怀仁一带到处挨打，也先后撤回。这时忠义军各部仍有两三万人，“西至沈阳，南至凤凰，北至铁岭”，使俄军处于“防不胜防，战无可恃”的被动局面^②。在俄军大举进兵之初，长顺、增祺提出剿抚并用的策略，采尔皮茨基等怀疑这两个奴才“袒贼”，一心用剿，同时不断收缴吉、奉二省马步巡捕的枪支，由俄军独来独往。其结果俄军失去耳目，又不熟悉地理民情，抗俄武装时聚时散，昼伏夜出，使俄军四处碰壁，屡遭挫败；地方居民在俄军的骚扰下，纷纷加入抗俄武装队伍，各地抗俄武装反而越聚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俄军不得不接受长顺和增祺的建议，剿抚并用，同时大力收买和扶植地方民团，使其担负扑灭抗俄武装的主力。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忠义军等诸部出现了非常困难的局面。

杨玉麟所部，拒绝长顺的“谕抚”，与俄军战于海龙，兵败后经大围场西奔昌图，又与俄军战于姚家窝铺，伤亡40余人，余部散入蒙荒。^③

刘永和率忠义军从新宾堡返回通化，各部分散作战。李贵春、董敏毅部攻占山城子，转战海龙，被地方武装击败，损失400多人，余部分成小股进入深山^④。张桂林部再度北上占新宾堡，兴京副都统灵熙进行招抚，张桂林受降。其部众3000余人，被俄军改编后分驻通化等地^⑤。其中受降头目蒲步瀛等大杀回马枪，成为俄军剿灭忠义军的得力鹰犬。刘永和因部众败降频仍，队伍越来越孤立，辗转退踞龙冈山，又被俄军围住，伤亡惨重^⑥。其族弟、忠义军帮统刘秉和被捕牺牲；王和达兵败后被韩登举的民团捕获，英勇就义；刘永和只身隐入山林，不知所终^⑦。

忠义军林成岱（林七）部驻怀仁，在俄军大举进攻通化、海龙时，趁机向东发展。6月6日占宽甸县，20日占凤凰城，凤城管带周玉麟投义军，林军大振，21日占安东，“乡间揭竿响应者五十余处”，辽东震动^⑧。驻辽阳俄

① 常有暇：《边疆叛迹》，手抄本。

② 奉天交涉总局档案，第1537号。

③ 盛京将军增祺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札，奉天交涉总局档案，第1538号。

④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200页。

⑤ 督粮营务处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移文，奉天交涉总局档案，第1539号。

⑥ 盛京将军增祺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札，奉天交涉总局档案，第1538页。

⑦ 一说刘永和被俄军俘获，带往俄国。参见《海龙战守事迹》序。

⑧ 常有暇：《边疆叛迹》，手抄本。

军 2000 余人在米申科少将率领下赴凤城镇压，林成岱正率 1500 人战斗在大孤山，闻警后回师救援，但凤城已于 6 月 30 日沦陷^①。大孤山之敌尾随掩杀，林军大败，周玉麟被俘处斩，林成岱携眷属逃往烟台，余部瓦解^②。

晋昌于哱噜聚众抗俄，不断受到长顺和增祺的弹劾，被清政府革职议处，失去了对部众的号召力。1901 年 3 月初，采尔皮茨基率俄军向哱噜大举进攻，增祺派员随俄军前往劝降^③，在俄军未到之前，晋昌部众已逃散大半。寿长率清军 1000 余人往助晋昌，被反动民团击散，于新民厅为俄军俘获^④，押往海参崴，后死于伊尔库茨克。

东三省抗俄武装经大小数百战，先后克复十余县、数十镇，涌现出一批为民族生存慷慨捐躯的英雄人物，造成巨大的抗俄声势，显示了中国人民保卫国土的决心。由于三省抗俄武装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各部分散作战，没有形成有机的作战整体，易于被各个击破；一些义军领导人，虽有强烈的民族观念，能英勇抗击俄军的进攻，但阶级意识模糊，经不住东北地方官员招抚的诱惑；特别是义军队伍中混进了不少投机军官，他们中途叛变，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最后，抗俄义军在中外反动派残酷的武装镇压和分化瓦解下失败了。但是，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沉重地教训了沙俄侵略者。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说：瓜分中国对俄国是不利的，因为“被逐块瓜分的四亿中国人民显然是要咬人的，而我们将首先被狠狠咬住。”^⑤东北人民的抗俄武装斗争粉碎了沙俄武装吞并东北的美梦。

第八节 沙俄与《辛丑条约》

1900 年 8 月 14 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腐败的清朝政府立即决定向帝国主义乞和，希望得到它们的宽容，以继续维持其对中国各族人民的统治。为此，清朝政府授权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1236 页；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 3 卷，第 310 页。

② 常有程：《边疆叛迹》，手抄本。

③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987 页。

④ 同上书，第 1136 页。

⑤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库罗巴特金和利涅维奇日记摘编，1925 年列宁格勒出版，第 15 页。

速办理”^①；同时，它翻过脸来，同侵略军一起绞杀革命。为表明乞和“诚意”，清廷颁发谕旨，指义和团“为肇祸之由”，并说“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②。

清政府乞和后，如何加强各自对清政府的控制和分得更多的赃物，成为列强关注的首要问题。经过近一年的争斗，俄、英、德、日、美、法、意、奥、比、荷、西等 11 个国家在牺牲中国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共同迫使清政府于 1901 年 9 月 7 日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沙俄从中国攫得的权益最多。

（一）沙俄与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

李鸿章于 1896 年与 1898 年曾两次为沙俄重金收买，同沙俄签订了卖国的“中俄密约”与《旅大租地条约》，成为清政府中的亲俄派首领。因此，还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初，沙俄就企图利用李鸿章，多次点名要他到北京来进行谈判^③。1900 年 6 月 13 日，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面告中国驻俄公使杨儒说：“已电格使（沙俄驻华公使格尔思）请太后召公（李鸿章）回京定乱。”^④两天后，清政府急召李鸿章“迅速来京”^⑤。与此同时，乌赫托姆斯基向杨儒表示，维特对中国“颇思相助”^⑥。李鸿章闻讯，即于 6 月 26 日从广州电请维特“提出高明的建议”，“以便帮助（清政府）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⑦。维特立即回电称，俄国政府与俄国军队可全力进行“帮助”^⑧。沙俄还决定派乌赫托姆斯基来华与李鸿章谈判^⑨。7 月 8 日，清廷发布上谕，调补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8 月 7 日，又接受沙俄建议，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⑩，俄国的愿望得到满足。

沙俄本想利用自己在联军中的重要地位，赶在联军统帅瓦德西率军到达

①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 4537 页。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 4 册，第 52 页。

③ 《红档》杂志 1926 年第 1（总第 14）卷，第 30 页注②。

④ 《彼得堡杨使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午刻到；《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 22 卷，第 35 页。

⑤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夏季档）；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41 页。

⑥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 22 卷，第 38 页。

⑦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250 页。

⑧ 同上。

⑨ 同上书，第 251 页。

⑩ 扬切维茨基：《在停滞不前的中国的城墙上》，第 493 页。

中国之前，同中国单独议和，取得有利于己的结果。但是，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仓皇西逃，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不过，沙俄仍想尽快通过李鸿章同清政府进行和议谈判。

慈禧等人出逃后，8月18日派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向帝国主义乞和。不久，俄国驻北京财政代表璞科第、公使格尔思便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电催李鸿章来京，准备用俄国军舰护送他北上。维特也通过杨儒电告李鸿章：“俄国他日之护助贵国，请中堂勿疑。”^① 8月25日，沙皇政府又佯示对华友好，通告列强，表示“拯救”使臣的目的已经达到，提议从北京撤离外国军队和公使^②，以便清廷早日返回北京，尽快开始议和。

但是，由于李鸿章“倾向”俄国^③，英、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拒绝承认李鸿章议和全权大臣资格，提出要同与英、日交往较密切的庆亲王奕劻“商议和局”，并要奕劻“急速回京”^④。璞科第在给维特的电报中说：“英、美、日公使都竭力谋划反对李鸿章，不愿承认他的全权，并说他是逃亡政府的代表，他们不愿意同他打任何交道，意图建立一个新的开明政府，并和这个政府谈判。我们极不愿意李鸿章不管事。”^⑤ 由于意见对立，英、德两国甚至想把李鸿章抓起来作为人质，使俄国人“不能与他交涉。”^⑥ 在大沽口的英、德、日、法等国的海军将领也做出决定：如果李鸿章北上抵达大沽，便不准他与陆上取得任何联系。对此，沙俄提出了抗议^⑦。

9月15日，沙皇政府发出通告，询问列强：

1. 是否准备在军队留驻北京时将使馆人员迁移至天津；
2. 是否承认中国皇帝给予庆亲王与李鸿章的全权为有效；
3. 如果认为有效的话，是否愿意训令驻北京代表立刻与中国代表进行谈判。^⑧

这是沙俄为博取清政府好感，实现独占东三省的野心，继8月25日发布“通告”之后采取的又一外交步骤。各国从各自的侵略利益出发，都表示

①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5卷，第32页。

② 《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28—29页。

③ 1900年8月23日维特给西皮亚金的信；《红档》杂志1926年第5（总第18）卷，第40页。

④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第1卷，第13页。

⑤ 《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30页。

⑥ 《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104章，第4618号文件。

⑦ 同上书，第4613号文件。

⑧ 同上书，第4644号文件。

了否定性意见。因这时联军统帅瓦德西尚在来华途中,德皇威廉二世对俄国的提议尤为反感。他在一封电文上批示道:俄国急于同李鸿章举行“和谈”,是要“使外国人不要进行报复,并离开北京”,以便通过李鸿章攫取满洲。“既然‘和平提案’事实上只标志变相地把满洲送给俄国,使其他国家吃亏,我们自然不能接受这个提案。”^①英国驻北京公使窦讷乐也说:“拖延谈判不会使我们蒙受任何损失。”^②他坚决反对从北京撤离使馆及军队,要求英国政府尽快从印度调派大军,并“坚决抗议接受李鸿章为全权大臣”^③。

面对英、日、德的抵制,沙俄极力争取美国的支持,向它保证自牛庄(营口)撤退军队,并表示对中国无领土野心。这时,美国为增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已提出名为“保全中国”、实为列强共管的口号,主张维持清政府原有统治秩序,并把它变成列强奴役中国的工具,因此,同意承认李鸿章为“全权”。英、日等国面对义和团运动的坚强反抗,也认识到为了维护列强对中国的控制,还是保持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较为有利,因而也承认这个政府所指派的全权大臣李鸿章^④。但是,英、日向清政府要求加派与它们关系较密切的刘坤一、张之洞参加和议,以为牵制。清政府不好违抗,同意“派刘坤一、张之洞函电会商议和事宜”^⑤。不久,谣传清政府要撤换刘、张,英、日对此甚不放心,提出警告说:“易此二督,则和议难望有成。”^⑥德国公使穆默也对奕劻、李鸿章说:各国将来意欲议和,则江督、楚(鄂)督万不可动^⑦。9月下旬,瓦德西率军抵华,德国的目的已达到,不愿再在李鸿章的全权问题上与俄国对立。这样,列强终于都同意和李鸿章进行谈判。

以上事实表明,沙俄与英、日、德等国围绕着李鸿章的全权大臣资格问题展开的斗争,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对清政府控制权的反映。

9月18日,李鸿章北上抵达大沽口,直隶地区俄军司令利涅维奇立即给予隆重接待,并派武装哥萨克30余人“接护前进”^⑧,把他送到北京。途经

① 《德国外交文件》,第15卷,第104章,第4625号文件。

②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1号(1901年),第254号文书。

③ 《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104章,第4638号文件。

④ 参见《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1号(1901年),第401号文书;《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104章,第4656号文件。

⑤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137页。

⑥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第3卷,第5页。

⑦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290页。

⑧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6卷,第23页。

大沽、天津时，李鸿章曾分别同沙俄的军政官员廓索维慈（时任阿列克谢耶夫的外交专员）、璞科第（沙俄驻京财政代表）、阿列克谢耶夫，以及俄国公使格尔思会晤。10月11日，他一到朝阳门，又“由俄统帅派骑兵数十名护卫……安抵贤良寺行台，寺门外复有俄兵以鼓箫相迎，颇极恭敬。”^①沙俄的这番作态，表面上是为了显示对中国的友谊和支持，实质上只是为了加强对李鸿章的笼络和控制，难怪当时外交界把李鸿章视作“俄国的俘虏”了^②。

（二）沙俄与“和议大纲”

李鸿章还没有到达北京，列强已就分赃事宜进行准备了。其中有互相勾结，也有尖锐的斗争。

1900年10月4日，法国首先提出了“和议基础提案”。这个提案是在同俄国反复研究以后才提出来的。

先是，法国认为应由俄国出面建议召开有列强代表参加的特别会议来讨论“进一步解决中国纠纷的实际方法”，并认为俄国政府8月25日通告中所提四点建议，“可以作为会议纲领的主要基础”。这四点：

1. 保持各国协商一致；
2. 保留中国原有的国家制度；
3. 避免可能引起瓜分中国的一切情况；
4. 共同努力，恢复北京合法的中央政府，使其具有保障国内秩序和社会安宁的力量。

当时，沙俄正忙于在东三省攻城略地，担心马上召开列强代表特别会议会给本国的单独行动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对法国的提议不太热情。但是，为了与法国协调行动，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对拟议中的和议条款，仍然提出了几点意见：

一、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用合法的中国政府来保证它对各国承担的义务”。

二、在联合对华要求中，应着重指明“确保中国政府此后不致破坏此类义务的一切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延长禁运武装至中国的期限；其次是严惩“叛乱首犯”和罢斥端王载漪、董福祥、刚毅、李秉衡及毓贤。

①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第1卷，第31页。

② 尼什：《日俄战争的起源》，1985年伦敦出版，第80页。

三、“赔偿”外国政府、团体及臣民的“物质损失”。^①

法国政府赞同上述建议。9月14日,法国驻俄公使奉命函告拉姆斯多夫,为了对清政府经常保持强大的压力,还必须在使馆设立常驻卫队,拆除大沽的工事,并在北京至海口的通道上占领两三个据点^②。10月4日,法国政府征得沙皇政府同意,向有关国家政府提出“和议基础提案”六条,作为对华谈判的基础:

“1. 惩办由各国在京代表指定的祸首。

2. 继续禁止军火输入中国。

3. 国家、社团及个人的合理赔款。

4. 北京使馆永久驻兵。

5. 拆毁大沽炮台。

6. 天津大沽间择二、三处驻兵,俾有事时使馆人员能安全抵达沿海地区,畅通无阻;外国军队亦可由沿海开赴北京。”^③

这项提案,原则上为列强所接受,只有个别的不同意见。法国政府对原案“稍作修改”后,于10月14日再次照会列强,并建议待进一步修改后即向中国代表提出,作为“和议出发点”^④。随后,外交团多次举行会议,对法国“提案”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至12月22日形成一个为各国代表一致通过的十二款“和议大纲”,除前述法国“基础提案”的基本内容外,增加了以下主要条款:

一、永远禁止中国人民设立或加入“仇视诸国各会,违者问死”;发生过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城镇“停止各项考试”;地方官对其辖区内发生的反帝斗争,如不及时弹压,“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借端开脱,别给奖叙。”(第十款)

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各国使臣觐见中国皇帝的礼节必须改革,“其如何变通之处,由诸国酌定,中国照允施行。”(第十二款)

三、中国政府为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书记生杉山彬^⑤“昭雪”。(第一、三款)

① 以上均见《红档》杂志1926年第1(总第14)卷,第31—33页。

② 同上书,第33页。

③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0年,第321—322页。

④ 《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104章,第4659号文件注①。

⑤ 克林德、杉山彬于1900年6月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在北京被清兵所杀。

四、“凡通商行船各约，以及关乎通商其他事宜，各国以修改为有益者，中国认与商议更改。”（第十一款）^①

足见“和议大纲”是沙俄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勾结的产物。

1900年12月24日，俄、英、德、日、美、法等11个国家的驻华公使发出联合照会，向中国提出上述“和议大纲”，并且声明，这些条件“无可更易”^②。同时，英、德、日、美等国认为，“在与中国政府行将举行的交涉中，俄国的态度无比重要”，一致希望它立即运用其对清廷的巨大影响，“使中国接受联合照会中所提出的要求。”^③沙俄自然不负众望。在联合照会发出的第二天，格尔思便来到李鸿章的寓所，威胁说：“若中国不从速允从，或仍与磋磨，各国必谓中国非真心修好，和局必至决裂。”又说，“和议大纲”条款如“从速核准，以后详目甚多，可从容计议”，“宗社安危，在此一举。”^④就这样，在沙俄的逼迫下，清政府没有经过任何谈判，便于12月27日接受了所有12条“大纲”^⑤。

“和约”的主要内容确定后，列强开始讨论“和议大纲”的一些细目。它们在“惩凶”和赔款问题上意见不一，争吵不休，致使条约的最后签订又拖延了八个多月。在此期间，“谈判”主要是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进行的，清政府的全权大臣几乎被弃置一旁，无事可做。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在列强商妥的约稿上签字，这就是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⑥。《辛丑条约》除正约12款外，尚有19个附件。

《辛丑条约》与“和议大纲”比较，有部分条款定出了细目，主要是：

1. 确定了赔款总数为白银4.5亿海关两，年息4厘，分39年清还，以关余、盐余（海关税和盐税收入抵原有外债后的余额）及通商口岸常关收入三项税收作担保（第六款）；
2. 确定了“祸首”名单及惩办方法（第二款）；
3. 具体规定了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12处驻扎外国军队（第九款）；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38—840页。

②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第4卷，第4页。

③ 《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107章，第4843号文件。

④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2—843页。

⑤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76页。

⑥ 同上书，第493—500页。

4. 在北京划定“使馆界”，由各国派兵保护，“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第七款）；

5. 规定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名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第十二款）。

《辛丑条约》是沙俄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一副空前沉重的枷锁。帝国主义各国通过该约，直接驻兵北京和直隶地区，加强了对清政府的监视与控制。该约规定清政府负有严厉镇压中国人民的一切反帝活动的“义务”，从而使清政府变成了列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在经济上，该约规定的巨额赔款，是对中华民族空前无耻的掠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由此受到进一步的限制。《辛丑条约》成了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的重要标志。

（三）沙俄从中国掠夺了最多的赔款

上文提到，“和议大纲”确定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惩凶”与赔款问题上发生了长期的激烈的争吵。沙俄为了博得清政府好感，以便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并实现它独占东三省的要求，在谈判之初，曾在这两个问题上提出所谓宽容条件。

关于“惩凶”问题，沙俄不赞成德国的意见，提议不以此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并主张从轻“惩处”。沙俄公使“受权放弃死刑要求”^①，建议把“死刑”二字改为“最严厉的刑罚”，并说“刽子手的任务，如果有必要的话，最好由中国政府担任”。沙俄的意见得到部分采纳。后来，“公使会议一致决定把死刑人数从10名减至4名”^②。接着，英国公使萨道义提出要惩办各省“祸首”，格尔思表示反对。他说，俄国政府“认为惩凶事已告结束，因此他不能参加进一步的讨论”^③。

关于赔款问题，1900年9月6日，沙俄与法国商讨“和议基础提案”时，曾提出要有所“节制”。它的如意算盘是以此诱使清政府签订关于东三省的单独条约。1901年3月，中俄单独谈判破裂，沙俄的计划落空，便在赔款问题上撕下了伪善的面纱，露出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贪婪凶狠的真面目。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宣称，现在“应该通过赔偿损失来坚决地保卫我们的物质利益”，并说在任何情况下“对中国的宽容不应与俄国人的损失联系在一

① 《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104章，第4676号文件。

② 同上书，第107章，第4879号文件注①。

③ 同上书，第16卷，第107章，第4877号文件。

起”^①。貌似宽容的财政大臣维特这时连一丝一毫“宽容”的影子也不见了。他电告格尔思，“以后再议公约，只可加刚，勿再作梗。如现议续办外省祸首，各国要杀多人，俄初未允，各国要素巨款，俄亦未允，今当反是，变本加厉。”^②也就是说，沙俄不仅在赔款问题上，就连在“惩凶”问题上也要对中国提出更苛刻的要求。

为了向中国勒索更多的赔款，沙俄主张由各公使径直提出本国的赔偿要求，反对成立混合委员会来加以审核^③。这一意见终为列强所接受。于是，沙俄乘机勒索，赔款额从1901年2月5日提出的白银1800万海关两，猛增到13331.6万海关两^④。其他各国也竞相加码。5月7日，列强照会清政府，截至7月1日赔款总数定为4.5亿海关两银子；各国按比例减少自定数额，沙俄也减至130371120海关两^⑤。如过期（7月1日）不订条约，必须另加占领军费用。清廷急于返回北京，被迫于5月16日颁发上谕：“各国赔款共450兆，4厘息，着即照准，以便迅速撤兵。”^⑥这样，沙俄向中国勒索了最大的赔款数额，占总额的28.97%，即使按照维特显然夸大了的1900—1901年沙俄全部侵华战费和“损失”数字，收支相抵，它掠取的赔款还多出1400多万卢布^⑦。无怪乎拉姆斯多夫承认：1900年的对华战争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⑧。

赔款数额与利率确定后，在赔款偿付方式问题上，沙俄又提出由各国联合合作保，替清政府筹借外债，以便达到一次取得全部赔款的目的。但是，英、美等国担心这会影响到它们今后同中国的贸易，“杀死下金蛋的母鸡”^⑨，表示坚决反对。最后，各国议定由中国发行债券，分39年摊还，年息4厘。这样，本利共白银98200余万海关两，加上各省的地方性赔款，实际赔款数超过10亿海关两，大体相当于清政府12年的财政总收入。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13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34卷，第25页。参见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28—129页。

③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6号（1901年），第3号文书。

④ 赤木英道：《日本对外关系（1542—1936年）》，1936年东京英文版，第189页。

⑤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50页。

⑥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第8卷，第9页。

⑦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62页注①。

⑧ 同上书，第262页。

⑨ 《德国外交文件》，第16卷，第107章，第4852号文件。

庚子赔款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各族人民的负担。清政府为了履行对沙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条约义务，强迫各省每年分摊 2300 余万两银子的赔款。1901 年 12 月 23 日，清廷谕令各省督抚，“按西〔历〕四月初一的行情，每月应摊银 182 万两”，各省“各将拨定数目，匀作十二次，先期交解沪道”。至于“各该省前次指派之款，……无论如何为难，不得稍有迟误”^①。清政府认为“此次中国受此大亏，舍加税别无法想”^②，它甚至想以抽人头税来解决赔款的偿付问题，说什么“果能办理得法，每丁岁捐二三百文，尚不至扰累，而可集巨款”^③。清政府的各级官吏，又借筹措赔款之机，大肆勒索，使劳动人民陷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 4 册，第 118 页。

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1091 页。

③ 同上书，第 1131 页。

第三章

争夺中国东三省的 日俄帝国主义战争

第一节 日俄矛盾的加深和中俄北京 谈判的开始

一 日俄在远东的对立和英德美法的态度

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爆发，是交战双方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的必然结果，也是以英、俄对立为主的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利益互相冲突的产物。

如本书第一章所述，1895年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但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辽东半岛得而复失，未能实现对华战争的全部目标；沙俄则乘机南进，从政治上控制了朝鲜。此后，日本继续奉行大陆政策，一面以俄国为假想敌，利用中国的巨额赔款，大力扩充军备，振兴实业；一面积极向朝鲜渗透，力图确立其优越的经济地位，与俄国势力相抗衡。于是，朝鲜半岛成了日俄关系的焦点。1898年初，沙皇政府鉴于远东局势动荡不定，日本军事力量迅猛发展，为阻止英、日接近，并取得旅顺、大连，不得不在朝鲜问题上对日本妥协。4月25日，两国代表在东京达成协议，俄国首次公开承认日本在朝鲜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利益关系，并保证绝不妨碍其进一步发展^①。这是日、俄两国在朝鲜的力量对比趋于平衡的显著标志。但日本并未感到满足，沙俄也无意继续让步。因此，两国在朝鲜摩擦的根源依然如故。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中国政局动荡。日本亟谋利用其有利的地理位

^①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卷上，“文书”，1955年东京出版，第186页。

置,扩大对华侵略。首相山县有朋积极采取“南进”方针,把着眼点放在新攫取的台湾岛对岸的福建,同时他也不忘怀“经营北方”^①。日本派遣重兵,侵入华北,充当镇压义和团的帝国主义联军的主力,绝非无因。7月,俄军大举入侵中国东三省。日本驻俄公使小村寿太郎立即感到俄国很快就会占领整个满洲,进而威胁日本在朝鲜的利益,便于22日建议外务大臣青木及早“与俄国达成相互谅解”,确认“日俄两国在朝鲜和满洲互不妨碍,并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互相保障通商自由”。他强调朝鲜问题的解决,“无疑会促进日俄双方在解决中国问题时全面合作。一旦把中国瓜分为各国的势力范围,则日本不难取得俄国的支持以保护其在中国南部的最高利益”^②。青木对这一建议反应极为迅速,7月26日即训令小村就商定满韩势力范围问题与俄国开始谈判。这一建议的实质是在“满韩交换”的基础上,通过协商把朝鲜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③。这时,沙皇政府正通过其驻汉城代办巴甫洛夫(巴布罗福)酝酿“朝鲜中立化”,企图将朝鲜变成由列强加以“保障”的“中立国”^④,实即将它变成日、俄之间的缓冲地带,对日本的建议没有响应。于是青木转而训令驻德公使井上试探德国政府对日本控制朝鲜的打算抱何态度^⑤。这是日本为与沙俄争夺朝鲜而谋求与国的重要尝试。10月初,日军南侵中国厦门惨败,第二次山县内阁总辞职,这一交涉被迫终止。

1900年10月,素主对俄协商的伊藤博文第四次出任内阁首相。他认为俄国占领满洲是日、俄举行谈判以解决朝鲜问题的最适宜的时机^⑥。但新任外相加藤高明表示反对。早在驻英公使任内(1894—1899年),他即曾建议本国政府采取亲英反俄政策,并主张日本应积极参加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出任外相后,他更认为:“与俄国达成和平协议将是日本的失败,采取坚定的态度并不惜诉诸武力,才是日本的唯一政策。”^⑦当时日本虽未做好对俄战争的准备,但加藤对俄外交的态度是强硬的。10月16日,英、德两国就中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三(《北清事变》下册),第2370号文书。参见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第206—208页。

② 同上书,第33卷,第699页。

③ “满韩交换”,“满”指东三省,“韩”即朝鲜。1897年10月,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详见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第197页。

④ 朴:《俄国与朝鲜》,第176—177页。

⑤ 《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第701页。

⑥ 加利佩林:《英日同盟》,1947年莫斯科出版,第65页。

⑦ 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第2卷,第716页。

国“门户开放”和领土完整问题达成协议：如任何大国利用中国混乱局面获得领土利益，协议双方将共同协商采取步骤以维护各自在华利益（第三款）^①。尽管两国的目标各异（英国想以此阻止俄国占领满洲，德国企图以此限制英国在长江流域获得新的领土利益），但加藤确信这一协定含有遏制俄国的因素，立即于同月29日声明加入协定^②，以便对德国的远东政策施加影响，离间俄、德关系，防止重演“三国干涉”的历史。

沙俄武装占领东三省后，如何巩固其在满洲的势力，已成为它在远东的头等任务；与此相比，在朝鲜的利害关系问题则已退居二位。1900年12月，沙皇政府于拟定《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后不久，授权驻日公使伊兹涅尔斯基向日本正式提出“朝鲜中立化”的建议^③，就是想通过在朝鲜问题上做出有限度的让步来安抚日本，以换取对方承认俄国在满洲的行动自由。日本首相伊藤期望“不战而获得朝鲜”^④，准备就这个问题与俄国谈判。但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却认为“韩国问题之解决，如不同满洲问题联系起来，则不能令人满意”^⑤，意即朝鲜问题的解决，应为日本“北进”开辟道路。恰在这时，阿列克谢耶夫迫增祺签订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为日、英等国所悉，中俄在彼得堡举行单独谈判一事也已成为外交界公开的秘密（详见本卷第二章）。因此，加藤赞同小村的建议，并指出俄国在千方百计地加强其在满洲的地位时提出“朝鲜中立化”问题，其目的是想继续驻足朝鲜，而日本在满洲和朝鲜均有利益，二者不可分割^⑥。两个强盗各怀鬼胎，一个要独占中国东北，同时在朝鲜也想分尝一脔；另一个要独吞朝鲜，同时对东三省也暗藏插足的野心。由于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俄、日之间根本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1901年1月17日，加藤通知伊兹涅尔斯基，拒绝在满洲恢复战前状态（即俄国从满洲全部撤军）前就朝鲜问题举行任何谈判；同日，他又电令驻俄公使珍田将此意通知俄国政府^⑦。显然，日本关心的是满洲的未来地位。加藤以俄国自满洲撤军为谈判的先决条件，积极反对中俄签订满洲专约、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原

① 马克谟编：《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263—265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第69—70页。

③ 同上书，第34卷，第521页；《红档》杂志1934年第2（总第63）卷，第8页。

④ 加利佩林：《英日同盟》，第66页。

⑤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524页。

⑥ 尼什：《英日同盟史》，第110页。

⑦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399、400号文书。

因就在于此。但是,俄国仍按既定的侵华方针办事,加紧拟定对华新要求,图谋使其对东三省的军事占领长期化、合法化。因此,1月30日拉姆斯多夫在答复日本时,对满洲问题仍避而不谈^①。这与日本的意向大异其趣。俄国关于“朝鲜中立化”的谈判计划于是搁浅。

在日益加剧的竞争中,日、俄双方都竭力争取余国,以便阻遏对方。沙俄首先依靠久已建立的法俄联盟。1901年1月末,拉姆斯多夫和法国驻彼得堡大使达成口头协议:法国对俄国在满洲的行动不置可否,俄国对法国在中国云南修筑铁路、扩张势力,采取同一态度^②。同时,沙皇谋求德皇的支持。德皇威廉二世为把俄国力量引向远东,以利孤立自己的宿敌法国,于1月19日表示,他“充分理解俄国为保护其在满洲的利益,有必要同中国人缔结单独协定。他不打算干涉这种协定。”^③事实表明,沙皇政府在远东仍想维持1895年三国联合对日的阵势。

日本外交当局则利用英、俄国有的矛盾,指望得到英国的援助。为此,日本驻英公使林董于1月12日援引10月16日《英德协定》第三款,希望英国外交部就《奉天交地暂且章程》采取类似日本的行动,向俄国提出质问^④。英国对俄国无视1899年双边协议,打破两国在华均势,蓄意扩大其在华北的势力,侵犯英国在东北的“条约权利”,深为不安,颇有在远东寻求盟友以削弱俄国的愿望。但英国政府仍视日本为“二等强国”,对它是否堪当与俄国抗衡的重任,心存疑虑。所以对日本的建议态度谨慎,仅表示将以温和的口吻向俄国政府提问,并向北京提出“必要的劝告”^⑤,而无意走得比这更远。

日本也寄希望于美国。19世纪末,美国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已拥有较大的贸易经济利益,它力图把包括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在内的所有地区变为美国的市场和投资场所。为扩大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出口,1899年2月,美国驻俄代办曾奉命要求俄国政府尊重美国在上述地区的“条约权利”^⑥。1899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列强发出照会,要求在中国

① 《红档》杂志1934年第2(总第63)卷,第11页。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59页。

③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2页。

④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4页。

⑤ 尼什:《英日同盟史》,第112页。

⑥ 扎布里斯基:《美国和俄国在远东的竞争(1895—1914)》,1973年美国重印本,第52—53页。

实行“门户开放”，其重要目标也是开放中国东北。“照会”要求在中国保有势力范围的国家宣布，在其势力范围内的铁路运费标准，对所有国家的货物一视同仁，一律平等^①。这一项直接与“东省铁路合同”和“南满支线合同”的有关规定相左（详见第一章），显然是针对俄国的。为此，11月19日穆拉维约夫指示驻华盛顿大使喀西尼：美国的要求不得涉及“关东租借地”；喀西尼也认为俄国在“关东租借地”应“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维特则表示他特别反对按美国的要求在东省铁路实行无差别运费制度^②。1899年12月30日，俄国复照美国，对铁路运费一事只字不提，实质上等于宣布拒绝美国的“门户开放”要求^③。1900年7月3日，在俄军入侵东三省前夕，海约翰再次向有关各国发出照会，不仅重申中国“门户开放”原则，而且要求“维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④，这也含有防范俄国独占东三省之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原是排挤竞争者的重要工具。日本这时在东三省尚未立足，与美国并无利害冲突，而在排俄这一点上又有共同之处。因此，美国是日本遏制俄国的理想盟国。但是，美国当时最关心的是发展它在满洲的经济利益，只要保证美国资本自由进入满洲，它甚至准备同俄国携手，所以对日本的属望，反应冷淡。

1901年2月15日，即俄国政府在彼得堡向杨儒提出12条无理要求前夕，早已获得有关情报的加藤高明，又向英国驻日公使窦乐尔表示，如俄国坚持同中国缔结有损中国利益的协定，日本将向中国提供“物质援助”，暗示日本可能向俄国动武^⑤。对此，索尔兹伯里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不可能为“防卫中国的陆上边界采取步骤”，但原则上不反对同日本达成协议，以“联合防卫我们认为于我们有重大利益的中国沿海，使其免落俄国之手。然而，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确定我们的责任范围”^⑥。索尔兹伯里的意见实际上指明了英日联合的原则。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899年，第131-133页。

② 康托罗维奇：《美国在争夺中国的斗争中》，1935年莫斯科出版，第140-141页。

③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899年，第141-142页。

④ 同上书，1900年，第299页。

⑤ 窦乐尔致兰斯敦密电，1901年2月15日。参见杨国伦《英国对华政策》，第285页。按：当时林董在伦敦向德国驻英使馆负责官员表示，日本一旦获得英国的实际支持和确信德国严守中立，将对俄国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非常措施。参见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300页。

⑥ 尼什：《英日同盟史》，第113页。

德国在远东采取两面政策。它既警告清政府不要与俄国单独订约^①，又向俄国表示，《英德协定》不适用于满洲^②，意即俄国可以大力向满洲伸展而不必担心德国的干预。3月6日，德国外交副大臣根据德皇的旨意，复向日本公使声明，如果日、俄因满洲问题发生危机，德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一旦日、俄交战，日本无需担心1895年“三国干涉”事件的重演，因为德国的“中立”将阻止法国出动舰队帮助俄国，英国大概也会给日本以援助^③。这等于说日本可以放心大胆与俄国争斗。加藤对柏林的“善意”表示怀疑。3月8日，他指示林董询问兰斯敦，如日俄“对抗”势在必行，“日本可望得到英国多大的援助”。兰斯敦表示，由于南非问题，英国除“严守中立外，不能提供实际援助”^④。当然，英国政府并不愿限制自己选择政策的自由。对它来说，关键在于德国的态度。这是一个比日本更强有力的国家，只要它肯对日本鼎力相助，法国便不会轻举妄动，英日联盟后也就不至于有后顾之忧；即使日俄交战，战争也将局限于亚洲特定区域，不会危及英国的根本利益。为此，3月12日，英国外交部草拟了英德宣言，声称如他国加入俄国对日的敌对行动，英、德两国政府将向日本提供海军援助。这实际上是一种英德日联盟的方案。次日，英国内阁举行会议，进行审议。虽然会议没有通过上述议案，但仍决定向德国探询它所称的“善意的中立”的含义^⑤。3月15日，德国首相在国会演说中突然发表声明：“德国在满洲没有重大利益”，1900年10月《英德协定》“决不涉及满洲”！^⑥这对英国无疑是一瓢冷水，对加藤运用《英德协定》以对抗俄国的外交策略，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针对上述情况，加藤致书伊藤博文，要求不依赖外援，拟订“独立处理”满洲问题的方针。他说：俄国侵占满洲“有使俄国势力支配朝鲜半岛，

① 参见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294、295、297、298等页。

② 同上书，第301页。

③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41页。参见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310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91—192、201页；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6、27、41页。

⑤ 尼什：《英日同盟史》，第115页；杨国伦：《英国对华政策》，第290页。

⑥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26页；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6页。

并对帝国之自卫形成威胁之虞”。因此，内阁应就对俄关系做出决策^①。元老们认为，日本尚不能与俄国抗衡，必须将自己的行为“尽量限制在英德意图（容许）的范围内”^②。尽管如此，加藤仍主张对俄国持强硬态度。3月25日，日本驻俄公使珍田奉命向拉姆斯多夫递交了措词空前激烈的照会，指责拟议中的中俄协定的某些条款“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侵犯了其他列强的条约权利”，警告沙皇政府在现时同中国签订单独协定是“危险的”^③。接过美国标榜的“门户开放”口号来反对沙俄独占东三省的图谋，这在日本还是第一次。它使日本的口号与西方列强的口号协调起来，有利于实现其侵略任务。

对于日本的抗议，拉姆斯多夫表示拒绝。他谎称拟议中的中俄协定是“临时性的”，它既不涉及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和不可侵犯的权力，也不涉及任何其他大国依据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其目的是“帮助俄军尽快撤出满洲”。又说，满洲问题是“两个独立国家正在交涉的问题，他国无权置喙”^④。实际上，这也是警告日本不要插手满洲，而应在朝鲜止步。沙皇政府的这一态度，在日本激起了相当强烈的反俄情绪，日俄战争似有一触即发之势^⑤。但是由于日军尚未做好出国远征的准备^⑥，加以财政困难，没有取胜的把握，伊藤博文不能不采取“冷静”态度。4月6日，日本外务省复照俄国，声明日本不能接受拉姆斯多夫的答复，并保留自己的意见^⑦。

日俄交涉的这一回合，对双方都产生了明显的后果。日本有些原来倾向“联俄”即对俄协商的重要人物现在转而倾向“联英”。例如，义和团运动时期曾认为日俄协商是解决“满韩问题”最好途径的小村，现在得出了日俄冲突不可避免、日本应该联英的结论^⑧。又如军界元老山县有朋，原先附和伊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06页。

②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1972年东京出版，第209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86-287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16页。

④ 《红档》杂志1934年第2（总第63）卷，第18-20页。

⑤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65-166页。

⑥ 英国驻日公使萨道义不止一次地说过日本不会在1903年前发动战争。（伦敦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1895-1904）》，第93页）当时，日本军方特别日本海相认为日本的军力尚不足以战胜俄国。参见尼什《日俄战争的起源》，第105-106页；尼什：《英日同盟史》，第119-120页。

⑦ 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第2卷，第723页。

⑧ 尼什：《英日同盟史》，第142页。

藤博文的主张^①，这时也认为俄国有长期占领中国东三省的企图，日俄间早晚必有一场大的冲突，为防患于未然，必须借助他国之力。他在四月间致伊藤的信中说，拟议中的英日（或英日德）同盟“应规定我们在朝鲜有行动自由”，并列入相互援助的军事条款^②。山县要求同盟国在军事上相互支援，这正是后来英日同盟的精髓。因此，中俄彼得堡谈判破裂后，日本向英国靠拢的趋势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4月17日，素来赞成英日结盟的林董，经伊藤同意，首次向兰斯敦提议：为保护双方的利益，英日宜缔结“永久协定”^③。英方反应良好。其后，双方的接触活跃起来。5月间，伊藤内阁因财政问题垮台，伊藤辞职，加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去法国休养，关于英日同盟的交涉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

中俄彼得堡谈判的过程，特别是3月25日日本政府的抗议表明，日本对俄国远东政策的敌对态度，是导致这场谈判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已成为俄国在远东的重要竞争对手，需要认真对付，这是彼得堡当局从挫折中得出的教训。俄国尚未完成远东的战备工作，形势险峻。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在6月上旬致函陆军大臣、财政大臣和海军大臣说：如果俄国政府在4月初不中止中俄单独谈判，“日本就会毫不延迟地向俄国开战。”^④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俄国外交界对急剧增长的日本军事力量的恐惧。如何排除日本的干涉，以避免在战备尚未就绪时被迫投入对日战争，遂成为沙皇政府在采取新的对华步骤时不能不考虑的突出问题。也可以说，在今后中俄交涉中，沙俄要迈出任何新的一步，向中国提出任何新的要求，都不能不考虑日本可能做出的反应。中国东三省正变成日俄争夺的新焦点。“满洲问题”随之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关注的中心。

二 中俄北京谈判的开始和沙皇政府的策略

中俄彼得堡谈判中止后，围绕“满洲问题”，沙皇政府面临抉择：或者开始无条件地从满洲撤兵，或者试图与日本谈判划分势力范围，或者参照3月28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俄国提出的要求，宣布对各国工商业实行“门

① 详见加利佩林《英日同盟》，第62页。

② 德富猪一郎编：《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1933年东京出版，第494—496页；参见尼什《英日同盟史》，第379—381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7—8页。

④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07页。

户开放”，同时继续占领满洲^①。

彼得堡当局的内部讨论迅即开始。财政大臣维特在6月6日和10日给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的信中认为，为避免对日作战，最可靠的办法是：“放弃俄国对满洲的政治控制”，“取消俄国的军事管制”，把俄国在那里的作用限于保护被视为“私营企业”的东省铁路。具体地说，就是要撤出俄国正规军，结束军事占领状态，然后在“护路”的名义下，由“护路军”保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关于朝鲜问题，他认为如果日本要求得到朝鲜，那么，可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讨论；但是，即使日本占领了朝鲜，俄国也不认为这是对日“宣战的理由”^②。简言之，维特主张对满洲实行“和平”征服；朝鲜，则必要时可交给日本。这是维特又一次改变对远东问题的态度。根据上述原则，他于6月24日拟就了从东三省撤军的第一个具体方案，随后又于7月间向日本驻俄公使珍田提议协商朝鲜问题（详后）。前者规定：将山海关—营口—新民屯铁路立即归还中国。作为“补偿”，中国政府应保证：

1. 赔偿俄国经营管理该铁路的费用；
2. 按1899年英俄协定和中英借款合同的规定，经营上述铁路；
3. 未经俄国同意，不得敷设支线，不得在营口修建横跨辽河的大桥；
4. 该铁路不得由外国人守卫。

同时，维特重新提出了2月间已被中国拒绝的一项“政治性要求”，即中国应允许东省铁路公司修筑从干线到长城的通往北京方向的支线^③，其目的依然是排除东三省南部的以英国为主的他国势力，从而把本国的影响扩大到直隶省。这一建议经7月11日特别会议讨论通过，于18日获得了沙皇认可。

维特的计划只涉及辽河以西地区。至于东三省全境的撤军问题，上述会议并未做出决定。关于这个问题，7月1日，拉姆斯多夫在给陆军部的信中说：由于俄国在远东的海军比日本弱，有必要“审慎地加强阿穆尔边区的战

① 1901年3月28日，即清政府拒绝在俄约签字后不久，海约翰在与喀西尼谈话时说，拟议中的中俄协定“威胁了美国在华工商利益”，但是，“如果我们（美国政府）确信，我们的贸易利益将不受损害，并且门户仍将开放；那末，假如俄国在这条路上走得再远一些，我们甚至也会谅解。”俄国外交界据此认为，只要俄国在满洲实行“门户开放”，美国将放弃“中华帝国不可侵犯”的主张，亦即美国将不反对俄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占领满洲。参见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04—305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13页。

③ 同上书，第314页。

备工作”；但为此而采取的任何步骤都不可避免地会促使日本或者在海军方面作出相应的部署，或者“寻找借口立即采取公开的敌对行动，趁俄国尚未做好战斗准备时对俄国发动突然袭击”。因此，他认为：“摆脱目前困境的最好出路是尽可能地准备……完全撤出满洲。”^①然而，时隔不久，他又提出“新见”：把辽阔富饶的满洲“归并俄国”，不仅有重大的经济价值，而且有助于“增强俄国在亚洲诸民族中的威信”，“及时实现俄国在远东的历史使命”。因此，他于8月1日致函财政大臣和陆军大臣，建议“一劳永逸地决定，为了俄国的国家利益，是希望保留由俄军占领的整个满洲，还是只要其中一部分”^②？同时，他询问俄国是否在军事上和财政上做好了准备，“足以应付日本的挑战而无需冒风险”^③。在此以前两天，即7月30日，拉姆斯多夫还就“如果俄国正式声明把满洲并入俄国，对中国（或日本）将产生何种后果”问题，分别征求驻华、驻日公使的意见。

对此，格尔思复电主张拖延撤军，以待来日。他指出：宣布兼并东三省将招致中国各界仇视俄国；当前“最妥善的办法是维持现状，即不从那里撤军，也不宜宣布我们的意图”。伊兹渥尔斯基的复电也认为，不管以何种借口宣布吞并满洲，都会在日本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因此，此事不宜操之过急，应“拖延事实上的占领时间而不作出任何正式的决定，尽可能等待日本逐步安于既成事实”^④。这实际上是建议实行拖延政策。

维特在答复中重申：由于日本持反对态度，吞并满洲将对俄国不利；为维持驻扎在满洲的庞大军队，财政方面也将“得不偿失”。因此，他主张“逐步地、完全地从满洲撤出”^⑤；撤出的俄军可集中在俄国边境、旅大租借地和东省铁路两侧。“护路军足以保证（东省）铁路的安全”^⑥。同时，维特坚持应要求中国政府做出若干保证，以保障俄国在满洲的利益。他强调，实行这样的政策，既不会遭到中国的反对，也不会有外来干涉，从而“使俄国

① 《红档》杂志1934年第2（总第63）卷，第31页。按：他甚至提议，由俄方发布公告，说明“一俟情况许可”，就宣布“主动”从满洲“逐渐召回俄军”。参见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15、319页。

②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73页，维特：《不得已的说明》，第66页。

③ 《红档》杂志1934年第2（总第63）卷，第32—35页。

④ 同上书，第36—37页。

⑤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74页。

⑥ 波波夫：《沙皇专制制度的远东政策》，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1935年第11期（总第51期），第54页。

政府有可能把满洲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为最终合并满洲做好准备”^①。显然，维特的计划是以退为进。

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在8月12日的复信中不同意“全部撤出满洲”的主张，认为那“标志着俄国在远东的失败”^②。他指出：拉姆斯多夫的所谓撤军，“实质上将是撤走一部分军队而代之以另一部分军队”；由于东省铁路沿线仍将驻扎相当多的俄军，说明“我们实际上不愿意把满洲全部交还中国”^③。他从军事方面论证了满洲对俄国的价值，认为目前既不能全部吞并，更不能完全撤出，而应“通过某种形式将满洲的北部并入俄国”，从而把俄国东部的国界南移至伯都讷、珲春一线。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东省铁路干线得以牢牢地掌握在俄国手中；沿“新国界”的防线比现存的防线将缩短一半以上，兵力更为集中，有利于对付日本。他说，“仿效保留布哈拉汗国的条件，把北满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或名义上从属于中国而实际上由俄国管辖、服从于俄国势力的省份，这对俄国将是最有利的。”为避免列强反对，他建议：在开头几年，只限于将盛京省和吉林省南部（包括吉林省城）移交给中国；并按《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无限期地在“北满”（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北部）“维持现行管理秩序”。此外，他希望将来有机会按俄国租借旅大的条件，向中国租借“北满”^④。

上述维特等人的意见，虽有许多差别，但在暂时避免对日作战、迟早要将中国东北并入俄国这一方面，并无原则分歧，所不同的只是实行的方法与步骤而已。正因为目的相同，彼此的方法有时也易相近，或互为补充；后来维特接受库罗巴特金吞并“北满”的主张，是完全合乎沙俄的逻辑的。

正当彼得堡当局就撤军问题进行紧张的秘密磋商时，李鸿章于8月2日向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副经理波兹德涅耶夫（宝至德）表示，希望俄军尽快撤出满洲，中国愿重新考虑“满洲协定”问题，并请他以此征求维特的意见。这时，拉姆斯多夫感到《辛丑条约》行将签订，如简单拒绝中方建议，李鸿章有可能转而请求英、日等国干预“满洲未来的命运”，迫使俄国外交界承担巨大的风险，因此他赞成同中国立即恢复谈判，并着手拟订新的协定草案。9日，维特经尼古拉二世批准，对李鸿章做如下答复：如中国政府能

①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340页。

② 同上书，第175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15页。

④ 维特：《不得已的说明》，第66—69页。

向道胜银行担保,“满洲的任何铁路与工业租让权,在向道胜银行提供之前,不让与任何人”,则“将大有助于”俄国从满洲撤军。同时,拉姆斯多夫通过格尔思,要求李鸿章“严守秘密”。为取得预期效果,维特等许诺事成后给李鸿章30万卢布“酬金”^①。由于这时杨儒抱病俄都,中俄谈判地点由彼得堡改为北京。

鉴于彼得堡谈判失败的教训,维特与拉姆斯多夫决定在谈判中采取分别商定“政府间协定”与“私人合同”的策略,前者由驻华公使经办,只涉及从满洲撤兵问题(用以公诸于世),后者由道胜银行出面,专注于攫取东三省的经济实利(秘而不宣),并要求先签订“私人”性质的“银行合同”,然后再签署政府间的撤军协定^②。维特的主旨是以降低撤军条件为饵,诱使清政府同意将原约稿中规定给予俄国政府的那些经济权益给予道胜银行,而道胜银行在这项协定中只“是俄国财政部的替身”^③。由道胜银行董事会作为缔约一方以代替俄国政府,则是为了“保持俄国政府的清白”,争取法国资本的支持^④,并“杜绝足资他国抗议的任何借口”^⑤,防止他国或他国人依据利益均沾的原则,打进满洲。“这样一来,整个满洲就会落入沙皇政府之手。”^⑥这就是说,沙俄想“不受占据之虚名,隐收囊括之实利”^⑦。事实上,维特在彼得堡谈判之初,就已有了双重谈判的计划,并为此拟制了两份各自独立、形式完备的协定草案,一为两国政府关于撤军的协定,一为中国政府和东省铁路公司之间的合同(它规定由东省铁路公司独揽东三省关税、路矿和其他工商业的租让权),只是由于当时日本已向俄国表示在满洲恢复战前状态前不与俄国谈判,美国积极鼓吹实行“门户开放”,拉姆斯多夫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才“说服”维特将后一个草案暂时收起。尽管如此,在2月间递交杨儒的约稿第十一款中,仍保留着维特的租让计划的痕迹^⑧。现在,维特决定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23—324页。

② 同上书,第325页注①。

③ 同上书,第326页注①。按:当时维特决定,一旦“银行合同”正式签订,俄国财政部应立即与道胜银行董事会签订专门协定,责其承担各种义务,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使该行都不能超出“替身”的作用,不能摆脱对财政大臣绝对服从的地位。

④ 河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60页。

⑤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76页。

⑥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155页。

⑦ 《杨儒庚辛存稿》,第22页。

⑧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00—301页。

把这一方案付诸实施，所不同的是那时要求先签两国政府间的单独协定，后签“银行合同”；另外，原拟把东三省全部资源的租让权集中在官办的东省铁路公司，现改归“私营”的道胜银行了。

清政府在3月下旬拒签俄约时，曾谕令李鸿章“俟公约（指《辛丑条约》。——引者）定后，即议专约”^①，仍幻想通过对俄单独谈判，规复东三省主权。但李鸿章执意媚俄，竟未经清廷同意，于3月底致电乌赫托姆斯基，乞其“密劝大皇帝宽宏大度，仍守不占中国土地原议；俟公约定后，再行画押”^②，意即准备不经谈判径自在俄方准备的协定草案上签字。李鸿章的这一行动，遭到一些廷臣的责难。直督袁世凯也认为：“俄约夺我权利，妨碍全局，无论公约前后，皆万不可允。”刘坤一、张之洞乘机鼓吹东三省事“愿听（各国）公断”，仍以依恃英日为拒俄的惟一手段^③。由于两派廷臣意见对立，争论不休，清廷举棋不定。7月，各国公使共同炮制的《辛丑条约》稿大体完成。29日，清政府遂发布谕旨，一面说“俄约自难全废，终当设法改订”，要求奕劻、李鸿章“乘公约既成之后，向俄使反复筹商，将前约婉与磋磨”，同时又说，可“将东三省许各国通商，互相牵制，庶根本之地可保，全局亦安”。^④这就是李鸿章在谈判中应遵循的方针。

8月12日，中俄关于撤军问题的谈判重新开始。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俄国公使格尔思首先要求李鸿章给俄国办一“机密照会”，内容包括：“议定画押之先，不得使他人预知此事”；“两国定约均系甘心自愿，所商量所答应之事，不听他国指使”。^⑤格尔思意在防止第三国主要是日本的干预，以便向中国任意勒索。李鸿章居然准备同意。清政府认为如照允俄使所索，未经开议，先立一甘心自愿凭据，其后果不堪设想，责问李鸿章开议后“万一有断不能允之事，何以处之”^⑥。格尔思未遂所欲，便对李鸿章软硬兼施，忽而甘言相诱，说什么“若俯允前约补画，则交收（东三省）以后，可遇事商办，只要中朝诚心和好，勿听外人摇惑，两国睦谊尚可重联”^⑦；忽而怒目相

① 王彦威辑：《西巡大事记》，第6卷，第25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34卷，第29页。

③ 王彦威辑：《西巡大事记》，第7卷，第1—2页。

④ 同上书，第9卷，第14—15页；《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086页。

⑤ 王彦威辑：《西巡大事记》，第9卷，第24页；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99、301号文书。

⑥ 同上书，第9卷，第30页。

⑦ 同上书，第28页。

对,威胁说:“东约必须及早画押,否则生变;……若置不理,东三省无交收之日矣。”^①李鸿章为得重贿,多次请求清政府接受俄方约稿。清政府认为,如照允“前约十一条,我主权、利权、兵权全失,是(东省)名还而实同不还”^②。加以“前约于东三省铁路矿产商务利益,有不得再允他国之语”^③,清政府怕他国效尤,所以不仅未允所求,而且谕令李鸿章继续与俄使“极力磋磨,总期于我兵权、利权及自主之权无损”^④。由于格尔思坚持“维持三月约款”,谈判毫无进展。

这时,彼得堡当局已制定了新的《满洲协定草案》。由拉姆斯多夫起草,并得到维特赞同的这一新约稿共四款,只涉及与撤军有关的问题,其主要内容是:

1. 东三省交还中国政府治理,仍隶中国版图;
2. 1901—1902年内,俄军分两次从盛京省撤退,吉、江两省视1903年情况再定;
3. 东三省中国驻军,不另添兵,巡捕不准用炮;
4. 山海关、营口、新民厅之间的铁路交还原主。

为此,中国方面应做出相应的补偿,其条件与前述6月24日维特所提大体相同,但略去了东省铁路得修筑北京支线的要求,以免招致英国反对。此外,草案规定:俄国以东省“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为履行撤军义务的前提。^⑤

这一草案与“三月约稿”相比,确实降低了一些要价,对清政府有一定的诱惑力。但是,由于“(俄国)陆军大臣的坚持”,新约稿规定了上述保留

① 王彦威辑:《西巡大事记》,第9卷,第46页。

② 同上书,第35页。

③ 同上书,第30页。

④ 同上书,第48页。

⑤ 同上书,第10卷,第24—26页,《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364号文书附件。按:在罗曼诺夫的《俄国在满洲》(第320页)及格林斯基的《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76页)等书中,关于撤军的期限有“到一九〇三年夏撤出其余俄军”或“到一九〇三年夏完成从满洲的撤军”等记载,这与当时约稿中译本所载“三年之间查看能否撤退其余之吉、江两省所驻之俄军”颇为不同。据当年10月7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日置益与奕劻谈话后发回本国的电报说,俄方在新约稿中承诺,江、吉两省俄军,于订约之日起限2年内陆续撤退(《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306号文书)。在同月14日日本外相小村与英国驻日临时代办交换的情报(同上书,第310号文书)以及11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致刘坤一的电文中,所说与日置益相同(王彦威辑:《西巡大事记》,第10卷,第27页)。何以出现上述情况,待考。

条件,这使俄国的撤军将“取决于非常不确定的和有伸缩性的因素”^①,从而为沙俄毁约拒绝撤军埋下伏笔。新约稿对中国在东三省的驻兵权横加限制,也有损中国主权;联系维持拟定的双重谈判的策略和故意延宕的外交战术,更不难窥见沙俄外交当局此举的用心了。

9月4日,即《辛丑条约》签订前三天,拉姆斯多夫将新约稿电告格尔思,令其以此为基础与李鸿章继续会谈。因李鸿章卧病,告假两旬,延至10月5日,该约稿才由俄国新任驻华公使雷萨尔送交李鸿章^②。李喜出望外,立即奏报西安行站,表示除第三款需与东三省各将军“电商再定”外,余款均极满意。他说:“四条似于国家自主权利尚无所损”,“较前议十一条更为大方。向京造路一节竟不再提,尤免后患。”^③10月6日,李鸿章就新约稿提出了四点纯属文字上的修改意见,俄方立即表示接受。这时,《辛丑条约》已经签订,列强正着手从北京撤军。彼得堡当局为避免发生变故,想“尽快解决满洲的未来命运问题”。10月13日,拉姆斯多夫电令雷萨尔“与李鸿章就满洲问题进行最后会谈”。李鸿章获悉后毫不迟疑,于15日通知雷萨尔,他本人正准备启奏皇上速下签约上谕^④。但军机处于19日对俄约稿提出两项修改意见,要求李鸿章与俄使商议:

1. “将吉、江两省与盛京全省俄军及早一并撤退”;

2. 东三省中国驻军数额、地点与巡捕不准用炮一节,只适用于与俄境接壤的若干里内,东省腹地则不在此限。^⑤

对此起码要求,雷萨尔竟坚拒不允^⑥。此后,中俄撤军谈判停滞不前。出现这种“波折”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协定的内容本身,而在于与此同时举行的关于“银行合同”的谈判已因俄方索价太高而搁浅。

①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76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403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65卷,第12页。按:罗曼诺夫在《俄国在满洲》(第321页)、《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152页)中都把9月4日即拉姆斯多夫训令格尔思就新约稿与李鸿章进行会谈之日,当做俄方向中方递交新约稿之时,并说,“李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研究撤兵协定(草案)”,然后才做出答复。这一论点,显然缺乏根据。马洛泽莫夫在《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70页)一书中把8月14日即英国驻华公使探知中俄会谈业已恢复之日〔参见《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25页〕,作为俄方递交新约稿之时,则离事实更远了。

③ 王彦威辑:《西巡大事记》,第10卷,第26页。

④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21-323页。

⑤ 王彦威辑:《西巡大事记》,第10卷,第33-34页。

⑥ 同上书,第38-39页。

如前所述,沙皇政府在谈判之初即已确定了先签“银行合同”后签政府间协定的策略原则。这一点,维特在上引8月9日的复电中已向李鸿章做了暗示。但李鸿章对此似未加理会,因此,在撤军谈判中提议把有关银行垄断权的条款纳入政府之间的协定,而无需另立专约^①。9月3日,他与道胜银行代表波兹德涅耶夫(时该行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不在北京)开始就签订“银行合同”进行对话,又提议“银行合同”应与撤军协定同时办理,至少前者不必先于后者。同时,李鸿章要求明确规定“中国是否有权向他人提供租让权”。这些意见无疑与沙俄的意图相悖。波兹德涅耶夫由此深信需要对李鸿章施加压力,并晓以“切身的”物质利益。于是,第二天他便向李鸿章的幼子李经迈谈了30万卢布“酬金问题”。李经迈满口答应,“合同”可以签订^②。但李鸿章既想得贿于维特,又想邀功于清廷,仍主张银行专约应与撤军协定同时签订。

10月6日,李鸿章与雷萨尔就撤军协定达成初步谅解,次日即要求波兹德涅耶夫提出“银行合同”草案。10月10日,波兹德涅耶夫将“合同”草案递交中方,内规定:中国政府应优先向道胜银行提供满洲全境铁路和一切工业的租让权;如该行自行放弃某一租让权,则中国可以同样条件将其提供他人承办^③。这种近乎吞并的要求,连李鸿章也为之吃惊,忙对波兹德涅耶夫说:“合同把整个满洲都交给道胜银行了”,这“必然会引起外国人的抗议”,他“无论如何没有胆量对这项合同担负责任”,并说他只能就矿产资源的租让权进行谈判。在10月15日的会晤中,李鸿章又说:“皇上不会批准这种合同”^④。这时,维特风闻日本已预闻其事,急不可耐,于27日电告波兹德涅耶夫,如果“在最近数日内”李鸿章不签订“合同”,就“分文不给他”!李鸿章既怕得罪维特,坐失贿款,又怕冒犯朝廷,乌纱难保,于是托词说:庆亲王奕劻已经同意“银行合同”,他已去河南请旨,俟其两周后返回再议^⑤。于是,“银行合同”谈判也陷入僵局。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24页。

② 同上书,第325页注②。

③ 康托罗维奇:《美国在争夺中国的斗争中》,第148页;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76—177页。按:这一“合同”草案的全文未见公布。据苏联学者阿瓦林说,其内容“大部分是重复以前的”(《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60页),即重复同年初维特起草的“中国政府与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草案”的内容。该合同的内容见本卷第二章第六节。

④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27页。

⑤ 同上书,第328—329页。

中俄单独谈判的恢复，再次引起了日、英等国政府的关注。《辛丑条约》签字后，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升任外交大臣，他一回国就电告清政府“今后中俄两国再度谈判东三省问题时，事前应照会日本政府，日本必予清国以助力”^①。10月7日，即俄使向中方递交撤军新约稿后两天，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日置益便从奕劻处探悉该约内容^②，随后即电令小田切将俄方要求告知刘坤一、张之洞，并鼓动他们出面反对^③。日本外务省生怕清政府屈服，一面警告中国“万勿求速”，“以待公论”，一面断然表示：“俟（清帝）回銮后，天津兵撤，日本自当联英美各国责俄撤兵。万一各国意见不合，日本利害所关，不能坐视，亦必独诘俄，催令撤兵还地。”^④中俄谈判“银行合同”的消息传出后，日本再次通过刘坤一、张之洞劝告清政府“坚执勿允，以保大局”^⑤。日置益也以“俄华银行采矿一层……不啻侵害有约各国权利，亦系侵害我国利益”为由，要求中国“断勿允准”^⑥。英国政府认为，俄国政府通过北京会议（指缔结《辛丑条约》的北京谈判）已获得大量赔款，另外要求取得补偿，有违列国协商精神。为此，它通知俄国外交部，俄中缔约不得侵犯第三国的“条约权利”^⑦。同时，英国驻华公使奉命将上述情况通知江督刘坤一^⑧。

清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不敢遽允李鸿章签约要求，于10月29日途次洛阳发布诏谕说：“俄约定后，倘日本各国起而相难，缠绕不休，有何应付之策？”“此事关系甚重，急切尚难定夺。”^⑨由于清政府不同意签约，李鸿章的处境十分狼狈。这时，俄使雷萨尔仍不断对他施加压力，威胁说：“满洲是俄国战胜而得，交还与否，全凭俄国定夺；中国一天不签约，俄国一天不交还……缔约推迟一天，中国多损失一天，俄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一天重于一天。”^⑩11月初，李鸿章已卧床不起，但雷萨尔仍不放弃最后勒索的机

① 谷寿夫：《机密日俄战史》，1966年东京出版，第21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306号文书。

③ 王彦威辑：《西巡大事记》，第10卷，第27页。

④ 同上书，第35页。

⑤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423—424页；谷寿夫：《机密日俄战史》，第22页。

⑥ 同上书，第34卷，第339号文书，附件五。

⑦ 同上书，第324号文书。

⑧ 尼什：《英日同盟史》，第179页；《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336号文书，附件二。

⑨ 王彦威辑：《西巡大事记》，第10卷，第39页。

⑩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452页。

会。在李鸿章临终前数小时，他又亲赴北京帅府园贤良寺李寓，当着李鸿章的面，逼其秘书在条约草案上画押用印，但没有得逞^①。11月7日，李鸿章病死，中俄北京秘密谈判的第一阶段至此落幕。

第二节 第一次英日同盟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的签订

一 日俄协商的挫折与英日同盟谈判的进展

李鸿章一死，沙俄在对华谈判中顿时失去了一根内应的“支柱”。维特于是要求波兹德涅耶夫不惜重金，在清政府内部重新物色“李鸿章式的有势力人物”，为下一轮谈判预做准备^②。中国方面因全权代表奕劻于10月底去河南“迎銮”未归，谈判乏人主持，不得不将交涉暂行搁置。另一方面，沙皇政府这时正期待同即将来访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就“朝鲜问题”达成谅解，以消除中俄谈判的阻力，确定下一个对华步骤，因此也不急于恢复北京谈判。

伊藤博文去彼得堡谈判，是日、俄两国在远东矛盾日趋尖锐的结果，也是日本政府内部对俄协商论和英日同盟论两派意见相持不下的表现。如前所述，在俄国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后，围绕着重新划分远东势力范围问题，以英俄对立为背景，日俄双方开始调整自己的远东政策，谋求组合新的国际力量，以便在竞争中压倒对手，尽可能地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这样，和中俄北京谈判同时，英日、日俄、英俄之间的秘密交涉也在进行；它们互相联系，彼此影响，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英日谈判对远东国际事态的发展和中俄谈判的进程影响至深。

先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为缓和同日本的矛盾，于1901年7月中旬主

^① 扎布里斯基：《美国和俄国在远东的竞争》，第77—78页。按：此处根据美国驻华公使康格报国务卿海约翰的材料。又，在李鸿章病危时代办交接手续的直隶布政司周馥也有类似的揭露。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450—451页。

^② 维特要求道胜银行下属人员与王文韶、袁世凯周围的人物“建立友好关系”，为此，“准许借支五百两用于请客和送礼”。（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29页注③）另据袁世凯透露，道胜银行曾以10万两银子“赠送”军机大臣荣禄，但遭到拒绝。（伦森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第179页）后又以固定的年补助金名义收买外务部俄语译员塔克什纳作内应。（《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33号文书）又据签署《辛丑条约》的美国代表柔克义揭露，李鸿章的某儿子每月从道胜银行领取银500两（同上书，第36卷，第176号文书）。

动向珍田公使表示，愿恢复1月间为日本所拒绝的对话，在承认朝鲜中立、日本有权在朝鲜政府中派驻财政、行政顾问和高级警官的基础上就朝鲜问题达成协议，条件是日本正式承认俄国在满洲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沙皇政府为迎合日本在经济方面的需要，向东京表示，它随时准备在巴黎为日本政府筹措大宗借款^①。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更迭，伊藤下台，维特的建议没有得到响应。

1901年6月，桂太郎组成新的内阁。他认为当前形势表明：俄国的政策不以占领满洲为满足；获得满洲后它必然会立即向朝鲜伸手；“不到使我（日本）无还手之力，其侵略将不会终止”^②。因此，他主张联英制俄，一上台就提出强硬的对外纲领，计划扩充海军舰艇八万吨位，相机和“欧洲某一国”（指英国）缔结协定，把朝鲜变为日本的保护国^③。

正在这时，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由于担心日俄联合，于7月15日向日本驻英公使林董表示，愿与日本政府携手^④。同月31日，外相兰斯敦又向林董指出：“为了在远东维护英日两国的利益，进行某种商谈的时机已到。”^⑤林董以倡导英日联盟闻名，早在1895年就已撰文鼓吹“如果英日结盟，远东问题即可解决”^⑥，所以，对兰斯敦的提议，欣然表示同意。他说俄国占据满洲后会侵入朝鲜，“这是日本不能不极力反对的”。因此，日本希望：

第一，“尽可能使俄国远离满洲”；

第二，“一旦日俄开战，最紧要的是使俄国得不到第三国的援助”。

兰斯敦说：“英国在朝鲜没有利害关系，但也不能让它落入另一大国（指俄国。——引者）之手。”^⑦

8月初，日本内阁由曾称代理外务大臣电告林董，对英日同盟会谈的精神表示赞成，并说：“使朝鲜不受外国扩张政策的影响”，是日本帝国政府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16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上册，1953年东京出版，第258页。

③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日俄战争》，1962年东京出版，第107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2—24页。

⑤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1927年伦敦出版，第90—91页；《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5—26页。

⑥ 普利编：《林董伯爵秘密回忆录》，1915年纽约出版，第111—114页。

⑦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91页；《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5—26页。

“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俄国控制满洲，将“构成对朝鲜独立的威胁”，这是“使日本焦虑不安的根源”；俄国在领土、工商利益方面对整个中国北部的排他性扩张，都和“门户开放”和“保全中国”的原则相冲突，“而这两项正是日本和大英帝国共同奉行的政策。”林董旋即于8月14日将日本意图转告兰斯敦，要求英国提出协商的具体条件。但兰斯敦认为日本比英国有更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应由日本政府首先提出建议^①。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联英、联俄问题上意见不一，日本政府迟迟未能做出答复。

原来，以伊藤、井上馨两元老为代表的日本对俄协商派，这时仍相信同俄国有妥协的可能，条件是朝鲜归日、满洲归俄^②。8月26日，桂太郎与伊藤、井上馨商谈英日同盟问题。伊藤说：“同只图一己之利的英国政府联合，作用微弱，反被俄法敌视，其结果必将遭到被迫放弃满洲最有希望的工商业利益的不幸。”^③井上也认为：“此刻和俄国开始谈判，正是我国夺取朝鲜支配权的良机”^④，表示不同意英日联盟。当天，他致函桂太郎建议派伊藤赴俄试探。桂以“一切和政府商量后才能付之实施”为条件，予以同意^⑤。9月18日，伊藤于横滨启程。于是，日本对英、对俄谈判同时展开，前者由外务省负责，后者以私人出面，后者服从前者。

新任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根据俄国在中俄谈判中的立场，积极主张对俄实行强硬外交。他上台不久就起草了有关英日同盟的“帝国政府试案”，经内阁同意后，授权林董于10月16日通知兰斯敦：日本政府愿与英国订立“防守性条约”；“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同缔约一方开战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以武力相助。”^⑥酝酿已久的英日同盟会谈于是正式开始。与此同时，小村向俄使伊兹渥尔斯基重申前外相的意见，在满洲恢复原状以前，日本不与俄国谈判朝鲜问题^⑦。小村对中俄北京谈判的积极干预（详见前节），也含

①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31—92页；《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7—28页。

② 大畑笃四郎：《日俄开战外交》，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日俄战争》，第108页。

③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196页。

④ 信太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1959年东京出版，第124页。

⑤ 同上。

⑥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25号文书；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95—98页。

⑦ 《红档》杂志1934年第2（总第63）卷，第40页。

有打击俄国之意。

然而，英国政府当时既想在远东和日本合作以抵制俄国，又想在划分远东和中亚势力范围方面同俄国进行交易，以共同对付日益强大的德国的竞争。为此，从4—10月，兰斯敦多次向俄国暗示英、俄达成谅解的可能性。就在他与林董交谈后不久，即10月22日和24日，又接连两次与俄国驻英大使斯塔尔交谈，希望俄方保证在新的中俄协定中能尊重英国在中国的“条约权利”。10月28日，英国内阁通过了兰斯敦起草的英日条约草案^①，同时批准了外交部给驻俄大使的训令，正式建议俄国就解决双方在中国、波斯（今伊朗。——引者）的矛盾以及其他利害攸关的广泛问题进行协商，达成互惠协议^②。但彼得堡当局“深恐英国会提出某种建议来建立一种多少作了伪装的共同统治”，加以拒绝^③。英国内阁感到对俄协商无望，而日俄妥协又并非绝无可能，这才下定了与日本联合的决心，于11月5日决定中止同俄国的外交试探；次日，兰斯敦即向林董面交了经内阁重新审议的关于英日同盟的草案^④。在此期间，林董利用英国政府害怕日俄结盟的心理，作出“如果英日同盟没有希望，日俄就可能联合”的姿态，使英国政府不断受到刺激；而伊藤赴俄谈判的消息，又增加了英国对日俄联合的疑虑，成了英国内阁做出上述决断的重要推动力。这是小村对英外交的成功之处。然而，迟至12月12日，即时隔三十多天之后，日本才对英方草案做出答复，这是因为，外务省拟定的对案，需要征求包括业已出访的伊藤在内的元老们的意见的缘故。

伊藤博文是11月24日到达彼得堡的。十天前，他在巴黎访问时，法国外长德尔卡赛受俄国外交大臣的委托，曾与之会谈朝鲜问题，并暗示法国对日贷款，需视伊藤对俄谈判的结果如何而定^⑤。这表明彼得堡当局对伊藤访俄，寄予厚望。但桂太郎却把伊藤的俄国之行，视为向英国施加影响的手段，并不期待取得对俄谈判的直接结果。11月14日，林董奉命由伦敦赶到巴黎向伊藤介绍英日交涉进展情况，并征求意见。伊藤表示，“对英国提案

① 杨国伦：《英国对华政策》，第307页。

② 尼什：《英日同盟史》，第179—180页。

③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162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39—40页；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115—120页。

⑤ 《红档》杂志1934年第2（总第63）卷，第42—43页。

的答复,最好等待我同俄国交换意见后进行”^①。27日,伊藤收到桂太郎的复电:“对英谈判不能迟延”,希望把在俄国的活动“限制在口头交换意见的范围内”,不要承担任何义务^②。

在彼得堡逗留期间(11月24日至12月4日),伊藤分别同拉姆斯多夫和维特进行了几次会谈。他对俄国军队占领满洲和东省铁路后可能进入朝鲜表示不安,希望俄国“听任日本在朝鲜自由行动”;而作为回报,他许诺:“一旦义和团运动(在中国)重新爆发,俄国可不必顾虑日本的态度,放手推进。”拉姆斯多夫无意接受伊藤的建议,反要求日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从战略上利用朝鲜领土”;“如果日本在朝鲜沿岸建造要塞,威胁旅顺和海参崴之间的交通,俄国为自卫计,不会熟视无睹”^③。在交谈中,维特向伊藤阐述了“俄罗斯帝国政府在满洲的全部使命”,伊藤则建议俄国彻底让出朝鲜,听凭日本主宰,条件是日本容忍俄国占领旅大租借地,并容许修筑通往旅顺口的铁路;俄国应立即从满洲撤军(只留一支护路部队),然后在满洲采取“门户开放”政策^④。因维特这时坚持要在满洲实行的政策,恰恰是“排斥他国势力”,把门户紧闭,上述意见也未被采纳。

12月4日,伊藤应拉姆斯多夫的要求,向他递交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协定草案六款。除双方保证不在朝鲜沿海进行可能威胁朝鲜海峡通航自由的军事活动一款外,拉姆斯多夫对伊藤的方案都不满意。他认为,这不是一个互惠的协定,因为根据草案第四款,日本有权从政治上统治朝鲜。伊藤希望拉姆斯多夫提出具体条件,以作为日本在朝鲜取得特权的“补偿”^⑤。但是,由于头天林董派人送来了日本内阁关于英日同盟的对应案,获悉英日谈判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伊藤决定中止与俄国的协商,并于次日匆匆离开俄都前往柏林,在那里直到12月17日才收到俄方的复文。

日俄双方草案的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伊藤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及工商业方面的行动自由,承认日本为“改革”朝鲜行政享有向其提出“建议”和进行“帮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的“专有权”(第四款)。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47—48页。

② 平塚笃编:《伊藤博文秘录》,1929年东京出版,附录,第16页。

③ 同上书,附录,第21页;《红档》杂志1934年第2(总第63)卷,第47—48页。

④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47—48页。

⑤ 《红档》杂志1934年第2(总第63)卷,第44—45页。

俄方则把日本希望获得的行动自由局限于工商业方面，同时规定日本虽有向朝鲜提供援助的“优先权”，但事先应取得俄国的同意（第四款）。

第二，俄方补充要求，根据前述条款开入朝鲜的日本军队，不得进入预先确定的毗连俄国边界的特定区域，并规定事毕后即行撤回（第五款），意即日本在朝鲜的行动自由，在地域上也应受到限制。

第三，俄方增加了新条款即第六款，要求日本“承认俄国在与其毗邻的中国各地享有优先权，并承担义务不妨碍俄国在上述地区的行动自由”。^①

这不仅表明俄国没有放弃它在中俄彼得堡谈判中提出的侵略纲领，而且证明它正试图事先取得第三国即日本的认可，然后再逼中国承认。这一条与日本的侵华方针也是完全对立的。总之，伊藤在这里是按“朝鲜归日，满洲基本归俄”的公式行事，而维特等人的公式则是“满洲（不只满洲）完全归俄，朝鲜不完全归日”。伊藤对俄方的答复感到十分失望，于23日给拉姆斯多夫复信说，他对俄国的方案是否适宜作为两国“进一步协商的基础”递交东京政府，深为怀疑^②。

这时，英日谈判已进入决定性阶段。12月7日，日本首相桂太郎邀集诸元老，就英日同盟的日方对案进行协商。外相小村向会议递交了长篇意见书，分析比较了英日联盟与日俄协商的利弊得失。他认为：

第一，只要俄国以护路为名，获得在东三省的驻军权，早晚将对朝鲜构成威胁，妨碍日本牢固地、永久地独占朝鲜；

第二，联俄不能阻止俄国向整个中国的扩张，却会增加中国对日本的恶感，不利于日本在中国从事的各种“事业”，并损害同英国的良好关系；

第三，与英国联盟，可以扼制俄国的野心，增进日本在华势力，确立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地位，并在财政、通商方面得到英国的援助；

第四，在交涉中“提出保全中国和朝鲜领土完整、实行门户开放，可无开罪列强之虞。”^③

日本元老和政府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意见趋于一致。会议责成林董将

① 《红档》杂志1934年第2（总第63）卷，第50—51页；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88页；平塚笃编：《伊藤博文秘录》，附录，第43—44页；《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29—130页。

② 平塚笃编：《伊藤博文秘录》，附录，第47—48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38—339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66—69页。

日本对应案交给英国外交大臣,从而完成了与英国结盟的重大决策。12月19日,英国内阁决定与日本缔结盟约。接着双方进入对约文的实质性讨论。伊藤虽认为日俄协商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已改变了先前对英日同盟所持的态度^①。事实表明,日本的联英、联俄两派,彼此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彼得堡当局昧于事态的发展,一直等待伊藤返日后的下文,并且一相情愿地认定以俄国对日的不完全让步可以换取在满洲的行动自由。当然,这一回沙皇政府失算了^②。

二 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的签订

当英日和日俄就划分各自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在伦敦和彼得堡分别进行秘密协商时,奕劻于11月29日返回北京。不久,中俄谈判恢复。李鸿章的全权大臣职务由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接替^③。全权大臣奕劻成为对俄谈判的主持人。他认为:“东三省为俄人兵力所得”,“事实如此,让与若干利益,在所难免”^④。这与李鸿章的论调“东省系俄力战而得,铁路矿产利益,似应允为专利”^⑤,如出一辙。他力主“将俄约允许”,因而在谈判开始前即已受到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激烈反对^⑥。

英、日驻华使节对中俄谈判仍处处防范。11月下旬,他们通过那桐,先后向奕劻发出警告说,中俄签约“必将产生非同小可的后果”^⑦。萨道义还前往镇江、武昌,鼓动刘坤一、张之洞反对订约^⑧。内田甚至在奕劻返京当日,就来探询东三省的矿山利权问题,要求中方提供约稿,“以便日本政府进一

① 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第2卷,第770页。

② 按:伊藤离柏林后并未像维特期待的那样返回彼得堡,而是取道布鲁塞尔前往伦敦访问,直到次年2月25日才返抵日本。在伦敦逗留期间,他会见了兰斯敦,表示了强硬对俄的态度。兰斯敦对此深为满意(前岛省三:《日中、日俄战争中的对韩政策》。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日俄战争》,第85页)。

③ 1901年7月,清政府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任奕劻为总理,王文韶为会办大臣,瞿鸿禨为尚书,徐寿鹏、联芳为左右侍郎。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52卷,第10—12页;许同莘等编:《光绪条约》,第58卷,第5页。

⑤ 王彦威辑:《西巡大事记》,第9卷,第34页。

⑥ 《张文襄公全集》,第178卷,电牍五十七,第1—3页;王彦威辑:《西巡大事记》,第11卷,第12、25页。

⑦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459页。

⑧ 伦森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第161—162页。

步考虑向中国献言”^①。美国驻华公使随后也向奕劻提出了警告^②。

为取得英、日、美三国的谅解，从12月3日起，奕劻分别向萨道义、内田、康格通报了俄方的撤军协定草案和中国的对案，以及李鸿章与波兹德涅耶夫会谈“银行合同”的情节和中国的对案，征求意见，并向英使保证在订约前将和英国商议^③。内田以“合同”旨在排斥他国，有违“利益均沾”原则，当即表示反对^④。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答复也说：美国不希望中国 and 任何一国做出“永久损害中国领土完整、有碍美国合法权利及削弱中国恪守国际义务的能力”的安排^⑤，从而再次表明了英、日、美决定直接干预中俄谈判的意向。

这时，沙皇政府对于英日协商联合反俄的情况茫无所知，不仅寄希望于伊藤，而且利用清政府的软弱地位，坚持“银行合同在先、撤军协定在后”，“不让任何外国人（资本）到满洲来”的方针。12月11日，奕劻与波兹德涅耶夫就“银行合同”问题进行商谈。他仍持对俄妥协的立场，但也想迎合英、日、美的某些要求，以便借他国之力挽回部分利权，于是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

1. “自今以后中国政府或自行用己资本创办、或准华公司用自己资本开办各种矿路生业，应由中国国家批准。”道胜银行既系两国资本所开，可“尽先承办，若银行自行辞谢，亦可任听别人或别公司承办”。

2. 此项合同“与他国别项通商口岸商务无涉，且与约准客商买货卖货，毫无妨碍。”^⑥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合同”的垄断性质，保护了有约国家在东三省的“条约权利”，为他国资本进入该地区开了一扇小门。但是，维特特别担心“外国人将打着中国政府或中国租让家的旗号”进入满洲，因此拒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464页。

② 谷寿夫：《机密日俄战史》，第24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468、477、478页。

④ 同上书，第492页。

⑤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2年，第271页；《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52卷，第1页。

⑥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62页，第33号文书附件。按：据奕劻与内田谈话，这一修正案曾四易其稿，最后一次有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参与其事。又，该修正案主要内容亦见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44页；伦敦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第168—169页。

绝了中国的上述建议^①。

继“银行合同”对应案之后，12月28日奕劻向雷萨尔提出了对俄方撤军草案的修正意见：

1. 从缔约之日起，至1902年底，分三期撤出俄军，每期4个月；
2. 东三省的中国驻军“须敷剿办匪贼及弹压地方之用”；中国驻军数额及驻扎地点，在俄军撤出前，由双方议定；撤军以后，由中方自行确定，“及时知照”俄方，毋须再议；
3. 取消“中国巡捕不准用炮”的限制；
4. 撤去“他国军队不得占据”俄军所还铁路地区的条款，代之以中国“不允许列强占有”上述地区的规定；
5. 中国“补偿”俄国用于所还铁路的款额，不能单凭俄方所说，而应由两国政府商定。^②

但是，维特拒不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项修改。在12月30日给外交大臣的信中，他针对中方对案，申述己见：

1. 全面撤军须待东省铁路建筑工程全部竣工，反对缩短撤军期限，因为到1902年底来不及把东省铁路“装备齐全”，其巨大的战略作用不能发挥；在此期限内，外阿穆尔军区（即“护路军”）也无法扩充至预定的2.5万人，不能取代撤出的正规军。
2. 限制中国在东三省的驻军，削弱其防卫能力，是俄国撤军的重要条件，现在没有理由予以放弃。
3. 如不禁用大炮，中国巡捕就会变成炮兵部队，构成对俄国的“威胁”。
4. 赔款（总额约为112万卢布）应在铁路移交之前交付，无须经过任何协商。

由于维特的上述主张，雷萨尔经俄国外交部同意，决定在奕劻同意就“银行合同”重开谈判之前，对清政府的修改意见不予答复。^③

中俄北京谈判再次陷于停顿。

1902年1月上旬，久离北京的道胜银行中国分行经理璞科第返回任所后，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40—341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478—482页；伦森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第183—187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41页。按：第4、5两条，《日本外交文书》与《俄国在满洲》两书记载稍有出入。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42页。

立即通过原李鸿章的幕僚杨廉甫和外务部官员塔克什纳等人进行活动，想方设法诱使奕劻按俄方草案签订“合同”^①。1月12日，他欺哄奕劻说，“从速签订（银行）‘合同’对中国比对俄国关系更为重大。”^②与此同时，雷萨尔向奕劻示意，清政府要求撤销对东三省中国驻军人数及武器的限制，这一条容易照办，但撤军限期一年，实行时有困难，须待俄国政府指示^③。这一切似乎暗示，撤军协定大体可按清政府的要求办，但“银行合同”则无讨论余地^④。

奕劻身受俄国和英、日、美两面夹击，感到“为难之至”。他权衡利弊，觉得英、日、美公使“但有阻缓之言，并无切实相助办法”，而“合同一日不定，俄约一日虚悬，东三省即一日不能交还……若再延宕一年半载，局势已成，既返璧之无期，更转寰之乏术，后患何堪设想”^⑤，于是准备继续对沙俄退让，撤回“合同”修正案中“立约各国仍可自由贸易”一节，并把中国政府“用己资本”创办各种工矿事业，更明确地规定为“只用己资本”^⑥，以迎合沙俄的“不准他国人来满营生”的要求。同时，他亲自向英、日、美驻华使节诉说清政府的艰难处境和签约苦衷，以平息他们的不满之火，并请赫德帮助说情^⑦。

然而，奕劻的行动既没有换来俄方的任何让步^⑧，也未赢得他国的谅解与同情。日使内田表示，“银行合同”侵害中国主权、利权，“妨碍东方大局”，中国政府必须“断然废弃”^⑨。萨道义说，如中俄缔结“银行合同”，英国“必向中国索偿”^⑩。康格也警告说：中国政府愿以权利让与俄国，可悉听尊便，但必须以不损害他国的“条约权利”为前提！^⑪

英、日、美各国政府得到本国驻华使节的报告后，对俄国政府做出了进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57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42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58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2年，第273—274页。

④ 同上书，第156页。

⑤ 许同莘等编：《光绪条约》，第58卷，第4页。

⑥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45页。

⑦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65页。

⑧ 维特担心中国修正案“可能使外国人充斥满洲”，仍表示拒绝。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45页。

⑨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61页。

⑩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49卷，第22页；参见《张文襄公全集》，第177卷，电牍五十六，第19页；伦森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第169页。

⑪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2年，第274页。

一步的反应。美国由于担心它在东三省的重要贸易利益受到俄国的威胁^①，于2月1日首先向中、俄、英、日、法、德等国发表备忘录，指责道胜银行企图垄断东三省的各种利权，违反“门户开放”的原则，影响了美国公民的权利^②。尽管海约翰随后向俄国驻美公使喀西尼承认“俄国对满洲具有性质十分特殊的关系”，只要“门户开放”政策得到维护，在满洲建立起足以防止义和团事件重演的行政机构，美国将不反对俄国长期占领满洲^③，但美国公开表示不同意俄国在满洲的政策，这还是第一次。这是美国标榜“门户开放”、助日制俄的重要标志。

继美国之后，日本政府于2月3日通知奕劻，中俄撤军协定可以签订，“银行合同”则应搁在一边。“如果俄国拒绝这项建议，迁延不肯撤兵，日本将采取措施，就履行满洲撤军的诺言一事，向俄国交涉。”如果中国同意签订“合同”，则日本不得不考虑向清政府提出某种要求^④。日本态度强硬，一方面可能是受到美国抗议的鼓舞，但更重要的是《英日同盟条约》这时已在伦敦签订的缘故。

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是1月30日签订、2月11日在伦敦和东京同时公布的。在英日谈判的最后阶段，双方在同盟条约适用范围（英国希望将条约涉及的地理范围从远东扩展到印度；日本坚持一旦同法俄交战，它只能承担在长江流域支援英国的义务）、英国对由于第三国在朝鲜限制日本的利益而引起战争时应承担的义务（日本希望英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行动自由，英国不愿为此承担与第三国作战的风险）、两国海军力量在远东的协调与配置（日本不愿把自己的海军力量调离本国附近水域，建议缔约双方在日本海

① 牛庄（营口）是美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口岸。1901年由牛庄（营口）入口的美国货物，在同期中国各通商口岸美国入口额中位居第三。其中，石油、棉花、面粉三项达七八百万海关两，超过了英国（500万两）和日本（约260万两）。俄国在满洲的政策，打击了“发展中的美国贸易利益”，“当时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美国贸易利益都没有受到如此直接的威胁”。参见丹涅特《罗斯福和日俄战争》，1925年纽约出版，第125—126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2年，第275页及注，第926页。按：俄国政府在复照中宣称，“道胜银行的要求没有超出他国政府所提出的要求范围。”参见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78页。

③ 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第2卷，第540页；多勃罗夫：《日俄战争时期美国的远东政策》，1952年莫斯科出版，第119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69页；参见伦森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第178页。

保持一定的海军力量,英国不愿受此约束)等方面,存在分歧^①。但英国为了防止日俄达成谅解,最后对日本一一做了让步。

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的矛头是针对沙俄的,同时也是指向中国和朝鲜的。前者属于英日和沙俄在远东争霸范畴,后者则是帝国主义大国欺凌弱小国家的问题。该约冠冕堂皇地声称“尊重”中国与朝鲜的独立,但两国背着中国和朝鲜签订涉及中、朝两国主权的条约,这一行为本身就揭穿了这一声明的欺骗性。条约规定:

1. 缔约双方在中国和朝鲜的“特殊利益”,“因他国的侵略行动或因中国和朝鲜发生内乱而遭损害”时,有权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第一款),这不言而喻宣布英、日两国干涉中、朝两国内政的权利。

2. 缔约一方为维护上述利益同第三国开战时,缔约另一方应严守中立,并努力阻止他国参加反对其同盟国的敌对行动(第二款);如他国(一国或数国)帮助第三国同缔约一方作战,则缔约另一方应援助其盟国共同作战,媾和时亦应协商一致行动(第三款)。这就保证日本一旦对俄作战,不致有单独同法、俄两国对抗的危险。

3. 缔约中的任一方,未经与对方协议,不得径直同他国另订有损于本约的协定(第四款),这样英国事实上承担了不组织反日联盟的义务,同时也消除了因日俄可能接近而在远东陷于孤立的顾虑。

此外,双方在签约时还互换秘密照会,规定两国海军在平时将采取联合行动,双方港口为对方战舰提供使用船坞和加煤站的方便,相互保证在远东维持优于任何第三国的海军力量。^②

显然,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大大增强了与沙俄争夺满洲和朝鲜的力量和勇气,这是桂内阁为准备对俄作战在外交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也是日本政府进一步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前提。同时,该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国放弃了在国际竞争中所持的“光荣孤立”的立场,实现了对外政策的重要转变^③;它使日本在英国远东政策中所占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① 尼什:《英日同盟史》,第211—214页;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第135—136页。

^② 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全文参见马克谟编《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324—325页;《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9—23页;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45—147页。

^③ 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第2卷,第736—742页。

一旦日俄开战，不论胜负谁属，都能削弱俄国在欧亚的力量，使英国得到好处。

美国国务院赞同英日同盟，认为它是“美国商业和工业在远东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①。在该约签订后的第二天，美国政府发表了上面提到的备忘录，表明“美国实际上参与了英日同盟”^②。至此，一个主要与沙俄相抗衡、以争夺中国为中心目的的帝国主义集团在远东已初步形成。

2月12日，沙皇政府接获《英日同盟条约》的副本，无异遭到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拉姆斯多夫立即指示驻法大使同法国政府磋商，将法俄联盟关系扩大到远东，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③。3月16日发表的法俄宣言说：如果第三国的行动或中国发生的骚动威胁法俄两国的特殊利益，两国保留会商的权利，但宣言并没有规定双方应承担的义务^④。为与英日同盟抗衡，沙皇政府试图拉拢德国参加某种形式的联盟，但遭到拒绝^⑤。俄国在远东的外交陷于孤立。

清政府对英日结盟惊喜参半，心情复杂。一面觉得“东三省撤军谈判从此大为方便了”^⑥，表示欣慰；一面又担心一旦日本把沙俄逐出东三省，会不会前门驱熊，后门进狼^⑦；连向来主张倚日拒俄的鄂督张之洞，也感到该约“含有经常干涉中国事务之意”^⑧，为此表示不安。奕劻以怀疑的心情询问萨道义，如俄国不按中国的要求签约，结果又将如何？萨道义回答说，“英日协定决不是无谓的恫吓。”^⑨在这种情况下，奕劻对俄交涉的态度转趋强硬，于2月11日通知璞科第，中国拒绝就“银行合同”继续进行谈判^⑩。从这时起，中俄谈判实际上已被置于日、英的监督之下了。

① 多勃罗夫：《日俄战争时期美国的远东政策》，第116页。

② 美国《明星晚报》1902年2月21日评论。转引自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168页。

③ 丹尼斯：《美国外交的冒险（1896—1906）》，1928年纽约出版，第352页。

④ 马克漠编：《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325—326页。

⑤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74页。

⑥ 伦森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第173页；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1927年伦敦出版，第126页。

⑦ 同上书，第177页。

⑧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136页。

⑨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88页；伦森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第178页。

⑩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46页。

面对上述国际局势，沙皇政府意识到通过同清政府签订“银行合同”以杜绝外国资本输入满洲的计划已不能实现。但它并不打算就此轻易地退却。就在彼得堡当局获悉中国拒签“银行合同”的当天，即2月12日，维特便决定采取迂回转进的办法，即通过与中国东北地方当局逐个签订“合同”的途径，来实现“巩固俄国在满洲的绝对势力”的原定目标^①，而在撤军问题上，则继续与清政府讨价还价。拉姆斯多夫对此表示同意。据此，璞科第不再谋求恢复关于“银行合同”的谈判；雷萨尔则主动要求奕劻立即签订撤军条约，条件是：

1. 撤军期限定为3年；
2. 按俄方原拟要求，限制东三省驻军人数；
3. 赔偿修理所交铁路的费用。

奕劻表示撤军日期可比中国原拟推迟两三个月，其余不予考虑。^②

日本对俄国在满洲驻军和扩展东省铁路问题特别敏感，力促奕劻坚持在中方对案的基础上缔结交收东三省的条约，不要向俄国示弱^③，并希望牛庄（营口）于第一期撤军期内交还，以恢复和发展南满地区的中外贸易。美国也有同样的要求^④。英国着眼于维护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对“满洲问题”的态度不甚急切。在日本和美国的压力下，奕劻于25日要求雷萨尔“全盘接受”中国关于撤军的修正案，并暗示如不迅速订约，列强将乘机进行干涉^⑤。

与此同时，中国东北人民反抗沙俄暴虐统治的斗争，也使彼得堡当局坐卧不安。他们惊呼：东三省局势严重，俄军无力对付神出鬼没的“红胡子”，“必须尽快解决满洲未来的命运问题”^⑥。

1902年3月5日，维特终于建议拉姆斯多大接受中方对案，签署撤军协定。拉姆斯多大表示同意，并接受将牛庄（营口）的民政管理事宜于10月8日前移交中国的补充要求。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中国将撤军期限由12个月延长至18个月^⑦。清政府征求内田的意见，内田起初仍要奕劻坚

① 详见下节。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83页。

③ 同上书，第184页。参见尼什《英日同盟史》，第238—239页。

④ 同上书，第195页。

⑤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47页。

⑥ 同上书，第322页。

⑦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179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47页注③。

持以一年为期^①，到3月17日才同意改为一年半^②。中俄双方于是就撤军期限达成协议。29日，俄方同意清政府提出的其余条款，但坚持在协定中加入“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一语，作为撤军的附加条件。中方认为这项条件可能“使撤军的诺言变成一句空话”，要求删去，双方相持不下。延至3月底，璞科第向王文韶等行贿银3万两，俄国才如愿以偿^③。

4月8日，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在北京签字。该约有汉、俄、法三种文本，以法文本为准。日本参与了法文本的准备、校订等工作^④。这不仅表明日本对清政府的影响力已空前加强，而且意味着中俄交涉正在变为日俄交涉的一部分。

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共四款^⑤，内规定，从订约之日起，俄军分3期撤出东三省，每期6个月。第一期俄军撤出盛京省西南段辽河以西，交还山海关、营口、新民厅之间的铁路；第二期撤出盛京省其余各地及吉林省；第三期撤出黑龙江省（第二款）。值得指出的是：

1. 一年半的撤军期限与维特原拟的东省铁路全部竣工的日期大体吻合；而一旦该路全线通车，撤出的俄军可在一两昼夜内从赤塔、海参崴及旅大租借地进入东三省的任何战略要地，因而即使俄国如约撤军，东三省仍处于俄国的武力威胁之下^⑥。

2. 从东三省撤出的俄军，仅指俄国陆军部统辖的正规军，不包括所有其他武装力量，也不包括旅大租借地的驻军。

事实上，俄国着手扩编的大批“护路军”——外阿穆尔边防军将取代正规军，驻守东省铁路沿线地段。所以，撤军后虽抹去了占领者的恶名，却保留着占据的实惠。

另外，牛庄（营口）本应如约于第一期交还，但雷萨尔节外生枝，于缔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70号文书。

② 伦森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第192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48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218页。

⑤ 条约全文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39—41页；马克谟编：《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326—329页。按：格林姆所编：《有关远东国际关系史的条约及其他文件汇编》将中国批准该约的日期4月11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236页）误为该约签订的日期（见该书第59号文件）。

⑥ 参见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88页。

约当天致函奕劻，单方面宣布此事“须待天津地方行政权归还中国当局一事完全商定后方可实行”^①，蓄意把“联军”交还天津作为俄国交还牛庄（营口）的前提，使问题复杂化。

该约还规定，俄军撤出之前，东三省中国驻军数量和驻军地点，需由中、俄两国商定；撤军以后，中国可自行核定，但需将增减情况知照俄国（第三款）。这一款直接损害中国的自保权。

该约又规定，由中国马、步巡捕负责“绥靖（东三省）地方等事”，但东省铁路界内例外（第三款），这就为沙俄日后在东省铁路车站及附属地段内擅设警察、篡夺警权提供了新的条约根据。

该约另规定，中国日后在东三省南部续修铁路或敷设支线，必须与俄国商定（第四款），这就限制了中国筑路自主权。

尤为严重的是，该约以“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为撤军的附带条件，从而使沙俄日后拒绝履行条约义务，延期撤军有所借口^②。条约签订后，俄使雷萨尔发表附带宣言，重申如中国政府违反上述条件，俄国政府即不再受该协定的约束，对由此产生的后果，也不负责任^③。这表明沙皇政府仍保留着在它认为需要时继续占领东三省的“权利”，而这种占领拖延得越久，“满洲问题”就越容易成为远东国际冲突的主题。正如苏联学者罗曼诺夫所说：“将中俄《满洲撤兵协定》加以公布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证明俄国外交当局这一次仍然试图用某种方法将满洲的‘门户关闭’，迄今尚无反证可以证明沙俄在满洲的全部行为确有明显的根本改变。远东的紧张气氛并没有因为3月26日（公历4月8日）协定的签订而有丝毫的缓和。”^④由于沙俄坚持独占满洲的政策和英日同盟的成立，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了。

① 参见《满铁关系条约集》，1929年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版，第794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38页。

② 4月23日，英国驻俄大使斯科特在会见杜姆斯多夫时也指出：“俄国政府作出保留，一旦遇到某种事件，例如，中国境内重新发生骚动时，便可据以认为俄国已解除了撤兵条约所规定的一切保证和义务。”参见《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39页。

③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40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38页。

④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167页。

第三节 “黄俄罗斯”计划的初步实施

一 攫取产业租让权，控制东三省的经济资源

沙皇政府蓄谋独占中国东三省，在被迫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后，仍千方百计考虑“在实践中获得通过该约未能获得的东西”，实现“事实上占领满洲”的既定目标^①。

如前所述，沙俄在上年谈判中两度受挫，深知由于国际压力，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一项总的条约，一举把整个东三省的产业租让权交给华俄道胜银行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当务之急是赶在撤军之前，通过和东三省地方当局签订一项具体的协定，把上述租让权逐一抢到自己手中，以免落入他国之手。为此，财政大臣维特于1902年2月间要求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同意把有关的交涉都移到东三省去，以道胜银行的名义出面办理，俄国驻满洲的外交代表则应予以全力支持。接着，维特指示他在东三省的代理人“竭尽全力地”去取得开采金、铁、石油、镍、煤等矿和采伐鸭绿江沿岸森林的租让权以及“其他大型企业”的租让权^②。随后，彼得堡当局更制订了由国库拨款、在国外投资兴办一系列“大型”企业，以进一步巩固俄国在满洲的“绝对势力”的行动计划，并于3月21日获得尼古拉二世的批准^③。

恰在这时，美、日、英等国工业资本也试图进入中国东北地区：1902年初，日本人力求取得奉天附近的煤矿租让权；美国人取得了开采吉林附近金矿的租让权；英美资本家的代理人组织的技术人员到敦化县和鸭绿江流域作了详细的调查。这无疑是对沙俄的挑战。维特本想把工业租让权（即独占权）完全集中在“私营”的道胜银行手里，但鉴于该行在东三省的分支机构规模较小，资本不够雄厚，难以对付他国的竞争，特别是它在技术方面尚不能适应经营工矿企业的要求，便决定吸收官办的东省铁路公司和“可靠的”俄国私人资本参与其事。他甚至准备吸收受道胜银行、东省铁路公司控制的华人参加，条件是这些人必须签字画押，同意非经俄方同意，不得将其获得的租让权转让他人，并且不得吸收俄中两国以外的他国人参与经营，违者将

①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79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69页。

③ 同上书，第371页注①。

处以巨额罚金^①。这样，在这次猎取租让权的活动中，维特依靠的依然是道胜银行和东省铁路公司这两个有力的工具。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1902年3月21日，维特奏请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从“李鸿章基金”中拨款以“运动中国地方当局”^②。据估计，俄国政府用于收买中国北部边疆各省的将军花费了几十万户布^③。对清政府，道胜银行经理璞科第每年以30万金作为刺探情报的“机密费”^④。1902年冬，璞科第为取得奉天采矿权，曾花银3.2万两去运动户部大臣王文韶和庆亲王长子等人^⑤。

应当指出，在沙皇政府有计划、大规模地攫取中国东北各种租让权前，这项活动即已开始，但它主要由俄国外交部出面交涉，由俄国资本家承揽。例如，1901年3月，俄国外交部驻吉、江两省办理交涉事务大臣吕巴（刘巴）和吉林将军长顺即已订立《矿务草约》14条，取得了勘探、开采吉林省金矿的权利。《矿务草约》规定勘探权以一年为限；获准开采者应自获准之日起一年内开采；并以产量的15%上缴中国国库；除中国人外，他国人不得入股^⑥。同年5月，俄国交涉员科洛特科夫又与长顺就勘探夹皮沟、宁古塔、珲春三处金矿订立新约，规定无论股分若干，总以俄人出股分多半^⑦。就这样，到1901年9月，“吉林省所有产金区都被分完了”^⑧。

除沙俄外交部外，东省铁路公司也积极活动，于1901年7月由总监工尤哥维奇出面与长顺签订《采煤合同》12条。本来，按照1896年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第六款的规定，铁路用煤不得视同砂石，在中国境内自行开采^⑨。但东省铁路公司竟把铁路沿线中国煤田视为己有。这一采煤合同规定：“如煤在铁路两旁各三十里之内，或华人，或洋人，或华洋同办人欲行采开，无铁路（公司）应允，均不得准行”；铁路两旁30里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70页。

② 同上书，第371页注①。

③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32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286号文书。

⑤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81页注②。

⑥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88—98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7册，《吉林、黑龙江》，第3967—3969页。

⑦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95—996页。

⑧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72页。

⑨ 参见本卷第一章第四节。

外,“如洋人,或他项公司,或华洋人同办,均须知照铁路公司,俟公司复称不用该处,始可允准。”这等于宣布该公司在吉林享有“探看煤苗、开挖煤斤”的“独擅之权”^①。该约虽没有得到清政府批准,但东省铁路公司仍恃强私挖。

黑龙江沿江一带的金矿,久已为隔江相望的沙俄所垂涎。19世纪80年代,仅漠河一处,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越境造屋立窑,招工盗采者,已屡见不鲜^②。俄军占领东三省后,俄人越江盗采金矿之事日益增多。吕巴、科洛特科夫适应他们的需要,援引吉林成例,要求黑龙江将军萨保订约。吕巴等语带威胁,说什么如不同意照办,“只好报明兵部,应将各官矿令俄营占守”^③。

1901年7月23日,萨保被迫签订《采勘矿苗草约》12条,内称“此约专指俄人采办新矿而言”,“一经画押后,即准俄人在江省界内采办金、铁、煤各矿苗”^④。据此,沙俄获得黑龙江省五段金矿的采勘权:

1. 从达赉诺尔湖至北五寺河(又称贝子河、牛尔河)为一段,归上游矿业公司;
2. 自北五寺河至呼玛河(库马尔河)及其支流为一段,归阿斯塔舍夫;
3. 自库马尔河至瑗珲城为一段,归阿普拉克辛伯爵、波波夫和叶米里扬诺夫合伙的采金公司;
4. 自瑗珲城至观音山为一段,归联合股份公司;
5. 自托罗山以下入松花江处起至都鲁河口止为一段,归俄国采金公司。^⑤ 签约后,萨保据情入奏,“部议驳之,而俄人仍设厂私挖”。

1902年1月13日,俄国官员卢边诺夫又持宽河金矿委员李席珍的执照,“图占通省矿山,并谋占穷民生计”^⑥。他们将江省金苗荟萃之区,视为囊中之物,甚至肆无忌惮地攘据北洋大臣所设之漠河、观音山金矿^⑦。除金矿外,东省铁路公司尤哥维奇与萨保于同年1月14日签订了《采煤合同》,其内容

① 《清德宗实录》,第487卷,第15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96—998页。

②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四。详见本卷第一章第一节。

③ 《矿务档》,第7册,《吉林、黑龙江》,第4311—4326页。

④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01—1002页。

⑤ 徐世昌:《纪五段金矿》。《东三省政略》,第3卷,《矿务交涉篇》。

⑥ 《清德宗实录》,第491卷,第6页。

⑦ 徐世昌:《纪五段金矿》。

与吉林的基本相同，规定铁路两旁各 30 里内东省铁路公司有采煤的专权；30 里之外，铁路有开采的优先权^①。就在这一年，东省铁路公司于干线西端扎赉诺尔新开煤矿一处；到 1904 年 2 月日俄战争爆发前，该矿产量足供东省铁路西线自用而有余^②。

在盛京省，阿列克谢耶夫于 1901 年 5 月令驻盛京省军事委员照会盛京将军增祺，要求仿照吉林办法开采境内各矿^③。清政府担心各国群起效尤，不敢批准，仅表示“俟东三省大局定后”再议^④。但沙俄并未由此歇手。从 1901 年 10 月起，东省铁路监工（工程师）吉利时满又多次照会增祺，“催立开采奉天全境煤矿合同”^⑤，并威胁说，如不照办，即“遣武员来办”^⑥。清政府认为，沙俄的要求“不但启他国之嫌疑，亦且妨碍中国之权利”，只同意开采铁路两旁各 30 里范围内的煤矿，30 里以外，则无论何人开采，该公司均不得过问^⑦。东省铁路公司对此十分不满，该公司全权代表达聂尔悻然表示，“东三省现为俄占，岂能一毫利益不得”；中国如果同意上述要求，“不惟营口可以早交，即宫殿亦可克期交出。”^⑧事实上，东省铁路公司当时已在奉天境内开采复州瓦房店和辽阳茨尔山两处煤矿，第二年又开采辽阳县境烟台和达尔尼两处煤矿，所产“非但足供铁路公司之用，并可在青泥洼（大连）售卖出口”^⑨。

沙俄对东三省矿权的掠夺，加剧了与其他列强的矛盾。吉林《矿务草约》签订后，日、英首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1902 年 5 月，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又指责清政府“给予俄国人专利权，侵犯其他各国利权”，并声称日本政府“自应向中国有所择要素求”；英国公使萨道义也发出警告：清政府如无视英国抗议，不顾“利益均沾”原则，“关系必非浅鲜”，届时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2 册，第 30—31 页。

②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 1 卷，第 298 页。又据光绪二十九年十月胡惟德奏报，当时该矿产量“非但足供东省铁路之用，并可供其西伯利亚铁路之用”。参见《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78 卷，第 7 页。

③ 《矿务档》，第 6 册，《云南、贵州、奉天》，第 3450 页。

④ 《清德宗实录》，第 484 卷，第 2 页；《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65 卷，第 1—3 页。

⑤ 同上书，第 487 卷，第 16 页。

⑥ 《矿务档》，第 6 册，《云南、贵州、奉天》，第 3454、3483 页；《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56 卷，第 2 页。

⑦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56 卷，第 1—2 页。

⑧ 《矿务档》，第 6 册，《云南、贵州、奉天》，第 3498 页。

⑨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78 卷，第 7 页。

将设法“向中国索抵”^①。清政府左右为难,于1902年3月17日趁英日结盟共同对俄的有利时机,公布了《筹办矿务章程十九条》,内规定凡拟开办矿务者必须先行禀报外务部批准;承办人不得私将执照转卖他人;承办矿务,自发照之日起,限12个月内开工,逾期执照作废^②。这一章程的公布,对资本和技术力量均感不足的沙俄,不能说不是一种限制和打击。因此,璞科第于6月间向维特告急,要求尽快增拨资金和调派得力的工程技术人员;否则,已获得的租让权有可能因不能如期勘探而流于形式^③。

面对上述情况,维特于1902年7月间决定成立满洲矿业公司,将道胜银行有关租让权的全部业务移交该公司,目的是向中国政府要求新的租让权和组织矿山的勘探工作^④。满洲矿业公司同东省铁路公司是一路货色^⑤。它的固定资本100万卢布是以公司股票作抵分批借来的(主要是向国家银行告贷)。公司的股东和俄国财政部、道胜银行都有密切关系。操纵公司领导权的罗启泰,就是道胜银行的总经理。根据该公司和道胜银行订立的契约,公司的金钱支付由该行负责,而在财政上承担全部风险的则是俄国政府。因此,它实质上是道胜银行的分支机构。

满洲矿业公司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于当年7月成立后的一年里,专注于攫取地下资源开采权,组织勘探工作,其中从道胜银行继承来的和通过该行获得的重要租让权有6项,内分布在奉天的三处,吉林的二处,黑龙江的一处;直接以公司名义获得的有松花江上游夹皮沟金矿的勘探开采权(原属阿斯塔舍夫)、松花江下游观音山地区的采金权(原属俄国采金公司)和吉林省三姓的采金权(原属特罗伊茨基和库图佐夫)^⑥。但是,到1903年8月维特去职、该公司中止活动止,因缺乏足够的资金,还没有真正办成任何一项企业。

另一方面,沙俄利用和中国商人合资经营的方式,不断蚕食中国东北利权。例如,1901年9月,道胜银行向候选府经历王承尧承办的抚顺西部华兴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10号文书;《矿务档》,第7册,《吉林、黑龙江》,第3975—3976页。

② 张寿鏞、张长祿等编:《皇朝掌故汇编》,外编,第24卷,求实书社藏版,第64—65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74页。

④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56页。

⑤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849页。

⑥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80—381页。

利煤矿公司投资 6 万两^①；次年，满洲矿业公司通过道胜银行又投资 5.47 万两^②。1902 年 5 月，俄商汝华托夫斯克、李沃夫和复州五湖嘴煤矿刘春溥等拟订合同，准备华俄合资开采，后以日俄战争爆发而中辍^③。同年 9 月，道胜银行与华商梁显诚等集资 40 万两（内道胜银行出资 15 万两），设立义胜鑫矿务总公司，申请经营辽阳等地的银、铁、煤、铜等矿 45 处。清政府担心“将来华商股本，全归华俄银行承买，华人既失利权，外人亦必滋口实”^④，只同意试办鸡爪山等 12 处^⑤。1903 年初，沙俄通过候补知府李席珍等出面申请华俄合资开设天利公司，经营辽阳属界尾明山煤矿，共股金 2 万两，内俄员纪道夫 1 万两；同年 4 月，清政府同意试办^⑥。此外，道胜银行在 1902 年春购买英俄开拓公司中英人罗斯的股份，从而占有了该公司总资本的 90%。这家公司于 1899 年成立，目的是开采由海关到营口这一带的金矿^⑦。

除了掠夺矿产租让权外，沙俄还向清政府提出“开发”森林资源的无理要求。事实上，自东省铁路动工之日起，路局即已开始盗伐吉、江两省铁路沿线林木，充铁路枕木、房舍建筑及燃料之用；同时它借口铁路合同中关于“用料免税”的规定，拒绝向中国交纳木材税^⑧。1898 年东省铁路南满支线合同签订后，路局正式取得了“在官地树林内自行采伐”的特权。但沙俄欲壑难填，1903 年又以建造铁路需要为名，要求黑龙江省准其在下述地段砍伐木材：

1. 陆路一段，自成吉思汗站至雅克石（什）站铁路两旁长 600 里、宽 60 里地区。

2. 水路两段：一为呼兰、诺敏两河，各至水源为止，长 300 余里、宽 100 余里；一为权林、浓浓两河汇流处各至水源为止，长 170 里、宽 70

①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第 3 卷，《矿务交涉篇》，第 3 页；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上册，1957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第 39—40 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381 页。

③ 《矿务档》，第 6 册，《云南、贵州、奉天》，第 3485 页；徐世昌：《东三省政略》，第 3 卷，《矿务交涉篇》，第 12 页。

④ 《矿务档》，第 6 册，《云南、贵州、奉天》，第 3496 页。

⑤ 同上书，第 3519 页。

⑥ 同上书，第 2085、2090 号文件。

⑦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375 页。

⑧ 魏声和：《增订吉林地理纪要》，卷下，1931 年吉林再版，第 52 页。

里。在此界内,“山林统归铁路公司砍伐,华人不得过问。”^①

上述掠夺租让权的活动,按照维特的本意,其出发点首先并不是考虑眼前的工商利益,而是力图“保住满洲”,即在外国资本涌入满洲前,为俄国保留日后“开发”满洲资源、支配满洲经济财富的专有权。这是维特“和平”征服满洲计划的重要内容。这项计划是建立在资本输出的基础上的,而俄国自有资本的严重不足,恰恰是这一计划的致命弱点。1902年4月撤军条约签订后,面对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激烈竞争,维特的计划受到反对派的非难,俄国专制政体的内部矛盾尖锐化、表面化了^②。在这种情况下,维特于1902年8月间亲自前来满洲“考察”。10月间,向沙皇提出了长篇考察报告,仍认为“扩大俄国在满洲的势力,不应通过征服,而应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③。后来,他又强调,俄国应“把满洲控制在手里并悄悄地准备最终予以兼并”^④。为此,维特提出了如下战略任务:迅速建成东省铁路;加强对东省铁路附属地段的有效管理,包括扩展沿线城镇,大规模占有土地和安置俄国移民等;大力建设旅顺军港^⑤。这也是直到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俄国远东政策的重要目标。

二 扩展以东省铁路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势力

如前所述,东省铁路自1898年动工后,筑路工程即加速进行。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铁路干线已铺轨1300俄里,尚有约1000俄里未建成^⑥。义和团运动中,该路保持完好的仅400俄里^⑦。俄军占领东三省后,于1901年提出了“不惜一切代价,争取铁路早日完工”的口号。1901年东三省天气奇寒,次年霍乱流行,但筑路工程并未受阻。1901年11月,东省铁路干线接轨,同年底已可临时通车。1903年7月1日,费时5年、造价37495万余卢

①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第3卷,《森林交涉篇》,第27页;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419页。

② 详见下节。

③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40-241页。按:该书第190-245页详细摘引了维特的上述奏稿。被删节的部分内容见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13-414页。维特奏稿的中文节译本见1905年5月上海《外交月报》,《天范行露》(未著出版年月和出版单位)和《东省铁路合同成案要览》等书。

④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340页。

⑤ 参见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15页。

⑥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22页。

⑦ 同上书,第232页。

布、干支线全长 2373 俄里的铁路全线通车，从而使位于欧洲的俄国政治经济中心与地处远东边陲的海参崴以便捷的交通直接联系起来，加强了俄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从此，“俄人出入于东三省，无异户庭”^①。

分布在东省铁路沿线的“护路军”，是沙俄对中国东三省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1901 年初，沙俄擅自在东省铁路界内设立“外阿穆尔军区”后，“护路军”兵力继续增加；1902 年秋维特“视察”远东时，实际人数已达 1.7 万人^②，1903 年增至 3 万人^③。外阿穆尔军区的军官都是俄国正规军的军官，“名义上归财政大臣统辖，实际上仍由陆军大臣控制”^④。在中俄单独谈判期间，维特主张撤出俄国正规军，代之以“护路军”，意即赋予“护路军”新的使命，直接充当占领军。日俄战争开始后，外阿穆尔军区曾派出部队到前线与正规军协同作战^⑤。此外，沙俄在 1903 年还建立了由四个独立营组成的外阿穆尔铁道旅，分驻哈尔滨、横道河子和辽阳等地^⑥。

俄军侵入东三省后，沙俄继续在东省铁路沿线大力推行移民政策。1902 年秋，维特在满洲“考察”时指出，需要将人数较少、居住分散的移民点适当集中起来，迁至重要的拓居地。在 1903 年 2 月彼得堡举行的东省铁路移民问题会议上，他强调适合移居满洲的首先应是工商人士、退役军人和护路军的下层军官及其家属，而不应是无业者或最贫困者；移民们可在铁路车站附近建立清一色的士兵村^⑦。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也赞成向中国东北北部大量移民，认为这对于俄国最终并吞北满，具有战略意义^⑧。1903 年 6 月 5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无视中国主权，批准了《俄国臣民移居东省铁路地段条例》^⑨，规定此项移民由东省铁路公司负责，准许该公司为此目的购买或无偿占有适于建立移民村镇的土地，俄国移民得无偿使用这些土地 10 年，并享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95 卷，第 6 页。

②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219 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 36 卷第 1 册，第 826 页。又据 1903 年 10 月法国的情报，这时“护路军”人数为 2.6 万人。参见奎斯特德《“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1895—1917）》，第 100 页。

④ 英国驻俄代办哈丁语。尼什：《日俄战争的起源》，第 90 页。

⑤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 1 卷，第 512 页。

⑥ 同上书，第 529 页。

⑦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 233 页；参见奎斯特德《“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第 123 页。

⑧ 《库罗巴特金日记》，1903 年 1 月 5（18）日。《红档》杂志 1922 年第 2 卷，第 22 页。

⑨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413 页注⑧。

有其他特权和优待。接着,维特于7月30日批准了《东省铁路附属地段外阿穆尔军区退伍军人士兵村镇条例》。“士兵村”安置的对象是外阿穆尔军区带家属的现役士兵,而“士兵镇”安置的则是转入预备役的愿留居满洲的士兵^①。这是露骨的半军事化移民。为了在“士兵村镇”建房和置办家具什物,1903—1905年间,东省铁路公司预算每年拨款20万卢布进行补助^②。

与此同时,沙皇政府通过东省铁路公司不断扩占沿线中国土地,1902年维特从远东返回彼得堡后,要求立即在各火车站附近占地500—2000俄亩,以供安置移民之用^③。截至1903年5月,已“购地”14.37万俄亩,其中10万俄亩在车站附近^④。以哈尔滨车站为例,原来占地5656俄亩,1902年增至10581俄亩,增加几近一倍^⑤。美国驻牛庄领事梅拉致美国公使康格的报告也指出:“(哈尔滨)车站周围沿松花江和铁路线数英里内的所有土地,都已被购买一空。哈尔滨如此,其他各站也莫不如此。”^⑥但沙俄并不以此为限。1903年6月,沙皇又批准东省铁路购地可增至20万俄亩^⑦。铁路全线通车后,路局全权代表达聂尔于1904年3月以“铁路所需”为名,迫使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总办周冕擅立《展地合同》,放宽购地限额至20万华垧,每垧只给价30卢布,蒙旗土地则不分等级每垧给价不超过5卢布^⑧。此后,东省铁路公司屡执“合同”为据,要求实行“展地”^⑨。程德全等照会路局,声明上述合同未经清政府批准,不足为凭。虽几经交涉,均无结果^⑩。

本来,根据“东省铁路合同”第六款的规定,铁路用地,专指“建造、经营、防护铁路所需之地”和“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项所需之地”。但路局占地,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不仅用于建造铁路和安置移民,而且被

① 斯克维尔斯基:《“黄俄罗斯的士兵村”——沙俄在满洲的军事殖民计划》,载《东省杂志》1930年第4期,第14—16页。

② 斯克维尔斯基:《“黄俄罗斯的士兵村”——沙俄在满洲的军事殖民计划》。

③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20页。另据《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412—413页,1902年8月维特在哈尔滨时曾指示东省铁路公司扩大占地面积,东西线各大站可占3000俄亩,南线各站可占600俄亩。按:1俄亩合1.09公顷。

④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13页注③。

⑤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413页。

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52页。

⑦ 奎斯特德:《“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第95页。

⑧ 《东省铁路文件集》,1922年哈尔滨俄文版,第13号文件。按:每垧俗称计地10市亩,实则合地12市亩。

⑨ 徐世昌:《纪东清铁路展地》。《东三省政略》,第3卷,《铁路交涉篇》。

⑩ 《程中丞奏稿》,第19卷,第5—8页。

转售牟利。例如，维特供认，仅1902年6月哈尔滨一次拍卖的土地，就有255段，计9.3万平方俄丈（合42.5平方公里），路局得价款37万卢布^①。另一方面，路局购地，“发价甚少，商民苦累”。如奉天怀德县，1902年占民地370垧，价值1400—1500吊，俄方仅给140吊^②。又如黑龙江省，“近省城者，有以中钱数十吊，卖地数十百垧之事”^③。遇有已经成熟的庄稼，也“不给谷值，遽强占之”^④。沙俄的行径，侵犯了当地居民的生计，遭到强烈反对。维特本人在“考察”满洲后也不得不承认，吉林、奉天两省居民，对俄人购地“持极不友好的态度”^⑤。哈尔滨附近马家船口地方佃户张永禄等为抵制沙俄“购地”，表示“情甘将地报效公家，招商开埠，至死决不卖给外（俄）人”^⑥。

东省铁路公司借口“铁路合同”载有关于铁路用料及水陆转运各事由中国政府相助，设法使其便捷的条款（第四款），特设航运处，组织河船队，开辟松花江航道，航行于伯力和哈尔滨之间。1898年“南满支线合同”订立后，路局又以该合同第二款为依据，组织本公司船舶及悬挂公司旗子的船只在辽河及其支流、营口与旅大租借地之间各海口行驶。开始时，路局船队仅限于运送筑路物资、器材和员工，后又兼营客货运输，企图垄断中国东北沿海及内河航运事业^⑦。此外，路局还拥有规模可观的太平洋商船队，经营中、日、朝港口客货运输^⑧。东省铁路公司在经济上已成为一个大托拉斯。

在东省铁路修筑过程中，沙俄为满足日益增多的俄国侨民的生活需要和解决铁路所需的材料加工、车辆维修问题，在哈尔滨等地陆续建立了各种工厂，其中尤以近代机器面粉工厂为突出。由东省铁路公司投资兴办的东北第一家面粉厂第一满洲制粉公司1900年在哈尔滨建成投产；同年，第二家面粉厂动工兴建。1902年，哈尔滨已有面粉厂4家^⑨，到1903年末，增至

①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150页。按：《东省铁路合同成案要览》第48页误作1901年6月。

② 辽宁省档案：交涉总局档，实业第290号。

③ 程德全：《抚东政略》，卷下，第48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第246页。

⑤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21页。

⑥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8卷，第2—3页。

⑦ 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北满与东省铁路》，1922年哈尔滨俄文版，第215—219页。

⑧ 详见本卷第一章第四节。

⑨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87页。

8家^①。

日俄战争爆发后,东省铁路商运锐减,北满成了俄军的供应基地,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俄资面粉工业迅猛发展。此外,俄侨开办的酿酒厂(啤酒厂)、卷烟厂、肉食厂、糖厂、榨油厂、锯木厂、机械修配厂等也在哈尔滨、海拉尔、阿什河、齐齐哈尔车站、乌吉密、一面坡、横道河子、海林等地陆续出现^②。沙皇政府为奖掖这些厂商,特“赋予华俄道胜银行以殖民银行的任务,以促进俄国在(中国)东北工商业的发展”^③。据估计,道胜银行当时向东北俄侨开设的面粉厂及其他企业提供了开办资金的90%^④。这些工厂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燃料和廉价劳动力,获取超额利润。

东省铁路建成前,俄国对华贸易主要依靠驼队运输,速度慢,运载量小,贸易额有限;在中国东三省,中俄贸易集中于边境城镇。铁路建成后,从旅顺到俄都,只需13天,不仅货物流通加快,而且便于俄国商品深入东三省腹地,中俄贸易于是得到较大发展。俄国在中国东北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各种洋行或贸易公司随之不断涌现。秋林公司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家,它不仅在哈尔滨、一面坡、奉天、吉林等地设有分店,进行贸易,而且还开办了茶叶、卷烟等加工厂。

沙皇政府视东省铁路为国有铁路的一部分,除军运直接为俄国政治目的服务外,其商运政策也深受俄国殖民政策的影响。1903年7月,东省铁路公司制定运费规则,实行差别运费制度,目的之一就是使俄国商品独占中国东三省市场。例如,东省铁路货运规则规定,普通货物运费分为10等,最高为每普特俄里1/7戈比,而同期俄国国内铁路最高运费每普特俄里为1/10戈比。这就是说,东省铁路对本地区的货运一律收高运费,以阻碍当地中国工业的发展。又如,中俄联运规则规定,由莫斯科到哈尔滨最高运费每普特俄里按1/45戈比计,最低运费每普特俄里按1/88戈比计,这项运费只相当于东省铁路本路运费的1/7或1/8,低廉殊甚,以致由莫斯科至哈尔滨(7511公里)比由大连至哈尔滨(946公里),虽然线路长出数倍,而运费所差甚微,这对俄国向中国东三省及蒙古东部推销商品极为有利。

另一方面,运则规定,由东省铁路各站运入俄国的货物,也实行差别运

① 奎斯特德:《“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第102页。

② 同上书,第103—104页。

③ 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北满与东省铁路》,俄文版,第410页。

④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145页。

费,即除对俄国远东地区紧缺的粮食、牲畜收取较低运费外,其余产品均收高运费^①,从而既有利于俄国远东各省地方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变为俄国远东区的廉价原料供应地。特别重要的是,东省铁路根据“铁路合同”第十款的规定,享有减税免税的特惠(由本路运输俄国过境货物一律免税)和优惠(由本路输出入的货物照各国通商税则减三分之一缴纳)。这是其他国家所未能享受的差别待遇。为把货运吸引到东省铁路来,维特还采取特殊的关税措施。例如,经满洲运进俄国的大米的关税是从价的0.25%,而经敖德萨入口的大米的关税高达从价的88%。这样,东省铁路虽因运费高昂,货运受恨,但仍可从关税制度的差别中受益^②。

这时,作为东省铁路金融后盾的道胜银行,实力也大为膨胀。1901年,该行在东北的分行已有哈尔滨、齐齐哈尔、宽城子(长春)、大连、旅顺、牛庄(营口)、吉林、铁岭、奉天、海拉尔等10处^③,共拥有资本1500万卢布^④。在此以前,该行的业务对象限于俄国政府机构和俄国占领军等部门,1901年起,开始同当地居民建立金融联系^⑤;对前往俄国购货的华商和经营满洲货物的中俄出口商,贷款“十分积极”。1903年,哈尔滨分行每天的货币经营额达40万卢布,其中尚不包括对东省铁路和政府部门的营业额^⑥。该行在东三省的盈利,数额虽然不大,但逐渐增多,1903年为113454卢布,1904年已达635898卢布^⑦。

另外,道胜银行从1898年起在旅大租借地为沙俄殖民当局代征各项税收;1900年俄国霸占牛庄海关后,它包揽了所有关政及关税事务;1902年在东北又充当了沙俄攫取各种租让权的工具。后起的道胜银行在业务上已和老牌的英国汇丰银行并驾齐驱。1903年,英国记者魏尔(辛博森)报道说:“名义上仅有资本一千五百万卢布的道胜银行,八年来在远东取得的成就,

① 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编》,第17册,第7章,第294—296页;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北满与东省铁路》,俄文版,第675—677页。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93页。

③ 奎斯特德:《华俄道胜银行》,第33页。

④ 阿纳尼奇:《俄国的专制制度与资本输出》,第5页。1897年该行的固定资本已由创建时的600万卢布增至1125万卢布。参见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史》,第307页。

⑤ 奎斯特德:《华俄道胜银行》,第38页。

⑥ 同上。

⑦ 据该行中国各支行1901年、1902年及1904年的年度报告,其时在华各支行的利润每年在130万—250万卢布之间(奎斯特德:《华俄道胜银行》,第36页)。又据1904年7月俄国财政大臣的奏折,1903年该行的净利共达430万卢布(阿纳尼奇:《俄国的专制制度与资本输出》,第6页)。

超过了英国政府半个世纪的成就!”^① 这话虽有些过甚其词,但对道胜银行在沙俄对外扩张中的作用之大,还是讲到了实处^②。

道胜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纸卢布(羌帖),这时开始在东北全境流通。这是该行的另一项“特种业务”。早在1897年初,维特就已指示乌赫托姆斯基为道胜银行向清政府谋求发行纸币和铸造银币的权利^③。1900年初,他又命令用卢布取代吉林银两支付修筑东省铁路的华工工资,但遭到抵制。因此,直到1901年道胜银行的营业报告书仍用“两”(而不是卢布)为计算单位^④。俄军占领东三省后,随着大批俄国侨民的涌入,卢布在铁路沿线广为流通。1903年东省铁路全线通车,路局规定客货运费一律只收卢布^⑤,于是卢布就推广到了东北全境,并逐渐成了当地占支配地位的通货^⑥。正如《黑龙江志稿》所述:“东清铁路告成,俄之卢布羌帖,遂通行于路线所经各地,操纵财权,市间不见官币。”^⑦ 上述英国记者因此把卢布、铁路和银行并称为沙俄统治东三省的女妖美杜莎的三个头^⑧,其后果之严重,由此可见。

在中国东北流通的俄国货币有硬币和纸币两种。东省铁路通车后,有一个时期铁路地段内商业往来一般以俄国硬币为支付手段,但后来纸卢布充斥市场,并呈取代之势^⑨。纸卢布的发行者除道胜银行外,还有东省铁路公司和沙皇政府本身。

英国对俄国在中国东北推行“铁路和银行”的侵略政策所取得的成果,颇为眼红。1903年6月,一家英国刊物在论述俄国对满洲的征服政策时曾指出:道胜银行与东省铁路公司,“凡所设施,皆操胜券,实不啻一行军之利器也。虽其经营布划所费不貲,然自此而三倍英国之腴壤,遂得据为己

① 普特南·魏尔(辛博森):《满洲人和俄国人》,1907年伦敦出版,第125—126页。

② 苏联学者说,到日俄战争前夕,在外国在华的十个金融机构中,道胜银行的资金周转额位居第二,仅次于英国汇丰银行。参见阿纳尼奇《俄国的专制制度与资本输出》,第6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70页。

④ 李斯特德:《华俄道胜银行》,第49—50页。

⑤ 东省铁路公司编:《北满与东省铁路》,1924年哈尔滨英文版,第324页;普特南·魏尔:《满洲人和俄国人》,第216页。

⑥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73页。

⑦ 张伯英等编:《黑龙江志稿》,第21卷,财赋志,钱币,第45页。

⑧ 普特南·魏尔:《满洲人和俄国人》,第213页。美杜莎(或译墨杜萨)系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可使目见者变成化石,其头后来被英雄珀尔修斯割下。

⑨ 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北满与东省铁路》,俄文版,第542—543页。

有。”^①在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上，沙俄不仅筑路、开矿、设厂、开办银行，攫取种种特权，而且在战略要地修建了哈尔滨、旅顺、大连等“俄国式”城市，作为继续向远东扩张的基地。到1903年东省铁路通车时，这些城市都已达到了可观的规模。

哈尔滨是连结东省铁路干线和南满支线的总枢纽。其地南距旅顺600英里，东距海参崴350英里，原是松花江畔的小渔村。1898年6月，东省铁路工程总局迁入本地后，便利用无偿占有的中国土地开始兴建哈尔滨市，除住宅、商店、工厂外，还建筑了东正教教堂。随着铁路工程的进展和移民的增加，哈尔滨户口日众，1902年俄国居民逾2万^②，1903年已达3万人^③，超过了海参崴^④。哈尔滨不仅是东省铁路公司总部和“护路军”司令部所在地，而且设有执行铁路沿线警务的警察总局、审理铁路东线俄国臣民刑案件的调解法庭，以及办理中俄交涉事务的黑龙江、吉林铁路交涉总局等单位。在这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沙俄均居支配地位。1903年6月，路局创办东三省第一家俄文报纸《哈尔滨新闻报》（周双刊。后改名《满洲日报》），以控制占领地区的舆论^⑤。7月，颁布“铁路管理总则”，着手控制铁路附属地段的行政权^⑥。同月11日，沙皇政府照会包括法国在内的列强，蛮横地宣布：“哈尔滨属东省铁路租借范围，设置外国领事馆，应经俄国同意。”^⑦美国领事梅拉于当时不无根据地写道：“哈尔滨比之所有其他城市更能表明俄国要在东方事务中成为积极的工业力量的意向；俄国人已经给哈尔滨取了亚洲莫斯科的名称！”^⑧哈尔滨迅速成为俄国在东三省的侵略中心。

大连是沙俄在辽东半岛租借地建立起来的商港。如本卷第一章所述，自1898年动工兴建起，人口激增，1900年已有俄国人（包括工人、职员和

① 《外交报汇编》，译报第1类，第52期，第26页。

②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26页。

③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87页注①。

④ 一说1901年在哈尔滨的俄国侨民为1.2万人，1902年为2万人，1903年5月为4.4万人，同年10月为6万人（均不包括俄国军人），当时海参崴的俄国市民和公职人员为2.45万人。参见奎斯特德《“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第100页。

⑤ 斯坦菲尔德：《俄国在满洲的事业》，第181页。

⑥ 详见本卷第四章第二节。

⑦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289页；奎斯特德：《“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第66页。

⑧ 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21页。

“护路军”) 6000 人,本地和外地的华工约 6 万人^①,不久成为亚洲第三大港^②。1902 年 10 月,日本学者内田湖南和法国作家夏当到旅大旅行,因这里“俄国气氛之迅速弥漫,它和莫斯科之惊人相似而感到吃惊。”^③在东省铁路通往沿海三口岸大连、营口、海参崴的商务中,当时以英日占优势的营口港为最发达。维特为开拓大连,压倒营口,除组织太平洋商船队、实行东省铁路海陆联运外,在 1903 年制定东省铁路“运费规则”时,曾贯彻使东北货运尽可能通过大连港的方针,并提高英、日货运费,以阻止其进入中国东北市场^④。

为了“使满洲的海关俄罗斯化”,1903 年 5 月,俄使璞科第曾向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要求,大连税务司的任命、调迁和解职须由东省铁路公司和总税务司协商办理^⑤。6 月,清政府同意以旅顺口俄国财务官普罗塔西耶夫为大连第一任税务司^⑥。1898 年,“旅大租地条约”有俄国不得侵犯中国主权的規定,但 1903 年 2 月沙俄外交部竟照会各国:“欲派领事(驻大连),须请俄政府批准,与俄他埠办法一例”^⑦,这等于宣布大连为俄国所领有。

旅顺口为渤海湾的门户,西南距大连 33 英里,是俄国向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重要海军基地,经苦心经营,到 1903 年已初具规模。英国中校情报官温盖特在当年 7 月访问东三省后报道说:“旅顺口即将成为远东的喀琅施塔得。约有 6 万名华工正在建设这个新的城镇、港口、船坞、炮台、军用道路和其他建筑物。这里不久将成为无懈可击的巨大堡垒。”^⑧

三 建立赤裸裸的军事殖民统治

包括哈尔滨在内的东三省所有重要城镇、全部铁路线、电话线,自 1900 年 10 月起即处于俄军的占领之下。1901 年俄军撤退了一部分,留驻的尚有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240—241 页。

②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第 231 页。

③ 北山康夫:《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1972 年东京出版,第 88 页;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第 231 页。

④ 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北满与东省铁路》,俄文版,第 675—677 页;1927 年哈尔滨中文版,第 312、314 页。

⑤ 莱特著,姚曾廌译:《中国关税沿革史》,1964 年商务印书局出版,第 392—393 页。

⑥ 《日本外交文书》,第 36 卷第 1 册,第 269 页。

⑦ 《驻俄公使胡惟德致外务部电》,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近代史资料》1978 年第 2 期,第 65 页。

⑧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 2 卷,第 211 页。

约10万人^①。1902年上半年续有撤退；据是年4月底英国估计，留下者约五万人^②。1903年沙俄不仅违约拒绝撤军，反而把占领军增至8.9万人^③。他们分驻在50多个重要城镇，其中旅顺—哈尔滨一线有20多个，东面沿朝鲜边境的有十几个，西南从山海关到牛庄沿辽河西岸的有几个，北满有十几个^④。以省区分，盛京省与朝鲜连界，扼渤海湾咽喉，加以全省居民抗俄情绪高昂，最受沙俄注意，所以驻军最多，吉林次之，黑龙江又次之。计盛京省驻军处所：西有山海关、锦州、沟帮子、新民厅，南有旅顺、大连湾、貔子窝、熊岳、海城、盖平、营口、牛庄、辽阳，北有昌图、开原、铁岭，而以省城（沈阳）为中心^⑤。到1903年9月，沙俄占领军主要集中于下列各地：盛京省的牛庄、凤凰城、沙河子、辽阳；吉林省的吉林、伊通州、宽城子、老少沟、陶赖昭、宁古塔、阿什河；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海拉尔、拉哈苏苏、哈尔滨等地^⑥。

上述占领区，依其行政权力的行使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旅大租借地。如第一章所述，这一地区按俄国擅自制定的《关东省暂行管理条例》实行统治，即根据俄国土尔克斯坦实施的各项政策行事。地方最高民政长官由当地俄国驻军司令兼任，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全由俄国当局摆布。这也就是实行“以俄治华”^⑦。邻近旅大的金州城，本不属于租借地范围，应“由中国自行管理”，但沙俄不顾条约的规定，竟在“关东省”下擅设金州市，将其法律地位与旅顺等同^⑧。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兴起后，金州城内原有中国官员，均被俄方无理捕去^⑨。

① 《皇家陆海军学院杂志》，第14卷，1901年10月。转引自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50页。

②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39页。

③ 普特南·魏尔：《满洲人和俄国人》，第478页。按：奎斯特德所著《“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一书第59—60页提供的驻军数，与此有所不同。

④ 普特南·魏尔：《满洲人和俄国人》，第470—471页。按：山海关本身由一支人数不多的国际联军控制。

⑤ 参见《西巡大事记》，第10卷，第31页。

⑥ 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354—355页；伦森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第229—230页；奎斯特德：《“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第75—79页。按：《日本外交文书》在此处将沙河子误作沙开子、老少沟误作投沙子、陶赖昭误作它赖明。《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02页有同样的讹误。

⑦ 郭素维慈：《俄国在东方》，第125页。

⑧ 参见杨沃德《满洲的国际关系》，1929年美国出版，第17页。

⑨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45卷，第14页。

第二类是贸易港营口。这里地据辽河左岸，西南距辽河入海口约40里，东北距牛庄约90里，是当时东三省的惟一通商口岸牛庄的港口（故牛庄、营口常混称），设有中国海关和日、英、美等国领事。1900年8月4日俄军占领该地后，一直拒绝清政府道台归任，并不顾中外各国抗议，擅自制定《营口管理条例》，设置民政厅、警察局和司法机关^①，实行殖民专制统治。尽管俄国在营口的商务只占该口贸易总额的1%，但却强行接管了当地海关，升起了俄国国旗，并把海关收入存入道胜银行，部分用作当地的行政经费，部分用作对俄军交出津榆（山海关）铁路的“补偿”。1903年4月，俄人葛诺发（科诺瓦洛夫）被任命为牛庄（营口）税务司^②。直到同年12月，美国驻牛庄领事仍抱怨俄国违反“门户开放”原则，要求给予“与俄国人在我国（美国）享有的相同的自由和权利”^③。

第三类是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省铁路地段。东三省首任总督徐世昌曾作如下描述：“庚子以还，俄人席战胜之余威，乘大局之未定，凭借路势，攘夺主权。向之创设工程由道胜银行承筑者，浸且俄国政府出而干预。加以总办华员虚悬未派^④，用人理财之柄，一听俄员主持。展铁路两旁2万顷之地，视同领土，则蚕食堪虞。尽江流以北数百里之山不纳税厘，则漏卮何极。而且置监狱，设巡警，则侵我裁判行政权。不许铁路界内驻兵，则夺我军事权。虎踞东陲，强宾夺主。东迁之氓，纷纷踵至；戍兵之设，源源而来。满洲里、扎兰屯等处，列廛而居，栉比鳞次，综计俄人约居十之七，华人不过十之三。”^⑤

半个世纪后，美国学者施瓦茨也指出：“满洲的铁路区域以及邻近铁路和兼并入铁路区域的广大土地，完全受俄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在这个区域，是俄国的法律和法庭在起作用；警察和武装力量掌握在俄国人手，一个庞大的新兴的俄国城市在哈尔滨——铁路的枢纽车站成长起来。俄国人以铁路作基地，力求尽可能迅速地将它的经济势力向满洲各地渗透。俄国轮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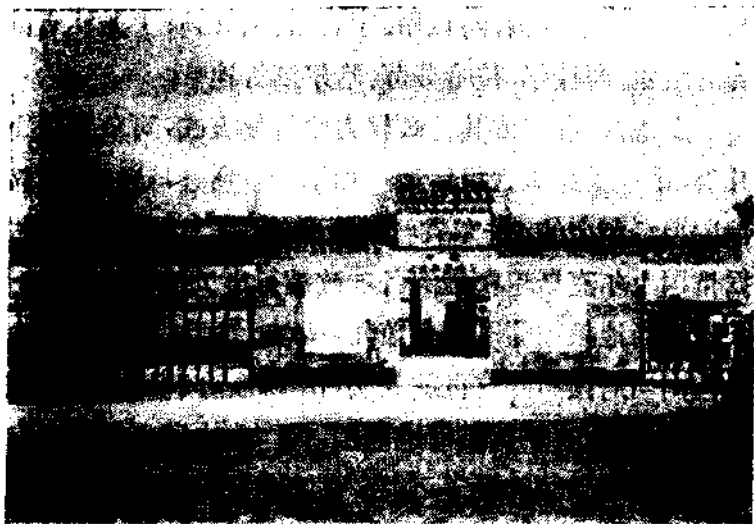
① 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55—58页。按：当年10—11月间，英、美、日三国相继派出炮艇各一艘驶入营口，对俄国侵犯它们的“条约权利”表示抗议。参见尼什《日俄战争的起源》，第113页。

② 奎斯特德：《“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第116—117页；《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271—273页。

③ 瓦格：《门户开放外交家柔克义传》，1952年美国出版，第56页。

④ 东省铁路公司总办一职自1900年7月许景澄被杀后久悬未派。

⑤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第3卷，《铁路交涉篇》，第1页。



沙俄强占中国牛庄海关

(采自普特南·魏尔《满洲人和俄国人》)

获得了在广阔的满洲水系航行的权利；松花江的航运成为东省铁路活动范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铁路又开办了许多煤矿、林场……”。简言之，“东省铁路是在中国疆域内建立的俄罗斯帝国”^①。东省铁路管理局便是这个“帝国”的权力中心。

第四类是地域辽阔的东三省其他地区。开初，沙俄是以1900年11月非法签订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为依据对这一地区进行统治的。当时俄国随军记者杨切夫斯基曾指出：“暂且章程”是俄国占领满洲后最初18个月内南满各项秩序的基础^②。1901年1月，宣布“暂且章程”无效后，沙皇政府财政、外交、陆军三大臣会议制定的《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成了直到日俄战争爆发前沙俄在东三省行事的准绳^③。1902年4月《交收东三省条约》的签订，也没有改变上述情况，维特总结远东之行的奏稿对此也直认不讳。

① 施瓦茨：《沙皇、清朝官员和俄国委员——中俄关系史》，1964年纽约出版，第83页。

② 杨切夫斯基：《在停滞不前的中国的城墙下》，第617页。

③ 参见矢野仁一：《满洲近代史》，第348页。

首先,中国东北地方官员虽然在1901年1—2月间陆续返任,但对俄军仍处于“从属地位”,不能独立行使职权。俄军无需任何正当理由,即可任意要求取消下自一般官员上至将军本人宣布的命令^①。俄国在将军衙门设置的军事委员名义上对将军只有监督权,实际上却享有发布命令的自由。盛京将军增祺的行动受俄国军事委员格罗姆切夫斯基的“绝对控制”^②。三省将军的任免,仍需听取俄国的意见。1903年,清政府拟由程德全接替萨保任署黑龙江将军,后由于俄方反对而改任达桂^③。

同时,俄军无视中国主权,在辽阳、海城、盖平、熊岳等处城外征税^④,并且违反国际惯例,继续把持东三省电报局,剥夺中国政府的通讯权利^⑤。撤军条约签订后,电报局虽允许中国使用,但电稿必须经过俄国军事当局为期两三天审查,从而使这种通讯丧失了应有的意义^⑥。

再如,中国地方官员,没有俄军发放的通行证不能自由行动,连吉林将军长顺前往哈尔滨会见维特(1902年),也需向俄国军事当局请示,否则在驻宿地就有被拘留的可能^⑦。至于俄军任意逮捕被认为“可疑”的分子,并借口扫荡红胡子,到处骚扰的事,更是层出不穷。

以上事实表明,1901—1903年间,沙俄在东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较义和团事件前有较大的扩张。这是当时的目击者和后来的历史家共有的结论。例如,曾在旅顺长期居住、日俄战争期间在俄营任随军记者的英人麦考密克就曾指出:“日俄战争爆发前的三年,俄国在中国国土上从事的侵略事业达到了它的顶峰。”^⑧

对于沙俄在中国东北建立的这种殖民统治,有的称之为“俄罗斯的东方帝国”^⑨,有的称之为“维特的满洲帝国”^⑩,而有的俄国人则直截了当地称

①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10—211页。

② 奎斯特德:《“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第55页;廓索维慈:《俄国在远东》,第132—133页。

③ 同上书,第83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46卷,第29页。

⑤ 同上书,第145卷,第14页。按:1900年11月,俄军强行接管东三省电报局。参见普特南·魏尔《满洲人和俄国人》,第290页。

⑥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11页。

⑦ 同上。

⑧ 麦考密克:《俄国在亚洲太平洋的悲剧》,第1卷,1907年纽约出版,第13页。

⑨ 同上书,第9页。

⑩ 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11页。

之为“黄俄罗斯”。一位旧俄作者曾这样说明这个名称的由来：“俄国占领满洲的时期，是它在远东威力极盛的时期。那时旅顺口就在我们手里，视察过它的库罗巴特金将军认为旅顺口是坚不可摧的。在它对面的碇泊场里，舰只众多的分舰队的桅杆上，高傲地飘扬着安德列旗。（东省）铁路的修筑工程接近完成，它的某些地段逐渐开始运营。大连出现了第一流商港。在这个地区内部，一切都顺从俄罗斯人的意志。《新时报》认为，把新的领地命名为黄俄罗斯是适时的。一个满洲好像已经少了。似乎朝鲜也请求归附于崇高的俄国支配之下。”^①

苏联学者罗曼诺夫也曾指出：1900年，在帝俄力图“摆布满洲未来命运”的时候，“有人指着这个俄国的克朗代克，已经在谈论‘黄俄罗斯’”了^②。《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也说过：“一九〇〇年，沙皇军队协同日德英法等国军队用空前残暴的手段镇压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起义。在此以前，沙皇政府已强迫中国把辽东半岛连同旅顺口要塞割让给俄国。俄国取得了在中国境内建筑铁路的权利。俄国在北满建筑了中东铁路，并为保护该路而调兵入境。北满被沙皇俄国用武力占领了。沙皇政府底势力已伸展到朝鲜。俄国资产阶级已拟定在满洲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③沙俄侵略者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把中国固有的东三省和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并列，蓄意把它变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④。这预示着沙俄将采取更冒险的侵华政策。1903年英国情报官温盖特在“考察”东三省后做出“不动用武力，他们（沙俄侵略者）决不会撤出（满洲）”的断语^⑤，是毫不足怪的。

① 斯坦菲尔德：《俄国在满洲的事业》，第38页。按：“安德列旗”指旧俄海军军旗。

②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109—110页。按：克朗代克是加拿大西北部的产金区。

③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3年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69页。

④ 被沙俄统治阶层称为“满洲问题”专家的列维多夫曾直言不讳地说：“既然在帝国的成员中有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那么，何尝不可以包括‘黄俄罗斯’呢？”（《东省杂志》1930年第4期，第14页）中国人属于黄色人种，所谓“黄俄罗斯”就是要把中国人世代居住的广大地区变为俄国的组成部分。

⑤ 占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11页。

第四节 沙俄毁约拒绝撤军,俄美关于东三省的秘密交涉

一 进退维谷的俄国远东政策

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签订后,沙俄是否依约撤军,这是关系中国主权并直接影响远东国际政治的大事,为举世所瞩目。

1902年10月8日,第一期撤军届满,俄军如约从盛京省辽河以西地区撤出,并将山海关至新民厅的铁路移交中国^①。俄使雷萨尔在签约时曾许诺牛庄将随天津同时归还中国;8月15日,联军将天津交还^②,但沙俄却自食其言。从盛京省西南段撤出的俄军,部分移驻东省铁路车站附近俄国人的拓居地和兵营里,以加强对陆上交通命脉的控制^③,部分转移到旅顺^④、凤凰城等地^⑤,以充实当地驻军,窥伺朝鲜^⑥,只有少部分返回西伯利亚。因此,俄军在东三省的实力并未因撤军而削弱^⑦。

辽河以西地区,既无重要城市和港口,又无俄国经营的工厂企业,从山海关到新民厅的铁路又涉及英国人的利益,俄军如期撤出,与此不无关系。第二期应撤出的盛京及吉林省境则有所不同。它东邻朝鲜,和日本势力相接触,西经营榆铁路,可长驱直入京津地区,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加以南满铁路纵贯其间,俄国的侵略权益比较集中,从这里撤军,有使既得利益失去保障的危险,且于进一步向华北和朝鲜扩张不利。于是,是否继续撤军的问题,在沙俄统治集团内部又引起了争辩,并由此触发了一场政府危机。

原来,早在1902年7月,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即根据阿穆尔总督格罗杰科夫的意见,向沙皇政府重新提议限制东三省的中国军事力量,在东三省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57卷,第2—3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65页。

③ 据记载,当时东省铁路沿线建有约80个兵站、俄国人新经营的拓居地和护路军驻地,其中辽阳兵站可容纳3000人,奉天兵站可容纳6000人。参见浅川一卫《日俄纷争》,1904年波上顿出版,第234—235页。

④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44页。

⑤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38页。

⑥ 参见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1964年中译本,第243页。

⑦ 1902年底,即沙俄第一期撤军完成后,彼得堡的《新时报》承认,由于撤出的俄军移驻东省铁路沿线兵站,它在满洲的实力不仅没有因此受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参见浅川一卫《日俄纷争》第237页注①。参见本山桂川《俄罗斯侵略三百年》,1939年东京出版,第287页。

各将军身边保留俄国军事委员“以监督中国武装力量的发展”，并强调必须使中国同意“决不聘用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教官训练满洲的中国军队”^①。10月，格罗杰科夫又要求“在满洲创立隶属于俄国的类似布哈拉和希瓦的自治国”^②。连当初曾主张撤军的维特，这时对撤军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为避免在最近期内同日本进行由于战备不足会给俄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他在10月间从远东返回俄都后呈交沙皇的报告中，一方面强调应与日本“和解”，在取得相应的补偿后暂时放弃朝鲜（将来可伺机夺回）；另一方面主张与中国“和解”，履行条约规定的撤军义务^③。但同时他提议必须取得吉长路租让权，在撤军前用俄国边防军独立军团（即“护路军”）“占领满洲的各大城市”，在东省铁路沿线建立由预备役低级军官组成的“军人村屯”，并说如有必要，俄国可再次“派兵进入满洲”^④。正如当时一位法国驻俄外交官所说：在维特看来，现在“最好设法使撤军延缓，从而使撤兵之举一笔勾销。”^⑤

应当指出，曾力主以“和平”方式在中国东北扩展俄国势力的维特，在撤军等问题上又一次改变态度，这是俄国远东政策陷入困境的反映，是时势所使然。

第一，从1900年开始的俄国经济危机，使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维特的远东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被视为俄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受到严厉的抨击；事实上，尼古拉二世在1901年夏便已对维特的政策表示怀疑^⑥。维特本人也承认：到1903年，俄国在远东花费了10亿卢布（其中百分之四十用于建筑东省铁路）。这10亿卢布“削弱了俄国欧洲部分”，“朝这条路走下去，不论在财政上还是政治上，都是走向破产。”^⑦因此，不仅维特的政敌对他的

① 维特：《不得已的说明》，第73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15页。按：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没有接受这项建议。

② 康托罗维奇：《美国在争夺中国的斗争中》，第146页。

③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07、216页。

④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13-414页。

⑤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215页。按：1904年1月11日，维特失宠后在与日本驻俄公使栗野的谈话中坦率承认，同俄国缔结条约“毫无现实的或实际的价值”；“俄国曾作过一些极为严肃的保证，后来情况变了，随之俄国的政策也变了。这是法则，并将继续成为法则。”“条约或协定只有在力量对比保持平衡时才具有约束力。”（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38页）可见，沙俄从未认真考虑恪守撤军诺言。

⑥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96页；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51-252页。

⑦ 同上书，第43-44页。

“和平”渗透方针不满,而且法国财政界对维特的态度也趋于冷淡^①。

第二,1902年后,俄国在东三省的经济势力虽有较大的发展,但维特利用差别税率和铁路差别运价政策以阻止外国商品输入满洲的计划未能奏效。据英国驻牛庄(营口)领事馆报告,1899—1903年间,经由牛庄(营口)入口的日本、美国和英国的货物,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俄国^②。面对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俄国的“观察家”深感俄国在满洲的“全部事业,至今还带有不牢固的性质”,所以重又提出了由俄国政府和军队保护他们,使“整个满洲为俄国人所有”,“不准”他国人进入满洲的强烈要求^③。这就是说,在与列强的竞争中,落后的俄国经济势力渴望利用政治和军事的力量来弥补其不足。

第三,1902年9月5日,中英签订《续议通商行船条约》^④,使由英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的管辖范围扩展到了东三省(即在东三省将出现担任当地税关职务的英国官员),这对沙俄垄断东三省关税的政策,将是一大打击。

第四,使沙皇政府感到尤其不安的是日本在“满韩问题”上采取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1902年8月4日,日本驻俄公使向俄国外交部提议废除两国有关朝鲜的旧协定,另订新协议,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绝对的“行动自由”,而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只承认俄国在满洲的“铁路利益”^⑤。10月2日,日本内阁根据小村的建议,决定增拨“清韩事业经费”,主要用于敷设贯通朝鲜南北的京(汉城)釜铁路和京义(义州)铁路,并投资设立类似华俄道胜银行的日清银行^⑥。

从英日结盟之日起,日本向北方扩张的野心急剧膨胀,同沙俄较量甚至决裂的胆量也愈来愈大。一方面,它继续坚持独吞朝鲜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许沙俄讲价;另一方面,如果说一年前日本曾考虑按“满韩交换”的条件进行对俄交涉,同意在“满洲问题”上对沙俄做较大的让步,那么现在

①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205页。

②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84页。

③ 纳金:《关东及其过去(1894—1900)》,载《欧洲公报》,第39卷第3期,第740页。转引自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95页。

④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01—114页。

⑤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216页;朴:《俄国与朝鲜》,第182页。

⑥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498—501页。参见今井庄次《日俄战争和对清政策的展开》,载田中直吉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关系的展开》,1961年东京出版,第21—22页。

它已露出了利齿，公开表现出要与沙俄争夺东三省这块肥肉的决心。日、俄在远东的对立加深了。上述事态不仅使撤军与否成为俄国远东政策中的关键性问题，而且和俄国内政问题直接联系起来。

当以维特为代表的“和平”征服方针陷入困境时，以别佐勃拉佐夫为代表的宫廷集团，在尼古拉二世支持下，起而攻击维特，并鼓吹在远东推行强硬政策。

二 冒险主义“新方针”的提出与沙俄毁约拒绝撤军

别佐勃拉佐夫原是退休的五等文官，彼得堡官场的老手。由于善于结交宫廷权贵和王公大臣，很快取得了沙皇的宠信，并形成了以他本人和阿巴扎（海军少将）、马秋宁（原驻朝鲜外交代表）、亚历山大·米海伊洛维奇大公（海军元帅）、普列维（内务大臣）、旺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已退役的近卫军上校）等人为骨干并有沙皇参加的政治派别——宫廷黑帮。他们带有极浓厚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色彩，积极主张实行如下纲领：

第一，在朝鲜攫取各种租让权，建立与日本对抗的军事“屏障”，把夺取满洲与解决朝鲜问题联系起来。他们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开发”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朝鲜北部、鸭绿江和图们江流域的森林资源，图谋依靠俄国在满洲的军事机器和国库的资助，在远东实现巨大的工商利益；同时，在“森林企业”的掩护下，募集转入后备役的军人，将地理位置极端重要的朝鲜北部，建成拥有后方补给线的作战基地，发挥北拱南满、南取朝鲜半岛、兼防日本战略作用^①。为此目的，早在1898年他们就着手以海参崴商人布林涅尔1896年获得的朝鲜境内鸭绿江、图们江沿岸森林开采权为基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样板，组建东亚工业公司（后改名东亚开发公司），并规定“该公司将监管当地事务和俄国整个远东政策”^②，以便“依据俄国皇帝的宏图大略”，在朝鲜实行“俄国原则，甚至灌输俄国思想”^③。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与当时俄国外交界在朝鲜实行的对日妥协政策是不协调的。虽然由于中国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和维特的反对，这一具有政治性质的机构未能成立，但别佐勃拉佐夫等人的活动从未停止。他们不仅取得了鸭绿江森林资源的租让

① 参见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60页。

② 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40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87页。

权,而且试图拥有对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权,并将活动舞台扩大到东三省,夺取维特在当地大力扶植的俄国企业的领导权^①。1902年12月,即第二期撤军期间,尼古拉二世特派别佐勃拉佐夫前往东三省,“去领导朝鲜及满洲的租让事务”^②,随后又电令维特由国库“贷款”200万卢布来推进别佐勃拉佐夫的“私人”企业^③,这无疑是向维特显示沙皇本人实施强硬方针的权力与决心。

第二,确保远东军事优势,反对从满洲撤军。面对日本的挑战和外国资本的竞争,1903年初,别佐勃拉佐夫远东之行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前我们在这个遥远边疆的形势很不妙。问题在于我们花费了20亿卢布以及我们的军队取得了胜利之后,我们竟丧失了威望和自信,自认软弱,作出让步,使自己在经济上也许还在军事上处于失败的边缘”^④;但是,“满洲无论如何应当属于我们”。为此,应当充分利用在满洲的数量可观的军队,而不必考虑“在尊重权利的基础上同中国重建合法关系”。他强调,“坚持要中国方面满足我们在实现军事优势的基础上提出的要求,是惟一正确的方式。”^⑤这样,别佐勃拉佐夫把停止撤军、保持军事优势提到了俄国远东政策的首位,从而使其更富有冒险主义的色彩。

另外,别佐勃拉佐夫等人主张与德国达成反对英国的政治协定,将欧洲的军队东调,这样可不必另增军备开支,就在远东建立起一支殖民军,从而使俄国在远东的事业获得可靠的保障^⑥。1902年8月,尼古拉二世和威廉二世在德国累尔会晤,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尼古拉二世正是在这次会晤时宣称:“巩固和扩大”俄国在远东的影响,是他在位期间的“使命”。^⑦

为实施自己的计划,1903年1—4月,别佐勃拉佐夫在东三省逗留期间,曾与中国奉天地方当局谈判鸭绿江沿岸中国一侧(包括凤凰城和安东两地)

① 参见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66—70页。

② 《库罗巴特金日记》,1902年12月1(14)日;《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12页。

③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99、208页。

④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63页。

⑤ 波克罗夫斯基:《通史》,1905, I, 第579页。转引自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214页。

⑥ [苏俄]中央国家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151页。按:早在1900年8月,别佐勃拉佐夫就曾倡议达成一项以德国为首的旨在反对英国的“欧洲大陆协定”。参见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94页。

⑦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61页。

的森林租让权问题，企图将该江两岸的森林租让企业合为一体^①。同时，他策划在鸭绿江一带“广招兵役，占守林木”，“兼防日本”^②。根据他的请求，阿列克谢耶夫向凤凰城、沙河子派遣了俄国军队^③。4月，俄国人开始在鸭绿江地区采伐木材；5月，“穿便服”的俄国人约60名进入鸭绿江朝鲜一侧的龙岩浦，修建土木工程。

日本人密切注视着沙俄在鸭绿江沿岸的一举一动^④。5月29日，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向政府报告说：“根据俄国目前的行动，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他们在保护森林的借口下，在鸭绿江谷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以便把它的侵略政策扩展到朝鲜”，并“在朝鲜建立反日的基地”^⑤。

以上情况表明，围绕着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方针政策问题，沙俄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为从中做出抉择，彼得堡最高当局从1902年12月至1903年6月曾多次举行会议，反复进行讨论，终于完成了决策的转变。

第一次特别会议是1902年11月9日在雅尔塔举行的，有财政、内务、陆军和外交四大臣参加，着重讨论了向东省铁路附属地继续移入俄国人和限制中国向北满移民的问题。这次会议虽未形成决议，但一致表示“满洲将来必须并入俄国，或完全从属于俄国”；否则，东省铁路地段的俄罗斯化不可能真正实现。在讨论中，维特强调完成这一过程要“自然”，“不能操之过急”；库罗巴特金则认为，“我们越是延缓按俄国的利益解决满洲问题，则今后越是难以解决。”^⑥尼古拉二世在会议记录上批示，他“特别赞成陆军大臣的意见”^⑦。这就是说，俄国不论采取何种方针，一定要尽快实现吞并满洲的

① 清政府和奉天地方当局对此都持反对态度。清政府并在天津设立采伐鸭绿江木材公司以为抵制。最后，别佐勃拉佐夫只获得了盛京将军签发的为期一年的砍伐证。参见《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73卷，第20页；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53—254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70卷，第2页。

③ [苏俄]中央国家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7页。

④ 参见尼什《日俄战争的起源》，第155—156页；朴：《俄国与朝鲜》，第186—187页。

⑤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178号文书。

⑥ 维特：《不得已的说明》，第73—74页。值得指出的是，维特在1903年7月给沙皇的一份奏疏中进一步发挥了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观点。他说：“不论占领关东地区或占领整个满洲，都不是俄国的最终目的。俄国应分得的是中国巨人的大部分。它早晚将成为外来的欧洲人的猎获物。为了占领满洲，最主要的任务是应通过自然的途径，不加速事件的发展，不使其他有关国家过早瓜分中国，剥夺俄国取得中国最珍贵的省份的机会。”参见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338页；参见阿尔莫林斯基编《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21—122页。

⑦ 康托罗维奇：《美国在争夺中国的斗争中》，第146页。

目的。

接着,俄国外交大臣于1903年1月24日在外交部主持召集了当时都在彼得堡的俄国驻华、驻日、驻朝公使会议。会上,雷萨尔认为,俄军继续留驻中国东三省,将引起中国的骚动,并予列强以干涉的口实。因此,他主张如期撤军,但事前必须取得中国政府的某些保证,使俄军撤离后俄国在满洲的“合法”利益不致受到中国或其他大国的侵犯。雷萨尔草拟的中国应予保证的条件有三项:

1. 不改变蒙古的内部体制;
2. 不得用任何形式(如让与、租赁等)把俄军撤出的任何地方转交给任何其他国家;
3. 如中国聘用外国人管理某些行政部门,则中国北方事务应委托俄国人管理。

至于东省铁路的安全保障问题,雷萨尔认为,可由“护路军”负责。会议同意上述意见,并以“初步指令”形式下达驻华代办普兰松(旧译柏林松、柏郎逊)考虑执行。^①

不难看出,按照雷萨尔的意见,撤军后的东三省仍将由沙俄控制,而且“中国北方”即蒙古、华北地区也将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所以,与4月8日撤军条约相比,雷萨尔的方案实质上是以退为进,关于朝鲜问题,会议认为日俄关于朝鲜的协定仍然有效,如需另订新约,亦应视为对现行协定的补充和发展,而目前尚非其时^②。

在上述会议的基础上,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于2月7日主持召开了又一次特别会议。出席者有财政、陆军、海军(代理)各部大臣,外交副大臣和驻华、驻日、驻朝三公使。会议首先讨论俄国同日本的关系。对于1902年8月4日日本的建议,拉姆斯多夫认为,由于“朝鲜对俄国的国家利益必然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俄国政府不能向日本做出它所希望的让步;同时,由于俄国在满洲(包括辽东半岛租借地)的地位有“独立的重要性”,因此也无需与日本就这一问题缔结任何特别协定。但“为了俄国在远东的普遍利益”,顺利解决远东的各种国际问题,应“尽可能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维特认为,日本的要求虽然“过分苛刻”,但这并不排除在俄国可以接受的基

①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70—271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20页注④。

② 补:《俄国与朝鲜》,第182—183页。

础上与日本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条件之一是他曾经提出的“朝鲜海峡的中立”。他说，一旦达成这样的协定，俄国便可以“集中力量进一步加强俄国在远东的威力”。与会者承认，日本武装力量的逐渐加强和英日同盟的成立，已使俄日矛盾尖锐化；但由于俄国军事准备不足，财力有限，在今后数年内应避免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因此，与日本就朝鲜问题缔结协定是可取的。当务之急是制定对朝鲜的坚定政策，以及“各部及其驻各地的代表和代理机构在行动方式上的完全一致”。会议根据拉姆斯多夫的提议，一致赞成暂缓与日本举行谈判，而“等待东京政府重新发起谈判”，以便在谈判桌上“取得最好的结果”^①。

关于满洲问题，会议闭口不谈严格履行撤军条约，却对雷萨尔在前述会议上提出的方案表示同意。在讨论时，库罗巴特金提议增加禁止中国人向东省铁路沿线地段移居的条款，并重申兼并北满或将北满建成像布哈拉那样的保护国的主张。但维特等认为，这种行动方式必将引起中国的强烈反抗和他国的敌意，日本甚至会对朝鲜采取同样的行动。有鉴于此，库罗巴特金又以时值冬令，运输不便为由，建议“最好不要急于撤军”。他提议：

1. 把第二期撤军期限由4月8日延至同年夏季，即在4月8日前只限于撤出盛京省；到夏季再撤出吉林省南部的军队。至于吉林省北部和黑龙江省的撤军问题，则需视南满撤军的结果如何而定，不预定撤出的时间。

2. 要求中国同意在铁路沿线及黑龙江、松花江沿岸留驻一定数量的俄军，作为由北满撤兵的先决条件。

与会者同意将这两点建议补充雷萨尔的“方案”，并决定驻牛庄（营口）的俄军要待中国接受雷萨尔“方案”后才能撤出。^②

在会上，维特已不再坚持自己过去的撤军主张。沙皇迅即批准了会议的决定，从而背弃了4月8日中俄条约。

2月7日会议后，根据业经沙皇批准的库罗巴特金的撤军计划，俄军应于2月中旬起在一个月內从盛京省撤出；吉林省南部地区，应考虑使撤出的俄军能在当年夏季到达阿穆尔沿岸地区^③。从3月8日起，俄军开始从奉天省城等地“陆续撤退”^④，其中一部分返回伯力、双城子、尼布楚等地；一部

① 《红档》杂志1932年第3（总第52）卷，第111—115页。

② 同上书，第115—123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19页注⑧。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66号文书附件。

分应阿列克谢耶夫之请,以“保障安全”为由,移驻旅顺口和辽东半岛其他地方^①。但4月初情况突然变化,驻辽阳、牛庄(营口)、牛家屯、奉天的俄军“去而复返”^②。驻牛庄(营口)的俄国“民政官”也拒绝移交税关和行政事务^③。4月8日后,奉天俄军再度接到撤军命令。然而,到5月初,奉天省城、辽阳、凤凰城、铁岭、牛庄(营口)等地俄军均未尽撤^④。盘踞吉林省的俄军,则直到5月14日“尚无退信”^⑤。

与俄军时撤时停同时,普兰松在俄国外交部“初步指令”的基础上,于3月26日拟定了对华要求草案八条,复经外交、财政、陆军三大臣审议后,由拉姆斯多夫于4月15日急电普兰松执行^⑥。普兰松随即拟就照会,将8条要求并为7条,于4月18日夜即第二期撤军限满后10天递交中国外务部侍郎联芳^⑦。其主要内容是:

1. 由俄国交还的地区,特别是牛庄(营口)和沿辽河一带,不得以让与、租赁、特许或其他方式移让他国;如有此类情事,俄国即视为威胁,将采取最果断之措施,以保护自身之利益。

2. 蒙古现行体制不得更改,否则必将引起极其严重的纷争。

3. 中国政府未经知照俄国,不得在东三省增开商埠、增设领事。

4. 如中国聘用他国人管理某一行政部门,则其权力不得涉及俄国利益占优势的中国北方的事务;在此情况下,其事务应划归另立之部门,并责成俄国人管理,例如蒙古及东三省的矿务,应聘用俄人,他国人不得与闻。

5. 在北京与营口间电线存在期间,俄国将继续管理旅顺至营口、奉天的电线,以供军用。

6. 牛庄(营口)交还中国后,道胜银行照常办理该口海关应办事项。

① 《库罗巴特金日记》,1903年2月16(29)日;《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31页;《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66、817、818号文书。

② 《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66页;《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819、854号文书。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880页。

④ 《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71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53页。

⑤ 同上书,第72页。

⑥ “指令”全文(八条),参见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74—275页。

⑦ 这一照会有俄文正本和中、英文两种副本。俄文照会全文至今未见公布。中文副本有俄国使馆译的和日本外务部根据俄文本译的两种,均《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92—97页;《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134—139页。英文副本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56—58页;伦森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第213—217页。

7. 俄国属民或机构在俄国占领满洲期间所获之一切利权，撤兵之后继续有效，并保留在东省铁路沿线及牛庄（营口）行使卫生，防疫之责^①。

这“七条”的要害是图谋独霸东三省，将蒙古和华北划为俄国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插足。其中第一条排斥在东三省的一切外国承租者和经营者，其垄断意图最为露骨；第三条是针对美、日的，因为这两国正在同中国修订商约，都已提出在东三省开埠、设领的要求（详后）；第四条旨在反对英国，企图把上文提到的1902年中英商约的有关内容一笔勾销，以免在满洲出现英国机构的代理人^②。照会最后说，上述各节，一经复照允准，“俄兵即由盛京省及吉林省撤出，而牛庄地面亦即由俄官交还中国道台管理。”^③这无疑是沙皇政府准备单方面毁弃4月8日撤军协定的信号。

清政府对沙俄的贪得无厌十分反感。4月1日，当普兰松向联芳表示俄国即将向中国提出若干条件时，联芳即指出：“一切条件都已在去年的协定中作了规定，还有什么条件要谈啊！”^④4月12日，俄国外交部预先通知胡惟德，“有数端，拟请中国担保”，外务部闻讯后即电令胡惟德向俄国表示，撤兵事“应照约办理，不应另立文件”^⑤。“七条”正式提出后，清政府立即指出，俄方“于定约之外，另立条款，且要挟太甚，有损主权，断难应允”^⑥。中国驻俄公使随即于22日照会俄国外交部予以拒绝^⑦。

沙俄的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4月27日，上海爱国学社联合寓沪各省绅商共千余人，在张园集会，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力拒俄约。会后成立了中国国民总会和中国学生同盟会等拒俄组织。北京、湖北、安徽、江西、广东、浙江、直隶、江苏、福建、湖南、河南等省学界起而响应，呼吁拒俄。留日学生也于4月29日，在东京集会，倡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并拟派人到国内、南洋以及美洲各国联络。为避免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56—58页。按：关于“七条”的内容及其顺序，虽历来说法不尽一致，但基本内容无甚差异。罗曼诺夫说普兰松照会删去了俄国政府指令第一条“不改变蒙古的内部体制”（《俄国在满洲》，第420页），马洛泽莫夫也沿袭此说（《俄国的远东政策》，第206页）。与普兰松递交的照会中文本、英文本对照，足证此说与事实不符。

②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217页。

③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58页。

④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21页注②。

⑤ 《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67—68页。

⑥ 同上书，第58页。

⑦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册，第260页。参见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21页。

干涉，义勇队不久改名学生军，再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其名虽易，拒俄的宗旨未变。他们的爱国行动，得到国内学界的热烈响应。4月30日，在上海张园集会的学生1200人，即议编义勇队，并与东京取得联系。不久该队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爱国学社入会者近百人，著名爱国者蔡元培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保全中国国土国权”，本是中国人民拒俄的目的^①，但昏庸腐朽的清政府竟斥爱国为“谋反”，下令镇压。这种倒行逆施，促使人民觉醒，逐渐懂得了欲救危亡、必先反清的道理，由爱国走向革命。

中国拒绝“七条”要求后，沙皇政府又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以巩固其在满洲的地位。

在4月26日的一次特别会议上，维特和拉姆斯多夫一致同意库罗巴特金的建议，决定继续占领北满，并将九营装备精良的步兵留驻哈尔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宁古塔、海拉尔、琿春、松花江沿岸及齐齐哈尔至海兰泡的大道上^②。

4月28日，库罗巴特金奉沙皇之命前往远东，名为与阿列克谢耶夫商议将俄军撤出盛京省，实是要运用他在希瓦、布哈拉的经验，“把当地（满洲）的实际权力牢牢地控制在俄国当局手里。”^③

5月13日，库罗巴特金到达哈尔滨，收到尼古拉二世的电令：“不得发出从满洲撤军的任何指示。”^④15日，沙皇又电令阿列克谢耶夫紧闭东三省的门户，“不允许外国势力以任何形式渗入满洲”；为此，必须：

1. “允许俄国企业主在满洲……特别是在政治及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些区域内广泛开展活动”；

2. “不惜花费必要的开支，在最短期限内使我们在远东的战备能和我们的政治经济任务完全相称，从而向公众显示，我们决心捍卫我们在满洲的独占势力。”

这则电报还通知阿列克谢耶夫预先做好改组行政机构的准备，“把负责管理远东各部门的最高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⑤同一天，沙皇任命刚从远

① 《苏报》1903年5月1日。

② 《库罗巴特金日记》，1903年4月14（27）日；《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43页。

③ 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7页。

④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8页；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249—250页。

⑤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09页。

东返回的别佐勃拉佐夫为御前大臣。这一切清楚地表明，尼古拉二世已决定撕毁撤军协定，并依靠别佐勃拉佐夫等人在远东行事了。

随后，沙皇应别佐勃拉佐夫的请求，于5月20日在彼得堡召集御前会议，重新审查鸭绿江森林租让权和远东战备问题。原来，在4月8日即别佐勃拉佐夫回到彼得堡前的一次御前特别会议上曾通过一项决议：拟议中的在鸭绿江地区开发森林资源的公司，必须是纯商业性的；它可由政府支持，但不应有军人参与其事，以免因该企业具有政治军事性质而招致同日本冲突的危险^①。这项决议与别佐勃拉佐夫的计划相悖，5月20日的会议对此作了较大的改动。关于撤军问题，别佐勃拉佐夫的同党沃加克少将在会上声称：同中国签订撤军协定，是俄国对中国的“让步”，履行撤军协定，将产生严重后果；“现在俄国在满洲的处境比1900年前更为险恶”，这将迫使俄国继续做出让步，从而有使我们“长期丧失满洲的危险”。沙皇赞同沃加克的意见，认为“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只有停止让步，才能防止战争^②！维特、拉姆斯多大虽在会上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但并未坚持。这样，在“停止让步”的鼓噪下，尼古拉二世开始在远东实行“新方针”。

所谓新方针，大体包括三项内容：

1. 加强留驻满洲的俄国军队，而不再从那里撤军；
2. “关闭门户”，禁止他国势力进入满洲；
3. 以维护俄国在满洲的军事利益为由插足朝鲜。^③

采取这一方针，表明俄国已改变了实现原定目标的步骤与方法。由于这一转变，俄国已把继续强化对东三省的军事占领、加强远东战备放在各项工作之首，从而在走向战争的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为贯彻上述会议精神，6月16日，别佐勃拉佐夫又奉命前往远东召集旅顺口会议。会议从7月1日起开了10天。与会者除库罗巴特金、阿列克谢耶夫和驻华、驻日、驻朝三国公使外，还有道胜银行及东省铁路公司等单位的代表。

关于撤军问题，会议重申必须以中国满足俄国的新要求为前提。由于原拟的“七条”已被中国拒绝，库罗巴特金在会上提出了一份共有17项条件

① 《库罗巴特金日记》，1903年4月10（23）日；《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40页；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81页。

②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13—14页。

③ 同上书，第15页。

的新草案,其中包括中国不得在满洲拥有军队,中国无权在满洲雇用外国教官,俄国有权在东省铁路附属地段拥有军队,俄国有权在松花江沿岸、黑龙江沿岸、东省铁路沿线设置哨所,等等^①。由于雷萨尔表示异议,上述要求被缩减为十条^②,删去了关于东三省不得开埠、设领和俄国臣民有获得工业租让权的优先权等项条件,以免过分刺激日、美等国。

会议强调,上述要求一旦遭到拒绝,应立即向中国声明,撤军条约“无法履行”,“我们(俄国)认为自己有权酌情决定满洲未来的命运。”^③为加强战备,会议要求:

1. 将满洲的军事占领再延长3年;

2. 在东省铁路部署一个正规军团,其大部分集中在南满地区;将外阿穆尔边防军军分区改编为野战军团,从而使满洲境内拥有两个军团;在旅大租借地组建一个特别军,并拨款250万卢布加强旅顺口要塞。^④

关于鸭绿江林业公司性质问题,会议认为为使日本找不到指责的理由,应立即采取措施,从企业中撤出现役军官,改由预备役军官或非公职人员主持其事。

旅顺口会议并不是决策会议。会议关于军事方面的全部设想,均获沙皇批准,并立即付诸实施。有关对华要求“十条”,经8月14日财政、外交、陆军三大臣讨论,缩减为五条:

1. 不得将退还的领土让与外国人;

2. 俄国有权沿松花江右岸设立哨所;

3. 在齐齐哈尔——海兰泡官道上设立哨所;

4. 他国人不得经管中国北方事务;

5. 保护东省铁路的商业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俄国将满洲归还中国,俄军于一年内分三批自盛京、吉林、黑龙江各地撤往东省铁路地段(但仍需占领珲春)。

关于朝鲜问题,会议建议维持原有结论,即应使鸭绿江森林企业具有纯商业性质。这是维特为适应沙皇的“新方针”而做出的最后一次努力。对于上述意见,尼古拉二世批示说,在做出有关的决定前,需听取远东总督的

① 维特:《不得已的说明》,第79—80页。

② “十条”全文见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306—307页。

③ 维特:《不得已的说明》,第81页。

④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30—32页;维特:《不得已的说明》,第81页。

“最后意见”。^①

远东总督府是沙皇为加强专制政体，防止“政出多门”，采纳别佐勃拉佐夫的建议，于8月12日下令设立的。已擢升为海军上将的阿列克谢耶夫被任命为远东总督，统辖外贝加尔湖以东包括阿穆尔、滨海、堪察加、库页岛等地区在内的俄国远东全域以及旅大租借地和东省铁路附属地的军政大权，并负责处理该地区与邻国的外交事务。总督隶属于由尼古拉二世任主席、普列维任副主席的远东特别委员会，不受中央各部节制。远东总督府是参照19世纪40年代俄国在高加索设官治理的成例办理的，“说明满洲问题是按照占领地状态予以解决的。”^②这一机构的设置标志着财政、外交、陆军三大臣对俄国远东地区的涉外工作和“防务”问题，已无指导之权，而改由远东总督专司其事。接着，维特于8月29日被免去财政大臣职务，改任毫无实权的大臣委员会主席。至此，沙皇政府内部干扰“新方针”的阻力也被排除了。

三 俄美关于东三省的秘密交涉，俄军重占奉天

从4月间沙俄悍然向中国提出“七条”要求，到8月间设立远东总督府，免除维特财政大臣的职务，这一系列的行动，引起了国际间的强烈反响。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于4月21日从庆亲王奕劻处首先探悉“七条”内容^③，随即转告英国驻华代办燕纳里和美国驻华公使康格^④。因“非经俄国同意，不得在满洲开埠”等项要求与美国鼓吹的“门户开放”政策大相径庭，康格得讯后不待获得“七条”全文，即于4月23日电告美国国务院。这时，美国政府援引《辛丑条约》第十一款的规定，已开始同中国政府谈判修改中美商约，并已将草案通知俄国驻美大使喀西尼，草案要求开辟奉天与

①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33—34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41页。

② 《关东报》，1903年7月3日译。转引自《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278—279页。参见《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73卷，第21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68号文书。按：据《日本外交文书》，4月19日即普兰松向联芳递交“七条”要求的次日，外务部日文秘书陶大均即将此消息密报日使馆。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70号文书；《英国议公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54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53—54页。

大东沟(后改为安东)为商埠^①。因此,海约翰认为俄国的“七条”是对美国的公开挑衅,率先于25日电令驻彼得堡大使麦考密克向俄国外交部抗议,指出俄国要求东三省不得开埠、设领以及不准俄国以外的各国人在该地区从事商业活动这两项,“与中美草约所拟内容不符”,“危害美国合法利益”^②。同日,他授权康格向清政府阐述美国关于“满洲开放条约口岸和设置领事馆”的主张,要求中国拒绝俄国的排他性条款^③。

这时,英国准备追随美国,共同维护两国在华利益。4月28日,外交大臣兰斯敦指示驻俄大使斯科特支持美国政府业已提出的意见,并且在同俄国政府的交涉中“使用和美国大使相同的词令”^④。同日,他授权驻美大使赫伯特向美国政府表示,英国愿按美国提出的“在华工商机会均等”、“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的原则行事,要求中国政府履行与英、美两国有关的条约义务,并望美国政府把它采取的每一行动通知英国^⑤。对此,海约翰欣然表示同意。与此同时,英、日两国彼此协商在远东对俄采取一致态度:

1. 两国将像1901—1902年中俄谈判期间那样,“支持”中国反对俄国的要求;

2. 力劝中国政府像在“次要之点”上让步,以免被迫向俄国做出“更重大的让步”。日本外相小村并保证如在满洲问题上采取新的步骤,必先通知自己的盟国。^⑥

沙皇政府对美国的抗议,采取回避态度。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在4月28日回答麦考密克就“七条”所提质问时,甚至故作惊讶,矢口否认,说什么“俄国无意排斥其他各国在满洲所享有的权利……也不会有关闭已开放的门户或妨碍美国商务的举动”,并暗示“这(‘七条’)必定是中国挑唆列强相互倾轧的外交狡计”^⑦。同日,俄国驻华盛顿大使喀西尼在答复海约翰的提问

① 康托罗维奇:《美国在争夺中国的斗争中》,第150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56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708—709页。

③ 同上书,第54页。

④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58页。

⑤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00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90号文书。

⑥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55、57页。

⑦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54、709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63—64页。

时，也“装作一无所知”，尽管在谈到具体问题时，他细致入微，使海约翰觉得，这“七条”要求，“仿佛就是他起草的”^①。第二天，彼得堡的《新时报》也说所谓“七条”，无非是外国新闻机构的“虚构”和“异想天开的谣言”^②。因此，一时间驻俄“各使中有疑报传七条为不确者”^③。足见沙俄外交手段的卑劣。

这样，“七条”的提出，一方面促使利害相关的美、日、英形成了共同对俄的阵线；另一方面又使清政府不得不同时应付来自沙俄和美、日、英三国的压力，其处境十分艰难。

如前所述，清政府于4月22日即已拒绝了俄国的“七条”。但沙皇政府并不由此罢休。4月29日，普兰松将“七条”缩减成三条，要求奕劻接受：

1. 不得把交回的辽河流域转让任何别的国家；
2. 不准他国在东三省开埠、设领；
3. 蒙古的政体不得变更。

他宣称，一旦中国允准，“俄国军方将得到宽慰”，满洲的撤军因“必要的准备业已就绪”而会毫不拖延地进行！奕劻以这些要求有损中国主权，当即予以拒绝^④。5月27日，普兰松蛮横地再次对奕劻说，中国在允许他国派驻领事和增开商埠之前，必须先与俄国政府商洽；否则，将被认为是对俄国的严重挑衅^⑤。普兰松的行动无疑也是向美国挑战。

康格由此感到，美国增开商埠的要求，已成为俄国不同意撤军的借口，而只有在俄国撤军以后，中国政府才有进一步开放满洲港口的可能；在此以前，它对美国将不敢有所允诺。有鉴于此，海约翰于5月18日命康格要求清政府以书面形式说明其不能承允美国所求的理由；同时令康格通知俄国驻华代办，俄国政府已声明不反对美国关于在满洲开埠、设领的要求，并劝其与中国政府就此事进行“合作”^⑥。5月29日，雷萨尔返回北京任所；6月9

① 瓦格：《门户开放外交家柔克义传》，第52页。

② 转引自《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107—108页。参见《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64—65页。

③ 《驻俄公使胡惟德致外务部电》，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五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70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117页；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02—203页。

⑤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58页。

⑥ 同上书，第60页。

日即向康格表示,“俄国政府并不反对开放(满洲)港口”,但又说在得到彼得堡的指令前,他不能向中国作出明确的声明^①。为此,美国又向俄国外交部提出质问。6月13日,拉姆斯多大答复美国代办说,只要康格向雷萨尔说明美国要求开埠的具体地点,他将授权雷萨尔给美国驻华公使有利的答复,并将俄国的这一态度通知中国政府。6月16日,康格遂奉命将美国要求中国开放奉天、大东沟和哈尔滨一事通知雷萨尔,并要求他将俄国的态度向中国政府坦率说明^②。但雷萨尔却说,他已得到指示,有关的交涉需在华盛顿进行,此刻他“不能就俄国的态度向中国政府或任何人作任何说明”^③。海约翰认为美国在数周前即已把美国的上述要求通知俄国外交部,拉姆斯多大和喀西尼都曾表示欢迎美国发展在满洲的贸易,现在竟出尔反尔,令人费解^④。其实,沙俄根本不愿开放满洲。雷萨尔返任后,清政府曾多次要求俄国践约撤军,并将“不能照允”俄国所提条件的理由一一开列,照会俄使,但遭到雷萨尔拒绝^⑤,这便是绝好的证明。

清政府切望早日收回东三省,同时担心正在访问日本的库罗巴特金可能与日方做出牺牲中国的安排,因此愿意稍做让步。6月10日,奕劻向雷萨尔表示:待牛庄(营口)交还后,牛庄(营口)海关税款存入道胜银行和设置检疫所问题,可以酌办,其他要求则不予考虑^⑥。日本公使从英国代办处闻讯后,担心中俄签订密约,立即警告清政府,不得允许俄国干预中国海关事务;否则,其他国家也将援例,“瓜分中国将从分割领土开始,而将从分别夺取各口海关开始”^⑦!奕劻无奈,只得向内田保证,在同日本政府商议以前,决不接受俄国有关东三省的要求。

沙俄拒绝向其他国家开放东三省,同样使俄、美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6月18日,海约翰通过与喀西尼的交涉,确信俄国政府已“不可思议”

① 扎布里斯基:《美国和俄国在远东的竞争》,第91页。按:6月4日,俄国驻美大使向海约翰保证说,他的政府“不反对开放(满洲的)口岸”。参见《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74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54页。

③ 同上书,第65、71页。

④ 扎布里斯基:《美国和俄国在远东的竞争》,第92页。

⑤ 《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74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615页;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05页。

⑥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208、238号文书;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05页。

⑦ 同上书,第245页。

地“完全改变”了原先对美国要求所持的态度，随即以美国将同英、日两国联合行动相威胁。喀西尼感到事态严重，当即电告拉姆斯多夫，指出这可能是“美国方面就美、英、日直接协约所作的最严重的决定”；拒绝美国对满洲的贸易要求，“不仅会招致（美国）政府而且会激起美国舆论起来反对我们”^①。恰在这时，俄国比萨拉比亚省省会基什尼奥夫市发生大规模迫害犹太人事件，美国国务卿应本国境内犹太人之请，就这一问题向俄使表示抗议。与此同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公开表示，美、日、英三国将共同行动。

7月2日，他通过代理国务卿向俄国发出了抗议书^②。面对上述形势，沙皇政府不得不“对美国忍气吞声”^③。在7月6日旅顺口会议上，根据雷萨尔的提议，决定电告拉姆斯多夫：必须立即“通知各国，俄国无意反对中国根据贸易发展情况在满洲开放若干通商城市，但不得有租借地”；至于哈尔滨，因它位于东省铁路租借地内，也不在开放之列^④。据此，拉姆斯多夫于7月11日在彼得堡发表了声明。14日，喀西尼又将上述炮容通知美国国务院，海约翰当即转告康格。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旅顺口会议决定将库罗巴特金对华要求十七条中“东三省不得开埠设领”一项删去的重要原因。

在美国提出开放奉天和大东沟通商之初，清政府既害嫉激怒沙俄，影响撤军；又担心各国援例，难以应付，因此迟迟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⑤。美国政腐接得上述俄国外交部声明后，立即向清政府施加压力。7月20日，康格将这一声明的内容转告奕劻，并说“中国已没有延不允诺美国要求的任何理由”。奕劻于是答应以秘密换文规定，待俄国撤军、东北地方政权全部归还中国后，在东三省为美国开放二三个商埠，并望康格勿将此意外泄。但康格迫不及待，于次日即向内田报讯^⑥。同时，美国政府坚持要把增开商埠的内容写进公开的条约。

① 康托罗维奇：《美国在争夺中国的斗争中》，第151页。参见丹尼斯《美国外交的冒险（1896-1906）》，第377-380页。

② 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第227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712页。

③ 康托罗维奇：《美国在争夺中国的斗争中》，第151页。

④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31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70卷，第19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58页。

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68-69页；《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307-308页。

8月12日,康格致书奕劻,限三天内以书面形式许诺美国要求,否则,由此引起的后果,将由中国全部承担。奕劻被迫接受了上述要求,并同意中美商约待俄国第三期撤军到期之日即10月8日签字^①。美国的这一外交胜利,对正在与清政府谈判续订商约的日本政府,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在中日交涉过程中,日本与美国采取一致步调,驻华盛顿公使高平与柔克义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外相小村甚至严令内田:“务使日清通商条约与美清条约同时签署”^②,最后和美国取得了相同的结果。

10月8日,中美《通商行船续约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在上海分别签订^③,内规定开放奉天(美、日)、安东(美)和大东沟(日)为商埠。美国和日本为反对俄国独霸中国东三省,终于取得了条约上的根据,初步实现了垂涎已久的目的。这两个条约实质上是1902年9月中英商约的补充;由于“最惠国条款”的存在,它进一步密切了日本与美国、英国在远东合作的关系,这是对沙俄远东政策的一个打击。

然而,沙俄对华的立场依然如故,中俄交涉的形势亦未因之改观。旅顺口会议后,雷萨尔软硬兼施,一面向英国驻华代办扬言:“中国如不照俄国目前的要求办理,将吃大亏。”^④一面又对联芳说:“为了给他本人一点面子,中国总得做点让步。”^⑤9月6日,他又受权向清政府提出五条要求作为撤军的条件,其中保留了上述8月14日俄国三大臣会议通过的五条要求中的前三条和第五条,并将原第二、第三条合为一项,删去了不许他国人经营中国北方事务的原第四条,另增加了由中国军队保护道胜银行和牛庄检疫所聘俄医一人常驻两项^⑥。

奕劻认为,这些条件颇为“温和”,9月8日向内田表示准备对俄让步^⑦。内田说:日俄谈判即将在彼得堡举行,中国不要急于与俄国达成协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71—74页。

②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第218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81—200页。按:中日《通商行船续约》汉文本的签字日期实际上是10月9日。汉文约本作10月8日,那是倒填日期。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308—309页。按:雷萨尔于7月14日自旅顺口返回北京任所。

⑤ 同上书,第292页。

⑥ 《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01—103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42页注②。

⑦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353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86—87页。

议^①。小村获悉后又电令内田警告奕劻：日本政府认为俄国的要求“损害中国主权，并藐视其他各国因约已享权利”，望中国政府“万勿允许”；如若不听“劝阻”，按俄国所索达成协议，其后果将由中国自负^②。英使萨道义也“劝”奕劻在涉及他国的条约权利时，行动要“谨慎”，“勿作让步”^③。于是，奕劻于9月24日通知雷萨尔：只有待俄军撤出东三省后，中国政府才能与之商谈俄方的“任何合理要求”^④。俄国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见清廷不从，便报请沙皇同意，于10月3日宣布中断同中国的谈判^⑤。10月8日，即撤军期满之日，阿列克谢耶夫在旅顺举行了挑衅性武装示威^⑥。接着俄军三营（一说400名或1000名）于28日重新占领了奉天省城^⑦，北京、奉天间的一切电讯随之均遭阻断^⑧。10月30日，清外务部电驻俄公使胡惟德要求俄方先将侵占奉天省的军队撤退，但并无结果^⑨。12月23日，雷萨尔通知联芳，因日本欲进入朝鲜，已构成对东省铁路的严重威胁，俄军现不能撤离满洲^⑩。沙俄终于撕下撤军假面具，公开表示赖在东三省不走了。

这时，日、俄为划分两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正在进行紧张的交涉。沙俄企图通过谈判使日本承认其在满洲的绝对势力，然后同中国达成一项更有利的协议。日本方面则为了同样利己的目的，于10月16日通知奕劻说，日、俄正在就满洲问题进行谈判，中国对俄采取任何行动，应随时告知日本^⑪。11月6日，清政府御前会议决定，俄国提出的任何要求概不允准，一切待日俄谈判有结果时再议^⑫。这样，促俄撤兵的中俄交涉，遂被日俄划分势力范围的谈判所代替。

① 伦森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第229—230页。

② 《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11页。

③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87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393—394页；《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88页。

⑤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47页。

⑥ 尼什：《日俄战争的起源》，第183页。

⑦ 《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79页；《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413—414页；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242—245页。

⑧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420页。

⑨ 《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79—80页。

⑩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393号文书。

⑪ 同上书，第403页。

⑫ 张之洞、袁世凯首将其事密告内田。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424页。



日俄战争前盘踞中国辽南的俄军
(采自普特南·魏尔《满洲人和俄国人》)

第五节 日俄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俄斗争

一 日俄谈判和日俄开战

1903年7月下旬至1904年2月初,历时半年余的日俄谈判,是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奏。沙俄妄图独占东三省,日本积极推行大陆政策,双方相持不下,是导致这次谈判最终破裂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沙俄拒绝撤军,引起了英、美等国的不满;野心勃勃、决意吞并朝鲜并插足中国东三省的日本,反应尤为强烈。4月21日,即沙俄向中国提出“七条”要求后的第三天,日本元老和军政各界首脑人物伊藤、山县、桂、小村等在京都的山县别墅无邻庵举行秘密会谈,商定了四项对俄方针,决心利用“满洲问题”迫使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地位,“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并表示为此将“不惜使用武力”^①。

27日,小村打出“安全防卫”的旗号,对英使窦纳乐说:“俄国永久占领满洲,意味着俄国将永远占领朝鲜”,从而势必“构成对日本生存的威

① 德富猪一郎编:《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第538—542页;《公爵桂太郎传》,坤卷,1917年东京出版,第119—120页;转引自大畑笃四郎《日俄开战外交》,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日俄战争》,第111页。

胁”，日本对此不能保持沉默^①。

日本军方普遍主战；总参谋部甚至得出结论：由于俄国拒不撤军，对俄战争必不可免，早开战比晚开战于日本更有利，政府应立即做出最后决断^②。

5月，总参谋长大山岩向天皇奏陈《关于朝鲜问题之意见书》，进一步强调目前正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惟一良机；日本军备现在能与俄国对抗，越往后，形势越可能逆转，所以，外交谈判也将无望^③。在官方的操纵和影响下，日本舆论界纷纷散播“对俄强硬”论，军国主义气氛弥漫全国。受日本浪人团体黑龙会和玄洋社支持的“对外强硬同志会”（8月9日，即日俄谈判开始前三天，该会改称“对俄同志会”），以及东京帝国大学所谓“开战七博士”，要求日本政府实行对俄“强硬外交”，煽动战争不遗余力^④。

日本政府决定采取主动。6月23日，元老及内阁举行御前会议，一致认为：日本对华有南进福建、北进朝鲜两途；由于俄占满洲已成事实，“朝鲜问题”的解决已成当前急务，否则日本将丧失在朝鲜的地位，且将危及帝国自身的“安全”。为日本的利益计，对俄交涉势在必行。会议为此决定开始对俄谈判，并在无邻庵会议协商的基础上议定了《日俄协商纲要》八条，作为谈判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是：

1. 互相尊重中朝两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保持各国在该两国工商业的机会均等。

2. 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铁路方面有特殊利益。

3. 两国不得干涉日本在朝鲜、俄国在满洲各自开展的工商业活动。

4. 俄国不阻挠朝鲜铁路延伸至满洲南部，与东省铁路、营榆铁路相接。

5. 为维护上述第二项规定的权利并平息可能引起国际纠纷的暴乱，日本可出兵朝鲜，俄国可出兵满洲，事毕撤兵。

6. 日本有帮助朝鲜“改善行政及军务”的专权。

会议预感到俄国不会轻易接受上述要求，因此强调：“一旦提出建议，

①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199页。

② 冈本俊平：《日本寡头政治和日俄战争》，1970年纽约出版，第71页；尼什：《日俄战争的起源》，第157页。

③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216页。

④ 参见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第206-207页；曾村保信：《近代史研究——日本与中国》，1962年东京出版，第80页。

即须排除万难,坚决贯彻”^①。“纲要”表明,日本要求在朝鲜获得行动自由权,并伸手东三省,而俄国在东三省的特权则仅限于铁路方面。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云云,意思是俄国必须严格履行撤兵义务,尊重他国(其中包括日本)在东北的“条约权利”,不得实行兼并,从而为日本开放东三省的大门!日本驻华公使内田曾向英使萨道义承认:“日本是为着满洲发起这次谈判的。”^②这与前年冬伊藤在彼得堡鼓吹的日俄妥协、“满韩交换”的方针大不相同,说明日本政府已把谈判的重点由“朝鲜问题”转移到“满洲问题”上了^③。

7月3日、13日,日本驻英公使林董先后将上述谈判意图和主要条款通知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指出俄国如拒绝日本提议,就要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负责。他援引英日同盟条约,建议两国就共同利益受俄国威胁一事交换意见,并希望英国政府赞同日本预定的行动方式^④。16日,英国内阁正式表示同意。接着,小村于28日训令驻俄公使栗野向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提议两国举行直接谈判,以期“划定两国于远东各自之特殊利益”(意即会谈内容不限于朝鲜问题)^⑤。经俄方同意,8月12日栗野受权向拉姆斯多夫提出了日本政府依据前述《协商纲要》拟就的协定草案六款^⑥,并要求从速开始谈判。

栗野递交日本提案之日,正是俄国宣布任命阿列克谢耶夫为远东总督之时。俄国此举等于宣告满洲将归俄有,日本休想染指。这是沙俄侵略性剧增、加速战争准备的征兆。8月23日,拉姆斯多夫又以他即将陪同沙皇出访欧洲(尼古拉二世于9月10日出发,11月18日返回)、不能与栗野保持联系为由,要求将谈判移至东京进行,并由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和驻日俄使罗森主持其事。尽管这一建议无异“把日本置于和布哈拉同等的地位”^⑦,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1—4页。

② 伦森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第243页。

③ 日本学者也指出,日本政府认为,只要东三省的局面不打开,不仅朝鲜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且日本的扩张欲望也得不到最后满足。所以,“问题的焦点无论如何是在满洲”。参见田中直吉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关系的展开》,第26页。

④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06—209页;伦森编:《处于俄日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萨道义述评》,第221—223页。

⑤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8页。

⑥ 草案全文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12—13页。

⑦ 维特语。参见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辞》,第351页。

“对日本来说不能不认为是一种侮辱”^①，但小村经过反复交涉，并与英国协商后，仍于9月7日表示同意。沙俄对日本采取这种轻慢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它估计日本不敢首先发动进攻，另一方面是为了拖延时间，赶修西伯利亚大铁道，以利加强远东战备。

8月下旬，俄方在彼得堡着手起草复文。由于沙皇（正在国外）、外交大臣（在彼得堡）、阿列克谢耶夫（在旅顺）、罗森（在东京）各处一方，公文辗转往返耗时，意见不易集中，俄国对案八款迟至10月3日才由罗森交给日方。其要点是：

1. 互相尊重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2. 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利益，在不违背前款的情况下，日本有权帮助朝鲜“改良民政”；
3. 俄国不妨碍日本在朝鲜的工商企业，不反对日本为保护该企业所采取的措施；
4. 日本为维护前款规定的本国工商利益，得派兵至朝鲜，事毕撤回；
5. 双方约定，不把朝鲜领土的任何部分用于战略目的，不在朝鲜修筑可能威胁朝鲜海峡通航自由的军事设施；
6. 北纬39°以北的朝鲜领土为中立地带，双方军队均不得进驻；
7. 日本承认满洲及其沿岸均在日本利益范围之外。^②

“对案”初稿原拟接受日方提案第一款，但沙皇在审阅时删去了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内容，这表示谈判的范围只限于朝鲜问题，不涉及中国东三省^③。“对案”不同意两国在满洲实施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意在由俄国实行垄断，排斥其他外国竞争者。关于“战略目的”和“中立地带”的限制性条款，是阿列克谢耶夫和罗森在旅顺补充的，完全针对着日本^④。可见，这个只涉及朝鲜问题的“对案”，实质上是要日本承认：满洲应由俄国独占，日本不得过问；而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则必须加以限制，以利俄国渗透，并防止日本把朝鲜变成它北进的基地。诚如当时一位美国记者评论所

①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92页。当时日本政界因俄国把日本“当作一个殖民地或二等的、从属的、不具有正常外交权利的国家对待”而感到愤怒。参见尼什《日俄战争的起源》，第185页。

②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159—160页；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第164页。

③ 《库罗巴特金日记》，1903年12月15（28）日；《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95—96页。

④ 参见浅川《日俄纷争》，第309—310页。

说,俄国的草案提出了“犹如一个大国给它的附庸——一个胆大妄为不服管束的附庸一样的条件”^①。连库罗巴特金也指责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的对日要求过苛,“好象他们(日本人)已经战败一样”^②。

显然,双方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日本不满足于独占朝鲜,俄国也不满足于独占满洲”^③,争夺的焦点是满洲。双方的观点很难有调和的余地,这就决定了谈判的前途和结局。谈判开始后,沙俄继续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于9月6日提出“五条”要求(译上文),同时在朝鲜开辟新的侵略据点,秘密派遣军事人员潜入龙岩浦,着手把这里建成军事基地;日本则在英、美两国的支持下,通过10月8日续订中日商约,在俄国视为禁脔的满洲取得了立足点。这也表明,日俄谈判不论出现什么局面,对中朝两国都意味着新的浩劫。

10月30日,小村将日本的第二次建议案交给罗森,除再次要求尊重中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承认日本在朝鲜有特殊利益并有权遣军入朝外,表示同意设立中立地带,但以中朝边界两侧各50公里为限;对于俄方提出的不得把朝鲜领土用于战略目的这一基本条款,则未予理睬。关于满洲问题,日方提议:

1. 日本承认满洲不属于日本特殊利益范围之内;俄国承认朝鲜不属于俄国特殊利益范围之内。

2. 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有特殊利益(即不限于铁路方面),并承认俄国有权采取保护这些利益的必要措施。

3. 日本不干涉因俄朝条约而属于俄国的商业权、居住权及其他特权;俄国不干涉因中日条约而属于日本的商业权、居住权和其他特权。

同时,日本约定不在朝鲜沿岸建立军事设施,以免妨碍朝鲜海峡的通航自由。关于满韩铁路问题,提案改为:两国相约,在朝鲜铁路和东省铁路延伸至鸭绿江时,不妨碍其连接,^④暗示它已放弃了将朝鲜铁路延伸至南满的要求。与第一次建议案相比,日方对俄方在满洲问题上确实有所让步,但这

① 麦考密克:《俄国在亚洲太平洋的悲剧》,第2卷,第231页。

② 《库罗巴特金日记》,1903年11月24日(12月7日),《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85页。

③ 李:《欧洲的关键年代》,1974年美国出版,第86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27—28页;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65—167页。

已是让步的“极限”了^①。

这时，日本的盟国英国，为对付迅速崛起的德国，正就成立英法协约一事与俄国的盟国法国进行谈判。英俄之间就划分两国在中亚与中东的势力范围举行谈判一事，正在酝酿。日本做出愿与俄国妥协的上述姿态，与这一形势不无关系。但沙俄的态度依然如故。由于故意延宕，由阿列克谢耶夫和罗森草拟、经尼古拉二世同意的俄国第二个对案，于12月12日即时隔40天后才由罗森递交小村。“对案”全文只谈朝鲜，并重申了北纬39°以北设中立地带和不把朝鲜领土用于战略目的的条款^②。俄方对日方关于满洲问题的提议只字未提，“仿佛它从未收到过日本第二次建议似的。”^③这与日本的谈判宗旨大异其趣。日本当局确信拖延只会使俄国在军事上得到好处，在征得英国外交部的同意后，于当月21日复照俄国，断然拒绝俄方关于“中立地带”和“战略目的”等条款，要求把“同两个帝国均有利害关系的远东一切地区”（意即除朝鲜外，还有满洲），全部纳入协议之中；小村并面告罗森，两国提案“在谈判涉及的地理范围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希望俄国政府“重新考虑它对这个问题的态度”^④。23日，栗野威肋拉姆斯多夫说：“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就会产生严重困难，甚至不可收拾。”^⑤

为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日本这时虽未立即中断谈判，但“已大体做出对俄开战的准备”^⑥。12月16日，日本政府和元老会议决定对俄宣战，其后继续进行外交谈判，只是为了赢得加强战备的时间^⑦。28日，日本内阁就国策和战备问题进行讨论，内包括改组军事机构、完成京（汉城）釜铁路、筹措战费、台湾的战争动员、在伦敦订购两艘巡洋舰等事项。30日，通过了《对俄交涉破裂时日本应采取的对清对韩方针》，要求中国保持“中立”（详后）^⑧。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活动也转向战争准备：12月24日，日本内阁决定向英国请求贷款；29日，驻英公使林董询问兰斯敦，在日俄谈判破裂时，日本能期望英国

① 浅川一卫：《日俄纷争》，第324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36页。

③ 浅川一卫：《日俄纷争》，第329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36—38页。

⑤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251页。

⑥ 田中直吉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关系的展开》，第26—28页。

⑦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218页。

⑧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42—45页。

采取何种“善意的中立”，是否同意让日本舰队使用英国的加煤站^①；31日，正式向英国政府提出，“在日俄冲突不可避免时，希望在开战前得到英国的财政援助。”^②稍后，林董又询问兰斯敦，如果俄国黑海舰队试图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前往远东，英国将采取什么步骤^③，并一再表示日本无意接受调停^④。日本驻华盛顿公使向美国政府也表示了本国誓与俄国对抗的决心^⑤。日俄关系陷入危机，国际舆论对此普遍表示关注。

为了答复日本第三次提案，12月28日沙皇在皇村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究竟是对日“冒险作战还是继续让步”问题。海、陆军和外交等部大臣以及远东特别委员会的阿巴扎出席了会议。库罗巴特金在会上主张继续谈判，因为铁路方面准备不够，兵员给养都有问题，对日作战将冒极大危险。他认为北纬39°以北设中立地带和朝鲜海峡不设防这两条对日要求极为重要，不应放弃，并反复表示俄国“为北满而战是值得的”，为南满和朝鲜而战是不值得的。拉姆斯多夫赞同继续谈判，并主张把满洲问题列入议案。阿巴扎根据“让步恰恰导致战争”的一贯立场，主张立即中止谈判，并相信不会因此和日本开战，“因为俄国不愿战争，日本却害怕战争。”会议采纳拉姆斯多夫的意见。这个决定大体上符合尼古拉二世在会议开始时表示的意见，即“无疑战争是不合乎需要的。时间是俄国最好的盟友。每年都会使我们得到加强。”^⑥这就是说，沙俄决定继续采取拖延的策略，以利备战。沙皇本人就曾表示，谈判“最好拖到俄国本身能开战的时候”^⑦；库罗巴特金也承认，俄方“故意拖延，好有时间准备战争”^⑧。情况确实如此。俄国一直在有计划地加强远东的陆军和海军。1903年10月以后，每月调往远东的陆军已由原来的

①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27—288页；尼什：《英日同盟史》，第277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46页。

③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33页；蒙格：《孤立的终止：1900—1907年的英国对外政策》，1963年伦敦出版，第133—154页。

④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29—230、236页；尼什：《英日同盟史》，第280页。

⑤ 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118页。

⑥ 《库罗巴特金日记》，1903年12月15（28）日；《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95—97页。

⑦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95页。

⑧ 《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85页。

3000人增至7000人^①；在海上，太平洋舰队也得到了增援^②。可见，沙俄并非不想使用武力，问题在于选择开战的时机^③。

根据上述会议的决议，罗森于1904年1月6日递交日本的第三次修正案规定：如日本同意接受双方不把朝鲜领土用于战略目的和关于北纬39°以北为中立地带的两项条款，并承认满洲及其沿海地区不属于日本利益范围，则俄国在满洲不妨碍日本及其他国家享有根据现行条约从中国获得的权利和特权，“但建立租界的权利除外。”^④提案仍然只字未提“保全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为消除其他列强的怀疑，孤立日本，1月8日沙皇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俄国无意阻碍各国行使它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⑤。

1月12日，日本元老和内阁举行御前会议，研究俄方最新提案。陆海军负责人也应邀出席。外相小村认为，俄国政府拒绝考虑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则所允其他各款将无着落；“俄国若果并吞满洲，与中国有约各国在满洲所享之权利亦即消灭”；限制设立租界一节，即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颇有窒碍”^⑥，因此日俄再无进行谈判的理由。会议通过了《关于日俄谈判满韩问题的帝国最后提案》，并决定：“必须中断谈判……立即采取必要的自卫手段。”^⑦次日，小村电令栗野将上述最后提案递交俄国当局，一面拒绝俄国关于在朝鲜设立中立地带等两项要求，亦即否定了俄方为讨论满洲问题提出的先决条件，一面要求俄国“尊重中国在满洲的领土完整”，承认各国在满洲的条约权利。“最后提案”声明：“继续拖延解决问题，对两国都极为不利。”^⑧栗野甚至私下向维特表示，如俄国在数日内不给予答复，战争就会爆发^⑨。这就是说，日本的这一提案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虽然它没有规定期限。

接着，日本加强临战准备：1月22日公布了“海面防御令”，限止外国船只进入日本港口和某些特定的海域；25日，公布“铁道军用令”，并制定

①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240页。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245页。

③ 早在1903年4月8日，库罗巴特金就曾在一次御前特别会议上说过，“如果和日本非打不可（看来这是必然的），那就最好在我们对战争做好准备时开战，而且由我们自己选择开战的时间。”参见〔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48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7卷第1册，第13页。

⑤ 《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2号（1904年），第97-98页。

⑥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76页。

⑦ 《日本外交文书》，第37卷第1册，第31页。

⑧ 同上书，第32-34页。

⑨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261页。

了派遣陆军前往汉城的计划,开始在南朝鲜征集物资^①。这时,美国政府已通知日本政府,一旦日俄开战,“美国的政策将有利于日本”^②;英国表示将履行其盟约义务,并说英将不允许俄国舰队通过土耳其海峡,前往远东参战^③;德国表示将置身局外。美、英等国的这一态度,无疑鼓舞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勇气。连素主对俄妥协的伊藤这时也改变了态度^④。于是,1月29日林董向兰斯敦大胆宣布:只有俄国“完全接受日本的建议,才能防止战争”;“在日本再也没有主和派了”!^⑤

沙皇政府为答复日本的最后条款,于1月28日召开大臣会议讨论。这时,尼古拉二世鉴于战备工作尚未就绪,仍倾向于“和”,即不急于采取战争行动。会前,他甚至电令阿列克谢耶夫:即使日本在朝鲜南部登陆,也不要把它当作宣战的理由;“可以允许日本占领朝鲜直至构成鸭绿江和图们乌拉地区分水岭的山脉”^⑥。因此,由拉姆斯多夫拟订的表示愿意妥协的反建议获得通过:取消关于中立地带的要求;承认日本与其他国家在满洲的条约权利,并且不附带关于租界的附加条件;保留关于日本不得把朝鲜领土用于战略目的的条款。根据沙皇的意见,会议仍决定不在反建议中涉及尊重中国在满洲的领土完整问题^⑦。复文经沙皇批准,即用电报发往旅顺和东京。显然,这一修正案虽在朝鲜问题上做了较大的让步,但在满洲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未变。由于栗野在1月末已从阿巴扎处获悉俄方答复的要点^⑧,确信俄国未能满足日本的要求,日本元老和大臣认为战机成熟,于2月4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立即中止日俄交涉,开始军事行动^⑨。待俄国复文于2月7日送达罗森时,日本已于前一天即2月6日宣布对俄绝交了。

① 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第268页。

② 扎布里斯基:《美国和俄国在远东的竞争》,第101页。

③ 蒙格:《孤立的终止:1900—1907年的英国对外政策》,第154页。按:1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电令驻俄大使将英国政府的这一立场通知俄国政府。参见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41—242页。

④ 尼什:《日俄战争的起源》,第207、211页。

⑤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2卷,第241页。

⑥ 布尔采夫:《沙皇和日俄战争肇事者的对外政策》,1910年柏林出版,第73页。

⑦ 《库罗巴特金日记》,1904年1月15(28)日;《红档》杂志1922年第2期,第103—105页;〔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51—52页。

⑧ 布尔采夫:《沙皇和日俄战争肇事者的对外政策》,第75页;〔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51页。

⑨ 《日本外交文书》,第37卷第1册,第92—94页。

日俄谈判的破裂,意味着战争的开始。2月6日以东乡平八郎为统帅的日本联合舰队按照预定计划,秘密驶离佐世保,向黄海北部进发,2月8日晚,向旅顺港外的俄舰发动突然袭击,揭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①。同日午后,日陆军先遣队(2200人)开始在仁川登陆。10日,两国同时宣战。11日,俄舰两艘在仁川沉没。战争以更大的规模展开了。

日俄战争是沙俄帝国主义南侵、日本帝国主义北进,竞相争夺东三省和朝鲜,历时十载(1895-1904年)的必然结局。拉姆斯多夫曾坦白承认:“战争是由于我们想方设法攫取满洲、朝鲜的失策所引起的”^②。

日本为报三国干涉还辽之仇,以俄国为假想敌的备战工作,一直系统地进行着。“1903年,作战体系已基本上准备停当”,“海军在1902年上半年也已全部完成了既定计划”^③。日本素以谍报工作闻名于世;交通条件较好,运兵方便又易集中;士气较高、作战力强;开战前统治阶级一致主战。这些都是俄国所不及的。

俄国以日本为假想敌,同样制定了多种作战计划,战争前夕也“厚集陆海各军以为战备”^④,但由于俄国统治集团对战争问题意见不一,加以惊人的虚骄轻敌,所以准备不如日本充分。如前所述,维特、库罗巴特金、拉姆斯多夫等人虽承认战争不可避免,“但希望战争延期到来,以便更好地加以准备”^⑤。1903年底,库罗巴特金甚至两度建议沙皇,以取得在“北满”的一切特权为条件把旅大租借地交还中国,把东省铁路南满支线作价“转让”给中国,从而减少对日战争的危险性和避免俄国的革命危机。这个计划得到维特的赞同^⑥。别佐勃拉佐夫、阿巴扎、阿列克谢耶夫一伙口头上也说要避免战争,实际上却采取种种步骤加速战争的到来。一向认为“俄国是靠刺刀而不是靠外交笔墨起家”的普列维^⑦,面对国内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希望通过对外

① 一说2月8日俄国炮艇“朝鲜人号”在仁川港附近袭击日本运输舰,打响了日俄战争的第一枪。参见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149页;米切尔:《俄国海事史(848—1948)》,1969年纽约再版本,第179—180页。

② 狄龙:《俄国的衰落》,第256页。

③ 小山弘健、浅田光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1卷,1958年出版,第164—165页。

④ 《拉姆斯多夫宣布日俄交涉经过》,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77页。

⑤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90页。

⑥ 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第1卷,第188—189页;《库罗巴特金日记》,1903年11月28日(12月10日);《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87—89页。

⑦ 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1974年美国出版,第243页。

战争来挽救沙皇专制统治的厄运,强调“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对于我国内政来说,也是极为适时的”^①。也就是说,在远东的对日之战一定是规模“小小的”,而且必定是“胜利”的,对此他从不怀疑。上述情况不能不影响俄国在远东的战备工作。其次,沙俄自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而轻视日本。俄国陆海军军官普遍持有“日本人不敢打”的信念,都觉得“战争与和平问题完全操在我们手里”^②。1903年6月1日库罗巴特金在访日时对日本陆军大臣寺内说:“在日本发起战争时,俄国将以三百万常备军攻击日本,东京将为俄国所占领。”^③12月,德皇威廉二世函告尼古拉二世,根据可靠情报,日本正在积极备战,情势十分紧张。对此,尼古拉二世若无其事地答复说:“我不想打仗,战争就打不起来。”^④战争爆发前十天,罗森在东京也扬言,“我们只要动员一个师,日本人就会退却。”^⑤1903年夏天,俄国《新时报》甚至说,日本“同俄国作战就等于不折不扣的‘自杀’”^⑥。直到黄海响起日本军舰的隆隆炮声,才把这些人从狂妄的迷梦中惊醒。

开战之初,日本陆军现役军官为7500人,下士官和士兵为19万人,另有预备役3.5万人,后备兵20万人^⑦。沙俄在贝加尔湖以东的陆军有13.5万人^⑧,陆军部又决定给远东总督增派11万人^⑨。俄国在欧洲的后备兵力很雄厚(约500万人),但由于地域远隔,交通不便(西伯利亚大铁道环绕贝加尔湖的一段和东省铁路的一部分,要到1904年12月才能竣工),调运迟缓,补给困难,短期内难以发挥其优势。海军方面,力量对比于日本不利。但俄国舰队分布于波罗的海、黑海、日本海和黄海,日本则集中于本土附近

①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41页;《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262页。

②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5页。

③ 鹿岛守之助:《第一次英日同盟及其前后》,1972年东京出版,第209页;本山桂川:《俄罗斯侵略三百年》,第294页。

④ 谷寿夫:《机密日俄战史》,第34页。

⑤ 尼什:《日俄战争的起源》,第205页。

⑥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1932年莫斯科出版,第305页。

⑦ 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第268页。

⑧ 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147页。按:截至1903年10月20日,俄国在远东的军队为12.7万人(参见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240页)。另据俄文资料,1904年1月在远东的俄国正规军为9.8万人,护路军2.4万人。参见罗斯图诺夫《日俄战争史(1904—1905年)》,1977年莫斯科出版,第75、85页。

⑨ 《库罗巴特金日记》,1904年1月28日(2月11日);《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110页。

海域,在这里,反比俄方稍胜一筹,然而,每调来一批新的俄舰,这种差距就会变小一点^②。因此,俄军利于持久,日军利于速胜。1903年6月,日本总参谋部即已确认:“只以朝鲜和满洲为战场,可以确保优势,胜利几已确定;如战争拖长,则地位逆转,俄国将渐占优势。”^③

日、俄宣战后,两军各按既定的方针对垒。日本海军力争在短时间内歼灭俄国太平洋舰队,夺取制海权,为陆军在辽东半岛的大规模登陆作战创造有利条件;陆军则兵分四路,从陆上、海上进袭东三省南部。大本营的第一阶段作战计划是完全占领朝鲜,进军鸭绿江右岸,同时进攻旅大地区,歼灭旅顺口的俄国海军,预定在秋季完成本阶段的战斗任务。第二阶段的主要战斗在南满展开,打击俄军主力,时间预定在来春进行。为统一指挥陆上各军,1904年6月20日组成满洲军总司令部,大山岩任总司令,儿玉源太郎为总参谋长。日本海军则由东乡率领^④。

俄军前线最高指挥官阿列克谢耶夫因欧洲增援部队无法及时赶到并进入战斗,首先指望海军获胜,以阻止日军在朝鲜北部登陆,并预计以4个西伯利亚军战胜日本^⑤。这一预想落空后,沙俄改采库罗巴特金的方案,即在欧洲俄国增援部队到达前,避免和日军接仗,以便厚集兵力,把日军引向奉天或哈尔滨一带决战;海上也取消极防御战略,坐等波罗的海舰队的援军到来。因此,俄军始终未能改变被动的局面。

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是进攻的一方。2月,日第一军在仁川顺利登陆后即挥戈北上,于4月底5月初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东北境内,接着连陷九连城、凤凰城,取得了陆上对俄作战的首次胜利。五六月间,日第二、第四军在辽东半岛盐大澳和大孤山等地相继登陆,然后北上,直扑辽阳。6月初,日本组成了第三军,准备攻打旅顺。7月,日军侵占营口。8月,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在旅顺港附近被摧毁,黄海、日本海的制海权一时属于日本,旅顺陷入重围。之后,日军继续取胜,经辽阳战役(8月30日至9月4日)、沙河战役(10月7—16日),于年末逼近奉天。1905年元旦,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第245页。关于战争前夕双方在太平洋海域海军力量的配置和对比情况,参见罗斯图诺夫《日俄战争史(1904—1905年)》,第81—82、91—93页;尼什:《日俄战争的起源》,第198—199页。

③ 小山弘健、浅田光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1卷,第163页。

④ 信太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第269页;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228页。

⑤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49页。

旅顺俄军投降。二三月间,双方共约60万人在奉天举行会战。3月10日,日军占领奉天,乘胜进据铁岭、开原,俄军向哈尔滨方向败退。5月27—28日,经对马海峡海战,远道东来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葬身日本海域。至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宣告结束,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形成了僵持的局面。由于俄军连遭败绩,俄国陆军最高指挥部在历时19个月的战争过程中曾三易其帅:从战争开始至1904年10月为阿列克谢耶夫,其后由库罗巴特金继任,1905年3月奉天战役后又改由第一军团司令利涅维奇接替,直至战争结束。

二 清政府的屈辱中立与日俄战争的灾祸

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掠夺战争。中国东三省沦为战场,首遭其殃。如何消弭战祸、恢复失地?还在战争爆发之前,朝野即已议论纷纷。亲英亲日官僚倡言倚日御俄。粤督岑春煊主张乘敌寇交战之机,“奋然一战”,收回东北主权^①。1903年末,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说,中国兵少、饷绌,械乏、无力参战;“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都对中国不利;只有谨守局外,才是可取之道^②。这一主张与奕劻不谋而合,得到后者的支持和采纳^③。

1904年1月初,清政府试探日本的态度。日本自恃拥有训练有素、数量可观的军队,又有英日同盟作后盾,可以单独对俄作战,并取得胜利,因此反对中国参战。1月7日,日驻华公使内田将日本愿中国中立之意通知奕劻,并望中国给予“秘密援助”^④。日本外务省向中国驻日公使杨枢做了同样表示^⑤。日本不愿清政府与之“协同”拒俄,主要是怕中国参战会妨碍它实现对俄作战的目的。

如前所述,1903年12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曾众口一词,要求中国“保持中立”,反对中国参战,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如日本“单独作战,战胜的结果将由我国(日本)任意处理。如与中国联合,则善后处理势将感到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1卷,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179卷,第4页。

③ 早在1903年8月,奕劻即已向英使萨道义表示清政府有中立之意。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324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7卷第1册,第15—16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0卷,第15—16页。



日俄战争示意图 (1904—1905 年)

种种不便。”日本内阁还认为：

1. 中国如参战，可能“见洋人即加迫害，重演义和团事件”，列强乘机争夺，日本可能丧失华南据点；

2. 如中国中立，则中国与其他中立国的贸易不受影响，从而可维持他国对日本的同情，防止其进行干涉；

3. 中国如中立，交战限于日、俄两国；不致因国际关系复杂化导致战争扩大化；

4. 中国如参战，大量财力投入战争，会影响中国清还庚子赔款；

5. 中日联合对俄作战，可能使“黄祸论”再起，便于他国干涉。^①

日本提倡中国中立的侵略本意，由此可见，所以，日本政府于对俄宣战次日，便将上述见解告诉列强驻日公使，要求各国共同承认中国的中立地位，使战争局限于日、俄两国^②。

与日本同时，法国驻华公使也倡言中国中立，其目的是由交战双方“尊重”由英、德、法、意“四国中立军队所占据的直隶省”^③。德国怀疑法国借此要求“保卫”华南、英国要求“保卫”长江流域的“中立”，而德国“只限于保卫山东”，于己不利，因此建议扩大中立范围，把东三省以外的中国领土都作为由列强加以保护的中立区域^④。美国认为这一提案“默许俄国继续武装占领满洲”，对日本很不利，并有招致外国军队占领中国的危险^⑤。因此当德皇威廉要求美国总统照会日俄交战双方“尊重军事范围以外的中国中立”时，西奥多·罗斯福将威廉原话删去，改成“希望交战双方在战争过程中尊重中国中立，采取一切措施保持中国的行政完整，并尽可能使战区局部化”^⑥。无论法、德或美国，它们所谓的尊重中国中立，实际上都是为着维护各自在华的侵略利益。

上述美国照会于2月10日首先递交中、日、俄三国，后又分送《辛丑条约》其他各签字国。日本立即表示同意，条件是：

1. 中立范围以俄占区之外为限；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42—45页。

② 《中立之由来》，载《江苏》杂志第9—10期合刊。

③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1页。

④ 同上书，第3页。

⑤ 瓦格：《门户开放外交家柔克义传》，第85页。

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4年，第2页。

2. 俄国接受并履行同样的义务。

俄国也表示同意，但别有用心地提出以中国恪守中立，日本尊重中国中立，满洲不在中立范围为条件。^①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于2月12日发布上谕说：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为睦谊起见，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②。

2月13日，外务部通电各国宣告：“东三省疆土权利，两国无论胜负，仍归中国自主，两国均不得占据。”“该三省城池衙署，民命财产，两国均不得损伤。”“辽河以西俄已退兵之地，由北洋大臣派兵驻扎，各省及沿边内外蒙古均按照局外中立例办理。”^③同时，颁布《中立条规》三十五条，划定了日、俄两国在奉天省内的“局外境”（中立区）和“局内境”（战区），要求交战双方不得逾越指定的战地，并保障战区内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与中国地方官守卫领土、履行行政职责^④。清政府认侵略者为友邦，以神圣国土供他国作战场，自以为这种屈己从人、消极无力的态度能得到交战双方的谅解和尊重，结果适得其反。2月14日，沙皇政府复照清政府，佯称“中国恪守局外，俄决不侵越”，但“东三省及蒙古东北隅铁路所经，为运兵用兵要地，势难认为局外。”^⑤不仅如此，沙俄外交部并照会中国驻俄公使胡惟德，悍然宣布：“辽西亦满洲境，难认局外。至东省疆土不得占据一节，目下不能谈论，应俟事后承前议续商。俄日用兵，华守局外为一事，东省交地是另一事，故不允商议。”^⑥清政府原拟由关内派兵赴辽西一带加强防务，维持“中立”，但是由于沙俄不承认该地区为“局外境”，并反对清军进入而作罢^⑦。无怪乎胡惟德慨叹：“战局无论胜败，归地日益绝望”^⑧了。

事实上，吞并东三省，实行“黄俄罗斯”计划，是沙俄的既定政策，也是它进行这场战争的基本目的。战争爆发后，自信俄国必胜的尼古拉二世认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4年，第2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1卷，第19页。

③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78页。

④ 同上书，第179—183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1卷，第27页。按：2月19日沙皇政府在答复美国关于维持中国中立、使战争区域局部化的提议时，又宣称整个东三省将作为战场，不属于中立区范围。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4年，第2页。

⑥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2卷，第3页。

⑦ 多勃罗夫：《日俄战争时期美国的远东政策》，第190—191页。

⑧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2卷，第5页。

为,胜利后“不能指望从破产的日本获得实际的足够的战争赔款……只有合并满洲,才是这次战争对俄国的惟一可以看得到的报酬”^①。为此,沙皇政府表面上承认中国中立,暗中却命令驻华公使雷萨尔搜集有利于吞并东三省的资料和论据。4月中旬,雷萨尔完成了上述任务。苏联史学家据此指出:“俄国如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必将合并满洲,变整个华北为其世袭领地。”^②

围绕上述目的,沙俄对待清政府的中立,在策略上准备采取两个步骤:

1. 在“尚未消灭最主要的敌人”即日本时,要维持中国中立,以免清政府“公开站到日本方面”;
2. 在有利于俄国的战局出现时,设法制造“中国破坏中立”的事端,以便“把中国官吏赶出满洲”,“把满洲从中国合并过来”^③。

由于俄国在战争中一败再败,实行第二步的时机从未出现。但在整个战争期间,沙俄蔑视《中立条规》,越过“战区”滋事,践踏中国主权的事层出不穷。

战争一开始,沙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即向盛京将军增祺提出四项蛮横要求:

- “一、地方政务应守俄国训令;
- 二、俄国有黜陟中国地方官之权;
- 三、捐税等项,须缴于俄国政府;
- 四、所留中国军队,应受俄国调度。”^④ 蓄意将中国东北地方的军政财大权尽行剥夺。

2月下旬,阿列克谢耶夫在东三省擅自张贴布告,公然提出:

1. 各地官员应“协助俄军”采买粮草及一切应用物品,“不得阻挠”;
2. 当地居民应保护东省铁路电线电话,倘有人谋损,不但严惩谋犯,而且要追究附近官民的责任;
3. “暗藏匪党”或知情不报者,“与匪同罪”;
4. 如中国官民仇视俄军、俄政府,“定行殄灭此人,决不姑宥”。^⑤

①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98页注①。

② 康托罗维奇:《美国在争夺中国的斗争中》,第166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65页。

④ 《中国中立汇志》,载《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第67页。

⑤ 《中外日报》1904年3月4日;麦考密克:《俄国在亚洲太平洋的悲剧》,第2卷,第428-430页。

随后，阿列克谢耶夫悍然命令增祺保护东省铁路，声称如有破坏，以致运转不通者，不但所损铁路工程之费须中国赔偿，而且军事方面的损失，也应由中国方面承担^①。5月下旬，他又刊刻告示，强制东省铁路沿线居民保护铁路，如有损坏，“初犯罚款，续犯即将25俄里（内）各村屯烧杀无遗”^②。中国舆论就此愤慨地指出：沙俄侵略者“皆以东三省之地为彼之地，皆以东三省之官为彼之官，皆以东三省之民为彼之民”，俨然是君临东三省的最高统治者^③。

根据上述布告，俄军所到之处，如凤凰厅、安东、熊岳、海城、辽阳等地，均胁迫地方官吏代觅住房、代办粮食，一切“听俄兵颐使”^④。在奉天省城内，他们勒占大学堂、军火处、金银库、宗室营等处，不听劝阻^⑤。在吉林省，俄军强占将军、都统等衙署，为所欲为^⑥。中国官员稍有不满意，即遭拘捕，海城、岫岩、怀德、通化、开原等县令均曾被俄军拘禁。结果，“将军以下，位同虚设，监司大僚，禁逐唯命。”^⑦ 中国主权，惨遭蹂躏。



日俄战争蹂躏下暂避奉天的中国难民群

（采自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2卷，第1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③ 《论俄官示谕东三省居民事》，《中外日报》1904年2月27日。

④ 《日俄战纪》，第1编，第40页。

⑤ 辽宁省档案：奉天交涉总局档第741号，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⑥ 《中外日报》1905年4月7日。

⑦ 《东北三省权宜策》，载《东方杂志》1904年第9期“社说”，第192页。

日俄战争双方投入兵力各达百余万人,是近代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战争中第一次使用烈性炸药、手榴弹和自动武器,其杀伤力为前所未有的。在1904年5月5日金州半岛南山的一次战役中,日军消耗的弹药与在甲午战争中消耗的总和相等^①,其规模之大,由此可见。长达19个月的战争,除日军登陆萨哈林(库页岛)之役外,陆上都以中国东北为战场。自旅顺中经金(州)复(县)海(城)盖(县),北至开原铁岭,东起鸭绿江,西迄辽东湾,烽烟千里,铁蹄纵横,其为祸之烈,远过于甲午、庚子两役^②。以辽阳战役为例,日俄双方使用兵力约50万人,战线绵长一百八九十里,前后历时十昼夜^③。开战前,辽阳城四周10—15里内,民房均被俄军占用^④。此外,城东至分水岭180里,城南到海界60里,也无处无兵。城外方圆10里内,因建筑炮台,挖掘战壕,修垫车道,占、毁民地数千亩。俄军军纪败坏,所到之处,抢牛搜物,奸淫烧杀,无恶不作^⑤,使本地居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在撤退中,被打败的哥萨克们甚至以大量屠杀中国人来发泄心头之恨^⑥。“因邻国之衅,而局外之国,惨遭荼毒若此,言之可为痛哭”。^⑦

在沙河战役中,战场附近村庄均遭俄军剽掠。“难民之避入奉天省城者不下三万人”,因无家可归,“近于流莩”^⑧。奉天战起,沙河各村庄均被拆毁,梁木被移作俄军地下掩体的支柱,“昔日欣欣向荣的几百个村落,如今除了残垣败瓦和孤零零的烟囱外,什么也没存下来。”^⑨

奉天战役给当地居民带来的灾难也极为深重。“自省城至兴京三百余里,蹂躏殆遍,西南则出城一二里,即无完土。”^⑩俄军袭扰多端,状如匪徒。如城北正黄旗界附近铁路各村屯,“民有车马,则彼夺之;民有鸡豚,则彼杀

① 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第271页。

② 《桓仁县志》(1930年),第15卷,第38—39页;辽宁省档案:《辽阳州禀奉天交涉总局》,奉天交涉总局档第988号。

③ 《辽阳县志》,第21卷,兵事志,第9页。

④ 《日俄战纪》,第2编,第60页。

⑤ 《辽阳州知州俊英致增祺禀》,辽宁省档案:《辽阳州禀奉天交涉总局》,奉天交涉总局档第988号。

⑥ 奎斯特德:《“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第140—141页。

⑦ 许珏:《复庵遗集》,第2卷,奏议上,《敬陈管见折》。

⑧ 《日俄战纪》,第15编,第84页。

⑨ 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1883—1913)》,1914年伦敦出版,第186页。

⑩ 《奉天将军致上海红十字会函》,《中外日报》1905年2月11日。

之；民有牛羊，则彼屠之；民有衣服财物，彼则掳掠一空之。”更有甚者，他们还拆毁民居，毁割禾稼，“以致乡民居无处，食无粟，嗷嗷待毙，不下数万，号泣流离之声，通闻四野”^①。又如在奉天西厢蓝旗界等 13 屯扎营的俄兵，“无论昼夜，逐户攻掠财物，所有骡马猪羊，硬行翻取，攻坟伐树，强拉妇女，有向劝阻，重则枪打刀刺，轻则暴打不休，反赖伊等良民系红胡子”，必欲置之于死地^②。在省城内，俄军不但向店铺索要财物酒肉，而且也四出抢掠，以致“商贾不通，省城地面百物短缺，贫民小户杂米为艰”^③。至于奉天历史文物古迹毁于战火者，其损失难于估计。

由于战区的扩大，难民日益增多。据增祺奏，1904 年冬，聚集奉天省城的待赈灾民不下 10 余万人^④。不少人饥寒交迫，露宿街头；许多儿童，因感染猩红热、天花而丧命。留恋家园不愿外出逃难的村民，更免不了战火的劫难。

战区周围的中小城镇，其战祸同样不容忽视。如海城县属杨家园子等 21 屯，1904 年六七月间，地亩禾苗或受俄军车马践踏，或被掘壕安营，计平毁 1 万余亩，房屋被拆 101 间，树木被砍伐 52100 余棵；俄军败退，日军旋至，毁房伐树，侵害村民，悉同俄军，总计待赈灾民达 38413 户^⑤。又如辽中县，周围六七十里内居民的粮贮、牲畜、鸡犬被掠一空；邑东长滩等处，所有居民庐舍，多被炮火轰毁，“颠连无告，遍野哀鸿，至今谈之，犹为变色”^⑥。

远离战区的吉林省，也未能幸免俄军的侵扰。1905 年 2 月初，俄军自奉天败退吉林，“所有威远堡边门以外，东迄伊通，南抵奉天围荒，北至昌图府属，周围千余里之间，无不为彼所占据，而长春府适当其前敌后路，屯扎之兵更较他处为多，而其支队游弋于各处者，几于通省皆遍；所到之处，驱逐居民，拆毁房屋，粮草牲畜，悉遭攘夺，声言战地以内，不准有人来往居住，非通令远离而后，即附近省城一带，亦皆挖壕修道，异常骚扰……哀此小民，田地抛荒，资财尽失，有富户而顿成贫窶者，流离远徙，惨不忍言。”^⑦

① 辽宁省档案：军督部堂档第 795 号。

② 辽宁省档案：军督部堂档第 789 号。

③ 奉天税务所档。

④ 《清德宗实录》，第 540 卷，第 9 页。

⑤ 辽宁省档案：军督部堂档第 988 号。

⑥ 《辽中县志》（1930 年），第 19 卷，军政，第 65—66 页。

⑦ 吉林省档案：《吉林将军富顺奏文》，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

在战争期间,沙俄侵略者还经常以武力胁迫中国丁壮无偿劳动。例如,开战之初,俄军曾在奉天省城郊外挨户拘去千人,前往海城修筑炮台,开挖战壕,每人每天仅给干粮1斤,此外分文不给;稍有怠慢,即被痛打,甚至击毙^①。在旅顺,俄军役使力夫约1.5万人,修缮船渠、炮台及船舰,每5人便有一挂腰刀的俄兵监视,每50人为一团,每天仅给粗食两餐,不给工资^②。在呼伦贝尔,俄军擅将中国铁路工人140名绑上火车,运至赤塔,勒令修路,途中被凌虐致死者20余人^③。此外,在辽阳、海城、哈尔滨、宁古塔、软化、农安等地,经常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俄军的刺刀下从事苦役。

俄军所到之处,还挨户搜查军器。如被发现,藏者即被视为“胡匪”,必须赂以重金,方得免于死。怀德、昌图一带,“良民之受其扰累者,殆什居六七焉”。同时,俄军罗织罪名,动辄陷人为通敌的匪谍,轻者讹诈需索,重者刑讯拷打,投之牢狱,因此“境内骚然,几无宁日”^④。中国百姓因被指控为匪谍遭关押的,奉天战役前仅沈阳铁路车站附近的一座监狱中,即有500余人^⑤。由此致死的,难以计数^⑥。据一位当时正在奉天的西方传教士记载:“人们被杀死,只是因为他们的不通俄语,或因不愿交出他们的牲口。一些哥萨克要某人带路,因他跑得不快,他们便用刺刀刺他。有18个农民、工人被控为匪徒,被缚在哥萨克的坐骑后,向沈阳方向跑了40英里,其中有2人因精疲力竭而丧生”。“有一家人在一队俄国人经过时避入地窖。他们被怀疑是日本间谍。士兵们立即朝他们开枪,除一名妇女幸免外,全家都被杀死了。”^⑦此外,俄军还在北起奉天省城、南至金州的途中,包括营口一带要隘在内,擅设卡伦,“每遇行旅,即遍身搜检,少可疑,立予捉去;若有函件等迹涉疑似之物,或径用枪击死,抛尸溪涧中”^⑧,其凶恶残暴,令人发指!

① 《中外日报》1904年4月2日。

② 同上。

③ 《黑龙江将军萨保致外务部文》,光绪三十年一月。

④ 《昌图府怀德县乡土志》初稿,兵事,第5-8页。

⑤ 麦考密克:《俄国在亚洲太平洋的悲剧》,第2卷,第339页。

⑥ 苏联学者阿瓦林指出,中国“居民稍涉间谍嫌疑者,一批一批地被交战双方枪杀了”。参见《帝国主义在满洲》,第2卷,第101页。

⑦ 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第189—190页。

⑧ 《中外日报》1904年6月19日。

在经济上,为了转嫁战争负担,占有中国财富,沙俄不仅在东三省用卢布纸币征购军需物品^①,而且在战区发行军用票,强制商民使用,“其数额颇巨,无法估计”^②。战争期间,俄币(羌帖)跌价,当地人民遭到巨大损失。与此同时,沙俄借战争之机,疯狂掠夺东北的森林、煤矿等自然资源和农副产品,把东三省变成俄军的供应基地。他们不仅扩大了对原有的扎赉诺尔、抚顺、昌图等地煤矿的开采,而且对新发现的乌吉密等地的煤矿也开始采掘^③。他们向民户“勒买”、“强取”粮食,任意芟割禾苗,“以作马料”^④。中国官民所需粮食,有时反须向俄军申请拨给^⑤。据沙俄军方统计,自1904年2月14日至1905年10月14日,入侵俄军的粮秣(包括饲料)85%取自中国东北,计重5639万普特^⑥,约合90余万吨。

日俄战争把东北人民抛入灾难的深渊。被清廷视为“发祥重地”的东北大地,在日俄侵略者的铁蹄下,“未数月即变为瓦砾场”^⑦。据盛京将军粗略估计,东北人民死于战火的约2万人,财产损失银6900万两^⑧。这只是直接损失,而且估计显然偏低,但已为数惊人了。至于从旅顺口逃往中国烟台、上海等港口,拒绝按中立条规解除武装,擅自登岸的俄国水兵和难民,无视中国法令,逞凶作恶,为非作歹,“无日不有,至日或数起”^⑨,难以尽述。曾随维特去美国朴次茅斯采访日俄和谈的英国记者狄龙指出:“日俄战争是沙皇制度犯下的种种罪行中最凶恶的一桩。”^⑩这个结论无疑是公正的。

应当指出,战前倡言中国中立的日本政府,于清政府宣告“局外中立”后,曾假惺惺地表示“毫无占领大清土地之意”,“必不敢有损害大清国主权

① “纸罗(卢)布之至东三省,殆无虑数千万。”《中外日报》1904年4月15日。

② 献可编著:《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74页。

③ 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第298页。

④ 《日俄战纪》,第13编,第85页。

⑤ 麦考密克:《俄国在亚洲太平洋的悲剧》,第2卷,第344页。

⑥ 朝鲜银行编:《满洲经济史》,第37页。

⑦ 《日俄战纪》,第21编,第57页。

⑧ 麦考密克:《俄国在亚洲太平洋的悲剧》,第2卷,384页。按:据中国海关1905年报告,中国财产损失逾7000万两,人员损失2万人以上。参见奎斯特德《“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第142页。

⑨ 《日俄战纪》,第21编,第50页。

⑩ 雅洪托夫:《俄国与苏联在远东》,1931年美国出版,第65页。

之事”，还说“断不损害地方财产；盛京、兴京贵国陵寝宫殿所在，以及各衙署，亦不若俄国所为，致蒙损害，可请贵国政府确信。”^①实际上，日本漠视中国主权之事，层见叠出。日军所到之处，遍立军政署，下设警察局，管理地方事宜，“凡事须禀请军政署作主，方准施行。”^②日军在“战区”烧杀淫掠，其暴虐程度也不逊俄兵。这充分说明侵略者所谓尊重中国主权与中立地位，纯属欺人之谈；而清政府的所谓局外中立，实质上就是听任日、俄帝国主义来摆布东北的命运。

三 中国人民的抗俄斗争

日俄战争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痛感民族危亡日益逼近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不顾清政府的屈辱退让政策，纷纷向日、俄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的抗争。东三省人民在1895—1905年的10年间，历经甲午、庚子、日俄三次战祸，遭受的灾难极为深重，反侵略的意志尤其坚强。日俄战前，维特即曾预感到“一旦对日作战，东省的中国人甚至中国当局不会冷眼旁观，十之八九将使我们坐卧不宁”^③。库罗巴特金同样担心，一旦日军首战告捷，“将立即使中国满洲北部所有敌视我们的分子振奋，他们借助于日军的临近，将成为我们的严重威胁”^④。这一点，维特和库罗巴特金的估计对了。中国人民憎恶一切侵略者，“在这场战争中，他们谁也不袒护”^⑤。

日俄战争爆发后，形式多样、范围广泛的反侵略斗争，即在东北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抗俄檄文，遍布城乡。锦州“遍贴揭帖，以庚子俄人在黑龙江驱逐华人溺毙多命，倡议仇俄”^⑥。学校流行反对日俄战争的歌曲，控诉俄国哥萨克“肆（意）蹂躏”，使我东北“户无鸡犬宁”^⑦。爱国团体抗俄铁血会发布的檄文，号召民众集合力量，“遍地合攻”，将侵略者逐出中国而后止^⑧。这些檄文，不胫而走，对于揭露侵略者，鼓舞群众斗志，起了巨大的作用。俄使雷萨尔曾多次向清外务部抱怨“满洲臣民，遍布怨俄檄文，举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1卷，第27页。

② 《中外日报》1904年9月6日、9月28日、9月30日。

③ 格林斯基：《日俄战争的序幕》，第244页。

④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44页。

⑤ 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第169页。

⑥ 《中外日报》1904年3月30日。

⑦ 《革命文物》1978年第1期，第23页。

⑧ 丁开峰：《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参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第22页。

动不靖，足以扰害俄军”^①，可见抗俄檄文的规模与力量。

在铁路、矿山直接受沙俄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中国工人，不断举行罢工，抵制沙俄，1904年2月，旅顺俄海军工厂的2000余名华工，“一概辞职”^②。3月，奉天关山煤矿“华人数百名罢工，以反对俄人”；吉林、盛京各处矿工继之^③。沙俄以增加工资为饵，诱骗工人复工，但工人们坚持斗争，“势甚汹汹”^④。6月，旅顺中国居民1500人，因拒募相率前往烟台^⑤。沙俄在哈尔滨白头山招工建筑炮台，“然无应者”^⑥。

在农村，拒绝使用羌帖，不卖给粮草、牲口等军需用品的事，屡见不鲜。如敦化一带农民，相互约定“不卖给食物，不使用俄钱”^⑦。各地商民也常拒绝用俄钱交易。如哈尔滨华商“概不收用”沙俄发行的军用票^⑧，齐齐哈尔商民不用俄钱，因此羌帖“行情大坏”^⑨，等等。驻吉林俄军负责人索阔宁供认：“仇视俄人，不卖物件，不花羌帖之处，并非一屯。”^⑩

与此同时，东省铁路沿线，奉天、锦州、牛庄、海城等地群众，纷纷“结会拒俄”^⑪。过去因俄军干涉而被迫解散的团练，这时出于自卫，又部分恢复起来。如辽河西面一带，大小数十村因遭俄军蹂躏，“人不聊生”，“遂联团练，誓欲报复”^⑫。又如辽阳城东部由18个村落组成的团练，人数达2000名，1904年4月27日，曾与俄军交锋，毙敌200多名，这是团练武装抗俄规模较大的一次^⑬。

随着斗争的发展，群众武装抗俄组织不断扩大，其中以被侵略者和清政府诋为“马贼”、“红胡子”的队伍最为活跃。加入这支队伍的大多数是饱经战祸、流离失所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满怀国仇家恨，对敌斗争十分坚决，

① 《日俄战纪》，第8编，第76页；《东方杂志》1904年第4期，军事，第302页。

② 《旅顺之同盟罢工》，《警钟日报》1904年3月3日。

③ 《中外日报》1904年3月5日、3月13日。

④ 《警钟日报》1904年4月6日。

⑤ 高桥作卫：《适用于日俄战争的国际法》，1908年伦敦出版，第755页。

⑥ 《日俄战纪》，第3编，第53页。

⑦ 吉林省档案：《驻吉林俄军总领事索阔宁致吉林将军照会》，1905年6月5日。

⑧ 《申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087页。

⑨ 黑龙江省档案：《俄商务公司总办拉乍列夫致齐齐哈尔副都统》，光绪三十年三月三十日。

⑩ 吉林省档案：《索阔宁致吉林将军照会》，1905年6月14日。

⑪ 《警钟日报》1904年3月12日、3月31日；《中外日报》1904年3月30日。

⑫ 《日俄战纪》，第18编，第82页。

⑬ 《中外日报》1904年6月30日。

“满洲居民皆与亲密，尊之为爱国义士”^①。他们有更严密的组织，纵横东三省和内外蒙古，“首领不下数十个”，“小伙数百，大伙数千，最大之伙数万”，总计达18万人。^②

东省铁路转运军队和粮饷，是俄军的命脉所在。因此，毁铁路、夺粮饷成为“马贼”的“制俄二策”^③。1904年2月，宁古塔附近铁路被拆毁数十丈^④。3月13日夜，铁岭到哈尔滨之间的铁路，同时被炸毁多段^⑤。八九月间，公主岭、四平、双庙子之间，铁路和电杆被不断拆毁或截断^⑥。1905年1月13—14日两天，铁岭至开原间铁路被毁5英里^⑦。侵略者虽大力防范，但“马贼”忽聚忽散，防不胜防，使俄军疲于奔命。阿列克谢耶夫曾严令当地居民保护铁道，但居民相率他迁，阿列克谢耶夫无可奈何^⑧。由于东省铁路屡被切断，运输不畅，“俄人大困”^⑨。

俄军的粮库是武装群众袭击的重要目标。1904年4月14日，“马贼”聚众3000人，将俄军设在海城县东北60里处的粮库付之一炬^⑩。6月24日，“马贼”3000余分两路夜袭铁岭的俄国粮台。俄军在睡梦中以为日军来攻，仓皇应战，自相残杀，结果伤亡600余人。“马贼”夺得大批军械粮秣，不能带走了，一律放火焚毁^⑪。在黑龙江省也有群众袭击俄人军粮的义举^⑫。

此外，1904年3月28日至5月29日间，“马贼”先后两次袭击沈阳附近的烟台煤矿，使俄军受到很大损失^⑬。战争初期，沙俄从蒙古草地驱送战

① 《大陆》杂志第2年第7号，1904年8月30日。

② 《马贼纪略》，载《日俄战纪》第14编，第83页；《大陆》杂志第2年第4号，1904年6月3日。

③ 《中外日报》1904年8月31日。

④ 《东方杂志》1904年第2期，军事，第103页。

⑤ 同上书，第265页。

⑥ 《日俄战纪》，第9编，第59—60页。

⑦ 《中外日报》1905年2月28日。

⑧ 《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战地杂记，第299—300页。

⑨ 《东方杂志》1904年第2期，军事，第102页。

⑩ 《中外日报》1904年6月18日。

⑪ 《字林西报》1904年7月13日；《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战地杂记，第300页。

⑫ 《日俄战纪》，第18编，第81页。

⑬ 《中外日报》1904年6月5日、7月22日。据格罗杰科夫报告，1904年5月13日“武装的中国人”曾袭击了烟台的俄国煤矿。见奎斯特德《“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第142页。

马千余匹东来，行经齐齐哈尔时遭“马贼”伏击，被“劫去数百匹”^①。

根据敌我形势，“马贼”有时直接袭击俄军，仅1904年6月后的3个月内，与俄军交战不下二十余次^②。如8月2日，“马贼”3000余人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沈阳火车站附近的俄营，予俄军以杀伤^③。1905年3月，沈阳的居民从城墙后向败退中的俄军奥尔洛夫部开了火^④。

抗俄“马贼”的正义行动，使侵略者坐卧不安，“临之以兵，兵无所施；结之以财，财无所继”^⑤，沙俄驻华公使不得不要求清政府命盛京将军“速殄之”^⑥。

应当指出，由于“马贼”成分复杂，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缺乏正确的认识，其中有些人主张联合日本，以为“外援”，有些人受利禄的诱惑，敌我不分，因此出现了日俄争相收买，“马贼”队伍分化，一部分为敌所用的复杂情况。尽管如此，爱国“马贼”英勇抗俄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

在日俄战前积极参加拒俄运动、具有革命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时更加积极地投身抗俄斗争。战争爆发后不久，蔡元培即将原先在上海成立的对俄同志会改为争存会，并把《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该报经常载文揭露日、俄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鼓舞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中国留日学生蓝天蔚等曾致电清政府，要求回国组织义勇军对俄作战，但清廷以“守局外中立”为由，加以拒绝。京师大学堂毕业生丁开璋、朱锡麟、张榕等，曾试图将东北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他们在东北分别创立了抗俄铁血会、东亚义勇队、关东保卫军等团体，其宗旨是一面抗俄，一面“为革命立基础”。由于清政府的阻挠，他们也未能施展其抱负^⑦。严酷的事实，使越来越多的爱国知识分子明白，要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惟一的出路是大举革命，推翻腐败无能，卖国偷安的清政府。1905年

① 《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军事，第67页。

② 《东方杂志》1905年第1期，杂俎，第10页。

③ 《中外日报》1904年8月13日。

④ 奎斯特德：《“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沙俄在满洲》，第142页。

⑤ 《东方杂志》1904年第2期，社说，第2页。

⑥ 《日俄战纪》，第2编，第81页。

⑦ 丁武：《东北辛亥革命简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第535页。

初,留日广西学生明确宣告:“抵御瓜分之策,以革命为宗旨。”^①这是救亡必先革命的时代呼声。其后,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逐渐高涨。

第六节 分割东三省的日俄《朴次茅斯和约》

一 日俄和谈的酝酿

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进行火并,都指望借助战神一举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出乎双方预料,奇迹没有出现,战争也未有穷期。在彼此打得头破血流、付出了高昂代价之后,两国政府不得不考虑重新回到谈判桌边。于是,伴随着前线的隆隆炮声,谋求和谈的活动在外交战线上逐渐展开。

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日本,由于资源贫乏、经济基础薄弱,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首先希望早日停战缔和,以利巩固胜利成果。早在1904年7月28日,即日军侵占中国辽东半岛部分地区并在旅顺口合围后不久,日本驻英公使林董便挟首战告捷的余威,通过第三者向正在柏林的维特表示,愿与他秘密磋商议和条件^②。次年1月1日,日军攻占旅顺;25日,日驻美公使高平奉命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表达日本政府的“意图和希望”:“恢复和平”后应使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由日本“继承”俄国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及其他权利^③。2月8日,罗斯福即以私人身份通过法国驻美大使朱塞朗向沙皇劝和^④。同月,林董通过第三者再次与维特接触。日方企图使俄国发出媾和倡议,接受战败国的屈辱地位^⑤。但是,沙俄无意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它自恃兵员后备充足,决心依靠屯驻奉天(沈阳)周围的30余万俄军以及正在远渡重洋东来的波罗的海舰队,战胜对手,收复“失地”,并把战火引向日本本土,因此,对日方的和谈试探没有置理。

1905年3月10日,奉天会战结束,俄军惨败,俄国震动。前线士兵,普遍思和^⑥。有影响的《俄国新闻报》和《解放》杂志,公开倡导和平运动。

① 《大陆》杂志第3年第2号。

②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320页。

③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246页;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第222页。

④ 谷寿夫:《机密日俄战史》,第629页。

⑤ 《红档》杂志1924年第6卷,第6页;丹涅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第43、171页。

⑥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90页。

矿业和石油业代表甚至在莫斯科集会，要求沙皇政府与日本缔和，“纵使丧失萨哈林（库页岛）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也在所不惜。”^① 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维特哀叹：“国内局势如此险恶，比近三百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糟得多，继续进行战争就不能不冒爆发革命的严重危险”^②！但尼古拉二世不惜孤注一掷，在3月12日御前会议上决定继续战争，并动员新的军队参战^③。尽管如此，沙皇政府慑于旅顺口陷落后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不得不开始探求体面地结束战争的途径和条件。3月21日，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命令驻巴黎大使涅利多夫通知法国外长德尔卡赛，俄国准备在不割地不赔款的前提下与日本进行和谈，并示意法国出面调停^④。25日，维特在彼得堡向英使哈丁表示，他“准备承认朝鲜为日本势力范围，将辽东半岛、旅顺口和哈尔滨以南的铁路租让权转让日本”^⑤，意即承认既成事实。同月30日，俄国驻华盛顿大使喀西尼也谨慎地向罗斯福总统表示，俄国政府“私下里”欢迎媾和^⑥。这就是说，沙皇政府准备在牺牲中国和朝鲜的基础上同日本达成和解，以确保俄国在远东的根本利益；但它仍不愿向日方示弱，为和谈迈出第一步。

在奉天战役中获得全胜的日本，这时战费激增，债台高筑^⑦，人员伤亡很大^⑧，后备兵员奇缺，不仅无力在满洲发动新的攻势，而且拖延战争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对此，日本军方深感不安。3月14日，满洲军司令官大山岩向大本营总参谋长山县有朋告急：敌军弥补其损失甚难，我军于短期内弥补损失亦不可能，“故在我战力恢复之前，切不可妄动大兵。”^⑨ 23日，山县有朋致书首相桂太郎等说，“无论坐守阵地抑或主动进攻，均前途渺茫”，其

① 珂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77页。

②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4卷，第92页。

③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375页。

④ 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第2卷，第581页。

⑤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4卷，第92页。

⑥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381-382、501页。

⑦ 据估计，战争期间日本每日军费为100万美元（丹涅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第298页），全部战费逾15亿日元（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第289页）。国债由6亿日元骤增至24亿日元，其中国外军事借款为8亿日元，战后仅利息一项，每年需支付1.1亿日元（小川乡太郎：《日俄战争的耗费》，1923年纽约出版，第36、252页）。

⑧ 日本动员兵力为108.8万余人，是常备兵力的5倍，其中伤亡及因病退役者共约41万人，即占总兵力的40%多。参见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254页。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该书第289页所述伤亡数与此说略有不同。

⑨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235页。

原因在于：“第一，敌在其国内尚有强大兵力，而我已用尽全部兵力；第二，敌之军官尚不缺乏，而我之军官自开战以来已大量伤亡，今后亦难以补充”。因此，他希望政府重新“确定国家之根本政策”，尽快结束战争，谋求和平^①。3月28日，大山岩还特地派遣其参谋长儿玉返回东京陈述军情，提醒政府不失时机地打开和局^②。陆军大臣寺内甚至不等奉天会战结束，便于3月8日在东京主动要求美国驻日公使格里康“严肃地”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他个人的意见：“战争应当终止的时刻已经来到，他已做好了停止战斗的准备。”外交大臣小村也有类似的表示^③。由于上述情况，桂太郎于4月8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作战和外交步调的一致”问题，决定：作战方面，据守日军一直占有的地点，尽最大努力取得新的进展；外交方面，“只要情况允许，迅速而圆满地恢复和平”^④。接着，4月21日的内阁会议研究了媾和条件（详后）。这一切表明，日本谋和心切。但日方仍坚持和谈倡议必须由俄国提出，否则，将等待与波罗的海舰队进行海战，以定最后胜负。

5月27—28日，波罗的海舰队在対马海峡被歼。沙俄“连最后的赌注也输了。”^⑤俄国统治阶级在対马海战前怀抱的一线希望，至此归于破灭^⑥。这是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致命一击。虽然俄国陆军的后备力量比日本雄厚，在中国东北集结的兵力继续增加，数量上占据优势，有一定的作战潜力；但由于连连战败，损兵折将^⑦，前线士气低落；加以财政枯竭^⑧，外债无源^⑨，经济濒于破产，战争难以为继。尤其严重的是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沙皇政府本

① 德富猪一郎编：《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1933年版，第679页。转引自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第221—222页。

② 沼田市郎：《日俄外交史》，1943年东京出版，第159页。

③ 特里特：《关日外交关系（1895—1905）》，193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第238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7—38卷，《日俄战争》第5册，第102—104页。

⑤ 列宁：《覆灭》，《列宁全集》第8卷，中文第1版，第451页。

⑥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99页。

⑦ 俄军伤亡人数，众说不一。如苏联学者罗斯图诺夫说，俄军损失约27万人，内死亡者逾5万人（《日俄战争史（1904—1905）》，第165页）；巴甫洛维奇说，俄军伤亡、病死和失踪者共约40万人（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103页）。

⑧ 沙俄每月军费支出约为5000万卢布（《红档》杂志1928年第3（总第28）卷，第186页）。另据俄国财政大臣1905年3月26日报告，当时俄国战争总支出已达10亿卢布（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377页）。又据苏联学者研究，战争使俄国耗费了23.47亿万卢布，加上沉没的军舰的价值和军事借款利息，总数超过70亿卢布。参见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第103页。

⑨ 由于俄军一败再败，法国银行界不愿再贷款给俄国，以免冒更大的风险。

想用“小规模 of 必胜的战争”来制止人民革命，巩固其军事封建统治，结果适得其反。以1月22日“流血的星期日”为转折，革命以暴风骤雨之势迅猛发展，到1905年春，已有23条铁路的工人举行罢工，35个县（几占欧俄总县数的1/7）的农民也卷入了革命运动^①。害怕革命甚于害怕日本的沙皇政府，为了集中力量扑灭革命，延缓自己的灭亡，也不能不把对日妥协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在日、俄和谈的时机日趋成熟之时，以英、德对立为背景的欧洲形势，正朝着有利于早日结束这场战争的方向发展。如前所述，日俄战争是交战双方为争夺中国东北及邻邦朝鲜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列强重新分割世界的总的争斗的组成部分。欧洲是帝国主义世界的政治中心；欧洲的形势与日俄战场的形势息息相关。战争爆发时英、法、德等国虽然发表“中立”声明，宣布不直接介入军事行动，但为了使战争出现有利于己的结局，它们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干预了战争的进程。俄国的盟友法国，面对强邻德国的竞争和英日同盟的存在，一开始就不赞成俄国同日本开战，更不愿卷入这场血与火的冲突。

1904年4月8日，即战争爆发后不久，它同英国签订了“准备同德国作战”的英法协定^②，建立了联合对德的战线。这一协定虽然只涉及两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问题，但其影响所及，远远越出了非洲：它直接导致缔约双方在远东接近，从而使法国在日俄战争中处于独特的地位。5月，法国向俄国提供8亿法郎（合3卢布）的借款，以示支持；但当俄国再次向法国提出贷款要求时，巴黎当局却“舍不得”了^③。战争不止，日本接连不断的胜利，足以削弱俄国对德国的牵制力量，危及欧洲大陆的均势，法国为此焦虑不安。

1905年3月15日，即奉天战役刚结束，法国外长唯恐俄国被彻底打败，正式向英国驻法大使表示：为了英法两国的利益，战争应当结束，俄国应保持欧洲大国的地位^④。3月底，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发生，法国渴望俄国尽早地、以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与日本媾和，以便从远东战场脱身，采取积极的欧

① 库塔科夫：《朴次茅斯和约》，1961年莫斯科出版，第15—16页。

②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中文第1版，第776页。

③ 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第565—567页。参见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96页。

④ 蒙格：《孤立的终止：1900—1907年的英国对外政策》，第184页。

洲政策,加强法俄同盟在对抗德国方面的作用。4月,法国外长德尔卡赛向日本驻巴黎公使本野表示愿居间调停,旋因这一建议附有俄国不割地不赔款的先决条件而遭到拒绝^①。但德尔卡赛仍不放弃调停努力,6月初又打算探询日本的媾和条件,以便在法国的干预下开始谈判^②。为诱使日本同意媾和,法国金融界表示愿向日本开放法国金融市场。同时,法国向俄国施加压力,公开告诉俄国,“只有取得和平,才能得到大宗贷款”^③。

日本的盟国英国,在战争中名为“严守中立”,实际上却站在日本一边。从1904年4月至次年7月,英国联合美国,先后向日本提供四次贷款(最后一次有德国银行界参加),总额达4.1亿美元^④,几占日本全部战费的一半。如果没有英、美的贷款,日本就很难同俄国作战。但为了防止俄德结盟,英国不得不同时设法缓和同俄国在中亚的矛盾,并为此与沙皇政府进行时断时续的秘密交涉。日本攻占旅顺后,英国感到日俄双方继续交战,互相削弱,既可能降低由英日同盟条约规定的日本在远东的作用,也无助于利用俄国牵制德国,因此,英国外交大臣于1月25日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出面居中调停。然而,英国不愿对日本施加压力,促其降低对俄国的要求,以免为自己在同日本谈判修改第一次英日同盟条款、将盟约义务扩大到保护英国在东亚的殖民地方面制造麻烦^⑤。

曾竭力怂恿尼古拉二世东进的德国^⑥,已达到了削弱法俄同盟的目的。但威廉二世担心,战争的长期延续,不仅可能使革命在俄国获得成功,而且势必波及整个欧洲,动摇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为防止革命而赞同日俄停战媾和,是帝国主义各国政府的共同心愿,德国尤其如此。因此,从1905年春开始,德皇也希望俄国赶快与日本媾和,集中力量对付革命。此外,德国也力图讨好日本,以免在远东的国际竞争中陷于孤立。1905年7月,德国与

①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4卷,第76—77页。

②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416—417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319页注②。

④ 关于向日本提供军费贷款的情况,参见多勃罗夫《日俄战争时期美国的远东政策》,第146—161页。

⑤ 尼什:《英日同盟史》,第294页;蒙格:《孤立的终止:1900—1907年的英国对外政策》,第184—185页。

⑥ 1904年7月俄德签订贸易条约,规定1905年4月1日前俄国可随时向德国借款,尼古拉二世因此对战争前途更加乐观,立即提出俄国将以吞并中国东北作为这次战争的补偿。参见罗曼诺夫《日俄战争的终结》,载《红档》杂志1928年第3(总第28)卷,第185页。1905年2月,奉天会战前夕,德国向俄国提供了1.5亿卢布的贷款。

英、美金融界一起，为日本募集外债，便是它实行两面政策的一例。德国同美国在远东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对战后的远东政策双方观点大体吻合，所以愿与美国合作，以防英、法两国插手和谈^①。

在战争中积极支持日本的美国政府，曾一再试图在日俄之间进行斡旋。如果说欧洲列强希望日俄和解，主要是为了调整英日同盟与法俄同盟的关系，重新组合力量以解决“欧洲问题”并防止革命；那么罗斯福总统最关心的是使交战双方两败俱伤，战后继续对峙，从而为美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扩展势力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同时，把日本牵制在北方，使其无法实现对菲律宾的野心，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1904年3月20日及5月9日罗斯福向德国驻美大使反复阐述的美国对日俄和战问题的出发点^②。

基于上述立场，美国政府首先主张满足日本对朝鲜的贪欲，并支持日本打破沙俄对东三省的霸权。1905年1月25日，罗斯福在获悉日本驻美公使转达的日本“在恢复和平后对于满、韩、旅顺的意图及希望”后，立即表示“日本必须确保旅顺，必须确保朝鲜”^③。同月下旬，他又与应邀访美的英国外交家斯普林-莱斯就两国对日俄和议的立场达成谅解，一致认为日本“有权要求占有旅顺和确保其在朝鲜的优越地位，不容俄国在朝鲜有任何特殊利益”^④。罗斯福还把上述见解告诉了法使朱塞朗^⑤。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主张战后沙俄仍留在东三省，与日本保持均势，互相牵制，以免后者过于强大，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劲敌。1904年12月，罗斯福设想的日、俄两国媾和的条件之一，就是“把满洲归还中国”，使之成为列强保护下的中立地区^⑥。次年1月25日及2月6日，他又分别向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和美国驻俄大使迈耶阐述了上述观点^⑦。这表明美国对日本试图独占东北怀有很大的戒心，并蓄谋假“中立化”之名，以其雄厚的资本为武器，将中国东北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① 参见多勃罗夫《日俄战争时期美国的远东政策》，第220—223页；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196页。

② 参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16—18页。

③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第226—227页。

④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4卷，第156页。

⑤ 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第382页。

⑥ 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第2卷，第580页。

⑦ 丹涅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第157、161—162页。

日本政府对“满洲中立”论持不同意见。这是围绕“满洲问题”出现的日美对立的萌芽^①。尽管如此,当4月18日高平希望美国总统进行“善意的”调停时,美国提出的唯一条件仍是日本必须归还满洲,并在东三省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实质上这是美国坚持要求与日本分享战争成果。日本政府深知,日俄开战以来,战争得以胜利进行,全仗英、美两国政府和两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今后能否取胜,仍取决于它们是否继续支持,因此讲和时不能不考虑英、美两国政府的意图,将战争的目的限定在英、美容许的范围之内。有鉴于此,4月25日,小村做出了相应的保证^②。于是,在日俄和谈前,美、日、英三国就战后朝鲜半岛、中国辽东半岛乃至整个东三省的地位问题达成了默契。美国达到了初步的目的。

日本海大海战后,罗斯福生怕日本完全取代俄国在远东的地位,惴惴不安地说:“俄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之被毁,对我们的安全来说将是……不幸的,最好还是俄国和日本对峙,使一方对另一方发挥抑制作用。”^③为防止“俄国被整个赶出东亚”,罗斯福决定出面干预^④。5月31日,小村利用海上大捷的有利形势,电令高平请罗斯福以“完全主动”的姿态,邀交战双方聚到一起谈判^⑤。罗斯福认为,这时俄国已弱而未尽弱,日本渐强而未大强,正是美国插手和谈的好时机,于是立即表示同意。

罗斯福的策略是通过法、德推动沙俄,迫使沙皇政府在它必须让步的地方做出让步;同时通过英国影响日本,使日本内阁不致对俄国提出过苛的要求。6月3日,德皇威廉二世鉴于俄国已不堪再战,并且有被革命吞没的危险,致函尼古拉二世劝和,同时给罗斯福写信,支持他出面调停。6月5日,迈耶奉罗斯福之命面见沙皇,为和谈说项,指出“继续作战只会使俄国全部丧失东亚的领地”^⑥。由于德、美双管齐下,俄国在国际上完全陷于孤立,沙皇遂于6月6日主持军事会议,研究军事形势,以便做出外交抉择。皇叔

① 日本政府认为,日本以确保中国“在东北进行改革并施行善政为条件”、将满洲归还中国的方案,较“满洲中立化”方案为优,意即战后的满洲应由日本而不是美国控制。参见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246—247页。

② 丹涅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第175、178—179页。

③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425页。

④ 丹涅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第202页。

⑤ 《日本外交文书》,第37—38卷,《日俄战争》第5册,第231—232页;丹涅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第189、215—216页。

⑥ 丹涅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第193页。

弗·阿历克山德罗维奇面对严重的革命危机，主张尽快开始和谈。他强调：“俄国国内的繁荣比战争的胜利更为重要”，“必须恢复国内的安定”，即必须全力镇压革命。尼古拉二世赞同上述意见，并指出迄今日本人还不曾在俄国国土上作战，但这种情况很快会改变；由于缺乏海军，海参崴、堪察加和库页岛可能被占领，“那时再进行和谈就困难得多了”^①。会议决定趁战火尚未延及俄国领土时议和，同时继续加强在满洲的俄军，以便在谈判时讨价还价^②。次日，沙皇向迈耶表示接受美国的建议。6月8日，罗斯福正式提议双方举行直接谈判。6月10日、12日，日、俄两国相继表示赞同。随后，又分别决定派遣全权代表前往罗斯福选定的谈判地点——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会谈。

为加强在谈判中的地位，日本在谈判前夕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

1. 接受罗斯福的建议，于7月间出兵占领了库页岛^③，堵塞了沙俄前往西太平洋的海上通道。

2. 同月29日，内阁首相桂太郎与正在东京访问的罗斯福总统的代表、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达成秘密谅解：美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权，日本保证对菲律宾无进攻的意图^④。

3. 从5月中旬开始，经过反复磋商，于8月12日与英国签订了期限为10年的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彼此确认对方“在东亚和印度”的“领土权利”和特殊利益，并规定缔约一方为防卫上述权利如与他国（一国或数国）交战，不论此项战斗发生于何地，缔约另一方应立即援助其盟国^⑤。

这一条约与第一次同盟条约的主要区别在于，英国承认日本有权对朝鲜“采取指导，监理及保护措施”；日本同意将条约的适用范围由远东扩大到印度。它是以俄国为主要对手的英、日两国在远东和南亚的势力范围协定和军事同盟条约。塔夫脱在该约签订前不久曾向日本保证，“为了远东和平”，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日本和英国可以指望并相信，美国将与英、日协力，“犹

① 《红档》杂志1928年第3（总第28）卷，第199—201页。

② 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211页。

③ 金子坚太郎：《日俄战争秘录》，第225页。转引自信大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第395页。

④ 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218—219页。罗斯福旋即致电塔夫脱，对此表示赞同。

⑤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4卷，第164—169页。按：9月8日，即日俄和约签订后第三天，双方将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通知俄国；9月27日，才予公布。

如承担它接受的条约义务一样”^①。这样，美国就成了英日同盟“未签字的成员国”^②，“匿名的合伙人”^③，从而为日本吞并朝鲜、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持和保护。

关于媾和条件，日本曾进行长期酝酿。早在1904年7月日军攻占中国辽阳之前，外相小村即已向内阁提出讲和条件草案，其纲领是：

1. “扩大我（日本）在满、韩及滨海省方面的权利”；
2. “从现在开始准备”参加将来瓜分中国的竞争；
3. 朝鲜“事实上为我（日本）主权范围”，“满洲在某种程度上为我（日本）利益范围”。

同时，小村将具体条件分别为“对俄要求”和“对华要求”两大类。关于对俄要求即和议大纲，共12条，其主要内容是：

1. 承认朝鲜全归日本自由处置；
2. 俄军撤出满洲，东省铁路限商业上使用，哈尔滨至旅顺段（及其支线）和辽东半岛的租让权转归日本；
3. 赔偿军费、割让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承认日本在俄国滨海省沿岸的捕鱼权。^④

1905年4月21日，日本内阁又审议了对俄和议的原则，确定了在谈判中必须满足的三项绝对必要条件和可以磋商的四项相对必要条件^⑤，具体要求与上述草案没有多大区别。同年6月30日由内阁通过并经7月5日天皇批准的给本国全权代表的训令，就是以此为基础制定的。训令把和议条件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不容磋商的“绝对必要条件”，计3项，其中包括上述和议大纲列举的关于朝鲜和满洲的全部条款；

第二类是由代表团尽可能努力实现的“相对必要条件”，计4项，内包括上述大纲关于割地、赔款的条款，并增加了引渡被拘留于中立国港口的俄国舰艇一款；

列入第三类的是新增的附加条款，可由代表团自行决定是否向俄方提

① 丹涅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第113—114页。

② 格里斯沃尔德：《美国的远东政策》，1938年纽约出版，第125—126页。

③ 杜勒斯：《中国和美国》，1946年美国出版，第126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7—38卷，《日俄战争》第5册，第59—62页。

⑤ 同上书，第104—105页。

出,其中包括限制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拆除海参崴的军事设施,将其改作商港两项。^①显然,通过谈判,使俄国最终承认日本用武力在朝鲜和中国东三省造成的政治局面,并尽可能谋求更多的侵略利益,是这项训令的基本点,它具有分赃的性质。俄国方面,尼古拉二世曾强调“不割让一寸土地,不赔偿一个戈比”是对日交涉必须遵循的原则。^②

在1905年7月11日给俄国全权代表的训令中,他又具体规定:割地,赔款,解除海参崴的武装,禁止在太平洋上保留俄国舰队,交出通往海参崴的铁路(东省铁路)等项,有损俄国的“荣誉与尊严”,“绝对不能接受”。但训令接着指出,日本的割地、赔款要求,“非但不应构成中断和谈的理由,甚至也不能构成拒绝全面讨论”这些要求的理由;一旦讨论上述条件,则可提议用其他办法来代替。例如,如日本要求割让库页岛,可宣布俄国准备在渔场方面给日本以广泛的特惠;如谈及赔款问题,可允给日本以工商业方面的某些关税特惠或其他特惠^③。“于是,训令为处理各种复杂局面开辟了广阔的途径。”^④与此同时,训令列举了“有可能达成友好协议”的一些条款,其中包括:旅大租借地转让日本(但根据俄中条约,此事须商得中国政府同意);以提前赎买的办法,将南满支线(自旅顺口至吉林省南界止)“转归中国所有”;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地位(但日本应承认朝鲜的“完全独立”),等等^⑤。可见,沙俄意图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既得利益为条件,与日本达成协议。

比较日俄双方的议和条款,不难看出,尽管双方在割地赔款问题上的立场根本对立,但在朝鲜的地位、辽东半岛租借权的归属等问题即重新分割势力范围方面,有许多共同点,这就为和谈较快达成协议准备了重要的前提。至于沙皇训令中以“但书”形式提出的附加条件,只不过是用以争取国际同情、掩入耳目的外交辞令,并不表明沙俄尊重中国和朝鲜的主权。

二 《朴次茅斯和约》的订立及其对中国的严重后果

8月10日,和谈正式开始,首由日方全权代表小村提出和约草案12款,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7—38卷,《日俄战争》第5册,第106—107页。

② 这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市杜马给尼古拉二世电文中提出的口号,受到沙皇的赞赏。参见库塔科夫《朴次茅斯和约》,第64页。

③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508—509页。

④ 库塔科夫:《朴次茅斯和约》,第19页。

⑤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509—510页。

其内容与前引日本政府训令所列基本相同,只是未列入拆除海参崴军事设施这项要求^①。8月12日,俄方全权代表维特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日方要求一一作复,除割地(第五款)、赔款(第九款)、限制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第十一款)和交出被扣于中立港的军舰(第十款)四项外,原则上接受了日方提案的所有其余各款。此后,谈判在日本提案的基础上逐条进行。至8月16日,关于朝鲜、中国东三省、东省铁路等项,均已达成协议。余下的割地、赔款问题,双方争持不下,致使谈判陷入僵局。

但是,由于库页岛已被日军占领,一时无望夺回,加以罗斯福的干预,8月23日沙皇决定同意将该岛南半部(北纬50°以南)割让给日本^②。至于赔款问题,日本要求俄国交付12亿日元作为收回库岛北半部的代价,但维特坚持前此表示的意见:俄国尚有相当多的黄金储备,他“宁愿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金钱用于继续战争,而不愿给日人以赔偿”^③。尼古拉二世也认定,“日本人急需钱,我们就不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无可能达成协议。”^④日方对此也已心中有数,桂太郎早就“不认为俄国有赔款的可能,不过情况不许(日本)在一开始便表示放弃赔款的要求”^⑤。同时,罗斯福担心日本会利用赔款加强其庞大的舰队,危及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于8月22日敦促日本不要坚持赔款要求^⑥。26日,小村致电本国政府,请求最后指示。日本内阁遂于28日召开内阁会议及御前会议,就这个问题做出了决定。会后给代表团的训令说:“鉴于……达成和议”,“但应先放弃赔款要求,而坚持割地要求。”^⑦于是,双方在8月29日第十次全体会议上就割地、赔款问题达成了协议,同时就满洲撤军、东省铁路的分割、“护路队”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9月1日,双方签署了停战议定书;5日,维特和小村等在《朴次茅斯和约》上签字。

日俄《朴次茅斯和约》计正约十五款,附约二款,其中涉及中国主权的

① 日本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下册,第61—62页。草案全文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7—38卷,《日俄战争》第5册,第277—278、319—320页。

②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568页。

③ 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4卷,第92页。

④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540页。

⑤ 谷寿夫:《机密日俄战史》,第646页。

⑥ 亚尔莫林斯克编:《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56—157页;丹涅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第268—269、274—275页。

⑦ 《日本外交文书》,第37—38卷,《日俄战争》第5册,第300—301页。

内容有：

1. 俄国将包括旅顺口、大连湾在内的辽东半岛租借地，及其附属的一切公共财物，让与日本（第五款）；

2. 俄国将由宽城子（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一切支线，铁路区域内所附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在内，都转归日本（第六款）；

3. 两国在东三省各自经营的铁路，只限工商业用，不得用于军事目的，但辽东半岛租借地内的铁路不在此限（第七款）；

4. 以 18 个月为限，日、俄两国军队同时全部撤出满洲（辽东半岛租借地除外）；为“保卫”各自的铁路，可留驻“守备兵”，每公里不超过 15 名（第三款，附约第一款）。

此外，俄国以北纬 50° 为界，将库页岛南半部及其附近的一切岛屿割让日本（第九款）；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特殊权利，对日本在朝鲜采取的“指导、保护和监理措施”，不加妨碍或干涉（第一款）。^①

这样，《朴次茅斯和约》满足了日本所坚持的“绝对必要条件”。日、俄为分割中国东北而进行的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的战争，至此以完成可耻的分赃而结束。《朴次茅斯和约》记录了这次分赃的结果。

日俄战争的陆战，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中国是主要受害者，日俄和会中国理当与闻。为此，清政府于 7 月 6 日分别向日、俄两国要求参加和谈，并严正声明：“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② 但是，日本驻华公使复照说：“此次议和自当专在日俄两国直接商定，当不容有第三国从中干预，有所容喙也。”^③ 沙皇政府则声称：“战属俄日两国，则和议条款必由俄日全权商议。”^④ 两国此唱彼和，悍然将中国排拒于和会之外。因此，《朴次茅斯和约》关于中国的条款，是背着中国政府议定的，完全非法的。

诚然，《朴次茅斯和约》第五、第六款规定，俄国以掠自中国的辽东半岛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等“转让”日本，“须商请中国政府允诺”，这仿佛表明

① 条约全文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 37—38 卷，《日俄战争》第 5 册，第 528—538 页。汉译本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4 卷，第 201—205 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90 卷，第 5—6 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 37—38 卷，《日俄战争》第 5 册，第 174—175 页。

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86 卷，第 6 页。

缔约双方尊重中国主权。其实不然。上文提到,早在1904年7月小村向日本内阁提出对俄和议大纲的同时,就已提出了对华要求十款,预谋在日俄和后立即逼中国政府承认,其中就含有日俄和约第五、第六款的内容,其要害是侵犯中国主权,维护日本在东三省的既得利益^①。这充分说明日本政府在战前、战时(以至战后)向各国屡次声明的,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等等,纯属伪善。沙俄擅自以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同日本作交易,在和会上满足了日方的上述要求,根本没有把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对待。“和约”第五、第六款“商请”云云,不过是缔约双方别有用心的安排,旨在给双方私相授受、践踏中国主权的罪恶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

事实正是如此。“和约”签订后,日本内阁为实现原订计划,完成形式上的“转让”手续,于10月27日正式决定向中国提出在东三省开埠、筑路、伐木、捕鱼、内河航行,无条件承认日俄和约第五、第六款“允让日本的一切”等项要求^②。接着,小村奉命率代表团于11月16日来华谈判。自17日起,经过22次会议,于12月22日在北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正约3款,附约12款。清政府除被迫同意日俄和约第五、第六款让与日本的各项权利外,并允诺:东三省开放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宽城子(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满洲里、海拉尔、瑗珲等16处为商埠;日本得继续经营战时擅自铺设的安东(今丹东)至奉天的军用铁路;鸭绿江右岸的森林采伐权转归日本;日本得在营口、安东和奉天划定租界;等等^③。这样,日本通过该约从中国获得了远比“和约”所规定的多得多的特权。日本学者也指出:这个条约“超出清国政府承认《朴次茅斯和约》的范围,给日本新规定了许多额外的权益”^④。这是日俄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新灾难。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是《朴次茅斯和约》的延续与补充。日本

① 小村草拟的十项对华要求,其要点为:(1)不割让满洲;(2)“维持”满洲秩序及地方安宁;(3)“改善”行政、兵制和警察;(4)转让由哈尔滨至旅顺的铁路(南满铁路)及其支线和附属权利;(5)安东、辽阳间铁路及南满铁路延展至吉林省城的铁路修筑权;(6)转让辽东半岛租借地;(7)在满洲开商埠12处;(8)辽河、松花江、鸭绿江的航行权;(9)鸭绿江及浑河沿岸森林采伐权和矿山开发权;(10)奉天省沿海的捕鱼权。详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7—38卷,《日俄战争》第5册,第62—63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38卷第1册,第105—107页。

③ 同上书,第155—159页;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220—223页。

④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日俄战争》,第10页。

以此为依据，将东三省南部视为它独占的势力范围；1906年6月7日，敕令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作为它侵略东三省的大本营；7月底，又仿照俄国远东总督府的体制，设置关东都督府，实行血腥的殖民统治；“南满”终于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贻患无穷。

《朴次茅斯和约》使沙俄放弃了它在远东的部分殖民利益，自中国东三省南部撤出，但换来了喘息的机会，得以集中全力扑灭国内的革命烈火，幸免覆灭。此后，它以中国为取偿对象，苦心经营“北满”，并变本加厉地把侵略魔爪伸向了蒙古、新疆一带。

《朴次茅斯和约》缓和了日、俄两国在远东的矛盾，加速了英、日和法、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相互靠拢的进程。美国通过干预日俄和谈，加强了它在远东的地位。以此为起点，欧美列强及日本侵华的新格局逐渐形成，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加深了。

中国是未曾参加日俄战争的中立国，却承担了战争的严重后果，日、俄侵略者难辞其咎。另一方面，“立宪的日本”在战争中击溃了专制的俄国，这一事实不仅促进了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教育了中国人民。在俄国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人民迅速觉醒，其结果是中国封建专制王朝在辛亥革命中崩解。这肯定是帝国主义者所始料不及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本卷论述19世纪末至1917年沙俄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和侵略活动,兼及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华侵略和十月革命后沙俄残余势力对中国的侵扰。本卷(上)第一章论述19世纪末期沙俄加紧对华侵略扩张;第二章论述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对中国的侵略;第三章论述争夺中国东三省的日俄帝国主义战争。